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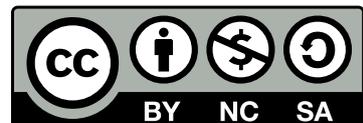
梦园呓语

我的三观独白

征求意见稿 20240627

作者：孙滨
日期：2024年6月
网站：<http://github.com/sd44/dingjia>
邮箱：sd44sd44@yeah.net

本作品采用 [Creative Commons](#)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目录

目录	iii
序言	ix
鸣谢	xiii
第一部分 空间生产	1
第一章 济南市丁家庄城中村照片集	3
第二章 济南市丁家庄城中村见闻散记	19
2.1 城中村的简单概念	19
2.2 背景介绍	20
2.3 初见	20
2.4 黑夜与清晨	21
2.5 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	22
2.6 何不食肉糜	22
2.7 过往的宅田基地之殇	23
2.8 希望的贫民窟与绝望的贫民窟	25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空间生产摘抄	27
3.1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27
3.2 列斐伏尔	29
3.3 大卫·哈维	32

第二部分 杂思	37
第四章 生命	39
4.1 关于无国界医生的一场争议	39
4.2 “科学”的优生学绝育论	40
4.3 被漠然视之的生命权	41
4.4 20 世纪的战争	42
4.5 人相食	43
第五章 工作制	45
5.1 传统超时加班企业	45
5.2 新型超时加班企业	46
5.3 工作时长立法	47
5.4 超时加班的危害和原理	48
5.5 工时改革问题的民族国家与全球化困局	50
第三部分 国际政经	53
第六章 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	55
6.1 罗斯福新政	56
6.2 凯恩斯主义	58
6.3 从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59
第七章 新自由主义札记	61
7.1 新自由主义的概念	61
7.2 哈维对新自由主义实践的批判	61
7.3 新自由主义的实质	64
7.4 联合国债务与人权独立专家报告	65
第八章 维基解密、阿桑奇与西方政治	75
8.1 维基解密简述	75
8.2 希拉里邮件门事件	75
8.3 维基解密的理念	78
8.4 维基解密的缺陷及问题	78

8.5 希拉里邮件门之后	79
第九章 早期苏俄科社实践	81
9.1 序言	81
9.2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缺陷	82
9.3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苏俄的影响	84
9.4 二十世纪初至十月革命的俄国	86
9.5 十月革命之后到新经济政策	88
9.6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争论	91
9.7 斯大林模式	94
9.8 早中期苏联科社实践总结	97
9.8.1 苏联领导人对马克思思想的正反应用	97
9.8.2 苏联的国家性质	100
第四部分 平民视角下的中国	103
第十章 关于中国的前言	105
第十一章 计划经济时期 1949–1978	107
11.1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1949–1956	107
11.2 红色社会主义社会时期 1957–1978 年	112
11.2.1 财政体制改进	112
11.2.2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14
11.2.3 整风到反右派	114
11.2.4 浮夸风、命令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权风	115
11.2.5 大跃进中后期的安徽省	118
11.2.6 对“大跃进”的补救措施及反思	122
11.2.7 继续阶级斗争	124
11.2.8 笔者个人总结	125
11.3 计划经济时期的成就	126
第十二章 市场经济过渡时期 1978–1992	129
12.1 时代背景	129
12.2 整体意识形态转变	129

12.3 领导制度改革	134
12.4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分歧	136
12.5 农业改革	140
12.5.1 包干到户、村社分设	140
12.5.2 合同订购制、农业价格双轨制	141
12.6 城市改革	148
12.7 企业改革	149
12.7.1 雇工及企业性质	149
12.7.2 乡镇企业	150
12.7.3 就业制度改革	153
12.7.4 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和增强企业活力	154
12.7.5 价格双轨制和价格闯关	155
12.8 金融改革	160
12.8.1 现代化银行	160
12.8.2 汇率双轨制	160
12.9 财政改革	164
12.9.1 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层逻辑	164
12.9.2 财政包干制	164
12.9.3 税制改革	167
12.9.4 拨改贷	169
12.10 土地财政	170
12.11 权力寻租、官倒和腐败	174
第十三章 市场经济体制时期 1992-	177
13.1 农业改革	177
13.1.1 粮食并轨	177
13.1.2 重回粮食双轨制	180
13.1.3 混沌双轨制	181
13.1.4 有限制的市场化改革	187
13.2 分税制	188
13.2.1 分税制历史资料简单汇总	188
13.2.2 分税制的后果	191
13.3 土地金融	195

13.3.1 海南房地产泡沫危机·····	195
13.3.2 住房双轨制·····	197
13.3.3 新的增长点——住房市场化和资本化·····	199
13.3.4 土地招拍挂·····	200
13.3.5 土地增值税·····	203
13.3.6 地产商阶层对金融监管的胜利·····	203
13.3.7 四万亿元投资刺激·····	206
13.3.8 土地置换制度·····	209
第十四章 再论土地金融及个别经济概念	215
14.1 王小鲁《土地财政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215
14.2 土地财政还是土地金融?·····	222
14.3 地方债务·····	224
14.4 通货膨胀税·····	226
14.5 铸币税·····	226
14.6 超发货币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228
14.7 GDP、GNI 和分配正义·····	231
第十五章 中国未来怎么走?	235
15.1 背景: 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危机的共性·····	236
15.2 大国大城 = 超级资本原始积累·····	237
15.2.1 大国大城概述·····	237
15.2.2 具体批判·····	238
15.2.3 总结——美国式道路的超级原始积累·····	244
15.3 建立健全政策提案的不可行性报告·····	245
15.4 谨防影子政府·····	246
插图索引	249
表格索引	251
参考文献	253

经验或曰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却是，人民和政府从来就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从未依照其本应从历史中抽绎出来的教训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处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和解决。当重大事件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笼统的信条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的。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序言

写作背景

我出生于山东省一个财政困难县，幼时幸得父母、长辈宠爱有加，家中虽不富裕却不缺衣短穿，也因此不谙世事，不解人间种种，总活在自我的小天地中。等到初中二年级时便遭恶果反噬，世间一切对我来说太过未知和魔幻。尼采所述人类社会那怒吼着“你应该”的巨龙形象，让我只敢蒙着头瑟瑟发抖于被窝之中无所适从。这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这样？我该怎么做？一切茫然无措。高中跌跌撞撞上完就赶快滚回家里蹲起逃避一切，3年后才参加工作，真正步入这魔幻人世间……

2014年，我所在单位和宿舍均搬至济南市化纤厂路，步行不足200米便是丁家庄菜市场。约莫过了两年，我才注意到菜市场后面的一个中大型城中村——丁家庄城中村。我在家乡时听说过、见过贫困的农户，却未曾想到大城市城中村的人文环境竟如此奇特、与众不同，便在此租了一个单间，以求近距离了解。一两个月租期到期后，也常漫步于丁家庄。

人已经在场，可无知如我怎样去深入了解这样一大风土人情呢？深圳的邱文建议我采用社会学的视角去观察丁家庄，并多次对我鼓励和指导。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学习社会学知识，继而延伸到历史、政治经济学后，本电子书便立项了，此书也可理解为我个人三观的阶段性的总结。

然而，并没有什么彼岸或者终点……

贫困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实践

我对人文社科的探索，只是发现遍野荒芜杂乱。

致力于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大师、宏观叙事一片寂静。马克思的学说可分为三部分：经典哲学部分，因经典哲学只满足于认识世界、而对改造世界有先天缺陷，早被马克思自己扬弃——“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

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马克思由此走向政治经济学，足够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但在建设性上只有对“自由人的联合王国”等希冀，乏善可陈，实则充满绝望。他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试图通过“科学”论述指向彼岸，但只有纲领而缺少具体实践措施。

最满足社会主义的资本发展条件、已形成国有垄断和强大党派的德国没有走向社会主义，最不满足经济发达条件的俄国却建立起了苏联，由此开始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

20世纪50年代之初，早期苏联、世界实践和理论上的困境，使激进左翼思想在法国等国由强盛急转为衰颓，深受尼采和马克思影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又发扬起来。他们认识到了现代性（资本理性）“可以吞噬一切”。后现代主义反对总体论、本质论和霸权，倡导微观的欲望、解辖域化、少数民族权利及多元化，于悲观和批判中求彼岸。但不过几年便被虚无思想所占据，后来转出一批虚无主义者。这时其实已经不能叫做后现代主义了，它已没有了真正的批判精神。其实疲弱的当代人哪有什么勇气去信奉虚无主义呢！万物皆虚，那唯有自己的切实体验为真。所谓当代虚无主义不过是个人功利主义的画皮而已，且丑陋。

1968年法国、日本、美国、西德、意大利、墨西哥、巴西、泰国等国“未曾被预见，也不可预知”地突然爆发主要以学生青年为主力的左翼运动，“夺权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这些运动紧接着就被更强大的右翼浪潮压倒。

70年代左右新自由主义出现，80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将之大规模应用，全球化影响至今。联合国外债与人权问题独立专家也多次提交报告批判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发达国家借助新自由主义对他国的压榨剥削等。

1985年9月22日，美国为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及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性地贬值，运用霸权收取这些发达国家的“铸币税”，解决巨额贸易赤字，与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签订广场协议。加之日本之后的系列操作，开启了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序幕。由此，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巨大张力成为理论研究热点和世界发展方向。如今的中美贸易战也在这一范畴之中。其实在苏联时期布哈林早已提供了完整的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理论框架，一直未被重视。

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以各种形式的超发货币向世界各国（包括美国自己）民众收取“铸币暗税”，每次超发引起的经济危机又以更大规模的货币超发、大水漫灌来应对，终使美国人民和政府均陷入债务和货币贬值泥潭之中，唯有寡头们越来越富有。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也纷纷均向美元看齐，开启了滥

发货币的狂欢，辅以劳什子现代货币理论作经济学背书，最终成为世界性“击鼓传花”“只要我跑得比你快”的“债务型驱动”庞氏骗局。泡沫炸弹越积越大，越来越危险，各国又都野蛮希望能将危机转嫁至他国……

当代哲学不必说改造世界，就连对认识**当前世界**似也已提不起兴趣。
人的原始性和动物性真是没多少变化呵。

贫困的个人

本书框架草稿于 2019 年完成时，绝望情绪不减反增：在宏观社会认识上，我没有找到任何建设性的方法，仍只能意识到马恩所说的破坏性；在微观个人实践上，世界仍是时时让我吃惊于他的魔幻与不可思议，只不过个人能以更好心态去应对绝望。

并且我发现，我只不过鹦鹉学舌而已。同样的理论认识，也有不少人理解，我身边的草根们也可直透本质。只是理解无用，他们对此选择了麻木或者忽略，各自的生活已然如此艰难，哪有闲暇他顾……

纵然我有大能，可获知不那么贫困的理论，想必对我个人生活也无多大用处。抽象、一般的人文社科理论与个人具体的现实实践之间有太多太多的不同，指导不了多少东西。何况我所知只是贫困的呢，写作之路就此终止。

恍惚间又过五年，来到了 2024，我已过四十岁，身心机能均开始走下坡路，也无意再去搜寻什么大道理，已经开始“认命”，接受自己的各种不足，一切均是自己种下的果，果再酸却也不必强求什么。我还是要继续生活的啊，就算不再去面对那人类社会谜题，可如何自得，如何获取一种踏实感呢？

一些日本作品似乎提供了一个角度——礼赞万物为生而做的一切努力和挣扎，包括恶行。慕强而轻善恶，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将人性与兽性等同，甚至禽兽不如，强力大于善恶，我想这也是日本至今仍在不断滋生万恶军国主义思想的原因，不可不警惕。

令人意外的是，我忽然发现儒释道这类心性学问倒是挺适合求得心灵踏实，真是未曾设想的道路……些微欣慰之余，又怅然若失。我知道过去的我即将死去，新的自己将要“重生”，同时死去的还会有这本书。

除去真诚，此书似是无用且丑陋。可我确实很喜欢这本书啊。它终归有着我的存在，如果今时我不去修订完成，那这本书就再也完成不了。好吧，随意吧，那就写完吧。起码在写作时，我能体会到久违的踏实感。其实这种“踏实”也是逃避，当我走向丁家庄之后开始写这样一本费时费力又各方面不讨好的电

子书时，何尝不是我惯熟二十余年的懦弱手段——逃避，逃避虽可耻却有用。我一直知道，也一直践行着自己这贫困之道……

我安慰自己，此书无用、估计也不会有二三十个读者，却也是了不起的一本书。他了不起在仍敢发声直言，仍希望向上走。总要、也总会有人去做这些“无用之事”，我愿成其中一粒沙尘。

尼采曾盛赞一位夫人，因其对自己的孩子说“亲爱的，你总是做傻事，做傻事让你特别快乐”。我想我也是这样一个傻小孩吧，哈哈……

笔者孙滨文责自负。

许可协议

本书 L^AT_EX 排版源代码及 PDF 成品文件放置在 <https://github.com/sd44/dingjia>，采用 Creative Commons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可在遵守协议的前提下自由散播、拷贝、修改等。

我在立项之初便想实现社会化编辑，但一直无人参加，只好明知不可而为之，硬着头皮写下很多超乎我能力的文字，加之笔者又爱大放厥词，肯定错漏颇多，在此再次征求修订校对或合作者，一切皆可改。可通过 [github](#) 或邮箱联系。

项目之初笔者错用了小众且有难度的 L^AT_EX 排版，使他人难以方便参与协作。如果预计合作者增删改内容可达本书 2% 以上，我就将 L^AT_EX 源代码转换为更适合公众编辑的 [mediawiki](#)。

但恐怕还是难以如愿——不会有人深度参与。那本书永远停留在当前征求意见阶段就好，不过我也欣慰于它的使命已可告终结。

孙滨

2024 年 6 月

鸣谢

感谢丁家庄愿意信任我并接受社会调查的人们。感谢深圳的邱文，使我踏上对社会的研究和学习道路，并多次给予鼓励和指导；成都的 saintjoe，也与我摄影和社会展开探讨。

非常感谢知乎和微信上的“到芬兰车站”与“东方拖拉机厂打工人读书小组”群组，特别是行止、澎啊湃、Exphilonous、杜若致远、白鹤飞、寒霜雪蝶等人，大家的洞见交流和激烈争论使我获益良多。

电报“Coder Offtopi”群的 SteamedFish 就本书提出了最多的感想和意见，提供了各国贫民窟现象的素材，和我就书中各种世界观进行了真诚坦荡探讨，使我倍感温暖。

最为特别的感谢，献给我的大儿子——子墨。在我不想继续写作或者担心直言后果时，却是你这个小小少年在鼓励我，只是要爱自己、保护自己多一些啊。

最大的感谢给予我的妻子康利。结婚数年来，我屡屡不务正业，不事生产，毫无建树，总做些傻事惹人耻笑，妻十余年来默默承担起照顾家人和孩子的工作，受苦受累颇多，却无怨言，静静包容我的一切胡闹。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两个孩子，子墨和子韩。希望书中有些内容可以使你们在将来少走些弯路，多些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

第一部分

空间生产

第一章 济南市丁家庄城中村照片集

本章图片均为笔者拍摄于丁家庄城中村，采用了如实摄影（straight photography）的拍摄手法，力图直接呈现丁家庄的生态，让其为自己发声。



图 1.1: 丁家庄村碑



图 1.2: 熙熙攘攘的三八大集
2017年5月8日, 丁家庄每逢农历三、八为大集。



图 1.3: 北侧一处出租楼房外景
2017年4月7日



图 1.4: 一条街道

2017 年 4 月 7 日。



图 1.5: 城中村最为破败的一间自搭棚户

2017 年 5 月 6 日



图 1.6: 笔者田野调查中租住的单间

2017 年 4 月 25 日, 月租金 240 元, 网络费 30 元, 居住条件在城中村属于中等偏上。



图 1.7: 夫妻二人和他们一岁孩子所租住的储藏室

2017 年 4 月 1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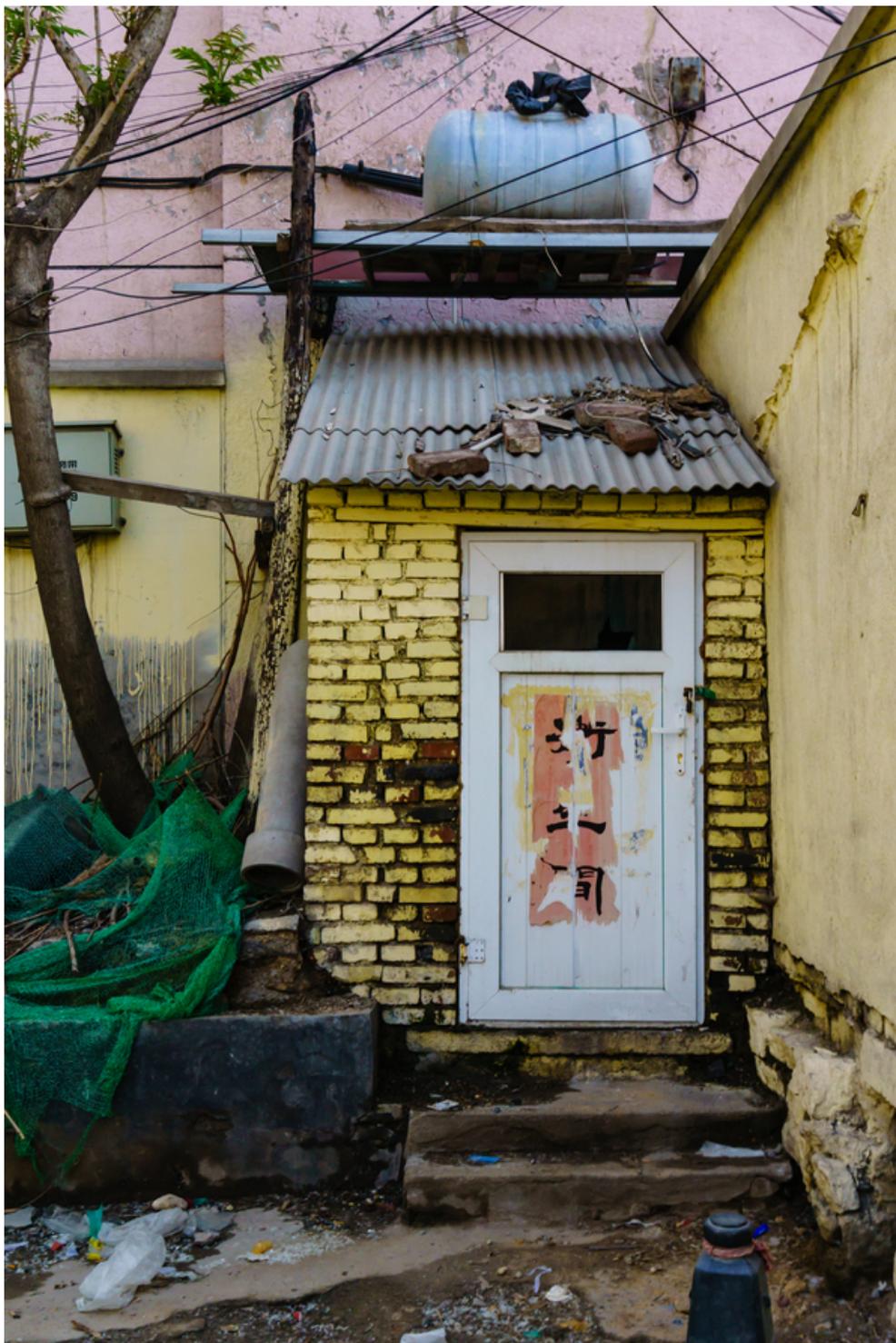


图 1.8: 城中村中等水平的简易卫生间
2017 年 3 月 31 日，这类卫生间多为房东所建，常常加锁，只供其名下租客使用。



图 1.9: 阳光

2017 年 4 月 26 日, 木制挂锁卫生间。



图 1.10: 二楼房顶私搭简易板房

2016 年 11 月 20 日



图 1.11: 丁家庄村民常用的木柴铁皮桶炉

2017年5月8日, 丁家庄一些村民为节俭持家常用这种简易炉烧开水, 火力弱, 耗时长、烟雾较大。



图 1.12: 幼儿园外墙与线缆

2017年3月31日。



图 1.13: 玩耍的孩子们

拍摄于 2017 年 5 月 7 日。



图 1.14: 改造楼梯、层层加盖的一座楼房
拍摄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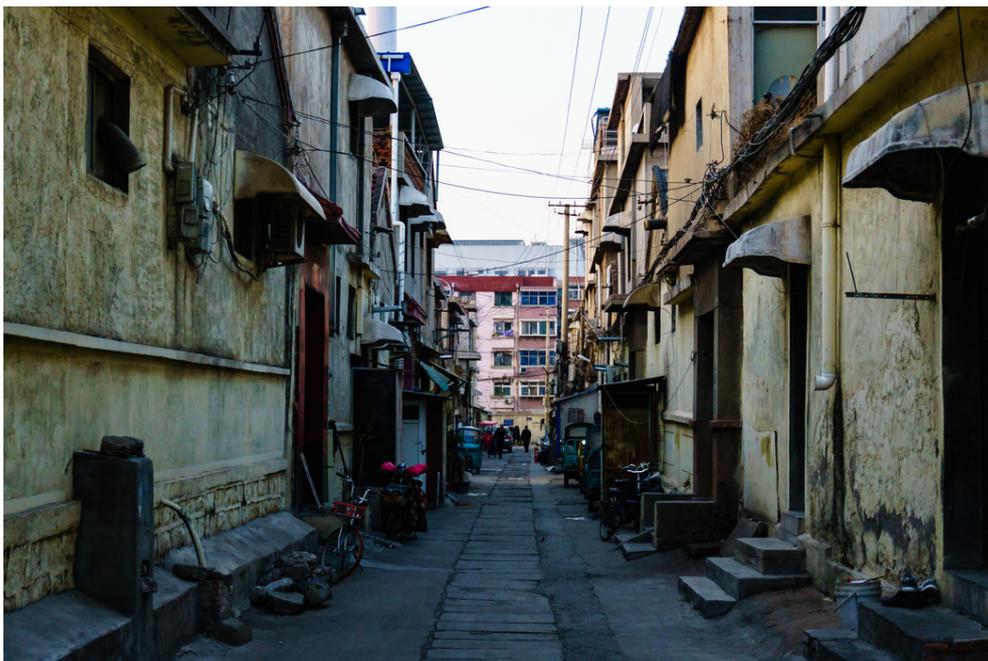


图 1.15: 街景

2017 年 3 月 26 日



图 1.16: 丁家庄综合市场中的一处菜摊

2017 年 4 月 26 日，年租金近 9 万，年耗塑料袋 1 万元左右。虽然是大棚内的开放式摊位，租金比综合市场中的活动板房小吃店还要高不少。



图 1.17: 城中村内一处简易搭建的菜摊

2016 年 12 月 14 日，城中村内一处菜摊，这里并无租金。内有被褥，卖菜大姐应当也睡在这里。



图 1.18: 简易菜摊消失了

2017 年 3 月 8 日，许是抵不住严寒和微薄收入，卖菜大姐和她的摊位不见了，只有床垫。



图 1.19: 墙上张贴的治安告示

2017年3月31日。这里盗窃案件可能略高于济南市其他小区，但远未达到恶劣的程度。笔者数十次进出丁家庄，未曾见过街头吵架斗殴。



图 1.20: 一位走失的小孩暂在三轮车摊主的怀抱中睡着

拍摄于2016年11月09日，小孩从综合市场误入城中村，寻不见家长大哭不止，后在三轮车饮食摊主怀中睡着，身上披着他人提供的大衣。



图 1.21：一处住户外侧的绿植与杂物

2017 年 4 月 12 日。



图 1.22：一处阳台——花与衣

2017 年 4 月 12 日。



图 1.23: 丁家庄工业南路南区一户未拆住房的外墙

2017年4月20日, 丁家庄南区是第一批拆除的宅基地住房, 当时已达成动迁20余户, 只余3户尚未动迁。

第二章 济南市丁家庄城中村见闻散记

2.1 城中村的简单概念

所谓城中村者，城市和村居性质兼而有之：它往往位于城市中心或郊区，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周边均具城市特征，自身却充斥着农村式的无序和自然，缺乏人工的总体规划，各家各户的宅地界限比传统村庄混乱得多，基础设施（能源、通讯、供水、交通、安全、卫生、医疗、文化等）薄弱，常住人口基本为农村户籍，土地制度仍为农村集体所有制而非城市的全民所有制；作为农村，它的外来流动人口数量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常住人口，耕地被大量或完全占用，转为实质上的商业或住宅地产，耕地的这种性质转变使常住人口原赖以生存的农业收入转为地产收入，并成为重要收入来源。

联合国对**贫民窟**的定义是“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对**贫民窟家庭**所作的定义为：

贫民窟家庭是指有以下一项或多项问题的家庭：*(a)* 缺乏改善的饮水；*(b)* 缺乏改善的卫生设施；*(c)* 缺乏足够居住面积，过于拥挤；*(d)* 住宅的结构耐久性差；*(e)* 缺乏土地所有权的保障。

我们通常所说的城中村可以认为是中国政府之前棚改文件中定义的“城市棚户区”，并且明显属于联合国定义的城市贫民窟范畴。^[1]

中国的城市贫民窟人口有多少呢？联合国人居署提供的往年数据如下：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4年
城市中贫民窟人口的比例 (%)	43.6	40.5	37.3	32.9	29.1	25.2
城市贫民窟人口的数量	1.316 亿	1.514 亿	1.691 亿	1,835 亿	1.806 亿	1.911 亿

表 2.1: 1990-2014 年中国城市贫民窟人口比例及数量

联合国人居署旗舰报告《World Cities Report 2016》^[2]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我国预计“到2020年基本完成城市棚户区改造任务”。根据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①，“棚户区住房改造2600多万套，农村危房改造1700多万户，上亿人喜迁新居”。全国轰轰烈烈兴起的城中村改造跑步前进，新型城镇化取得了惊人成绩，这同时也标志着曾经遍布每个大中型城市的老式城中村的大量消亡，丁家庄城中村也在其中。先让我们看下曾经的丁家庄是什么样子吧。

2.2 背景介绍

济南市丁家庄，又名丁家村、丁家新村，据1992年5月1日所立村碑记载：

明永乐年间（1403-1424）当地根据传说取村名“定妖庄”。后因此名不雅，故以“定”字谐音“丁”字改为丁家庄。

丁家庄隶属于山东省济南市姚家街道，曾是济南市一个较大且密集的城中村，在2000年前就已开始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住房餐饮等生活服务，共有村民宅基地（院落）近800户5000人，外来流动人口峰值大约可达30000人。丁家村城中改造是山东省棚改旧改的重点项目，于2017年年底基本完成房屋拆除工作，拆迁面积约为53万平方米，包括村民宅基地、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等，整体搬迁至奥体西路新建高层小区。

2.3 初见

笔者初入丁家庄时便因它表面的破败和杂乱而产生一种恐惧感。整个城中村除20余栋6层楼房以外，基本全是村民自建、层层加盖的三四层楼房，有的自建房已有些轻微倾斜，有的在房顶上再加装简易活动板房；各种样式的电线、网线、不明用途的线缆随意聚成一团团，与敞盖或无盖的配电箱、歪七扭八的电线杆纠结交织，这里似乎随时会演变为危房倒塌或大型火灾现场。笔者倒是未闻未见相关事故，或许是因户主和租户有一套自发自治管理办法。

条条未经规划和硬化的水泥石板路面也是蜿蜒曲折，纵横交错整个村落，笔者游历丁家庄数次之后才可不迷路。出租房基本都是单间，十几二十几户共用户主搭建的公共厕所，楼上住户冬天起夜时还要穿衣下楼，并不方便。村民们

^①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286356.htm

多是传统农民打扮，外来务工人员衣着也称不上光鲜亮丽。过往中国农村生活条件艰苦，重病患者、残障、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比例往往大于城市，而丁家庄这里边缘人的比例可能比传统农村还要高些。笔者有次刚要走出丁家庄时碰见村口一位 50 岁左右的男子坐在轮椅上斜着头，面无表情、眼神空洞，对周围不管不问地在晒太阳，或许是偏瘫。未过几秒，迎面又走来一个怯生生的 30 岁左右的男子。他提着午饭低头走来，看见我时便将整个身子直接旋转 180 度，定在原地背向我，不敢和我有一瞥眼的接触。当我正要和他擦肩而过时，这位男子又朝无人那侧 180 度急速转身，继续前行，他应有视线恐惧症或社交恐惧症等精神疾病吧。不过有路过的村民向他热情问候。

未接触过城中村的人，初入丁家庄，很难不恐惧吧，毕竟这里像是随时随地会发生刑事案件一样。然而，这确实多虑了。房东们多会查看并登记租户身份信息，考察租户人品性格，周边人群间的关系也比高楼大厦上来得亲密一些。一只只小小的、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普通挂锁足以保证财物安全。不知怎的，当我在那不足 10 平的单间里住宿时，却比在现代小区高楼上居住更加平静和坦然一些。

2.4 黑夜与清晨

丁家庄城中村的夜总比周边来的更早些。

街道路灯不多，住户多使用散发着黄色光晕的白炽灯。晚上八九点钟，灯光和墙面组成的黄色主色调混合着个别店铺的七彩霓虹灯光闪耀在城中村里，叮叮当当的做饭声时常在周边响起，笔者还见过住处一楼楼廊里一位不足 10 岁的小男孩独立炒菜做饭，归来的叔叔阿姨们在路过时对他不吝赞叹。

深夜，村外尚有较晚收摊的小吃车、大排档、夏天 24 小时营业的烧烤店、为深夜食客们服务的小零售店、长明的路灯和过往的车辆。村里却是另一片景象，这里更黑更静。晚 10 点左右还能偶尔听见晚归人家的锅碗瓢盆交响曲，11 点左右整个村子便一下子寂静起来，水泥石板路上鲜有路人。偶在没有路灯照耀的环卫点，有老人在几个垃圾箱中翻找可再利用的杂物。

这里的早晨也比周边来的更早些，6、7 点钟各处雄鸡打鸣，各家各样的声音均透过不隔音的墙壁和窗户传到家家户户，问候声、寒暄声也此起彼伏。孩子、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上班族一下子散布各处，城中村在这个时间已经开始繁忙起来。

2.5 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

笔者起初本想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社会学调查方法深度挖掘丁家庄，但因笔者的怯懦和懒惰未能成功，使本章主要是个别人文见闻，无甚社会学价值。

接受笔者调查的人群多为中老年人并且数量很少。存在严重样本偏差，导致不能推导出一般性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可以提下自己直观经验感受：不管是流动人口还是常住人口，他们身高较之周边明显偏矮，心脑血管疾病比例较多，也有被调查人家庭两代人中均患重大疾病的事例。《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7》中开篇有提“我国居民心血管病 (CVD) 危险因素普遍暴露，呈现在低龄化、低收入群体中快速增长及个体聚集趋势”，贫穷始终是种顽疾，甚至是绝症。

根据“丁家庄环境卫生管理公示牌”，丁家庄有保洁人员 21 人，保洁面积 4 万平方米。据本次调查，济南市环保局贯彻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为保洁人员缴纳三险。所聘用保洁人员多为丁家庄居住人口，当时每月到手收入在 1600 元左右。济南市环保局在社会保障上的表现出乎笔者意料，在此点赞。另外，有一例保洁员工伤纠纷，当事人为外地来济 60 多岁老人，因是否算工伤与环保局有分歧，环保局领导也曾亲切慰问。虽然当时问题并没有解决，但当事人对国家和政府仍表示“非常满意”，没有任何意见。

丁家庄老年村民大多没有缴纳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险，包括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也不了解具体政策。满 60 岁老人由村委每月补助 600 元左右。丁家庄大部份村民所能缴纳的社保只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有每年缴纳 100 元和 300 元两个档次。新农合在丁家庄村民重大疾病治疗上发挥了极其重要和显著的作用，常可报销 60% 多的费用。

2.6 何不食肉糜

虽然丁家庄北侧就是一个较大的综合市场，向周边几个社区的居民供给农副产品，生意兴隆但年租金昂贵，大菜摊租金约 9 万元/年。城中村里仍有些蔬果摊子长期固定在街道一角，它们铺设在水泥道路或机动三轮车上；还有些定期定时流动叫卖的轻型贩菜货车。城中村蔬果摊主要面向城中村内中老年居民，无需承担任何租金，多供应次一级的菜品并且价格低廉，但销售额和利润远不能与综合市场相比。（可参考图 1.16，图 1.17，图 1.18。）

这里我们来谈一个架设在机动三轮车上的水果摊主吧，笔者将其隐去名讳，代称为刘哥吧。即使在城中村，刘哥家的居住环境可能仍是最为糟糕的，他一

家三代住在一个 200 多元月租的单间中。他的立业史，也是每一步都恰被时代所驱赶和压迫的悲剧史。他做过走街串巷流动叫卖的小贩，被驱逐淘汰；又做过居民小区外较固定的摊贩，被驱逐淘汰；又做过丁家庄综合市场外路边摆摊的摊贩，相较综合市场的高额租金，路边摊所需费用便宜太多，同样也是被驱逐淘汰；最后刘哥成为了城中村内一个机动三轮车上的瓜果小贩。2017 年丁家庄已被夷为平地，真正的硬汉刘哥不知又将以何种方式去往何处，拖家带口继续书写他自己的奋斗史……

夏季的一天，笔者碰到他十岁左右的儿子从自家中捧来几片薄切的西瓜给他吃，可他明明就正在三轮车那卖瓜呀。

笔者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当笔者向一些人说起丁家庄综合市场和城中村菜摊的区别时，有些人会指责刘哥不努力不争气，质疑他为何不早在综合市场租摊位（高租金）以求得良好收益。一个一家三代居住在城中村破败单间的外来人，如何去承担每年数万的租金啊。我记得 90 年代初当我还是个小孩时，并没有铺天盖地地听到“成功”“成功人士”这类说法，对于贫穷者多半是怜悯其境遇不佳。今时简单用资本结果作为个人能力的衡量标准，从而一叶障目时，我们都将成为那个呆傻可笑的晋惠帝，“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2.7 过往的宅田基地之殇

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农村中，往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主要活动范围局限在村内，生产集中在自家规模极为有限的耕田或从事简单手工业、半加工业的家中，生活集中在自家住宅与村内公共空间。田区和住宅区常常分隔明显，呈大块状分布，同一大块内常是多家彼此有联结的田地或住宅，其中相联两家之间的田地多用沟、垄、界石作为田界，住宅之间多用共用的一面墙壁或距离极近的两面墙壁作为宅界。

多数人的社会空间长期固定、聚合、封闭在居住村，物质和社会资源有限，生产生活单调贫乏，村民之间联系频繁，信息传播速度快，甚至可以代代相传。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利益冲突常常尖锐持久、难以调和，田界和宅界作为最重要的家庭产权，具有相当刚性。

在实践和具体的社会空间中，这一刚性界限却又常常变动并受到侵蚀。它本身包含农村中通风、采光、日照、排水、通道等难以界定的方面，另外在国家 and 政府层面来说，又有历史遗留、立法不健全、执法成本高等问题；在村民来

说，则有历史遗留、普遍违规超额占用、法律维权成本高、法制观念不强、宗族势力等问题。

如果氏族大家庭或直系小家庭被其他大小家庭侵犯界限而未采取有效措施，则不单是家庭经济效益，连带个人和家庭的自我认同、社会地位也将受到严重负面影响。这也使宅、宅基地矛盾相当尖锐频发，家庭中的强壮男子往往被赋予保卫甚至扩张这一刚性界限的责任。过往中国对家庭伦理的重视，甚至重男轻女等现象，也多由此建立起来。

在笔者对丁家庄的走访过程中，也曾碰到宅基地纠纷当事人商姐（化名）说起一例二十多年前的惨剧：两家因新修墙壁越界而产生的宅基地矛盾步步升级，致使受到屈辱的商姐丈夫自杀。商姐带领家人将邻居群毆至半死，法院支持了邻居的索赔诉求，商家并未履行法院判决，于是被打邻居二十余年不允许商姐家开发自家一块空地。

丈夫自杀后，商姐带着两个儿子独立生活，其中小儿子当年不到两岁。她抓住了城市更新空间转化的时机，是90年代丁家庄第一批建立租屋的人。丁家庄拆迁前她的租屋总面积已经超过1500余平，出租房屋超过50户，月入过万，在丁家庄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她的两个儿子也争气，可给她带去一些宽慰，只是长年的劳苦使其腿疾明显，面态老相，但商姐勤劳不改，晚上仍会去丁家庄综合市场进行清洁工作，以换取一些额外的微薄报酬。总是风风火火、穿着男式西装、一瘸一拐地支撑起整个家庭的商姐啊……

当商姐以维权为理由向我极为悲愤倾诉她的故事时，笔者一再说明我这个自发小项目不能给其带来任何改变，也难以根据她的一家之言去支持她时，她对笔者的中立态度表示认可，最后甚至还埋怨起她的家庭当年为什么不让一下那寸土的界限，即使再让更多些也不要紧啊……

诉说过程中，笔者渐感商姐并非真要维权，并非还存那样强烈的恨意。她曾说要带笔者去看那块因久被搁置而自然成为停车场的空地，笔者当时就感觉可能此事到此为止，事实上也是如此。事后我为求证自己想法两三次询问时间安排时，她果然都借故推脱，并刻意回避我。

她真正想要的其实只不过是一场没有利害关系的倾诉……倾诉完之后当事人产生了羞愧感，不敢面对被倾诉人；而所谓仇恨早已经在时空的变换中变成了心中一大块难看疮疤。

随着丁家庄旧村改造的完成，丁家庄人将进入新的、现代化的城市空间，城市空间中的界限更为明显也易维权，原本农村中典型的宅基地矛盾将很少存在，希望两家日后能够相忘于江湖，也同样希望人们彼此能够多一些理解，多给一些倾诉的空间，以使悲剧不再那么多，那么难以令人承受……

另外笔者进行国在丁家庄发放调查问卷时，听闻山东大学有两个女学生也在发放社会学调查问卷，并且工作扎实，在此深表惭愧……

2.8 希望的贫民窟与绝望的贫民窟

中国的城中村早先多是位于中大型城市郊区的传统农业村庄；上世纪90年代出现农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劳动力大规模流动转移的“民工潮”，城中村始现。随着21世纪初人口流动逐渐全部放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中村开始兴盛，成为城市景观中一个特殊部分。

在此过程中，城中村原常住居民集体农地逐步减少，多转为事实上的集体工商业出租用地；其中一些村集体也由此走向富裕之路；村民主要收入由农业转为出租，非规划占地、无序自建房屋；城中村也由此成为不断扩张的城市的一部分；城中村基础和配套设施薄弱，且仍保留着部分乡村特色；常常薄薄一墙之隔，里边是城中村，外边是摩天大楼和现代化道路。

当一群群、一波波外来务工人员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时，城中村给了他们一个暂时的落脚地，只提供最基础生活保障，但也得以较少，甚至可以不承担，城市公共服务显性或隐性的“税收”，使他们得以省吃俭用、向着梦想奋斗，在此过程中，不少人创造了一个个发家致富的奇迹，也为一些赤贫、生理或精神病患者提供了一个并不足以保暖御寒的小小家园。

联合国2003年发布了《贫民窟的挑战》报告，报告描述了两种贫民窟——希望的贫民窟和绝望的贫民窟。

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多提一些量化分区指标，以准确补强定义，那是专家干的事情。我们可以依托世俗对“希望”和“绝望”两词的理解，对联合国定义补充如下（粗体为笔者自加注释）：

希望的贫民窟“进步”的住区，其特点是新的、通常是自建的建筑，通常是非法的（例如擅自占地）。这些建筑正处于或最近经历了发展、巩固和改善的过程。**大部分住民的生活质量有基本保障或逐步提高；存在阶层跨越空间，部分人得以搬离贫民窟，住进其他拥有完善配套设施和产权的现代化社区。**

绝望的贫民窟“衰落”的住区，其环境条件和配套服务正在经历退化的过程。**大部分住民对未来丧失信心，人文环境恶劣，难以阶层跨越，多发违规违法事件且难以根治。**

中国几乎全部城中村都为丁家庄类似“希望的贫民窟”、并且绝大部分城中村也已改造完成，不少原常住人口、产权人也已住上现代化高楼大厦，配套设施较为完善，彻底脱离“农村”，正式成为“城市”的一分子。甚至世界的贫困状况也主要因中国一系列扶贫安置政策而得以明显改善，联合国多次对中国不吝赞美之辞。

“绝望的贫民窟”在中国极少，但也有，如曾经的深圳龙华三和人才市场周边，“三和大神”们“干一天，玩三天”，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材料多抵卖给违法犯罪团伙，负债累累，挂逼^①习以为常……

当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之时，很多城中村被列入市政规划。一些城中村居民希望借此获得更多收益，住上一至多套宽敞明亮新房，政府也为其配备了集体工业用地、商业用房用以补偿村集体经济，补偿金额也在逐年提升。

但是也有一些家境更为贫寒、缺乏可持续收入来源的居民确实不希望搬迁，因为搬迁进入高层楼房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和城市公共服务隐性税赋，同时失去了原有稳定的房租收入来源。而外来租户的权利，更是往往被忽视，因其“大可去其他地方出租”，似乎很“公平”。前文中的瓜果商刘哥和曾经居住在此的边缘人群又将去经历怎样的风雨，去怎样奋斗呢？

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必然面临着一个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个别“钉子户”为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漫天要价，会对整体规划产生巨大损耗，甚至导致规划夭折。这是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市场和个人功利的必然结果，自上而下的弥漫扩散。为应对这种局面，资本将可能联合政府使用软硬手段（例如以村集体多数通过的“合理性”等方式）完成拆迁安置，摧毁这部分群体的个人功利诉求。

过高拆迁安置成本的老城中心、已由低容积率升级成超高容积率的密集高楼住宅区等，也将因难以具备资本增殖空间而成为城市更新的弃儿，生活环境和条件日渐衰退，贫民窟化。

在恩格斯、列斐伏尔、哈维等关于空间生产、城市权利的论述中，有条可怕的论断：现代社会城市更新的过程亦是阶级再生产的过程；在旧的差的空间被“建设性摧毁”，城市边缘人被抛离出原住所时，更旧更差的空间必将在城市他处生产出来。

这意味着希望的贫民窟将向绝望的贫民窟步进转化，且无法真正根除……

^① 挂逼：三和群体的象征性概念，常指遇到了特别困难的情况，比如身无分文，有时也指身亡。但大多时候指的是基本上身无分文又无事可做的状态。进入“挂逼”状态时在三和所能买到的最廉价的商品则被称为“挂逼×”，如人民币五元一碗的“挂逼面”（清汤面），五角一支的“挂逼烟”（“红双喜”牌），两元两升的“挂逼水”（也叫“大水”，一般为“清蓝”牌），十五元一晚的“挂逼床位”等。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空间生产摘抄

3.1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臧峰宇《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研究读本》:

我所说的“欧斯曼计划”，是指把工人区，特别是把我国大城市中心的工人区从中豁开的那种已经普遍实行起来的办法，而不论这是为了公共卫生或美化，还是由于市中心需要大商场，或是由于敷设铁路、修建街道等交通的需要。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到处总是一样：**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这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别处，并且往往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3]243}

住房短缺也是这样。现代大城市的扩展，使城内某些地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这样提高价值，反而降低了价值，**因为这种房屋同改变了的环境已经不相称；它们被拆除，改建成别的房屋。**市中心的工人住房首先就遇到这种情形，因为这些住房的房租，甚至在住户挤得极满的时候，也决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额。这些住房被拆除，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政权曾通过欧斯曼在巴黎利用这种趋势来大肆敲诈勒索，大发横财。但是欧斯曼的幽灵也曾漫步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而且在柏林和维也纳似乎也感到亲切如家乡。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房以及一般较小的住房都变得又少又贵，而且往往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房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房只是一种例外。**^{[3]193}

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发现恩格斯对住宅问题的分析也具有某种空间权利及空间正义的考量。他对资本统治下城市空间的分化隔离、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生存空间被剥夺的现象进行了科学分析，把城市空间的矛盾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实乃深刻的思想洞察。^{[4]74}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理解资本逻辑的特征：**其一，资本逻辑是以资本的增殖为终极目的而把一切变成为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的一种强制关系。**在这一关系中，资本增殖是一切行动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而作为创造资本的主体—劳动者却被降低为被剥削的对象和役使工具，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其二，资本逻辑的展开过程就是资本逻辑内在矛盾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资本逻辑的过度膨胀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极端贫困，激化了社会矛盾，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以至于威胁到资本的统治，从而迫使它寻求**维系剥削与总体利润最大化的长远机制**，其外在表现就是资产阶级解决社会问题的种种尝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自我修复、自我进化的能力。当然，这只是资本逻辑的自我循环。

资本拜物教的信徒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必然基于对资本逻辑的认同，他们从不怀疑这一逻辑本身……这也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在看待社会问题上的局限性。^{[4]100}

房租的背后是资本的生产链条以及经济规律的调节作用。其中主要的一环就是地租，这是由于城市的迅速发展使得现实的经济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工业和商业资本的有机构成高于农业，所以为了加快资本周转和创造剩余价值，就必须让渡给土地所有者更多的地租，以便于城市土地顺畅地参与市场资源的配置。**

关于在美国怎样自然而然地形成这种**把工人束缚在大城市或新兴城市附近自己的“住房”**上来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1886 年 11 月 28 日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来信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明“在堪萨斯城内，或者确切些说，是在城郊，我们看见一些可怜的小木房，每幢木房大致有 3 个房间，小木房所处地段还很荒僻，地皮价值 6 美元，面积正好可以容纳一幢小房子，小房本身又值 6 美元，所以为了获得到处是烂泥的荒郊中离城里一个钟头路程的一所糟糕的小房子，总共要费去 4800 马克。”这样，**工人就必须负起沉重的抵押债务，才能得到这种住房，于是他们就真正变成**

了自己雇主的奴隶，他们被自己的房屋拴住了，不能离开，只好同意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

3.2 列斐伏尔

张笑夷《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研究》^[5]:

空间的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而然的再生产，而是被构想的和深思熟虑的结果。空间具有政治性，它是政治统治的工具，空间的生产是现代主义国家的政治战略。“空间与政治国家的关联比曾经的领土与民族国家的关联更牢固。它不仅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所有权生产；而且它是一种政治产品，具有行政和残暴统治性的产品、由政治国家上层统治关系和战略决定的产品。并且，这不是在某一政治国家范围内，而是在国际和全球范围内，在全球国家体系范围内的生产。”

从列斐伏尔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了它自己的空间，在空间的生产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改变为“**国家生产方式**”。同时，空间不仅成了生产力要素、生产关系和所有权关系要素，还完全成为政治性的，政治性的空间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主导性的。空间的政治性主要表现为，**首先，空间是意识形态的，它是社会技术专家治国制的表象。其次，空间是实践的，是政治权力的工具和手段。最后，空间是战略性的，它从属于政治目标，被纳入了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过去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中，土地曾被视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残余而被忽视，建筑业的重要性曾远远不及钢铁生产、制糖工业等。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实践则相反，**土地进入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范畴，在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生产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显而易见，政府的住房规划就促进了这种以“**不动产**”的**动产化为特征**的空间的生产。住房建筑与土地不可分割，土地构成住房价值的一部分，于是，被分割的一块一块土地成了空间性的产品。“因而，资本投资在房地产部门中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一个补充性和互补性的剥削领域……在一些国家中，比如西班牙和希腊，房地产部门已经成为由相当熟悉的政府干预形式所构成的经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其他国家，比如日本，求助于房地产部门来弥补通常的生产-消费循环

带来的困境并增加利润，这已是稀松平常之事：甚至对房地产部门进行事先预测和规划。”基于作为整体的空间的生产的新资本主义的增长战略为了实现空间的生产而进行的空间动员开始于土地，然后，这种动员延伸到地下空间和地上空间，从地下的能源、原材料资源、地面的土地资源到地上的被建筑或各种需要分隔出来的空间容量都被赋予了交换价值，作为整体的空间成了一个更庞大的“商品世界”。过去我们买卖或租赁的是土地，而今是房屋、楼层、公寓、停车场、游泳池等各种各样的可交换可计量的碎片化的空间。“空间成为商品，把空间中的商品特征发展到了极致。”

列斐伏尔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个关于空间战略的高层决策；不是欧洲的，不是欧洲的空间战略，而是一个法国的空间战略。换句话说，它描绘着中心化，巴黎的中心化。巴黎必须变成像鲁尔或英国的巨大都市一样的财富和权力的都市核心。这是关于空间政策的政治决定。”因此，**中心化需要更高的政治理性，也就是需要国家或者叫作都市理性以更有效的方式，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和整体上生产空间，通过这种空间秩序的中心性驱逐边缘要素，强有力地集中财富、行为手段、知识、信息和文化。同时，因为中心化是一种政治决定，它还需要技术和知识的代理人，也就是规划者为中心化提供不证自明的合理性。**

工业化带来的破坏——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地重建，即在**整个社会的规模上进行重建**。这一过程的推进，伴随着许多越来越深刻的矛盾。现存的生产关系被推广、扩张了；在同时把农业和都市的存在整合起来的过程中，它们又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一方面，**拥有某些未知的权力的决策中心已经形成**，因为这些中心集中了财富、压迫性的权力和信息；另一方面，对过去的城邑的破坏，使得各种形式的隔离成为可能，各种社会力量无情地将人们在**空间中分隔开来**。由此，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解体了，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和所有制关系密切相关的那些关系，被集中化了。”总体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和政治权力主持整合历史城市和农业，把地下、地面和地上的空间以及世界范围的空间作为整体进行规划，为寻求日益稀缺的能源、水、光等资源而被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都市空间既是统一的又是分离的，都市空间被分割和分隔成彼此分离又相互叠加的异常复杂的空间碎片，国家和政治权力保证碎片化的都市空间**

相互联系，同时，国家和政治权力正是通过历史城市的碎片化和中心化建构来保证都市空间的统一性。

当国家和政治权力占据它所生产的空间时，日常成了政治建筑屹立其上的土壤。权力处心积虑地联合技术和实证知识，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日常生活的连续性，把都市社会伪装成具有虚假透明性的“抽象空间”，结果是，这层神秘的面纱把都市社会的日常生活笼罩在恐怖主义之中，“对社会成员来讲，到处弥漫着恐怖，暗藏着暴力，压力来自四面八方，只能通过超人的努力来避免或转移这种压迫；每个成员都是恐怖分子，因为他们都想掌权；因此，无须有一个独裁者；每个成员都自我背叛和自我惩罚；恐怖不能被定位，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来自每一件事；‘系统’（如果能被称为‘系统’的话）掌控着每个单独的成员，并使每个成员服从整体，也就是，服从一个战略，一个隐藏的结局，这些目标除了掌权者外无人知晓，也无人质疑。”

在法国就存在着一个过于庞大的中心，这就是法国的首都巴黎。巴黎作为决策和舆论中心统治、剥削着分布在巴黎周围的从属性和被等级化的空间，从而在法国内部建立起了一种新殖民主义，形成了“超发达、超工业化、超都市化的地区”与欠发达和贫困状况日益加剧地区的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同时，他也指出，在现代世界里，“边缘”具有多重含义。首先，边缘在广义上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剥夺生产工具的世界无产阶级。狭义上来讲包括世界范围内的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其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边缘指那些远离中心的区域。比如，法国的布列塔尼，大不列颠的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和南部地区等。再次，边缘指城市的边缘地区、城郊的居民等。最后，边缘还指那些社会和**政治的边缘群体**，特别是青年和妇女、同性恋者、绝望的人、“精神错乱”的人、吸毒者等。中心和边缘的矛盾不仅仅表现为单方面的中心对边缘的控制和剥削，以及中心和边缘发展不平衡的加剧。

同化和同质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反抗，中心越倾全力控制和剥削边缘，边缘对中心的反抗和违反就越激烈，中心越连续和无限地控制和剥削边缘，边缘对中心的反抗和违反就越持久和永恒。另一方面，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把城市作为**财富、决策、信息和空间组织的中心**，伴随着中心的饱和、资源的匮乏等问题的出现，城

市发展逐渐显现出衰退迹象，从而使中心化危机显露出来并不断扩展，甚至恶化。美国的都市化进程最迅猛，相应的城市问题和城市危机也最先暴露出来。“美国资本主义曾经面临极度痛苦的两难境地：是应该牺牲城市（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并在别处组建决策中心（这是件很难的事），还是应该通过投入巨大的资源来保留这些城市，即使是美国社会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源的总和也在所不惜。”

总之，国家资本主义的都市化进程生产了中心、边缘及其矛盾，中心的衰落和中心与边缘矛盾的加剧引发的城市现象和城市危机使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矛盾表现最激烈的场所。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抽象的都市空间中质与量的矛盾、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为非生产性消费和生产性消费进行的空间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暂时与稳定的矛盾、都市理性统治下抽象空间的意识形态化等矛盾是中心和边缘矛盾的征兆，同时也是其原因和结果。

3.3 大卫·哈维

大卫·哈维《叛逆的城市》^[6]：

资本家资本主义永远都在生产城市化所要求的剩余产品。反之，资本主义也需要城市化（与此相关的还有其他一些现象，例如军事开支等等）来吸收无止境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惊险地一跃）。因此，资本主义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呈现出一种内在的联系。

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城市化从来都是吸收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手段，城镇化凭借不断变更空间和场所的使用功能，实现空间垄断及垄断地租，进一步推动资本积累。

如果劳动力短缺，劳动力工资太高，那么必须重新培训现存的劳动力（以技术手段引起失业，或打击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如撒切尔和里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采用的——是两种基本方法），或者找到新的劳动力。从一般意义上讲，必须要找到新的生产方式；从特定意义上来讲，必须要找到新的自然资源。

1848 年的经济危机是一个明显的无法利用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的危机。拿破仑公布了一个宏大的海内外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最重要的是重建巴黎的城市基础设施。奥斯曼使用了类似凯恩

斯^①的体制，利用债务融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从而解决剩余资本的出路问题。

奥斯曼清楚地认识到，他的使命是**通过城市化来帮助解决剩余资本和失业问题**。当建筑师雅克·伊尼亚斯·希托夫向奥斯曼展示他关于巴黎新林荫大道的设计方案时，奥斯曼驳回了这个方案，他说：“不够宽……你的设计宽度是40米，我要的是120米。”他吞并了郊区，重新设计了整个街区，如 *Les Halles*。要做到这一点，奥斯曼需要新的**金融机构和债务工具**，即建立在圣西门基础上的**流动信贷和不动产信贷**。实际上，他建立了一个**原始凯恩斯体系**，利用**债务融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从而解决剩余资本的出路问题**。

在随后的15年中，这个类似凯恩斯主义的体制运行良好……但是这种**过度扩张，以及日益具有投机性的金融和信贷制度**最终于**1868年崩溃**。奥斯曼被迫下台。绝望中的拿破仑三世发动了与俾斯麦德国的战争，并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

二战后，罗伯特·摩西在整个纽约都市区再现了奥斯曼在巴黎的作为。他改变了有关城市发展的思维尺度，**通过（由债务融资建设的）高速公路系统和基础设施改造，通过郊区化，通过对城市和整个都市区域的重新建设来吸收剩余产品，进而解决剩余资本的吸收问题**。当上述过程在全国范围内的都市区域推行时，对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的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

尽管郊区化在战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郊区发展是以**掏空城市中心**为代价的。聚居在城市中心的少数族裔因此被隔离在新的繁荣之外，并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他们的反抗，进而产生了人们所说的“**城市危机**”。

直到2008年，美国人一直认为，**住宅市场是美国经济重要的稳定器**，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高技术崩盘之后。通过新的建设，房地产市场直接吸收了**大量剩余资本**，而在历史性的低利率条件下，**抵押贷款再融资的浪潮**导致了住宅资产价格急剧飞涨，从而推动了美国国内消费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美国用**平均日借款20亿美元**来维系其不可满足的消费，同时以**借贷融资开展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全球性城市化的繁荣一直依赖于建立新的金融体制和措施，以便组织起维持城市化的信贷需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创

① 不是经济学发明经济模式，而是经济学总结发现已有的经济模式

新，特别是销售给世界范围投资者的**地方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和打包**，**建立持有债务抵押债券的新型金融机构**，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分散了风险，允许**剩余储备更容易地介入过剩的住房需求**。通过金融机构间的协调，这类金融创新导致**整体利率下降（给那些创造奇迹的金融中介机构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分散风险并不等于消除风险。而且，由于风险可以转嫁到其他地方，这样广泛的风险分散甚至鼓励了**更加风险的地方行为**。由于没有**适当的风险评估管理**，抵押贷款市场已经失控……财政亏空，都再次呈现在 2008 年的次贷和住宅资产危机之中。

地方政府债务的急剧上升和对投资公司借贷控制不力（多由政府主导）现在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不仅给中国也给全世界的增长前景蒙上了深深阴影。截至 2011 年，中国政府估计市政债务约为 2.2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三分之一”，其中 80% 的债务可能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持有，这些公司由市政府主导，但严格来说不是市政府的一部分。这些组织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和标志性建筑，使中国城市如此壮观。但**市政当局的累积债务是巨大的。一波违约浪潮“可能成为中央政府的巨大负债，中央政府背负着约 2 万亿美元的债务：”**崩溃之后是长期“日本式停滞”的可能性是非常真实的。2011 年中国经济增长机器的放缓已经导致进口减少，而这反过来又将反弹到世界上所有那些在中国原材料市场的支持下蓬勃发展的地区。

吸收剩余已通过“**建设性摧毁**”引起了**反反复复的城市重建**。由于穷人、弱势群体和在政治权利上被边缘化的那些人总是首当其冲且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所以城市重建基本上总是具有阶级性的。新的城市是在旧城市的残骸上建立起来，因而需要暴力。

几乎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城市都可以看到因有钱人而产生的**建设高潮**——而有钱人通常具有类似的令人沮丧的性格。与之相伴的是**农民在农业工业化和商业化中变得一无所有，洪水般地涌向城市，沦为贫困的城市移民**。

贯穿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国家通过税收拿走一部分剩余资本。在其社会民主阶段，这一比例显著上升，国家控制了大部分剩余。最近 30 年新自由主义一直向**剩余资本私有化**发展……其主要成就是，阻止了国家按照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方式来增加税收。更进一步的举

措是建立新的治理体系，将国家和企业利益相结合，并且在城市改造中应用货币权力，确保国家机构的剩余资本支出利好于企业资本和上层阶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自由主义让富裕精英的阶级力量得以复原。

第二部分

杂思

第四章 生命

生命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如果无法充分保障人的生命权，那么一切其它权利都是空中楼阁。无端剥夺人的生命，或者肆意对人施加恐吓、虐待和折磨，就是用一种非人权的待人方式。任由这种情况发生，个人权利就无从谈起。所以一般各国的刑法都将侵害他人生命权的罪行量刑最重。

生命权是一个人之所以被当作人类伙伴所必须享有的权利。^[7]

4.1 关于无国界医生的一场争议

无国界医生是一个独立的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致力为受武装冲突、疫病和天灾影响，以及遭排拒于医疗体系以外的人群提供紧急医疗援助。无国界医生只会基于人们的需要提供援助，不受种族、宗教、性别或政治因素左右。

传媒、文学作品等往往将 MSF 成员描绘为在枪林弹雨里冒着极大生命危险抢救难民的英雄。这是过于煽情偏颇的。MSF 医生的生命同样是生命，MSF 组织并不会让医生为救人而面临随时死亡的危险，只会辟出安全区域设立医院为难民实行救治。

知乎网有关于无国界医生蒋励的一张贴子热度较高，文字回复条数过千。题目是，《如何看待北京医生辞职去阿富汗参加无国界医生?》。^[8]

蒋励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完成八年本硕博连读教育后，顺利入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受师姐和领导屠铮影响，“2012 年参加了无国界医生。2013 年 3 月至 6 月在无国界医生位于阿富汗霍斯特的妇产医院工作（同时前往阿富汗的另一 MSF 中国内地成员——麻醉医生赵一凡去了昆都士省的外科创伤医院），2014 年 1 月再次去往无国界医生在巴基斯坦蒂默加拉的医院工作。”^[9]。阿富汗霍斯特医院情况总结如下，床位 60 张，每月 1200 多例分娩，相关医护人员有 2 位

妇产科医生，4位国际助产士，2位麻醉医生组成，也就是说，这8个人分工协作，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每天平均40余例的分娩“流水线作业”。挽救大量的新生儿和妊娠母亲的生命。

但有关这个帖子的一些回复真是让人完全意想不到，瞠目结舌。其中点赞1700多次、点赞次数排行第四的匿名帖子反对无国界医生对阿富汗的援助，提倡**绝育论**，“已经生育三个及其以上孩子的妇女向援助医院请求接生必须以切除子宫或者上节育环作为交换条件，然后由国际组织建立隔离带，优先为已经绝育的妇女及其子女提供庇护，食物，医疗和基础教育，把儿童从中剥离出来接受现代教育。”，有帖子发表类似观点“没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人就没有出生和生存的权利。”，除此之外，还有“愚善”，“学医救不了阿富汗”等脑沟回清奇的言论。

在网络上，不止此贴所涉及国家，我们还可以看到，关于罗姆人（吉普赛人）、社会底层人士的优生学绝育论。这种绝育论宣扬缺乏教育和社会资源的群体，或者相比自己群体拥有更高不和谐的群体（这种水平判定其实只是个人不负责的主观判断），应当尽量抑制他们彼此间繁殖新生生命，对于正在或已经出生的新生生命，“社会上流人士”有义务、有必要剥夺新生儿父母的监护权、教育权，让社会特殊的学校或机构行使监护权、教育权，使他们脱离这个不文明的群体……

4.2 “科学”的优生学绝育论

优生学常是举着科学的旗号，被一些别有用心或者精神脆弱之人利用，行反伦理、反人类之实，让我们看看优生学在历史上曾被误用滥用的历史吧，以下内容节选自邱仁宗所著《一本医学家、遗传学家、决策者和立法者必读的书——《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10]：

1881年 Francis Galton 提出“优生学”，当时被定义为“通过优化生育改良人种的科学”。于是在北美和欧洲兴起了一场将弱智、残疾、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人绝育、禁止他们第一章探讨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背景，即固守“人类不平等”入境的优生运动。1907年美国印第安那州颁布了第一部将精神病人、性罪错者、智力低下者、道德堕落者和癫痫病人绝育的法律，到了30年代中期已有半数以上的州通过了类似的法律。

对日耳曼人或德意志人的优良品质深信不疑的德国医生和科学家提出了“种族卫生”(Rassenshygiene)概念。

1920年德国律师 Carl Binding 和医生 Alfred Hoche 出版了第一本题为《授权毁灭不值得生存的生命》的书。

正是纳粹政权使种族卫生计划成为现实，它决心保持德意志血统的纯洁性，清理德意志的基因库，将“人类不平等”这一思想制度化。1933年7月颁布《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即绝育法，对患有各类精神和肉体疾病的病人实行强制绝育。1933年11月颁布《反危险惯犯法》和《安全和改革措施法》，授权将反社会者关进国营医院，对性犯罪实行阉割手术。1935年9月颁布《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尊严保护法》，二者统称纽伦堡种族法，正式在法律上排斥犹太人、吉卜赛人、黑人。

1939年10月，希特勒签署了一份文件，文件称：“一些根据人道的判断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施慈悲死亡。”

后来将残疾人安乐死的计划进一步在德国占领区扩大实施。接着大规模屠杀吉卜赛人和犹太人，进行所谓“最终解决”，被杀害的人数达600万人。

在数年前，这种极端蔑视生命权的言论在中国没有一丁点市场，几乎见不到有人去支持。如今我们不需要在网络上，就算是在现实中的社交场合，都能听到这些优生学绝育论或灭绝论。我们忘了中国人历史上被称为“东亚病夫”“黄皮猪”的屈辱历史了么？那在当时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应该被理所当然的消灭呢？

这些言论其实都和邪恶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相近。马尔萨斯主张采取措施限制人口增长，减少过剩人口，例如运用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来消弱消除社会危机。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本质简而言之，就是大规模减少“低端”人口，确保“高端”人口不会被由他们自己造成的社会危机后果反噬。所谓“低端”，不是技术能力素质的低端，而是权力的低端。

4.3 被漠然视之的生命权

一些老司机告诉我们“把人撞成重伤，不如直接撞死人”，并有撞到陌生人后多次碾压致受害者死亡的多个现实案例；笔者也在现实生活中听闻，包工头因第一时间将重伤建筑工人送至医院，被乙方负责人怒斥，因为这增加了花销；

某地的同胞们学习电影《盲井》，整村组团外出靠矿井下杀人，勒索矿主获利，并组成整个犯罪链条；部分军事爱好者们狂想爆发战争，中国重锤他国或地区，这是他们的民族自信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所谓的左派们希望重回激进，工运、革命；一些所谓的右派们想着带路西方列强的“民主”“自由”……在他们看来，大量生命面对困境或者死亡这种残酷性竟是“实现伟大梦想”所必不可少、不可或缺、不能避免的。

宣扬这些反生命文化的不是未受教化之人，他们中反而有不少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人甚至是博士。笔者认为，这反映出我国在关于生命权，关于正义和权利的人文社科教育方面是严重失位的，存在着可怕的匮乏与空洞。

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众向钱看的同时，将人文社科教育远远抛在了后面，留下的只有应试，这些极端反生命权的言论也因此得以抬头，这真是对“中华上下五千年传统文明”的莫大讽刺。长此以往，即使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即使我们自然科学知识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我们仍将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荒漠。荒漠中将只有个别人聊以自慰的小绿洲，而这小绿洲于国于家并无多大用处，聊可自慰而已。这最终仍会反过来导致经济、科学的大幅倒退，乃至民族认同感的消逝。

4.4 20 世纪的战争

我们迅速的将中国在 20 世纪所经受的各种生命惨剧忘却脑后，而**中国是 20 世纪因战争和暴行受害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其实离我们最近的一场战争——1979 年中越战争，从爆发之日算起距今算起还不到 40 年。马修·怀特 (Matthew White)^[11] 致力于研究统计战争及暴行导致的死亡人数，他参考多种资料，立场比较中立，数据统计相对详实可信。虽然如此，因西方世界中战争及暴行相关参考资料大多带有反共意识形态影响，这无疑也会使马修所使用参考文献的数据出现偏差，建议大家批判性阅读。

据马修，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1918)，全球死亡人数约 1500 万。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5)，全球死亡人数约 6600 万。20 世纪全球全部死亡人数大约为 55 亿，其中死于 20 世纪战争、人类暴行的人数约 2.03 亿，也就是说，在 20 世纪，全球死亡人口中平均每 27 人中就有 1 人的死因是战争或人类暴行。

中国方面，军阀战争 (1917–1928) 期间各方军队战死约 20 万，因屠杀和饥荒死去的民众约 60 万，共计死亡约 80 万。第一次国共内战 (1928–1937) 期

	军事	军事附带	大屠杀	饥荒	合计
战争时期	3700 万	2700 万	4100 万	1800 万	12300 万
和平时期	0	0	4000 万	4000 万	8000 万
合计	3700 万	2700 万	8100 万	5800 万	20300 万

表 4.1: 20 世纪死于战争、屠杀和压迫的人数统计表

来源: Matthew White,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10

间, 死于战争、屠杀和饥荒的军民约 500 万。抗日战争 (1937–1945) 期间, 国共两党军事死亡人数约 180 万, 平民死亡人数约 800 万, 伪军死亡人数约 20 万左右, 合计死亡约 1000 万人。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5–1949) 期间军民死亡人数约 250 万。平民和士兵的死亡比极高, 在世界上位列前茅。

4.5 人相食

在中国史书记载上, “人相食” 屡次出现, 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固有表述^[12]。以年份 ÷ 次数 简单统计, 《资治通鉴》中大约平均 30 多年出现一次人相食, 《二十四史》中因记录详细, 跨越朝代久远, 大约 20 多年出现一次人相食。

在《中国古代的食人》一书中, 郑麒来 (美籍韩裔) 将食人分为两类, “求生性食人意味着人们为自己的生物性生存而互食, 与求生性食人密切联系的食物匮乏往往由战争、内乱等人祸或干旱、饥馑、虫灾等天灾引起。习得性食人……更多受制于文化因素, 诸如爱与恨。”^[13]¹⁵²。“在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153 例与战争 (直接) 有关的食人事例, 均由战时或战后的饥饿和饥荒引起。……间接相关的有 74 例, 两个数字加起来, 即全部与战争有关的食人事例便共有 227 例”, 几乎每朝每代均发生这种求生性的群体人相食。而以上统计数据并不包括地方方志所记载的“人相食”数据。

综观人类历史, 就民计民生方面来说, 人类并不是常说的总体向上进步的螺旋上升, 而是因种种权力欲望带来的生发死灭这一悲喜交加的交替循环。且在这权欲的循环中, 向上的、喜剧的经历苦短而观众甚少, 常常是你方唱罢他登场; 向下的、悲剧的经历恨长而观众众多, 常常是意悬悬半世心, 枉费了卿卿性命。难道福柯是对的吗:

人性并不会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逐渐进步, 直到最后达到普遍的互惠, 最终以法律准则取代战争; 相反, 人类将其每一种暴戾都

深深地潜藏于法律体系之中，因而所谓人性的进步只不过是从小一种统治形式过渡到了另一种统治形式而已。

或许是笔者悲观，对于人类，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很可能会将“岁大饥”、“人相食”在未来某一天继续下去，再次书写食人的历史。至于在哪一天，是否一百年、二百年后，那就不知了。当前来说，幸好前人或后人与我们现在的人何干，而我们本身也善于遗忘。幸哉乐哉！

朋友们，我们下次战争再见吧，祝你平安。

第五章 工作制

5.1 传统超时加班企业

在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尤其是制造业,是我们传统的超时加班重灾区^[14],曾经引发社会极大关注的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便被认为是因超时加班所致,仅2010一年被媒体曝光出来的就有“14连跳”。富士康为降低、杜绝此类事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2010年、2011年两次大幅提升工资、健全加班制,铺设大面积防跳楼网,签订《不自杀协议》等。2011年后,就很少有相关报道了……

根据《富士康工资、工时与生产管理调研》^[15]一文,虽然至2015年为止,富士康工人超时加班现象仍较严重,但大量裁员现象却与之并存。“2013年媒体又报道了富士康新一轮的变相裁员浪潮(在2013年富士康全国用工规模减少了21万),引起工人以‘跳楼’或停工等形式的激烈反抗。”。2016年,BBC发文报道《富士康用机器人取代了6万名工人》。

笔者实在是无法理解,十几年前乃至二十年前,是哪些人在向政府整天鼓吹2035年中国“劳动力红利”消失,为何各部门大力推进“无人化、少人化、智能化、信息化”,甚至主动要求企业升级,为何采取一系列激进的劳动力溢出政策。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是严重劳动力过剩啊!我们已经有了大量的产业后备军——失业和半失业工人啊!

网友白鹤飞和澎啊湃启发了我,中国的超级城镇化进程使城市居民数量剧增的同时,更多人口要接受各种城市公共服务收费——物业、医疗、教育、交通、治安、消防等。这使工人最低工资水平较多增长,企业用工成本加大。

鼓吹“劳动力红利消失”并实施相关政策,继续制造更多的剩余劳动力,继续庞大已足够庞大的产业后备军队伍,可以打破工人工资刚性,使工人可以接受比当前最低工资更低的工资……这一系列的超限会产生怎样恶劣后果,笔者认为无需赘述。

事实上,正是刺激劳动力红利的政策、超长工作日等,让中国人口负增长,未来可用劳动力数量下降……

5.2 新型超时加班企业

金融和互联网企业是二十一世纪新加班重灾区。华为在舶来词方面有个贡献，将日本“过劳死”的概念成功传播到了中国，“加班文化”流传甚广，有很多段子。华为苏州研究院椅子背后常备的睡袋，酷爱加班文化的日本专家入职华为两个月后愤而辞职“你们这样是不人道的”，华为总裁任正非挽留要回北京陪妻子的副总李玉琢时说“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等。

说起创意，华为也一点也不比富士康《不自杀协议》差。我国于 2007 年 6 月 29 日颁布《劳动合同法》，其中第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这个法案将于 2008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华为就在 2007 年底要求 7000 余名工龄 8 年以上的老工人向公司递交自请辞信，作为补偿，华为向这些老工人支付约十亿元违约金，然后再重新聘用这些“失业工人”，工龄从零开始重新计算。数天后，2008 年 1 月 1 日，工人们“自愿”为了几万到十几万的补偿金，放弃了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可能，变为了 1 至 3 年劳动合同的新工人。“华为裁员门事件后，沃尔玛、环球、摩托罗拉等公司也先后进行了应对新法的人力资源调整。《劳动合同法》实施前的“阵痛”似不减反增。^[16]

2010 年 8 月，华为“公司 14 级以上工人被要求‘自愿’签署《成为奋斗者申请书》……申请“华为奋斗者”有一个必备条件，需要添加“我申请成为与公司共同奋斗的目标责任制工人，自愿放弃带薪年假、非指令性加班费和陪产假”这句话。^[17]华为真是互联网企业的好模板。

任正非在 2001 年有篇文章《华为的冬天》非常有名，当时国内大 IT 公司似乎基本没有这种“Winter is coming”的论调，更不大认为自己可能马上狗带，他的危机意识立刻被广大媒体、企业称赞。近 20 年过去，在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下，华为仍是高奏凯歌、一路前行。而 2017 年，一些年过 34 岁的交付工程维护人员，过 40 岁的研发员工和 45 岁的老员工却可能迎来了真正的凛冬，要被清退掉去他处过日子了。当然，华为已经惯例辟谣了。从此 35 岁陆续成为多个行业裁员和招聘的红线。

2016 年 8 月 29 日起，58 公司总裁兼 CEO 姚劲波的微博陆续被众多 58 公司员工、员工家属和社会人士浏览并情绪不稳定地评论^[18]，起因是 58 公司在不发邮件和公文的情况下口头传播了公司新工作制度——“996 工作制”，早九点上班，晚九点下班，星期六正常上班，没有任何补贴。虽然这种工作制可能

并非 58 公司原创，但却是由因它开始引起公众反加班的社会影响，并且在事件后，“996 工作制”并没有受到实际影响，反而成为了不少单位一种明目张胆的制度。笔者认为，58 公司“996 工作制”这一事件，可以定为中国劳动制度的一个里程碑。这标志着严重超时工作制从原来只是个别公司内部隐性文化、不成文规定，发展至显性公司制度，并最终成为一种公开的可以被任何企业复制的社会劳动制度。

滴滴出行于 2016 年底连发三篇大数据报告《2016 年度加班最“狠”公司排行榜》^[19]，涉及金融、互联网、公关、广告四个行业，包括 33 家公司。这 33 家公司中最晚下班时间均在 20 点后，其中 20 点到 21 点之间下班的只有 15 家。四个行业相比较，工作日时长方面金融行业较好，互联网业最差，最高加班时间是京东 23 点 16 分。周末上班方面，金融业最差。0-5 点下班返工人数方面，公关、广告公司表现突出，其中奥美广告返工人数 3080 人，金宝大厦 3 家公司合计 2102 人。

5.3 工作时长立法

去看二十世纪或者当前的劳动法已经是难堪之事，那让我们粗略看下早期的工时立法吧。

英国全行业立法是始于“1874 年，R. A. Cross 提出工厂方案，最终使得所有的英国工人都享受 10 小时工作的权利”^[20]⁹⁶。

法国一步到位，直接是全行业立法，“法国 1850 年 9 月 5 日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是临时政府 1848 年 3 月 2 日法令的资产阶级化的翻版；这个法令适用于一切作坊”^[21]³¹⁹。

我们这些大体量的企业，靠着不懈的努力，向前 150 多年终于赶超到了英法 19 世纪中后期水平，真是可歌可泣。另外，24 小时工作制其实也已经来了，就是工作、睡觉、起床接着干活，某为分公司椅子背后就挂着睡袋，随时一天 24 小时不离公司，祝这些企业能早日赶超到 19 世纪早期劳动水平吧，就是不知道是否还需要童工呢？

结合实际来看，我国现在实行的 1995 年劳动法，规定的 8 小时工作制相比其他各国标准较高，要求劳动时长较短，比德国、新加坡等一周 60 小时工作制还要少不少。在实际操作上缺乏一些空间，可能的解决方案如弹性工作制、休息权等问题还在探讨中。希望尽快出台相关政策。

5.4 超时加班的危害和原理

150多年前的《资本论》中提到的一些情况，居然仍高度适用我们的当前社会，在世界发展方面来说这真不是一件庆幸之事。那么为何我们又重新回到150年前的工作状况？

马克思原文如下（不想看马克思原文的读者，可以略过这部分）：

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21]306}

《1861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委员会认为，把工作日延长到12小时以上，是横暴地侵犯工人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这就侵犯一个男人的家庭，使他不能履行他作为一个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所应尽的家庭义务，以致造成道德上的非常不幸的后果。12小时以上的劳动会损害工人的健康，使他们早衰早死，因而造成工人家庭的不幸，恰好在最必要的时候，失去家长的照料和扶持。”^{[21]292}

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①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无事可做指后备军），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他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21]733}

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21]733}

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21]736}

^① 想在本行业入职的失业或半失业人

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即工厂建筑物、机器等等的规模，不管用来工作 16 小时，还是 12 小时，都会仍旧不变。工作日的延长并不要求在不变资本的这个最花钱的部分上有新的支出。此外，固定资本的价值，由此会在一个较短的周转期间系列中再生产出来，因而，这种资本为获得一定利润所必须预付的时间缩短了。因此，甚至在额外时间支付报酬，而且在一定限度内甚至比正常劳动时间支付较高报酬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都会提高利润。因此，**现代工业制度下不断增长的增加固定资本的必要性，也就成了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延长工作日的的一个主要动力。**^{[22]9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做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做提高利润率的手段。^{[22]101}

以上意思是指：

1. 工人、职员异化成为企业身上一个微小的、易损坏和易更换替代的一个器官。不止个人的健康、生命受到损害，他的社交角色、儿女角色、父母角色、夫妻角色等社会角色也被严重削弱和抑制。在中国传统家庭人伦关系加速破裂。尤其是华为《奋斗者申请书》居然明目张胆“自愿”要求放弃本就不多的陪产假，真是反基本社会人伦，千夫可指。当然，华为始终横眉冷对，淡定得很，人家负面新闻也像富士康一样越来越少了，这真是进步呵！

2. 在职工人、职员的过度劳动，使当前就业人数相对于正常劳动情况下应当就业的人数减少了。当前未就业或者半就业工人、职员的存在又使在职工人、员工的工资报酬被压低。

3. 随着生产力发展，机器等固定资本的支出愈加巨大，不管其使用或不使用，都在产生折耗，这是生产力发展所必要的。为了事实上节约这种固定资本，就需要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这就使工人超长劳动，乃至 24 小时劳动似乎成为一种生产力发展的必须。另外，如果雇佣更多工人，则需要更多数量和更大投资的固定资本，这对本已庞大的不变资本支出无异于雪上加霜。

4. 此外，脱离马克思文本，就实际情况来看，将工人本应得的工资分至加班费中，企业可以灵活运用加班政策，萧条时不加班或少加班，使工资维持在低水平，避过工资刚性。通过超长工作日所产生的职工数量节约，也使企业培训成本、培养成本、管理成本、福利保障成本、风险成本均大幅降低。

综上，企业倾向于让员工尽量加班而非在原工作时长不变的情况下雇佣更多工人。

员工作为这个微小的、易损坏的、易更换替代的螺丝钉，在工作 10 年左右被榨干后，甚至只是在自己阅历增加、工龄福利增多后，便迎来自己被扫地出门的结局，他们将被年龄更小，福利待遇更低的年轻员工所取代！超长工时所带来的利润诱惑几乎是不可阻挡的。这便是自由！但这是资本的自由，而非人的自由！

5.5 工时改革问题的民族国家与全球化困局

重新结合实际情况立法，对工人、工会赋权，加入弹性工作制和阶梯性休假等补偿措施，加大执法力度，主动执法，对较重违规现象进行惩罚性罚款等，这些举措理论上将能有效解决工时严重过长的问题。

就以往传统历史经验来说，19 世纪英国工作日改革经验表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变化，或者是在工作日缩短以前，或者是紧接着在工作日缩短以后发生的”^{[21]601}，后来福特 8 小时工作制以及世界上广泛传播的劳动法均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点。

但现实是严酷的，我们可能无法出台实质的修正措施。中国当今所面临的正是资本语境中，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这一巨大张力困境。

所谓全球化，说穿了就是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在全球高速通畅的流动。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不管是工人还是大企业家在面对全球化这一庞然大物时都常是有心乏力。中国在长期脱实向虚的城镇化改造中使工人最低工资提高较多，用于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事业支出以及铸币税支付；而东南亚、南亚、拉美劳动市场的低廉——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当地贫困人口、童工、更贫穷国家的劳动力输入；政府的非现代化管控要求，法律法规不健全；

所谓民族国家，则是强调本国利益，打击抵制他国相对本国的优势力量。2008 年经济危机后，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制造崛起的强势，打造各种非自由的贸易壁垒，对中国产品出口设置各种障碍，征收各种不合理高额关税，发起各种非法反倾销反垄断诉讼、调查，威逼利诱中国大型企业外迁；种种境况下，中国资本外逃数量恐不是少数。

民族国家并不一定和全球化相对。事实上，强国如美国，通过民族国家政策对他国的打压，可以让本国金融资本全球化更具优势。

以富士康^[23]为例，其在巴西、匈牙利、斯洛伐克、土耳其、捷克、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印度、美国均有工厂。印度方面已与富士康签订谅解备忘录，

富士康预计在 5 年之内投资印度 50 亿美元，“美国方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宣布，富士康将在威斯康星州东南部建立一个价值 100 亿美元的平板电视制造工厂。威斯康星州将每年向富士康支付高达 2.5 亿美元的补贴，为期十五年。这笔交易被一些人批评为是拿取 30 亿美元纳税人税收资助激励富士康。威斯康星州立法机关的无党派预算办公室的分析确定，国家纳税人将在 2043 年收回投资。”

外国对中国的强力抵制，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与他们不同，不是中国“邪恶”，只因我们可能变得越加强大！

这真是个困局呵。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提出，现代性的全球扩展趋向产生了一个“失控的世界”，它的出现没有人也没有政府能够全面地控制。马克思用怪物来描述现代性，而吉登斯将其比作坐在巨型汽车或猛兽“上面……人类的聪明才智，在这里居然毫无用处，是我们人类自己，孕产出了这种种怪胎……”

当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学时，当吉登斯希望发现未知社会模式的原始部落时，都是这样一种绝望下的希望。虽然希望，却也绝望；虽然绝望，却也希望……

最后，用工人诗人许立志的一首诗来结束本节吧。

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沿线站着

夏丘 张子凤 肖朋

李孝定 唐秀猛 雷兰娇

许立志 朱正武

潘霞 苒雪梅

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 穿戴好

静电衣 静电帽 静电鞋

静电手套 静电环

整装待发 静候军令

只一响铃功夫

悉数回到秦朝

许立志 (1990-2014)

第三部分

国际政经

第六章 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

1929年美国爆发严重经济危机，经济大萧条，并扩散至世界，主张自由放任市场调节完善性的经济学彻底倒台。1933年当选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发布一系列政策，试图依靠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缓解经济周期中下行期的萧条影响，史称罗斯福新政。

不少人（包括经济学家）认为罗斯福新政主要是受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影响；也有不少人对此反驳，认为罗斯福受凯恩斯的影响较小。争议综述可参考刘绪贻^[24]。

笔者认同刘绪贻、张小鲁^[25]、张世明^[26]等人观点，**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关系并不大，凯恩斯指导罗斯福新政是个“童话”**。单是两人行动时间节点就可以提供不少作证。另外早期制度经济学派代表凡勃伦、康芒斯对于新政的影响力也远比凯恩斯大得多。

根据布鲁和格兰特《经济思想史》摘抄如下：

康芒斯的第一本著作《财富的分配》(1893)并没有获得充分认同。批评家认为，这是康芒斯为其**社会主义思想**确立科学基础的一次令人不满尝试。然而，康芒斯并不是一个试图改变私人财产和自由企业社会结构的革命家。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可以并且应当保持完整无缺，但是，经济秩序的运转规则需要变革，以消除自由放任经济体的明显缺陷**。在威斯康星大学，他的观点获得了州长拉·弗利特（La Follette）的支持。

被一些人称作**威斯康星学派**（Wisconsin school）的经济学方法，主要是在康芒斯的影响下在威斯康星大学得到发展。**这种方法支撑了美国的非正统经济理论，发动了改变美国经济结构与功能的改革**。

威斯康星州政府广泛利用威斯康星大学教职工充当新思想的智囊团、法律的起草者以及指定委员会的成员。

体现在罗斯福新政社会立法中的很多思想来自于威斯康星州，这一点很少有人怀疑。毫无疑问，1932年，很多在麦迪逊接受培养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人都搬到了华盛顿特区。

其实凯恩斯也了解过马克思，根据《经济思想史》，凯恩斯在《通论》第一稿中有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的论述和注解，第二稿中删除。另外凯恩斯学生中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

凯恩斯的学生莫里斯·多布还是一位研究生时，曾在凯恩斯的房间里读到一篇论述马克思与剑桥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论文。多布回忆道，凯恩斯很赞许这篇论文，因为“他年轻时在一定程度上喜欢非正统思想”。

一些专家学者缘何凭空造就力挽狂澜美国于大萧条的“凯恩斯童话”，笔者不明就里，只敢妄加揣测：难道是因为凯恩斯作为英国政府高级代表参加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定了当代国际金融体系，并与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一起创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亲亲尊尊？或者为了**增加货币超发的伪合法性以实现进一步财富分配倾向于最富者？**

其实数据证明罗斯福新政并未采用凯恩斯式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25]。接下来我们分别了解下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这有助于理解国家干预政策，有助于构建一条资本主义发展史链条。

6.1 罗斯福新政

本节大量参考王小鲁《美国大萧条与新政再思考》^[25]。罗斯福新政主要还是应用经济，是应对当时大萧条的实用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实行8小时工作制、禁止使用童工。这些劳工保障措施于1935年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随国家复兴署的裁撤而终止，直到193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后才重新得以实行。

2. 大幅度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和救济等福利支出，建立了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逐步替代了临时性社会救助的功能。

3. 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减少过大贫富差距。如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率,征收了累进的**遗产税和财产税**。据王小鲁:

在这一变化中减少的主要是个人财产收入的份额,对企业利润份额没有影响,因此企业家的积极性也受到了保护……到1950年没有太大变化,其中财产收入份额进一步下降,公司利润份额上升了。

4. 规范工农业生产和产品价格,防止过度竞争,促进价格止跌回升。

5. 新政未使用凯恩斯主义要求的扩大政府借债和支出政策,大搞基建。

据王小鲁,之前已经货币严重超发,甚至正是**货币超发才引起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罗斯福自然不可能依据凯恩斯的请求继续超发货币。

大萧条之前美国已确实经历了长期的货币宽松。但并非如罗斯巴德所说主要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而是持续了更久。更宽松的时期是在20世纪10年代……1917-1919年,美国参加一战,政府以**巨额赤字**支持了军事支出扩张,而该支出的大部分都是通过借债和货币发行筹集的。这解释了20世纪10年代货币快速扩张的原因

(20年代)货币事实上超量供应。而且这是在20世纪10年代货币严重超发基础上的继续。**长期货币扩张最后导致股市崩盘、引发萧条的说法是有充分根据的。**

据列宁,金融垄断资本发动的一战使自由资本主义从垄断阶段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笔者认为,这也标志着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虽然“事实上,没有任何干预的‘纯粹’市场经济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以后也不会出现。

世界托拉斯和银行资本为争夺世界市场的统治权而引起的世界大战,使物质财富遭到巨大破坏,使生产力消耗殆尽,使军事工业蓬勃发展,以致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无法进行。

战前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无疑已经具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笔者注,这里列宁过于乐观了。),由于战争而更加成熟,并且继续在异常迅速地成熟。中小经济更加迅速地遭到排挤和破产。资本的积聚和国际化正在大大地加强。**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由于情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其中有些国家进而采取**普遍劳动义务制**。^{[27]441}

据克里斯·哈曼:

正如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所指出的，当“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开始让位于“垄断资本主义”及其产物帝国主义时，经济“自由主义”已在实践中被替代了。国家干预被认为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基础设施所必需的（铁路在德国长期以来就是国有化的，在英国，保守党政府将电网和航空公司国有化）。后来的战时国民经济组织——最初出现在德国和日本，后来又出现在英国和美国——表明国家干预可以为收益率和积累的复苏提供基础。

据王小鲁，罗斯福也没有大搞基建：

除了田纳西工程，新政期间政府还投资了3万多个公共工程项目，小型项目居多……大多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这些项目对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减少失业、减贫、环境治理和带动经济增长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政府投资并不是新政的核心。

6.2 凯恩斯主义

虽然大萧条救市和凯恩斯关系不大，但较多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创建了现代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经济学^[28]的立足点是，总需求（以家庭、企业和政府的总支出来衡量，包括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凯恩斯没有对支出进行细分。）是经济中最重要驱动力。自由市场没有导致充分就业的自我平衡机制——“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

经济周期中的下行期，随着总体需求的持续下降，消费者信心不足减少消费支出，进而企业减少投资支出。政府支出的积极干预便有助于缓和经济周期的繁荣上升和萧条下行期幅度，并且是必要的。

具体举措是政府针对经济周期情况适时干预：在需求侧（总支出）下降时，对劳动密集型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赤字支出和降低利率，增加社会福利，以刺激就业和稳定工资，修复消费和生产循环。在需求侧增长充足时，提高税收以冷却经济并防止通货膨胀。

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府常常应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世界出现经济停滞或衰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滞胀”，凯恩斯主义受到其他学派巨大挑战，面临前所未有危机。此后有一些学者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不同改造。

一个有意思却未必正确的观点：**凯恩斯主义是劫小康、济大贫、修缮大权贵。**

它是应用政策经济学，而非学院理论经济学。它是**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漠视长期经济周期，**坚持长期使用将成为越来越毒的毒药**，在未来市场出清、结算总账时带来更加巨大的灾难，包括但不限于“滞胀”；如同任何经济学说一样，它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基本矛盾。

6.3 从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用于“**缓和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资本主义以降，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市民社会的阶级张力与矛盾制约决定了国家，而不是相反。国家不是社会的主宰物，恰恰相反，国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关于市民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可能是政府内阁；更可能是“**统治阶级不统治**”，藏在幕后的国内外金融大佬。经济学家们五花八门、各圆其说、常彼此矛盾的妙计锦囊，只被用作统治阶级的政策支持武器，哪个趁手拿哪个，加以改造，用完即弃。分析现实经济政策，切忌用 XX 经济思想标签这些经济学武器套取，要像福尔摩斯一样关注背后的获利群体。

笔者认可刘绪贻的论断：

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同是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的典型产物。

不少国人听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会想起当时的苏联，其实欧美与苏联核心一致，都是融入国家主动调控，给予福利，只是欧美的政府垄断程度不如苏联的更高些，可叫**社会自由主义**或者**左翼自由主义**等。

社会自由主义 (*Social liberalism*，也可称为 *Newliberalism*)，与 John Ruggie 在 1982 年提出的**镶嵌型自由主义**、**嵌入式自由主义** (*Embedded liberalism*) 相通。其代言人为凯恩斯、罗尔斯和德沃金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可通过加大政府支出、投资来解决失业和消费不足经济危机，重视社会福利。它允许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但主张**政治自由权的平等优于经济自由权的平等**，要求国家给予民众关怀和尊重。^[29]

它，资本主义，在危机之中又一次进化了！

第七章 新自由主义札记

7.1 新自由主义的概念

中国语境中常说的“新自由主义”实为 Neoliberalism，即“新古典自由主义”，它不同于前一章结尾所说的社会自由主义 Newliberalism。维基英文版对 Neoliberalism 的解释如下：

新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是指 19 世纪初与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关的思想^①在 20 世纪的复苏。这些想法包括经济自由化的一系列政策，如私有化，财政紧缩，放松管制，自由贸易和减少政府支出，以增加私营部门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这些以市场为基础的思想及其所激发的政策促成了从战后的凯恩斯主义（1945–1980）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范式转变。

学者现在倾向于将其与朝圣山学派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詹姆斯·M·布坎南，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和艾伦·格林斯潘等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联系起来。

新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充斥着各种学派，如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等，这些学派彼此之间也存矛盾、异议，各国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实践依时间、国情等的不同，对这些理论的侧重均有不同^[30]，也有一些早期的热情拥护者和参与者如今也都转向批判立场。

7.2 哈维对新自由主义实践的批判

本节内容主要参考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

^① 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中的经济自由部分

新自由主义理论口号所宣称的实则是一种**乌托邦**。它宣称市场放任的**经济自由**远比一切其他方面的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更为重要，认为**经济自由是其它自由的唯一基础**。并且其理论和真实实践（对新自由主义的应用）存在着相反面。

新自由主义真实的**实践内容**主要有：

1. 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向其它弱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倡导经济自由，**实则是使新自由化的弱国更易被强国资本全球化组织获取高利**。在收割过程中，以强国国力作为背书，**实现强国的超额利润和绝对主导地位，造成弱国的社会悲剧深渊**。还有强国对弱国放贷，往往以自由化为前提且要求债权人的至上权力和债务人的无限责任，其实即使是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等也反对债权人的无风险。美国也可以依托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直接在全球化中抽取高额利润。

正如斯蒂格利茨的讽刺“这是多么古怪的世界啊，**反倒是贫穷的国家在补助最富裕的国家**^{[31]75}。笔者觉得斯蒂格利茨有点过于惊乍了，世界任何组织不总是在向下劫贫济富么……

2. 在放任的市场经济自由内部，本身也是**大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各方面霸权体现，而非经济自由和平等**。如经济精英对弱势者的剥削；垄断或寡头的形成；市民隐性或显性的税赋形成的政府投入成为精英阶层生财资本和工具；快速私有化过程中**国有、集体资本被精英阶层严重折价收购从而使私人资本在收购结束时就已获取超量巨额利润**；金融资本远远超越生产资本占据强势地位，一部分工业资本也纷纷实现金融化。

即使是凯恩斯也鄙视食利者，提出“**食利者的安乐死**”，如今却是**食利者的迷醉狂欢**。

3. 新自由主义确实产生了一些其它自由，如择业自由、言论自由等。但这种附带自由很是有限，并且

如卡尔·波兰尼所说“这些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的副产品，这同一种经济也要为那些恶的自由负责**’”。

就不好的自由方面，波兰尼列出的有“**剥削他人的自由，或获得超额利润而不对社会做出相应贡献的自由，阻止技术发明用于公益事业**的自由，或**发国难财的自由**”。

自由的理念由此“**堕落为仅仅是对自由企业的鼓吹**”，这意味着“那些其收入、闲暇和安全都高枕无忧的人拥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

众仅拥有微薄的自由，尽管他们徒劳地试图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来获得某种保护，以免遭那些有钱人的权力的侵害”。但是——事情往往如此——如果“没有权力和压制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强力不发挥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存在的”，那么维持这种自由主义乌托邦前景的唯一办法就是靠**强力、暴力和独裁**。在波兰尼看来，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论调注定会为权威主义甚或十足的法西斯主义所挫。^{[31]38-39}

4. 金融和跨国集团等“实力自由派”，凭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非要求国家无所作为，而是试图**让国家全力为己服务**，尤其是在难见市场效益的公共事务上的巨额投入——往往是巨额赤字，与法律法规的的倾斜。

新自由主义赖以实现的并非如它宣称“否定国家干预”。恰恰相反，它**必须大力借助于国家的强力，甚至暴力和独裁，还有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投入**。国家在此的作用并非是为了民众自由或普惠，而是被作为**有利于上层阶级的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成为上层精英获利手段，国家沦为企业资本和上层阶级的“守夜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借此成为最强且普遍的规训手段，为强大资本主义、现代性理性代言和背书。

我国社科院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

该课题组将“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归纳和概括为以下三点：在经济理论方面大力宣扬“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特别强调和坚持“三否定”（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29]

社科院这个课题组似乎只注意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层面内容，没有注意其实践本质，没有看到其要求国家干预并为资本精英和权力贵族牟利这一点，没有意识到政治权力沦为资本权力附庸？笔者对此失望。

5. 一切成为商品，人的肉体、精神以及权利也均被作为经济商品对待，无助于实现物质价值的便被认为是无价值的。即使对资本精英来说，消费主义的盛行也造成表面满足、内心空洞、身份焦虑等。^{[31]179}

6. 社会、集体团结的意愿缺失，必然使人试图从他处寻得（很有限的）满足。催生黑社会、边缘群落、非政府组织、以及宗教团体等。

总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化**无法刺激经济增长或提高人民生活**。第二，从上层阶级角度出发，新自由主义**进程而非其理论**确实是巨大

的成功：它要么重建了统治精英的阶级力量（如美国和某种程度的英国），要么为资产阶级形成创造了条件（如中国、印度、俄罗斯等等）。……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平等、低薪、失业等），都是因为缺乏竞争力，或因为个人、文化、政治上的缺陷，以上论述宣称，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里，只有适者才应该也能够生存。^[31]¹⁶⁴

7.3 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哈曼对哈维的批判

克里斯·哈曼^[32]^[33]和大卫·哈维都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实践过程中均出现了与它所宣称的背离。在美国、中国等国的新自由主义实践中，均采用了新自由主义表面反对的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例如政府大规模财政赤字、不良银行债券资助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本投资等。其他被灌输并实行较为彻底新自由主义化的落后国家，则被美国等国利用资本全球化进行掠夺和积累。

哈曼以更为激进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对哈维提出了批评。哈曼认为“新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提法具有模糊性，它弱化了国家支出在新自由主义实践中的地位，相比注重就业和福利的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要求的国家投入更高；抬高了积累过程中“暴力”的地位，忽视了资本在阶级生产方面的强大理性和连续性——资本主义自始至终在原始积累（包括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政策）；过于强调了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对立，忽略了工业资本也加快了金融化；弱化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并不是对今日资本运行的精确描述。我们没有面临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回归，这种资本主义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完结了。我们面临的是这样一个体系，它尝试着在全球范围内重建它体系的各个单元来解决它自身的问题，这些单元出现于20世纪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继续扮演重要角色，想方设法为垄断资本提供便利或进行管理……即使生产的国际化使得这样做比战后几十年更加困难。

对马克思来说，原始积累不仅仅是早期资本家通过抢劫积累财富。它主要是从农民手中掠夺土地，然后迫使他们寻找雇佣工人的工作。它的特殊性不在于剥削阶级以武力增加他们的财富（这在各

种阶级社会中都发生过)。至关重要的是，它允许发展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方式来扩大这种财富，通过创造一个“自由”工人阶级，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现在控制生产资料的人。

这种形式的“原始”积累一直持续到今天。埃及的老地主、巴西的农业资本家、中国的共产党老板和印度新近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农民，都在不断地试图夺取当地农民的土地，在他们成功的地方，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就诞生了。但哈维错误地认为这只是最近几十年的特征。

似乎可以从哈曼的论述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从日不落英国到吸收了他国人力物力财力的美国初期：资本主义自由的胜利；从俾斯麦时期的普鲁士^①到国家资本初步发达的二十世纪初德国^②，再到一战、罗斯福新政、苏联、上世纪60年代末：古典自由资本主义衰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步步兴起；从70年代美国至今：资本对国家力量的利用，国家日益成为服从于、服务于资本逻辑的“守夜人”，不停公共债务、财政赤字、超发货币……虽然资本主义危机避无可避，但它却是总体向上发展的？！

只是，我的朋友，代价呢？未来呢？

以上只是笔者初步猜想，毕竟似乎有些神枪手谬误……欢迎交流和批判。

7.4 联合国债务与人权问题独立专家报告摘抄

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发达国家常为向其它国家贷款或减债而附加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条件，联合国多项机构和议题均涉及对此的强烈批判。因相关议题和文档过多，笔者以较为随机的方式选择了外债与人权独立专家的年度报告作为切入点，以求管中窥豹。

独立专家人选不同，其倾向、水平也有不同，希望大家能够批判辩证来看。笔者个人认为，Fantu Cheru 的报告有理有据，水平极高，可作重点研究。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官网链接：<https://www.ohchr.org/CH/Pages/Home.aspx>。

联合国外债问题独立专家年度报告链接：<https://www.ohchr.org/CH/Issues/Development/IEdebt/Pages/AnnualReports.aspx>

① 对工人阶级实行“鞭子加甜面包”政策：一方面解散工人组织，查禁进步报纸和刊物，另一方面增加医疗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残疾和老年保险法等。^{[4]75}

② 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占据议会27.2%的席位，1912年提高到34.8%。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是联合国主要的人权实体。联合国大会赋予了高级专员及其办事处一个独特任务，即：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所有权利。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宪章》于1946年在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成立。2006年3月15日，联合国大会以170票支持、4票反对和3票弃权多数通过成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是**由47个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机构**，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美国于2018年退出人权理事会**。

人权理事会是**独立于人权高专办的实体**。这种划分源于联合国大会的分别授权。尽管如此，人权高专办为人权理事会会议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并跟进理事会所作出的评议。

联合国外债与人权问题独立专家的职能是就国家外债、国际金融对人权^①的影响问题开展分析研究，进行国家访问任务，致力于与政府、联合国、非政府行为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

在人权委员会对充分享有人权的诸多议题中，**中国几乎一直投赞成票，切实表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英法意德韩日等常为自身资本利益投反对票。

1. 1999年,独立专家 Fantu Cheru 向人权委员会提交报告 E/CN.4/1999/50。报告认为，**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七国集团（简称 G7）的政府官员是第三世界负债发展的根源**。它们在债务国家未能及时还款时，一般要求债务国家以加紧实施**结构调整方案（全球化和自由化）**为条件，重订还款期限。它们的结构调整方案使债务国家陷入更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指责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新自由派反革命**”，“**债务危机被用来作为打开第三世界市场，剥夺政府在国家发展中作用的方便借口**”。

2. 2000年,特别报告员 Figueredo, Fanto Cheru, 和独立专家 Reinaldo 向人权委员会提交报告 E/CN.4/2000/51。报告开篇写到：

将近 20 年来，国际金融机构和债务国、债券国政府乐于一场自欺欺人的游戏，从远距离操纵第三世界的经济，强行让毫无力量的第三世界国家接受不得人心的经济政策，却自认是最终将使那些国家走上繁荣的道路和摆脱债务的宏观经济调整苦药。

布雷顿森林机构，如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联盟压力**下于1996年秋天批准了**重债穷国计划**（the 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缩写

^① 尤其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为 HIPC)。HIPC 要求债务国首先“必须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化结构调整方案 (ESAF) 下完成六年结构调整, 然后要满足一些额外条件才能减免债务”。1999 年春,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国际大庆 2000 运动的政治压力下对 HIPC 作检讨。

简单地说, HIPC/ESAF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后门继续控制穷国和债务国国家发展政策的一种手段。

3. 2001 年, 独立专家 Fantu Cheru 向人权委员会提交报告 E/CN.4/2001/56。报告认真分析了非洲九国向 IMF 和世界银行提交的临时减贫战略文件 (I-PRSP)。Cheru 认可 IMF 和世界银行此举有积极的一面, 但也提出一些批评, 如 I-PRSP 是根据捐助方设计的模版编制, “谈不上国家所有权的真实可靠性”, “仍导致一种把社会 and 人的发展以及公平方面的关注问题放在次于财政方面考虑因素地位的局面”。希望 IMF 和世界银行能进一步改进。

报告指出 IMF 和世界银行很大程度上服务于主要股东, 即七国集团 (G7) 的利益, “在这方面, 也不可忽视美国财政部的作用”。批评 G7 不作为。

4. 2003 年, 独立专家 Bernardts Mudho 向人权委员会提交报告 E/CN.4/2003/10。报告中强调了一些成功的案例, 也指出

非政府组织认为, 大量证据表明结构调整战略是失败的, 因为没有解决国际金融机构经济政策在世界各地造成的日益严重的贫困和不平等。……重债穷国倡议、结构调整战略和减贫扶助信贷不仅不会成功, 而且将使穷人的生活更加艰难, 因为其目的是紧缩预算, 实行的政策将缩小经济生产能力, 减少可行和可持续性就业。

借款人和债权人应该对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目前无法持续的外债承担共同责任。

5. 2004 年, 独立专家 Bernardts Mudho 向人权委员会提交报告 E/CN.4/2004/47。报告指出,

独立专家赞同世界银行业务评价部回顾的主要结论, 即《重债穷国倡议》是一项有益但有限的手段, 必须在债务国和国际社会需要对于整体的发展筹资方法作出更广泛承诺的范围内加以考虑。

6. 2005 年, 独立专家 Bernardts Mudho 向人权委员会提交报告 E/CN.4/2005/42。报告延续上年宗旨, 对 IMF 和世界银行总体持肯定态度。

7. 2006 年, 独立专家 Bernardts Mudho 向人权委员会提交报告 E/CN.4/2006/46。

报告中提请人权委员会延缓“八国集团（G8，俄罗斯为新加入国）倡议”截止日期的进步性。

由八国集团（G8，俄罗斯为新加入国）在 2005 年夏天提出的“**多边债务减免倡议**”预测 IMF、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开发协会）和非洲开发基金（非发基金）会 100% 减免世界上负债最沉重穷国的债务，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但是首先，**只有成功完成重债穷国倡议的国家**（迄今只有 19 个）**才符合资格**。其次，只有三个多边开发银行参加债务减免倡议，使得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仍然承担沉重的债务。

独立专家**遗憾地**指出，世界银行下设的国际开发协会将 2003 年定为取消合格债务的“**截止日期**”，这一举措不符合 G8 的最初提议，并将导致债务减免大量损失。他请开发协会重新考虑其决定。

8. 2007 年,独立专家 Bernards Mudho 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 A/HRC/4/10。报告中

遗憾的是，近二十年期间，贸易自由化在实施上往往**操之过急**，并且**顺序安排不当**。有时更易为**经济教条**所左右，而不是就对之可能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作出有事实根据的分析。

9. 2008 年，新任独立专家 Cephas Lumina 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报告，A/63/289。报告中 Cephas Lumina 概述了自己的执政方针，着重指出**人权法的首要地位和人权的中心地位**。

可以辩称，根据国际法，国家的人权义务凌驾于许多其他种类法律义务之上，因此，国家，以及作为国际法主题的国际组织，采取的所有行动都应与国际人权法一致。

10. 2009 年,独立专家 Cephas Lumina 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 A/HRC/11/10。报告中关于债务减免所附条件的脚注是

例如，根据 *Eurodad* 最近一项研究，**国际货币基金每一笔低收入贷款通常附加 13 项条件；大多数条件要求实行私有化和自由论，对借款国家的穷人造成严重后果。**

另一个脚注提到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指出

过去几十年里包括**世界银行**在内向贫穷国家提出的大多数政策忠告都强调参加**全球经济的优势**。然而**全球市场远非公平，其运作管**

理规则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比例偏高的不利影响。这些规则是经过复杂的谈判进程所取的结果，然而在这其中发展中国家却没有什么发言权”（加重强调）。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

此外

过高的债务偿还以及对债务减免和新贷款的附加条件通常限制公共开支（甚至有损于向教育和保健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促进经济自由化（包括国营企业私有化，解除投资管理并引进公共服务使用费），以及优先考虑债务偿还而忽视满足基本需求，这些不仅使贫穷恶化，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保健造成尤其严重影响。

11. 2009年，独立专家Cephas Lumina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报告A/64/289。报告中Lumina援引多方国家、组织、个人对“非法债务”的定义，希望依据公平、公正、持久、人权原则等，建立有权确立债务非法性的机构，建立负责任融资框架等。

债务人和债权人共同承担责任的原则是平等的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如同在《蒙特雷共识》中强调的，“债务人和债权人必须共同负责防止出现和解决债务不可持续的情况。”

12. 2010年，独立专家Cephas Lumina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报告A/65/260。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贷款和债务的减免机制常常附加私有化以及贸易和金融部门所需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报告中认为这些贸易自由化使债务加剧和不可持续，并对人权，尤其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及发展权造成不良影响和灾难性后果。

13. 2010年，独立专家Cephas Lumina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A/HRC/14/21。报告中定义了“秃鹫基金”的概念。秃鹫基金侵蚀了贫困穷国从《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中获得的收益。呼吁各国立法限制秃鹫基金，其中美国、英国、比利时已经或者正在执行相关遏制法律。笔者注：实际上，秃鹫基金在金融领域发展迅猛。

“秃鹫基金”一词用于描述私人商业实体通过购买、转让或其他交易形式，获得违约或不良债务，有时是实际的法庭裁决，以期获得高回报。从主权债务的角度来说，秃鹫基金（或如它们通常自称的“问题债务基金”）一般会在二级市场上以远低于其面值的价格获得穷国

(其中很多是重债穷国)的**违约主权债务**，然后企图通过**诉讼、扣押财产或施加政治压力**寻求获得**债务全额面值连带利息、罚金和法律费用**的偿付。根据非洲开发银行(非行)，秃鹫基金的平均回收率为其投资的**3-20倍**，相当于**300-2000%**的利润率。非行把这种回收率描述为“可能是问题债务市场中**最高的**”。目前，既**没有法律限制**这种基金可通过诉讼获得的利息或利润总额，也没有管理框架要求披露这种基金的**购债成本**。

秃鹫基金诉讼案件通常都在发达国家的法院上提出。这里可能是秃鹫基金的注册地或贷款协定中指定的管辖区。多数诉讼案件都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法国的法院**提起的，这些地方被视为“**有利于债权人的**”辖区。

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承认商业债权人提起的诉讼“阻碍了向重债穷国提供完全的债务减免”。

14. 2011年,独立专家 Cephaz Lumina 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 A/66/271。报告中介绍了**出口信贷机构对国家可持续发展和人权造成的不利影响**。

“**出口信贷**”一词系指一种**保险、担保或融资安排**，它使出口资本货物和服务的购买人能推迟一段时间付款(包括通常为两年以下的短期信贷，通常为两至五年的中期信贷，以及通常为五年以上的长期信贷)。出口信贷是出口信贷机构提供的主要贷款。

出口信贷机构是公共实体，向母国的私营公司提供政府担保或补贴的**贷款、担保、信贷和保险**，以**支助出口和对外投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和投资。大多数发达国家至少有一个出口信贷机构，通常是其政府的官方或准官方机构。

出口信贷和投资保险机构一般称为出口信贷机构。这些机构作为一个整体，是为外国企业参与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采掘业部门项目提供公共融资的主要来源**。

出口信贷机构以**低于私人市场的利率、保险费和手续费提供融资**，且这些机构对提供支助提出的经济条件很低，只需有限度地遵守(或根本不用遵守)环境、社会和透明度标准，使金融交易得以更容易、更快捷地进行，但其风险也更高。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人而言，出口信贷机构担保的贷款的利率仍**高于**开发银行或机构等其他官方来源提供的许多贷款的利率。

大多数出口信贷机构则完全没有促进发展的任务。这些机构的**唯一目标就是促进本国的出口或对外投资。**

15. 2012年,独立专家Cephas Lumina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报告A/67/304。报告中介绍了国际金融机构在向借款国提供贷款、赠款和债务减免时所附加的经济改革条件,对借款国妇女权利造成的影响。如**削减政府开支,进行公共部门改革、公共服务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

IMF和世界银行估计,重债穷国的偿债金额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已从2000年的4%以上跌至2009年的1%,而减贫支出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已从2000年的7%增至2009年的9%。

报告中肯定了债务减免对穷国的一些积极作用,“然而,必须强调,债务减免通常并不降低重债穷国的脆弱性,因为许多国家仍然严重依赖外国贷款和投资。”

16. 2013年,独立专家Cephas Lumina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A/HRC/23/37。

虽然现行国际债务减免举措减轻了重债穷国的债务负担(从账面来看),但这些举措未能处理致使低收入国家的**债务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包括不公正的全球贸易条件,生产和出口基础狭窄,容易遭受外来冲击(包括国际资金量的减少),以及不负责任的放款等。实际上,这些举措侧重把债务降至债权人认为“**可持续**”的水平,这样做隐含的意思是:问题在于接受债务减免的国家在债务管理上欠谨慎而且治理不善。**债权人在举措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与共同责任原则相抵触的。**同时,与举措相关的附加条件损害了债务国的主权,在某些情形中妨碍了债务减免的减贫目标的实现。

17. 2013年,独立专家Cephas Lumina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报告A/68/542。报告主要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差距工作队2012年报告》,总结**千年发展目标8与实际进展的差距**,希望建立更为强大的发展框架。报告中提出千年目标8实际进展过程中的不足和缺陷有:

发达国家持续的农业补贴也继续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贸易和生产产生不利影响。2011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农业补贴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95%。虽然发达国家农业补贴一天为**10亿美元**,许多贫穷发展中国家无力补贴其农业,导致其产品价格较高,农民的贫困加剧和生活水平下降。发达国家还对**进口的制成品和加工产品征收高额**

税,使得发展中国家无法赚取更多收入,并使他们只限于原材料出口。贸易谈判多哈回合停滞不前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二十国承诺抵制所有保护主义措施,并纠正任何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所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但2008世界贸易自危机开始以来只废除了一小部分已经实施的贸易限制。迄今实施的贸易限制已影响到将近3%的世界贸易。遭到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

如独立专家在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A/HRC/23/37)中所指出,债务减免的直接财政影响难以衡量,债务减免与减贫支出增加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难以确定。

债务减免机制已经完全为债权人所主导,过度侧重于纠正被视为是受援国方面不慎重的债务管理,没有债务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包括不公平的贸易条件、不负责任的贷款和国际金融机构不当的政策规定。

18. 2013年,独立专家 Cephass Lumina 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 A/HRC/25/52,说明不把非法资金归还来源国对享受人权的负面影响。

“非法资金”一词泛指腐败、贿赂、贪污、逃税和其他犯罪行为的收益。

19. 2014年,独立专家 Cephass Lumina 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 A/HRC/25/50。报告中 Lumina 总结了自己2008–2014任期内的的工作。

人权理事会的一些成员没有为外债和人权这一任务提供支助,尤其是欧洲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

20. 2015年,独立专家 Juan Pablo Bohoslavsky 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 A/HRC/28/60。报告主要涉及非法资金流动问题。

根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的最新估计,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因非法资金外流损失了9912亿美元,比2011年再增加1.8%。2003年以来,非法资金外流实际每年增加9.4%。通过将这个数字与发展中国家收到的官方发展援助比较即可表明这种资源流失的规模。2012年的官方发展援助为897亿美元,这意味着,2012年每支出1美元的发展援助,就有超过10美元以非法资金外流的形式逃离发展中国家。根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的资料,过去十年官方发展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外流。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资料，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 1992 年以来全球被谋杀的 725 记者中，有 208 人或 29% 报道了**腐败问题**。记者无国界组织 2011 年报告，在 2000–2010 的十年中至少有 141 名报道有**组织犯罪和贩毒**——非法资金流动的另一个主要来源——的记者被杀害。

21. 独立专家 Juan Pablo Bohoslavsky 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 A/HRC/28/59。报告题目为**金融共谋向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提供贷款**，提议对这些国家的贷款必须经过评估和验证。

向严重侵犯人权的政权提供贷款可能有助于政权巩固、使不尊重人权行为得以延续以及增加严重侵犯人权的可能性。这些结论对官方和私人对政府的金融援助都适用。然而，私人贷款似乎更具有破坏性，因为与国家间的贷款和由国际金融机构分配的贷款相比，私人贷款的公共问责程度较低。

第八章 维基解密、阿桑奇与西方政治

8.1 维基解密简述

维基解密官网 wikileaks.org 注册于 2006 年 10 月 4 日，朱利安·保罗·阿桑奇一般被视为其创始人。自维基解密成立之初，就着力于解密大批文档。创始之初采用 wiki 惯用的公共编辑方式，任何人都可以发布、修改页面，提供各行业领域的秘密信息，所提交文件需经匿名维基解密工作人员的审阅。因超出审核人员处理能力，后来改为只接受具有**政治、外交、历史或伦理**意义的文件。

维基解密在十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对世界造成巨大影响。如公布肯尼亚原总统腐败案；阿尔及利亚政府与石油公司合作，破坏另一家石油公司的设备造成石油大面积泄露；伊拉克战争美军直升机射杀平民，包括两名路透社记者和儿童；阿富汗战争的大量文件及关塔那摩虐俘；美国、俄罗斯的可以侵入几乎所有系统的网络黑客工具等。

8.2 希拉里邮件门事件

在 2016 年，维基解密先后发布 10 多万封有关于希拉里的邮件，一般被称为“邮件门”，影响更是巨大。本节内容有借鉴以下网页。

1. [知乎：DNC 邮件中有哪些美国民主党不可告人的内容？](#)
2. [知乎：如何看待 The Podesta Emails?](#)
3. [GitHub：希拉里邮件门数据](#)

为力求客观表述，克林顿基金会连续杀人、撒旦教或共济会披萨门等经由网友讨论演绎出的论点不计算在内，只节选其中极少数邮件，以及与之相关的后续发展。

2016年3月16日，维基解密发布30322封希拉里邮件，邮件收发时间跨度为2010年6月至2014年8月。2016年7月22日，维基解密发布19252封DNC（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邮件，邮件收发时间跨度为2015年至2016年5月25日。笔者翻译部分邮件如下：

1. emailid/25 希拉里竞选团队用邮件向DNC确认已收到几张DNC支票，被Jordan Kaplan严厉斥责：“不要再像这样发邮件。你认识Alex（直接跟他说）。不要犯蠢。”（根据网友分析，希拉里竞选团队通过HVF和DNC违法获取超过政治献金额度的捐赠，然后将超额捐赠化整为零，将这笔钱投入到竞选广告或者分化为小额筹款以躲避监管）

2. emailid/1041 DNC中的Luis Miranda提供了造谣污损特朗普的几个方向。如特朗普危险、暴力、侮辱女性、穆斯林、墨西哥人、反对言论自由等。

3. emailid/17065 富人Liz为HVF（希拉里胜利基金会）开具了一张20万美元的支票，要求希拉里参加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使Eileen Donahoe举办的私人晚宴。

4. emailid/20352 Jordan Kaplan索要捐赠人名单，要求将名单发给Scott Comer。这些人可进入USPS, NEA, NEH等实权董事会，也有可能进入不怎么好的董事会、理事会，如美国妇女历史委员会。

5. emailid/658 Scott Comer提供了一个23名捐赠人名单。（据知乎帖<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676600>，有部分人的捐赠数额，除去捐款最少的25美元和2600美元外，数额均在4万美元以上，最多捐款额为334000美元。）

2016年10月7日，维基解密又发布58000余封John Podesta的邮件。Podesta于1998-2001年任比尔·克林顿的白宫幕僚长，2014-2015年任奥巴马总统顾问，2015-2016年任希拉里竞选团队主席。笔者翻译部分邮件如下：

1. emailid/8396 2011年，卡塔尔邀请克林顿参加了纽约一个5分钟的小会，并承诺捐赠给克林顿基金会100万美元，作为克林顿生日礼物。另外，卡塔尔感谢希拉里提出的海地投资意见，并表示会加以考虑。

2. emailid/7452 比尔·克林顿的幕僚长Tina Flournoy致信Podesta：外国政府捐赠的钱已经入账。

3. emailid/22030 摩洛哥提出向克林顿基金会支付1200万美元，但有条件——希拉里要于2015年5月出席在摩洛哥古城马拉喀什为其召开的“克林顿

全球倡议大会”，并在大会发表演讲。（希拉里当时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此捐赠已构成受贿行为，但希拉里仍然收下这笔钱。因担心影响选情，后由其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女儿出席。）

4. emailid/6775 沙特的谢赫·穆罕默德酋长想对克林顿提供飞机带其参加埃塞俄比亚的会议一事表示感谢，要求克林顿亲自致电给他。Podesta 同意 Doug Band 的意见，同时要求穆罕默德酋长向克林顿基金会捐赠 600 万美元。

5. emailid/4635 Podesta 在疑与普京高度相关的 Joule Unlimited 公司持有 75000 股股票。（后于奥巴马任期 2014 年时将股票转让给一家匿名私人控股公司）

6. emailid/57027 民主党国家委员会的临时主席，也曾任职于 CNN 的 Donna Brazile，向希拉里泄露其与桑德斯**党内辩论**时要被问到的两个问题。在其他邮件中，Brazile 表示想在希拉里总统胜选后做 Podesta 的代理人。

7. emailid/39107 Alphabet 公司（Google 母公司）董事长 Eric Emerson Schmidt 的一个小团队为希拉里竞选团队制作竞选页面工具，并搜集整理捐赠者信息、信用卡号数据库等，团队工作人员认为 Eric Emerson Schmidt 暗示**他可以做的更“全面”**。（据 [opensecrets 网站](#)统计，Alphabet/Google 政治献金数额极大，2015-2023 年年均游说费用为 1485 万美元，年均使用说客 99.4 人。）

8. emailid/8190 2008 年 10 月 6 日，时任美国花旗银行（幕后为洛克菲勒家族）高管的 Michael Froman 发给 Podesta 一封主题为“Lists”的邮件，要求名单上的人应当优先考虑出任政府高官。内有三个附件，附件 1：92 个女性官员提名名单；附件 2：222 个非白种或残疾美国人提名名单；附件 3：31 个内阁级别职位的提名名单（附优先级与候选人）。（2008 年大选投票日期是 11 月 4 日，奥巴马当选后，有近半数入选奥巴马内阁。）

9. 其他，近百位媒体工作者、领导被 Podesta 招待。多位记者向 Podesta 表忠心，还有人预先告知将会提问希拉里的**问题**或者在发文章前请希拉里竞选团队过目。

10. Jack Ma 多次与美国金融巨头高管和演艺界明星参加克林顿全球倡议会。

8.3 维基解密的理念

综观维基解密历史，它的理念应当是显而易见的。

吸收多渠道泄密出来的大批量文件，不管信息来自哪个渠道——黑客、政府和企业工作人员、某一派系的敌对方都可以，只要解密文件是真实的便可接受。当信息量大到一定量级时，这个系统就可以高度容错，泄密者、甚至网站管理人员的个人主观就不起作用了。诸多事件就会一个个结合起来，构成为更富普遍性、一般性、客观性的权力和金钱光谱。世人由此可见光谱中的反伦理反人类思想，从而谴责、批评、改造、审判这种反伦理，促进相关信息的更加公开化，以让世界变得更加阳光美好、公正平等。

据阿桑奇接受采访时宣称，其主要目的是针对秘密结社。

以邮件门为例，Hillary Clinton 和她“still dicking bimbos at home”的丈夫比尔·林顿本来只是具体两个人，在竞选中则代表一方竞选势力。但随着邮件量级的增长，我们可以将其抽象到民主党、共和党；再到美国政治、资本生态；再到西方，直至抽象到人类整个的——可以是当前的，也可以是历史的——权力、资本生态，甚至抽象到人欲本身。

8.4 维基解密的缺陷及问题

维基解密仍有些问题和缺陷：

1. 存在公器私用的可能，如阿桑奇与小特朗普的生意。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过这样一条信息：从 2016 年 9 月美国大选期间到 2017 年 7 月之间，他与维基解密在 Twitter 上的私聊记录。其中一条信息显示，维基解密希望小特朗普帮忙——让特朗普总统建议澳大利亚指派阿桑奇为澳驻美大使。笔者个人认为阿桑奇向特朗普的倾斜出自现实的考虑，以使自己不必腹背受敌，谋求大使职位是希望借助大使的外交豁免权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有人指责维基解密与俄罗斯政府有关联，如 DNC 邮件泄露事件被怀疑有俄罗斯政府官员参与其中，向维基解密递交了邮件。也有人指责维基解密与特朗普有关联。如阿桑奇就曾在某次电视节目上自带“Vote Trump”的胸标，在个别采访中也倾向于特朗普。但在一次采访中当主持人问他要投票给特朗普还是希拉里时，阿桑奇又说“霍乱还是淋病的选择吗？就我个人而言，我一个都不喜欢。”。

2. 不受制约的权力：

维基解密试图借助公开秘密文件，打击不受制约和暗箱化操作的权力，使政治、军事、外交、伦理奔向更为阳光的一面。在维基解密的历史中，它显然具备极高可信度。但同时，维基解密的内容发布权限只集中在少数几个人的委员会，甚至只有阿桑奇自己手中。在试图制约其他权力的同时，维基解密的“发布委员会”自身也具备了极高的权力，这种权力由维基解密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用户所赋予。

那么，由谁来制约维基解密自身的权力呢？在现实中，因其倾向于特朗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选结果。勇者要谨防成为恶龙，而我们却不能提供预防恶变的措施，只能单薄无力地寄希望于阿桑奇自己的个人人格。

3. 核心机密文件的筹码困境：

维基解密在因特网上数次释放了数十 GB 加密文件，可供自由下载但无解密密码，数年来从未公开，被网民推测其中拥有足以造成国家动荡的核心机密。这些文件的密码也是阿桑奇的“保命筹码”。凭此筹码，美国等国家不敢轻易直接对阿桑奇采取极端措施。但维基解密掌握的这些最为有力的文件，在非极端情况下却几乎永不会为人所知。

即使阿桑奇已于 2014 年被英国逮捕，这些核心文件密码仍无从得知。

4. 体制外权力的限度：

维基解密是一种反体制规训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无法融入体制。它寄希望于通过公众的知情权，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打破规训，走向美好，至于怎样“走向”，是它所不能提出的。也就是说，它具有极强批判性，但是建设性仍是有限，且会受到多个强权集团的强力打击，极难以生存下来。自阿桑奇被捕后，维基解密网站的活跃度、真实性、影响力都大幅下降。

知乎的 @阿伽陀认为体制就现实来说，仍是重要且必须的。维基解密太过于反对体制，只能被反对派、寄生虫或别有用心者利用，我个人对此持有限赞同态度。

8.5 希拉里邮件门之后

希拉里邮件门，特别是 Podesta 邮件曝光后，美国媒体先是相当沉默，直至此事在公众网络上越炒越热后才真正介入。CNN 居然有主持人说公众直接去看泄密邮件是违法的，公众应当从媒体、从 CNN 渠道获取“权威报道”。

Quora, 4Chan, Google 等网站均有删除维基解密相关内容的行为。本是希拉里激烈对立面的特朗普也往往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皮尽管扯，里子却是触动不得，两党保持相当默契。媒体、政治地被规训在此表现的淋漓尽致。

那维基解密理念中所在意的世界大众的力量呢？结果同样令人失望，浪潮过后并未起什么大的波澜……历史上类似的政治腐败曝光事例，又有多少激起了民众非表面的、积极行动的强烈反抗呢？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维基解密充其量是理想，而不具有现实的行动性呢？虽然我们的现实太过贫困，很可能无法提出任何行之有效的总体建设方案，只能揭示。但笔者认为不可无视星火，正因为有这些理想的火种散播在部分人心中，那就始终是有燎原希望的。不然整个人类社会都将持续向边沁、功利、利己的方向发展，走向毁灭。当潘多拉打开魔盒，放出一切邪恶与困病时，“希望”还留在里面。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鲁迅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第九章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 早期苏俄科社实践

9.1 序言

苏联问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一个敏感话题。对其研究常常带有各种不同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功利目的，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为不同利益背书；也常被个人主观倾向所利用；在民间个人，则常常被自身迷梦所影响，简单片面的赞美或者抨击。

笔者认为，如果刨除政治经济学，只用其他视角去考察苏联列宁和斯大林统治时期历史的话，无法形成一个完整链条。历史与政治经济学的考察相结合，将更为完整展现苏联早期内在的满满张力——起因、经过、结果、成就、矛盾和不足；认识马克思本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早先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所在；弄清楚有关社会主义本身的一些问题，比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及其局限和不足；加深历史唯物认识并破除对于救世主或个人的迷信与崇拜……总之，这样的考察结果将会在多方面提供更多借鉴和意义。

本章关于苏联的资料，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论据主要取材自批判色彩浓厚的 M. C. 霍华德与 J. E. King 所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 1883-192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 1929-1990》，历史资料多取材于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 1917-1991》，闫永飞《苏联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新经济政策》，黄立葑主编《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这无疑犯了取材样本过少的错误，容易偏颇。但笔者实在无能为力再进行过多展开了。望得到大家建议、批判。

笔者对所有参考文献并不全然赞同，对个别文献更是批判大于赞同，为此将以上材料进行了**批判性整合**，融入自己观点。

9.2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缺陷

自马克思中学毕业前夕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至其生命终结时未完成的一些作品，我们都可以鲜明看到贯穿马克思思想的一条主线——**社会伦理**。马克思的社会伦理不直接讲求个人伦理，它讲求人的“**社会性**”。因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之恶主要是由综合历史社会关系影响，真正解放的人本质只有在相当和谐的社会才能实现。

大部分人将马克思学说分为三个部份，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科学社会主义部份描述了一个美丽前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王国、共产主义社会。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均没有描述具体实践方式。

为什么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过一句话说，“**这种一切（本）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①在这种普遍的否定中，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拜物教**”。

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出了一个易懂简洁的说明：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下的过渡期

（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3]434}

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者称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一般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它仍带有（平均来说）等价交换的资产阶级法权**。

那么，为什么初级阶段可以发展自资本主义社会呢？

^① 括号中的文字为笔者所加。这句话的前半句起源于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34]531}，发展自对马克思具有重大影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35]309}。

“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36]538}，等价交换商品成为现实，个人也与一切人普遍异化的同时又与一切人发生关系；同时导致创造最多价值的人反而沦为“没有财产的”、“普遍异化”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于历史唯物对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分析鞭辟入里，但是他求得建设性的共产主义自身却并不是历史唯物的，而是伦理价值目的论，并且是彻底偏离了“科学”二字的伦理价值目的论。

他的不科学成分笔者总结如下：

1. 人是动物的一种，马恩学说夸大了人相对于动物的优越性。他最终要实现的是人超越动物性和原始性，使人类与自然中的天空大地等一体。笔者记得马恩也都曾在文章或书信中说过这是个永远无法到达但可无限趋近的最终阶段，并非是要人性完全超越动物性^①。但这点其实并不是最重要，我们接着看。

2.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一般规律的现实考察，主要基于曼彻斯特大工厂生产模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加入了金融资本、土地、平均利润率的考量，天才地、先驱地批判了金融资本。但最终还是小看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就如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利奥塔所认为的：**就当前而言，资本主义可以消融一切对立和异己的东西，能够吞噬一切。**

其实马克思自己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结合历史经验和当今现实，资本主义仍在发展，仍未发挥其全部生产力，那么在此情况下“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是否会产生，统治阶级是否是无产阶级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3. 即使按照马克思对于历史唯物的考察，或者按照列宁、斯大林颇有争议的“五段论”去考察人类历史，我们不无悲伤地发现，从奴隶社会至资本主义社会，每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每一个新兴的、替代了之前上层阶级的阶级，无一不是代表了比旧上层阶级更为先进的生产力、更为强劲的经济增长。但这种新上层阶级的兴起是较为**历史自然形成**，与旧上层阶级的**融合、过渡**一般也较为和谐，有时甚至是直接脱胎于旧上层阶级。而“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由理论指导，并非像马克思所说“现实的运动”；其次为了实践它所需要的暴力实在是太暴力了。

^① 笔者已不记得马恩类似话语出现在哪几篇文献里，印象里马克思在论述康德时有提到过，恩格斯一封书信中比较直接提出，如有读者知晓还望告知。

综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确实是一种基于马克思强烈“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愿望、偏离了科学的价值目的论。

笔者认为，马克思这一仍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伦理目的论与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着同样的结构，而不是柏拉图。

（苏格拉底关于善的知识）包括两个有重大意义的先决条件：一个是心理学上的，即明显的唯理智论；另一个是伦理学上的，即明显的幸福论……

就此苏格拉底把世俗说教的一般道德提高到科学的水平。^{[37]113}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智慧，恶源于无知，试图将德性等同于客观规律，借此让人类世界成为一个幸福的伦理世界，并为贯彻这一信念而殉葬。马克思很可能也是如此，最终导致不管他怎样为“科学”一词辩护，这都使其难以摆脱“目的论”的范畴。

马克思晚年关注过俄国革命的可能，与俄国民粹派有过交流，提出过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猜想，但这一猜想并非是有集体土地基础和意识的俄国可以独立革命成功；而是俄国革命的最终成功仍要依托于“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呼应”。^[38]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所提“不断革命论”的革命动力学也正是因此建筑于西方革命成功，这是**必要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批判的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不是彻底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更不是全盘否定马克思。没有任何一人的社科理论可以健全，我们要辩证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发展。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考量至今仍有巨大意义，甚至直接应验；科学社会主义中也提供了些理念、理想和具体方法，只是我们将更加负重前行。

9.3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苏俄的影响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被霍华德和 King 高度称赞，他早期是一个“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转变为寻求“社会合作”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因而被列宁批判为“自由派教授”。因他的这种转变、列宁对他的批评以及俄语受众小等原因，他也常常被国人忽视。

霍华德和 King 认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观点，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托洛茨基、列宁、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大林等人。笔者认为，如不了解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理论，便缺失了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痴迷于重工业发展的**重要思想历史源头**。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再生产图式”的批判和推演，得出：在**减少奢侈品消费，限制社会消费**的情况下，将节约出来的这部分资本**投资于生产部类**，可以扩大社会再生产。加强机器等促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应用，可以使扩大再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而不是像马克思所说一样随之增长，如此**消费部类**的消费需求也可以继续降低。“也就是说，**社会财富增加，社会收入（人的工资）减少，也是可能的**”，相比于消费需求，“生产资料需求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生产”。^[39]霍华德和 King 将其结论进一步总结为“**剩余价值的实现越来越独立于消费需求**”。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提出“**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各国发展条件、经济制度不一，但资本主义对于无限生产的欲望已经使当前形成一个**世界市场**，各国也均要通过这个世界市场彼此发生联系。

俄国是世界市场中一个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后发国家**”。

发端于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现代化是生存的必然选择**。……新型生产必须在**大规模工厂**中进行，以便有效地利用进口技术。仅**商业资本家**拥有资源和能力来筹办新工厂。由于提供自由劳动力的国内市场并不存在，因此，**国家有必要进行直接干预**，以提供**强制劳动**。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识到，“**后发者**”发展模式明显与**英国**模式不同，……后发国家的工业化缺乏自发性，国家行为发挥了支配性的作用，非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关系**结合在一起**，公开的**强制**补充了**市场训诫**，技术引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强调，**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整个俄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市场**。^[40]₁₇₄₋₁₇₅

杜冈强调国家规训下的现代化工业是“后发”俄国唯一出路的论调，奠定了列宁、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粮食危机后”斯大林的**抑农重工**思想。后来布哈林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大林等人应用“**杜冈主义**”，希望**工农均衡发展**。

杜冈的思想中，已经有了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张力。布哈林对此理论的延伸加强堪称经典，并且远远超越苏联时代。直至 1985 年广场协议之后几年学界才开始重建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理论，但似乎并未脱离布哈林的理论框架。

9.4 二十世纪初至十月革命的俄国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绝大多数东方国家不具有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曙光的种种有利条件（即地理环境、金矿、奴隶贸易、殖民地等），相反却普遍受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排挤和剥削（它们是作为被剥夺者而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这一客观原因外，更主要的则在于东方社会自身的历史条件。^{[41]2-3}

俄国是一个半亚洲式的、落后沙皇专制下的小农国家，他的农业国性质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使其受马克思影响较深，对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尤其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对农民的极强压迫剥削，带有较深恐惧。^{[40]137}。

1917年之前，作为社会主义必要的前提条件，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是无论如何也不可避免的。所有的非农民政党都赞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为它是落后的沙皇俄国唯一可能的革命形式。^{[40]86}

早期俄国民粹主义者，希望借助“农村公社”集体化与西方相异的特质，实行土地国有化，试图不经过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并与晚年马克思、恩格斯有过直接的交流。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否定后，又考虑了跨越“卡夫卡峡谷”的可能，但这一可能建立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彼此呼应。^[38]

“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批判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历史前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针对如何尽快过渡到社会主义，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阶段论”。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成立独立政治组织保护自己权益，并与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如果在这一进程中资产阶级抵制无产阶级，已经壮大的无产阶级则进行夺权斗争。

笔者认为可以将《1883-1929》的评价可以总结如下，两阶段论的缺陷在于它匮乏阶级动力学，过于重视政治而忽视了经济，忽视了俄国落后资产阶级的革命意向并没有这么强烈；甚至因为落后而依附于旧有沙皇专制统治阶级。此种情景下，无产阶级如何接受并超越第一阶段中的实际从属地位呢？

普列汉诺夫将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所有理念称为“代数学”，将这些人中产生的派系、理论差别称为“算术”，从而将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民粹主义政党）于1917年前长期求同存异地联系在一起。

继承普列汉诺夫衣钵的孟什维克，在演化过程中于 1905 年走向了支持资产阶级领导权，削弱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负责对政府施加压力的道路。

早在 1905 年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就逐渐形成了关于俄国未来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而既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来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将实行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实践了这一理论，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最有资格执政的民主派”。**政权应该集中在由自由主义政党的代表组织的政府手中**。至于社会革命党，1905 年革命的结局使它得出了与孟什维克类似的结论。在二月革命中，社会革命党人起先是尽量避免掌握权力，继而又同孟什维克一起，与立宪民主党实行合作。^{[41]38}

列宁在不同时期吸收了不同派别学说，对于社会现实变化极为敏感，并在政治表现上极为果决。针对右倾资本主义思想，列宁提出激进的“工农民主专政”。托洛茨基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不断革命论”，倡导“资产阶级革命嵌入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动力学和一系列先知色彩的预测上表现突出，在 1917 年与列宁走到了一起。两者均提出联合农民的具体纲领，列宁在 1914 年起就采取了“革命失败主义”——“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因分赃不均而爆发的，战争并不符合工人的利益，无产阶级只是在给资产阶级白白充当炮灰而已，因此，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乘机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权。”^[42]

更直接的描述：与主张“护国战争”的绝对多数社会革命党、立宪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相反，**列宁主张俄国投降，目的在于将俄国战争失败的压力转变为国内工农无产阶级革命的动能，其和平政策赢得了相当民心和军心**。

1917 年的俄国，形势复杂、风云变幻、莫名吊诡，难以用常识和理智去理解。二月革命突然爆发，“伊里奇的梦醒了”，当时本已对社会主义掌权绝望的列宁立刻展开一系列操作，在党内外多次以小博大、以少博多，审时度势、勇猛坚定，或许还要加上运气，数次力挽狂澜。这段历史建议直接观看《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1918 年 1 月 5 日下午 4 点布尔什维克十月底在彼得格勒武装夺权后成立政权。但即使如此，布尔什维克在 11 月 12 日选举出的立宪会议代表名单中，仍然只占据 24% 的份额。这使布尔什维克更加强烈意识到自己无法在立宪会议中

占据主导地位，于是继续采取一系列悍然措施，甚至逮捕与会代表。1月5日下午4点立宪会议召开，1月6日凌晨4点与会代表被驱离，当天宣布解散……1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并取代了立宪会议的职能，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没有充分理由相信列宁是一个投机机会主义者，或是窃国犯。相反，列宁始终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当时列宁视角来看，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立刻夺取政权，那么俄国革命的胜利果实必然是直接送入资产阶级政权之手，所谓起监督权的社会主义成分只能越来越稀薄和边缘化，如此绝不会出现普列汉诺夫所说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另外，作为一个政治家，待时而果决行动是优点而非缺点。

9.5 十月革命之后到新经济政策

面对1917年以后的困难，布尔什维克完全可能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式的解决方法，这也许是我们理解共产主义经济学具有的理论上不稳定和冲突的特征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革命政权继承了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1914年后成年男性人口中的三分之一，被动员起来参与到战争中，落后的俄国经济已经极其脆弱，很难承受一场全面的战争。革命和内战更是毁灭性的。假设1913年工业产出指数为100，1917年下降到75，1921年为31，而农业生产在1917年下降为90，四年后下降到60。在俄国内战期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下，俄国的对外贸易事实上几乎完全中止。随后的复苏十分迅速，工业和农业指数在1928年分别上升到133和125。然而，将1913至1928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俄国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与1870年至1913年2.5%的年增长率相比，这一时期的年产出增长率只有极低的0.8%，前一个时期人口的增长率为0.9%，但在1913年后下降到0.3%。^{[40]286-287}

《1881-1929》将苏联在1917年革命成功后到1929年之间的苏联经济史分为了三个不同的过渡阶段，笔者沿用这种划分，并将其与其他参考文献有关内容批判整合如下：

1. 1917年10月到1918年6月：农民夺取了土地，但却是以传统公社原则进行了重新分配，使新政府颁布的土地国有化法令成为多余，并降低了生产

率。实行的少数工业国有化大多是**地方行为**，并实行了“**工人控制**”，私人资本家受**工厂委员会**和**当地布尔什维克官员**监督。列宁将其描述为和公社国家结合的“**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在《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对要求更为激进实行全面社会主义的“左派”进行了批判，其中列宁观点主要是：

(a) **从投降派转向护国派**。俄帝国主义时代，采取投降主义，是因为这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如果此时支持战争则会有利于帝国主义，损害社会主义发展。“1917年10月25日以后我们是护国派……必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b) **进一步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消除怠工的政策是幼稚的**。之前采取这样措施是为在政治局面中占据主导地位，**掌权后**所面临的则是综合现实状况，身为执政党要贴合实际，采取过渡策略。

(c) 列宁在多方面论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苏联的“计划”特征也初具雏形。

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不采取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小农国家内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投机商（尤其是**投机粮商**）将既与国家资本主义作斗争，也将与社会主义作斗争。

在工农领导和监督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通过**正确计算和分配**将为一种保障。应仿效**德国国家资本主义**。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那么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笔者按：意即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将不需面对大的困难）……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诞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加紧仿效，甚于当年的彼得”。

2. 1918年6月到1921年初：**国有化和紧缩经济**。为应对协约国和国内白军武装压力，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试图征收农民全部剩余价值，优先恢复工业，导致1921年苏联爆发大饥荒，爆发**50多起大规模农民起义**，工业也处于**瘫痪状态**；**取消公用事业、住房、铁路交通和基本食物配给的收费**；工业品**不通过货币**而是进行直接配置，工资以**实物**发放；对城市劳动力实行**军事纪律**；工人

阶级的自治从属于等级制的控制；对反革命分子实施“红色恐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可化为两阶段：前段时具有政治、战时经济方面的客观合理性；后段的军事管制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次失败的主观尝试。列宁自述：

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43]184}

3. 1921年初：列宁得出结论，“要么是经济政策的根本改变，要么是他的政府被暴力推翻”。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将这一阶段视为“过渡性的混合体制”，并认为“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后退一些的境地，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44]283}。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政策体系，而是通过不断的摸索、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认识，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否允许引进市场机制。^{[41]144-145}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有：恢复了农民对于农业剩余交易的权力，将征收余粮改为粮食税，商业、农业可以雇佣劳工；对中小手工业企业实行非国有化，大力发展合作社；把企业交付租赁，鼓励合资企业和敦促共产主义者“学会贸易”，保留国有工业尤其是大工业的控制而不松手，涌现一批辛迪加、托拉斯；恢复商品、货币、市场、价值、金融机制，允许私人资本。

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中，列宁说“正如所预料的那样，私人资本并没有投入生产（因为全部工业的9/10已掌握在国家手中），而投入了商业。”中后期开始逐步加强对私人资本和富农的打压，逐步加强国家计划职能和集中化。

一个新资产阶级“耐普曼^①”产生了，列宁采取了利用且限制的态度，至30年代左右斯大林消除了耐普曼。

1923年，因国家对工、农产品价格的调控过度，爆发“剪刀差危机”，工业品价格相对于农产品来说过高，富农、投机商利用这一政策作为工农中间商赚取差价，农民不愿在市场出售粮食。1927年末到1928年春又发生了“粮食危机”“粮食罢工”，农民藏起粮食，不愿把粮食交给国家，农产品供应不足。

^① 耐普曼：俄文 Нэпман 的音译，字面意思是新经济政策的狂热爱好者，实际上是指新经济政策后城市中新兴起来的工商业私营业主。列宁用“耐普曼”一词表达对他们的嘲讽。

9.6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争论

苏联新经济政策前后历经了列宁和斯大林两位统治者，源于杜冈思想之**苏联必须大力发展大机器工业是党内绝大多数共识**。但围绕如何调节工农之间的强烈矛盾，避免工农撕裂，对农业部门的经济支持力度多大，苏联发生多次激烈争论，形成派别之争。

以下只介绍主要流派的主要思想以及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应对：

1.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党派要求支持新经济政策，进而和平演变至资本主义。特别是“**路标转换派**”号召放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抗状态，转而加入此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列宁采取了欢迎并警惕的态度^{[45]2.1 节}，斯大林权力稳固后持谴责态度，并于 1934 年开始对其逮捕、清洗。^[46]

2. 1923 年秋，针对新经济政策，**托洛茨基反对派**形成。

托洛茨基提出“**工业专政**”，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等“**超工业化**”观点^{[45]2.2 节}。两种观点都基于错综复杂矛盾下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且具急迫性。

托派提出，工农业价格剪刀差问题，根本上乃是党的错误政策和错误领导之下的工农业产品价格比例失调，富商、耐普曼等私人资本从中获取绝大部分利润是次要原因。

托派着重于从**工业分配领域**中获取利润，具体内容：进一步大力加强国家计划对国有化工业的扶持，进一步加速工业发展，工业地位要高于金融、农业，提升工人无产阶级政治地位及待遇、福利，排挤削弱私人资本，对富农、私人资本征收重税，贫农免税，用出口粮食的外汇来购买国外原材料和先进工业机器。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

随着工业的发展，农民转变为无产者、农业工人，国民经济发展将具有统一基础。结果是全面国有化和集中制，私人资本和前资本主义成分被消除。我们可以从中明显看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影响。若非如此，则俄国国有工业发展无法获得足够剩余，俄国农民的阶级分化将加剧，私人资本会扩大市场影响，俄国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3. 联共（布）中央多数和斯大林、布哈林对托洛茨基反对派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危机的原因是国家扶持下的工业恢复速度优先于农业恢复速度，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未能有效起到工农联结作用，应该**优先帮助和支持农民经济的恢复**。

新经济政策中本应以恢复工业品价格为目标的**托拉斯、辛迪加走向反面，错误利用垄断优势抬高流通价格，获得利润**。工业利润不应从之前的**分配领域**，而应从**生产领域**获得，如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杂费开支、缩减流通环节等等。认为托派意见低估了农民经济，**将农民经济看作被剥削的“殖民地”**，这会有害于国家政治和经济。

笔者认为，联共（布）中央此时论断更为正确性。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意见正是人为应用的造成大量失地农民的资本原始积累，毫无疑问会进一步加大农村矛盾，破坏工农联盟，理论上过于简单莽撞和一厢情愿。但是斯大林在“粮食危机”后学习贯彻的正是这种“应用杜冈主义”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意见。

1925年4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根据莫洛托夫报告决议^[47]⁵³⁸⁻⁵⁵⁰，认为应当进一步**提高和恢复整个农民经济**。对歉收地区农户、贫困农户继续加强国家扶持。提高农业商品化，消除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停止以行政手段对付私营商业和富农等。

需要采取法律的（特别是经济的）措施，向那些在农村中放高利贷和对贫农进行奴役性剥削的富农进行斗争。……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基本的实际任务，就是通过发展农村合作化（机器合作社、供耕社、牲畜管理联合社等等）的办法全力促进劳动农户的联合……尽力支持和巩固大规模的国营农业——国营农场。国营农场应当成为经营大规模的先进经济的榜样，并给予周围农民以经济和文化上的帮助……继续支持集体农庄运动（农业合作社，农业劳动组合，农业公社等等），因为在联合起来的农户和雇农完全自愿参加的条件下，这一运动正在有效的发展着。”

具体措施有减税赋、增加农业贷款、降低农业贷款利率，降低工业品价格，将一些国家土地转交给农民使用等等。

4. 会议之后，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以列宁格勒为阵地的新反对派**形成。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不同意决议，主张加强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他们认为1925年以来的新经济政策已经退却太多，国家资本主义走强，社会主义成分正在成长但远未成长，在整体向资本主义让步。富农力量依托政策变得过于强大，应当在农村挑起阶级斗争，依靠贫农消灭农村中的剥削阶级——富农分子。^[45]^{2.4.2节}

1926年春夏，新反对派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结盟，组成**反对派联盟**。

反对派联盟观点主要还是托洛茨基式的,要求对富裕农村地区加征税收,进一步加快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扩大日用品生产,提高日用工业品价格和工人工资等,“工人专政”、“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成为联盟共同认知。

可能因组织压力越来越巨大,反对派联盟为争取地位进行了一系列**跨越党组织的宣传和集会**。1927年9月份秘密印刷散布《反对派政纲》;将反对政府的意见扩大至国际社会;11月7日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组织游行示威,被政府驱散;11月14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开除出党;11月16日,托派越飞自杀,临终遗言埋怨托洛茨基不如列宁果决、不敢为天下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越飞葬礼上发表讲话,号召队列士兵对前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致敬“乌拉”,士兵无动于衷,这基本上宣告反对派联盟已无力翻盘。

托洛茨基于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寓所被暗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于1936年8月被枪毙。

5. 布哈林集团。

布哈林具有早期联共(布)领导人所缺乏的温柔浪漫色彩。他认为当前社会主义还是落后的,整合资本主义的过程应该**慢一点**,一步步来。

1925年4月,他号召农民**“发财吧,积累吧”**,借助于富农经济的提升,国家从富农中取得资金来发展中农、贫农。这进一步退却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立足点,在于**“我们还没有力量什么都自己干”**。^{[48]368-371}

1926年2月,布哈林提出“总的说来,在我们这里,阶级斗争会趋于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它不会尖锐起来……而相反地,会趋于尖锐化,因而在这个一定阶段,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以相应的方式行事。”^{[49]18-19}这一观点被中央评价为**“阶级斗争熄灭论”**。

布哈林总体上希望**工农平衡**,农业是全部经济的基础。应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发展小农经济。相比于**集体农庄**,**合作社**才是当前小农经济现实状况下,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道路**。合作社的发展将为农民提供更多个人利益,表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使农民自愿进入这一体系,富农合作社也将长入到这一体系,从而在未来将农民引入集体耕作。这一观点被中央评价为**“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1928年的粮食危机,使布哈林集团形成并明朗化。1928年1月,中央采取旨在打击富农和投机商的“非常措施”。1928年4月13日起,布哈林集团和斯大林矛盾公开化、尖锐化,双方贯彻和加强了之前的观点。斯大林坚持**工农剪刀差,快速工业化,大力发展重工业,农业集体化,农业“贡税”论**。笔

者赞同布哈林观点，此时斯大林就是“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提出了坚持**农业“贡税”**的必要性：

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我们不得不暂时征收这种税。^{[50]139-140}

也许为了更加“慎重”起见，应当延缓重工业的发展，把主要是供应农民市场的轻工业变成我国工业的基础吧？无论如何不应当！这样做就是**自杀**，就是破坏我国全部工业，连轻工业在内。这样做就是离开我国工业化的口号，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

1929年11月，布哈林被解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真理报》主编职务。1937年布哈林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捕入狱并被开除出苏联共产党。1938年3月15日，布哈林与集团内李可夫等人被枪决。

斯大林通过在政治对手之间的合纵连横，逐个扫清了他们。

笔者认为，除重要的个人权力欲望以外，以上所述几位对马克思颇有研究的苏联领导人其实有一条共通的认识——他们都明晓苏俄历史缺少了重要的一环——**发达资本主义**！

布哈林与斯大林决裂的根本原因，也不是表面上斯大林、托洛茨基和联共（布）中央指责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们对于**苏联经济发展的急迫性**认识不同。

列宁、托洛茨基、中后期斯大林等人认为在苏联强烈内忧外患、时刻面临政权颠覆危险的紧急情况下，必须抓紧改革，必须强力发展生产力！哪怕是以工农剪刀差为代价。而布哈林希望的则是社会普适的、“渐渐地”发展。对于当前急迫性和发展快慢的认识不同，使他们走向了最终的决裂。

9.7 斯大林模式

随着斯大林领袖地位的进一步稳固，斯大林模式开始逐渐成型。

1. “**围攻富农**”的政策受到一些富农激烈反抗——放火、煽动、阻碍粮食收购、甚至暗杀，“**粮食收购危机**”被认为是富农对苏维埃的反抗。1929年，政策转为**全盘集体化和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全乡全村土地纳入集体农庄；全国3%–5%的农民被划为富农，不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并将其土地、机器、财产收归集体农庄；将富农、反抗粮食收购和集体农庄的家庭大规模迁徙至偏远、恶劣地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富农家庭的划分被严重扩大。从1930至1932年全盘集体化结束，被迁徙富农家庭约为**40万户**，人数约为**180万人**。^[51]

1932-1933年，苏联爆发大饥荒，当前学界大多数认可乌克兰“大饥荒”死亡人数在**300万左右**，约占苏联饥荒中死亡总数的一半。^[52]

苏联体制下的官僚刻板追求数字政绩是富农迁徙扩大化以及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什么在苏联这种极权体制下，容易产生无视大量人民生命安危和伦理道德的官僚化，这需要很大重视和反思。笔者认为，简单将其评断为意识形态宣传的群体化错误，而不从**个人、人性**上找原因，远不能达到全面和深刻的水平。两方面都要深刻反思。

合作社系统所属机器拖拉机站和维修空间移交给全苏机器拖拉机站总管理局；扩大**预购合同制**，1933年预购合同制转为**义务交售制**，定额上交农产品，剩余产品归集体农庄和个人所有，使集体农庄和个人获得了更多利润。

斯大林实现了苏联式的资本原始积累。

2. 斯大林模式也取得一些飞速发展，以下内容摘自多个文献。

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30%，到1932年这一比重上升为50%。1929-1933年，苏联用于购买机器设备的外汇开支达60.1亿卢布。^{[41]277}

正当大萧条席卷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时，苏联经济的增长率急剧提高。1928至1937年间，工业生产增长**3倍**，从不足国民生产的1/3发展到接近1/2。1937至1953年间，工业再次增长**两倍多**，到斯大林去世时接近于总产出的60%。这一切只有通过**大规模投资**才会成为可能。每年平均有20%以上的产出用于积累，**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显著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再度达到1928年的水平，而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得更多，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到原有水平。^{[53]31}

（1933年1月10日，联席会议决议在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结中提到，）**苏联已从旧俄时代的落后的小农国家变为技术和经济最发达**

的先进国家之一……苏联已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而巩固了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因为苏联已经能够在本国的企业内生产大部分必须的设备。……苏联已由小农国家变成了拥有规模最大的农业的国家……失业现象已经消失……（因欧美经济大萧条影响）在美国，根据官方统计，但是加工工业中的在业人数，就由 1928 年的 850 万人减少到 1932 年的 550 万人。而根据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统计，美国整个工业中的失业人数，在 1932 年底已经达到 1200 万人……在英国，根据官方统计，失业人数由 1928 年的 129 万人增加到 1932 年的 280 万人。在德国，根据官方统计，失业人数由 1928 年的 1376000 人增加到 1932 年的 550 万人。^{[54]321-329}

到 1934 年，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在国民收入中已占 99.1%，在工业总产值中已占 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已占 98.5%，在商业企业零售商品流转额中已占 100%。^{[55]5.4.2 节}

这时候其实走的正是应用杜冈“社会财富增加，社会收入（消费）减少”的道路。

3. 1929 年，除住房建设合作社所有的住房以外，一切住房都转变为国家所有制，并逐渐形成党对住房事业的高度集中管理。并且国家对住房建设合作社的扶持逐年减少。

1937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住房租赁合作社和住房建设合作社及其联社被撤销，由地方苏维埃和国家机关及工业企业直接管理国有住房。百分之百国有化。党高度集中的管理最终形成，成为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55]第 7 章末}。

但是工人的等级化以及官僚的等级化在住房方面也有明显体现，其中官僚整体待遇比工人待遇要好得多。但斯大林时期官僚主义并未形成自成自治体系，斯大林倾向于瓦解分裂官僚体系，勃列日涅夫时期才是官僚主义巅峰。

4. 在考察受斯大林执政期间迫害致死和间接致死的具体人数上，常掺杂过多集团的功利目的或个人主观随意。有彻底妖魔化，也有为其辩护甚至美化的倾向，可谓光怪陆离。其实不管这个数字是 800 万还是 2000 万，无论如何也无法否定斯大林时期存在暴力极权、反人道和邪恶的一面。

关于大清洗断代和具体迫害致死人数，笔者倾向于吴恩远的观点。吴恩远《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56]可谓是一篇雄文，推荐大家观看。1937-1938 年确实是大清洗运动高潮，这点是共识。吴也在《苏联“三十年代

大清洗”人数考》一文中列举斯大林其他时期政治镇压的数据。

1937-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但仅以死刑犯为例，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人数约**68.2万**，占1921-1940年判死刑的政治犯总人数**749421**人的91%，占1930-1950年代被判死刑**786098**人的87%，也就是约占“整个斯大林时代”被判死刑总人数的90%，更占马文认定的大清洗年代被判死刑总人数的99%以上（1935年仅有1229人判死刑，1936年为1118人，1939年为2552人）。

另外，1937-1938年，按吴的数据，以政治镇压罪名被逮捕的政治犯人数为**130-150万**。整个斯大林时期，被判刑的政治犯人数为**380万**左右。

斯大林发起的大清洗及一系列扩大化运动，波及党政军及文化、科学、艺术行业，使苏联政治学、经济学发展从此迟滞，斯大林本人的极权统治得以建立。其积极性的一面就是通过这些恐怖统治手段，工业劳动纪律得以增强，农村反抗难以再兴风浪，官僚的反对意见日渐消失、高度围绕斯大林极权中心。“大清洗”的政策宣传使一些平民、贫民反倒对其充满热情和希望。苏联进入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

据赫鲁晓夫和一些文章，斯大林临终前曾想再次发动一场针对官僚的“大清洗”……

9.8 早中期苏联科社实践总结

笔者认为，列宁、托洛茨基、奥布拉任斯基、1928年后的斯大林其实具有着一贯性和连续性。这种一贯性基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社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历史唯物要求社会主义的建立要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条件下，这一点也被俄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部分党派和知识分子认同。苏联领导人一方面具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时便有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当然，这种背离在马克思论述科社时便已存在。

9.8.1 苏联领导人对马克思思想的正反应用

十月革命胜利后，葛兰西立刻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反〈资本论〉的革命》。文章中观点可以总结为，落后、物质条件不足的俄国所取得的革命

胜利，战胜了教条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葛兰西错了，苏俄正因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才在建国之初就深深埋下这一祸根。

在苏俄领导人仓促上台后，面对着极为恶劣的环境，没有丰富的资本主义物质条件，苏俄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外的夹攻中甚至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覆灭。在资本主义发达、世界经济市场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一国也无法建成社会主义，对后发达国家来说这更是艰难。列宁、托洛茨基、奥布拉任斯基、中后期斯大林均持有这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认识。因此他们更为急迫的想要获得资本发达，为此不惜代价。

在农村问题上，二十世纪早期列宁真正想要的是沙皇俄国推动激进的“美国式道路”^[57]。直接来说，就是列宁希望土地国有化，更为彻底的消除传统地主、农奴主、土地贵族等落后生产方式，获取大量失地农民支持，然后国家将土地无偿或低价转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农场主，实现资本发达化、大量农民无产化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再直接些表述的话，列宁希望沙俄采用马克思批判的鲜血淋漓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此，俄国不仅可以实现资本发达的条件，也可以大幅增进社会主义夺权的动力。

列宁认为，保守改良的“普鲁士道路”——人人皆有田可种，对于农民占比4/5，且贫农为绝大多数的小农经济苏俄来说，只能是生产方式的倒退，不管这田地是归农民个人私有还是全部归国家。

如前所述，列宁除战时共产主义阶段的失败尝试以外，一直希望实现的是愈加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也是马恩学说中的“物质基础”。

至于托洛茨基，他其实对工农矛盾有着深刻认识，但寄希望于“不断革命论”：

落后俄国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先于工业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取政权。然而，在托洛茨基看来，在孤立的状况下，是无法维持这一政权的。最终，必然和农民发生冲突，因为农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只限于完成土地革命。维护无产阶级统治所要求的集体主义措施，将导致与农民的分道扬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措施的结果，将会同时削弱这种统治的非无产阶级基础。在此意义上，土地问题既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帮手，也是它的一个主要挑战者。

不断革命论结果陷入矛盾之中，只有革命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并且成为世界范围内持续的“不断的”革命时，这个矛盾才可能解决。^{[40]224-225}

托洛茨基试图通过“**不断革命论**”：将阶级斗争推入扩大至西方，西方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后，世界无产阶级联盟，反过来哺育落后俄国，来消解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剪刀差问题。但托洛茨基对于西方无产阶级胜利的论断相当不成熟，一厢情愿。

前文已经论述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限制消费扩大生产的观点，托洛茨基“超工业化”的观点，之后斯大林也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托派观点。笔者在这里作进一步说明。

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价值规律仍在制约苏俄，斯大林多次承认这点，克里夫和沃勒斯坦也是因此论述苏联的国家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

苏联作为一个贫农、中农占绝大部分人口比的落后小农经济国家，其意识形态面临世界政治、经济封锁、军事侵犯以及威胁，如果苏联（资本）经济不发达，则无法免除沦为“**资本主义国家附庸**”的命运，甚至“**等同于自杀**”。而国内层出不穷的农业危机、农民叛乱、官僚离心也常使苏维埃政权濒临毁灭的危险，从而使苏联领导人在内忧外患之下高度精神紧张和敏感。

另外对于苏联这一后发国家来说，已不具备早先英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类似的优势条件。发展轻工业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早期路径。轻工业企业使用劳动力相对少，并且西方轻工企业数量多，发达程度高。对于苏联这类后发国家来说，几乎已经无法再从轻工业中获取世界的价值优势。

苏联重工业本身也不占价值优势，但是通过压低农业品价格、实现农业集体化、从农民中游离出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减少农民和工人收入，从古拉格和大迁徙中获取廉价劳动力及集约化土地等一系列措施可以获取大量超额利润。再将这部分利润附加上大量国家资本，重点投入到资本密集、人力密集的重工业，辅以计划和联合，**将使苏联重工业取得世界的价值优势**。从而重工业可以反哺农业集体化以及苏联经济、工人农民，苏联将成为强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管用怎样的理论去维护“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贡税”，它所遵照和向往的仍绝对属于获取“**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只是这种积累前面冠以了“**国家**”，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掌握一切生产资料，对资本予以调节，对工农有一定的回馈。苏联其实不可避免的成为恩格斯五六十年前所说的“**总资本家**”。

斯大林的政策，即使在政权稳固、全盘集体化、重工业得以迅速发展，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世界第二强国后，仍然忽略了工农收入、特别是农民的等比例发展。在他生命的尽头，仍想再次激进加速重工业发展……

9.8.2 苏联的国家性质

如果具有政治经济学基础和客观态度，便知苏联确实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其中**国家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且斯大林采取了暴力集权统治。全盘否定他的小社会主义性质或大资本主义性质，都是显著错误。如果将其视为17、18、19世纪的生产方式，则更是愚蠢无知，或者包藏祸心。如前所述，其实苏联在相当多层面尊重资本价值规律、尊重历史唯物主义，才走向这样道路。

整个过程像是一个笑话。本为反对资本主义鲜血淋漓“资本积累”的国家，因强烈的革命理想，居然走上在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道路。虽然无法否认斯大林全世界无产阶级胜利的革命理想……

斯大林模式中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这只“**看得见的手**”总有一天要面对资本主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挑战。计划经济中的官僚、技术专家制定全国计划的各方面欠缺都将强烈暴露出来。软预算约束^①、一些部门为完成硬性计划指标牺牲质量、各产业部门优先级的人力调节、官僚的贪腐等……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中，也并不是由一个鲜明的上层国家机器来行使“计划”职能……回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两段话，读者们，你们怎么想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向股份公司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

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夺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

而在我们去考察历史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时，甚至可能不得不去思考这些国家，是否是“**党取代阶级**”、或“**党的机关取代了党**”、或**知识分子和农民联盟**而不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或其他**强力社会主义国家军事和政治压力下的本**

^① 软预算约束：指当一个经济组织遇到财务上的困境时，借助外部组织的救助得以继续生存这一经济现象。

国改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能有个巨大错误——工人阶级并不代表更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其实列宁自己也否定工人阶级至上主义，所以要由先锋队引导。

列裴伏尔同意列宁的观点，工人阶级是革命行动的基础，但自身有局限性，革命依靠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的联盟，而且“工人阶级只有在各种力量处于一种特定的平衡并且有一种富有首创精神的**政治思想引导**时，它才发挥革命性作用”。^[5]

（列裴伏尔就此认为，）因此革命只能随形势而动，也就是在某些阶级关系中完成，这时农民与知识分子都进入这些关系的整体中来。**工人阶级本身并不是革命的，也不造就革命，也不为自己革命。个人阶级的革命性本质或革命的自然属性并不存在。**^{[58]¹²⁷}

列宁在沙俄时期就因其激进的社会主义理论受到党内外的质疑，其中亚·萨·马尔丁诺夫曾引用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中的一段历史唯物主义文本来反对列宁观点，现在看来，恩格斯这段话仍是振聋发聩，有效的切中了问题所在，并具普世意义，有必要全部引用。

对于**激进派的领袖**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运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所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的时候，就被迫出来掌握政权。

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取决于不同阶级之间对立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阶级对立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

他**所应**做的事，他那一派要求他做的事，也并不取决于他，而且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不得不恪守自己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而这些理论和要求又并不是产生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相互对立的态势以及当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状况，而是产生于他对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一般结果所持的或深或浅的认识。

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所能**做的事，同他迄今为止的全部行动，同他的原则以及他那一派的直接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而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办到的。总而言之，他被迫不代表自己那一派，不代表自己的阶级，而去代表

在当时运动中已经具备成熟的统治条件的那个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维护一个异己阶级的利益，不得不以空话和诺言来对自己的阶级进行搪塞，声称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本阶级的利益。谁要是陷入这种窘境，那就无可挽回地要遭到失败。[3]303-304

按照马恩唯物主义来说，从没有什么**救世主**，社会的形态和发展使个人只可有限改进，违背历史唯物，则将面临失败命运。对于**救世主**的幻想，往往来源于人类自欺的迷梦。每个人生活在这风雨雷电变幻莫测的人世间，都会有这样那样不切实际的迷梦，这迷梦来自于个人试图超脱现实困境的希望，是种自我保护机制。但若真正的认清和改良现实，恐怕就要求人自身尽量将这迷梦的成分缩微，直面惨淡人生，正视淋漓鲜血，为客观真实腾出更多的位置。

第四部分

平民视角下的中国

第十章 关于中国的前言

笔者已过不惑，越发感觉一切都是渺小的。仍具相当动物性和原始性的人给了世界历史社会太多限制，世界历史社会给了国家太多限制，国家给了政府和领导人太多限制……而凡人平民无疑是最为受限和苦难的。在这些丰富张力之下，若有一只上帝之眼去观看任何一人的一生，那都是怎样辉煌又深刻丰富的悲喜剧呢！

人类常常一直缺乏直面社会现实的勇气，常将幻梦蒙在真实和悲苦之上，这层面纱或遮掩或美化或扭曲。中国在数千年沧桑历史中形成的一种绝望尤使太多中国人爱做幻梦，常常自我麻醉、视而不见现实悲剧那并不让人开心的力量。

李大钊先生早在百年前就说：

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以自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①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其或征诛誓诰，则称帝命；衰乱行吟，则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时多故，则思王者，思英雄。而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又皆为应运而生、天亶天纵的聪明圣智，而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扰除。

今日又改变了多少呢？

在笔者的日常生活中，偶有贩夫走卒直指一些问题深刻本质，历史经验和个人的现实经验给予了他们一些超过“转椅上的专家”的真知灼见。很多人其实不是不知道，不是不能知道，只是不愿面对。

① 先秦农家学派代表人物

痴痴幻梦可以让人在世界悲凉残酷时感受到并不存在的温暖。过去我认为这是国人的虚弱，现在我更接受这是理性，是沧桑历史赋予我们的、用以应对现实的理性。面对了又能怎样呢？一切又有何用呢？太阳照常从东方升起，哪有什么迷雾外的彼岸伊甸园？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人民的自愿幻梦，怎不是看透了世事的大智慧？！

但我还是想在还能写的时候，把历史写下来。民为重，社稷为轻、君次之。我想写的是民的历史，而非人斗人或某些具体个人的历史。不管是社稷还是权力者都应当成为民的历史的注解，而非相反。悠悠世间，浊浪苍生，民总是这样翻来覆去起伏着，悲喜着，树欲静而风不止……但当我尽可能去避免描述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斗争，为了更好书写中国人的历史的时候，才发现政治主线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关于政治的描写也不得已追加。

有一点需要声明，笔者仅是高中文凭，一介匹夫，本身所知就甚少，接触到的资料又极少和片面，另外很多内在动因其实只有局内人才可知悉，这一切均使本部分内容可能出现较多幼稚谬误，让人贻笑大方，不可轻信。

土地在本部分占有极大篇幅，但也只是笔者在三个月内的所得。如果要写，不免错漏百出；不写，本书太过残缺，最终还是选择了写下来。

为什么敢写敢说，因为笔者仍有些天真相信真实和睁眼看世界这二者的力量，真诚求索的前提下，未达山峰只是在路上并不怎样难堪。

笔者所述中国史仅为一些片段，并非全貌。一是因为前文所述笔者能力有限，二是因为历史往往相通，乃至重复，无需面面俱到便可细绎得出一些更为本质的内在逻辑。笔者希望借这些历史片段去纪念在时代沉浮中漂泊的人民，如能激发起个别读者公平正义之心思自是最好，不能的话，也足可聊以自慰。

或许一切都是徒劳，每朝每代都有人在旷野中呼唤；或许一切是最好，人性的缺点所保证的是人类整体的繁衍生息，代代基因的传递；或许这只是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愚者所作所为……

但我还是想写下来，总有人会去做这样的事，我愿成为其中的一员。写完了，向我那总做傻事、一直逃避的青春致敬完毕，也就可以大方去做我的小家幻梦，继续另一段逃避历程了。

另外，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有目共睹，我们的衣食住行得到了飞跃式的提高，坚硬的城乡二元壁垒被打破，阶级流动前所未有，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跻身世界大国前列，诸如此类。笔者爱之深、责之切，还请读者多多理解。另外当代似也缺乏批判精神，甚至有人将之归入负能量，笔者不敢苟同，还是认为需要多些批判的力量。

第十一章 计划经济时期 1949–1978

11.1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1949–1956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

经济恢复3年，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 1950年2月13日至15日，第一次全国财经会议，中央统管全国财政收支、国家国营贸易和物资调度，稳定金融物价，具体实施中实行了严格的公粮入库制度。薄一波认为这是新中国财经战线三大战役中的第一次大战役。

2. 1950年3月16日，第一次全国统战会议，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针对党内左倾倾向，毛泽东提出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应求得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

3. 1950年夏，淮河发大水，灾情严重。农田受灾面积达4687万亩，灾民约1300多万人，倒塌房屋89万余间。以淮河为起点开展了对全国大江大河的治理。

史实部分参考樊宪雷《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我国兴修水利的探索实践及其基本经验》。

在1950年至1952年3年中，国家用于以大江大河治理为主的水利建设的投资共约7亿元，占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的10%，对全国2.4万多公里的重要堤防进行了修整，3年内直接参加水利工程的人员有2000万人，完成土方17亿多。如此大规模的以大江大河治理为主的水利建设，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河道失修的状态，基本上解除

了我国人民几千年所受洪水灾害的严重威胁，保证了大部地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安全。

防汛为主的水利工程之后延伸至以增产增收为目的的农田灌溉水利建设。

水利部提出，“1953年以及今后的农田水利工作的方向”，“应该着重开展群众性的各种小型水利，整顿现有水利设施，加强灌溉管理，发掘潜在力量，以扩大灌溉面积”。

从治淮到全国大兴农田水利，最后犯了大跃进错误。

新中国经济相当薄弱，城市经济自身都面临劳动力过剩问题，无法吸纳小农经济下农村严重过剩劳动力。大兴农田水利是**巨型以工代赈**工程。一方面，从农村中析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参与基础工程建设，对这部分人发放劳务报酬，农村农民生活压力得以减轻。另一方面，以过剩劳动力替代基础建设中耗资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笔者认为，这是一次后发国家中国尝试**弯道超车的巨型社会制度实验**。如果可行，可将这种**以工代赈的群众性运动**推广至其他全国性大规模基建，并大力发展经济。可惜尝试的结果可能是失败的。

大兴水利至今已有70余年，不管中国的意识形态有何变化，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始终是中国求得经济发展的主要依赖路径之一，1992年之后，房地产也列入了其中。

笔者还认为读者还需关注一点，毛泽东在他整个执政生涯里虽犯了一些错误，但始终没有开展直接的、血淋淋的创造大量失地农民，将其挤入城市的资本原始积累。

4. 1952年3月，“五反”运动中，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反对资本家“五毒”行为的斗争高潮。1952年10月，五反运动结束，中共中央转批的廖鲁言报告中指出

根据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5大区67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的统计，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总计999707户，受到刑事处罚的只有1509人，仅占总数的0.15%，其中判处死刑和死缓的仅19人，占判刑总数的1.26%。

5.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医疗制度是贯穿计划经济时期时期的，因此做下全面陈述。以下内容根据王晓玲《中国医疗市场政府管制的历史演进及制度反思》^[59]：

1951年起开始对工商业职工及其供养的直系家属实行源自企业纯收入的**劳保医疗**。1952年底，全国90%以上的地区建立了县级卫生机构，县级卫生院达到2123所。政府在1952年，1960年和1972年三次大幅降低医疗价格收

费标准，低于成本部分进行财政补贴。1952年，开始实行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公费医疗**，后于1953年扩大至大学和专科院校。1955年在山西省高平县率先实行了医疗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相结合的**集体医疗**保健制度，标志着我国农村正式出现具有保险性质的**合作医疗**制度。1968年，毛泽东批示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计划经济时期禁止私人资本进入医院。

毛泽东以领袖强力推动了农村医疗水平。主要是医疗巡回队下农村和培养保健员（赤脚医生）。据时任卫生部长钱信忠回忆：

在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又当面指示过，并批评“**卫生部想不想面向工农兵**”，“**为什么把医学教育年限搞的那么长!**”……我于当月20日，向毛主席呈上报告，决定在15所医学院中开办三年制的班，为农村培养医生，毛主席于第二天就作了“同意照办”的批示。

1965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对卫生部关于组织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报告的批示，至4月初，全国各地就有1500个医疗队，18600名医务人员下到农村，卫生部还派了两名司长分赴四川、广西等地检查贯彻执行情况，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下农村巡回医疗和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的高潮，其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医疗全覆盖至农村，这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乃至后无来者。1980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共同发布的一份考察报告中称，“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80年代初，由于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农业最小单位由农村合作社转为家庭，“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退出历史。

6.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出台，首要重点发展重工业。

“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是：五年内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总支出为766.4亿元……其中，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为427.4亿元，占55.8%，其余44.2%的资金计339亿元，用于基础建设所要的资源勘探、工程设计和器材储备等；工业交通运输和邮电业的设备大修、技术组织措施、新产品试制等；各经济部门的流通资金；经济和文化事业，培养专业干部等。

基本建设投资427.4亿元的分配是：工业部门为248.5亿元，占

58.2%；农、林、水部门为 32.6 亿元，占 7.6%；运输邮电业为 82.2 亿元，占 19.2%；文教卫生部门为 30.8 亿元，占 7.2%。

7. 1953 年 2 月 15 日，中央正式决议，重点发展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左倾右倾均要不得，另外推广国营农场。1953 年底到 1955 年春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合作社数量就由 1.4 万个发展到 67 万个。1956 年 1 月，中央发布《1956—195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强调完成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的升级。1956 年底，全国建成 75.6 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 88.8%。这标志着中国农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对农村史无前例的全面管控。

8. 1953 年 10 月，国家对粮、油、棉统购统销。1955 年 3 月 3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决定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薄一波写到：

继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之后，被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次大战役的，就是 1953 年开始的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到 1985 年改行**粮棉合同定购**制度为止，这个在特定条件下开始实行的农产品统购制度，持续时间长达 32 年之久。而统销制度的一些基本内容现在还在持续进行。^{[60]255}

关于统购统销的研究存在多方论述，田锡全论文《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有对各方观点的理论综述。

统购统销出台的背景如薄所说：1952 年粮食丰收，但粮食收支赤字较大；经济作物比粮食作物利润高；私营粮商的行价比政府征购牌价高 20%—30%。笔者想，显而易见，征购不畅最主要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征购价格低。

1953 年 10 月 2 日晚，陈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其中最重要一点是**粮食征购不足将导致物价整体上涨、工人工资上涨、继而使工业生产、预算、建设计划均受损。且人人囤积，形势会日益紧张严峻**。笔者认为陈云的分析是正确的，并且符合马克思、前期苏联的认识。

陈云在会上直言采用这种方式的代价是可能会有小部分农民闹事。可见《陈云文集》第二卷 1953 年 10 月 10 日《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报告中也陈述了他预想的另七种方法的优劣，可见陈原文，薄一波也赞美陈云这份报告的切实有力。

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

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任何国家政策的制定首先要立足于现实状况，而现实状况有时无法给出正确答案。关于农业，新中国与二十世纪初俄国面临同样问题，我们都没有大规模资本原始积累形成农业工业化（“美国式道路”）这一条件。陈云所述、薄一波评价“两个炸弹中的选择”便是为了发展工业化而苦力维持小农经济的现实实践。这真的难以说是国家的错误，而更像是整个人类世界客观局限和绝望，从全球到各国家到每个人，有时候都会面对这种可怕可悲选择的境地……

也如薄一波所说，虽然党内外批评和反对苏联利用剪刀差的一些具体做法，但仍然“在实际上无法同剪刀差真正决裂”。^{[60]281}黄宗智认为“三农政策不仅把小农家庭农场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实际上还强有力地农民推向集体化的道路。”^{[61]175}，国家依靠农村合作社等集体模式获得了对农村前所未有的强力管理，另外在国家对合作社提供优惠政策，及农民个人无法承担征购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使农民主动融入合作社。

9. 1953年6月，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1954年9月2日，政务院颁布《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1955年10月全国工商联会议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也是薄一波所说新中国财经战线三大战役中的第三次大战役。^①

10. 1956年是“一五”计划第四年，在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已经完成整个“一五”计划指标。工业方面总产值平均年增长19.2%，超过目标14.7%。在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时，农业方面：

农业增长率为4.5%，虽然完成了计划指标（4.3%），但是与工业高速增长相比明显滞后。这也造成了农村购买力增长缓慢，原计划农村购买力增长100%，实际上只增长20%，大大低于计划目标。^[62]

1956年的国民收入中，有92.9%来自于公有制经济（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这标志着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① 1966年9月，在原定的向资本家支付定息的年限已满后，政府决定不再支付定息，公私合营的企业由此变成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

11.2 红色社会主义社会时期 1957-1978 年

笔者将 1957-1978 年称为红色社会主义社会时期。

11.2.1 财政体制改进

关于这一时期的具体历史事件可看胡安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与经济体制改进》^[63]，中央和地方权利分配变化可看周飞舟和谭飞智所著《当代中国中央地方关系》^[64]。

关于中央集权和给地方放权、分权的内在张力：

中国政体的突出特点是**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一统体制**，即中央政府对其广大国土及居住其上的民众、各个领域和方面有着最高和最终的决定权。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深刻矛盾是**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一统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在一统体制中，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动态中寻找某种暂时的平衡点。国家治理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一矛盾而演化发展起来的，体现在一整套制度设施和应对机制之上。^[65]

地方权力过大，容易造成中央的政令不通，在极端的情况下造成“诸侯政治”甚至地方割据和国家分裂；而中央实行过度的集权又容易使得整个政治和经济体制陷于僵化，难以对地方出现的问题进行灵活和适当的反应和处理，地方的小问题往往容易蔓延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问题，从而也威胁到政权和国家的稳定。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就是指的这种状况。^[64]

根据万其刚《当代中国财税法制的历史及其发展》：

政务院 1950 年 3 月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关于统一管理 1950 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核心内容就是**把财政收支权集中于中央**。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好转，逐步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体制**”。1951 年 3 月政务院颁布《关于 1951 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把国家财政分为**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三级**。初步建立起“**统收统支、总额分成**”的集权型财政体制。

1957年11月，国务院颁发《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决定从1958年起，实行“**以收定支，三年不变**”（1958年4月改为“**五年不变**”）的体制。中央政府开始全面下放权限，建立起了“**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制，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对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可以安排本地区的建设投资和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公共事业项目。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放权**的变革。各省开始追求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地方可以自主基建投资等。企业管理方面，央企下放88%。对企业管理的指标性计划从12个减少为4个。

官僚主义抬头，地方第一次开始**指标锦标赛**，1958-1960年，各地纷纷上马各大中型项目，重复基建，重工业增长了2.33倍，轻工业增长了47%，农业下降了22.7%。大跃进开始，“浮夸风”等五风盛行，造成恶劣后果。

因五风盛行、大跃进、地方大干快上等，中央暂时收权：

“以收定支，五年不变”仅执行不到一年就难以为继。1958年9月，国务院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和改进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草案修改稿）》，决定从1959年起，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管理体制，简称“**总额分成，一年一变**”。

对地方的机动财力进行了适当压缩，将特定收入之外的其余地方财政收入捆在一起按照核定的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实行总额分成，把基本建设支出由中央专案拨款改为列入地方预算支出，参与收入分成，加上预算指标一年一定，中央适当地集中了财力，属于“**高度集中**”体制下的“**部分分权**”模式。但是，由于“大跃进”对经济工作的影响、中苏关系逐渐交恶及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年地方上仍然存在财权相对下放较多、财力分散、财政管理松软等问题。^[66]

从1961年到1966年，中央在行政和经济管理上重新“**收权**”，对于恢复国民经济的作用明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提出以“**块块**”为主的管理国民经济的基本思路，是“大跃进”时期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放权”**。大量精简、合并中央机构，下放85%的部属企业到地方。扩大地方基建投资的管理权；中央统配和部管物资由1966年的579种减为1972年的217种，同时下放企业的物资分配和供应权限给地方。

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正式提出“**四三方案**”。建议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红利，引

进 43 亿美元的西方成套设备来调整中国工业结构，布局相对集中的沿海主要工业城市，以调整国内“缺重少轻”的工业结构。由此开始了新中国的第二轮仍然维持自主性的对外开放。

统计表明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四三方案”的实施情况：中国从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用延期付款和利用中国银行外汇存款等方式，大规模引进的机械设备价值高达 42.4 亿美元。同期，中国马上就出现了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第一次面向苏东“对外开放”的“一五”计划完成后类似的问题：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特别是 1974 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 100 亿元，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还不到 800 亿元。^[67]

1974 年，财政困难，中央收权，回归“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第三次知青上山下乡。

11.2.2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对于新中国这一历史阶段的理解，必须加入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影响的认识。

1956 年 2 月 25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大力批判了斯大林，斯大林模式中一些残酷问题暴露出来，共产主义世界受到极大冲击，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发生十月事件，拥有绝大部份法国知识分子的法共有半数以上党员退党，其中一些理论家后来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过三七分，功大于过。^①笔者认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存在分歧和矛盾，但这种分歧和矛盾是建立在两人同一个社会理想的框架之下，并且在当时“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语境之下，斯大林的被批判使毛泽东感觉到了沉重的危机，阶级斗争的这根弦更加紧绷起来，**整治党内外，达成建设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统一共识**成为毛泽东的首要目标。但是也要考虑在历史语境下，当时世界各国各派领导人的神经都高度敏感和紧张。

11.2.3 整风到反右派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1956 年下半年开始，

^① 此类文献较多，可简单参考https://www.wxyjs.org.cn/mzdyj/201802/t20180208_236685.htm。

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
万多学生罢课。从 1956 年 10 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
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决
定在全党的范围内“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
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5 月 4 日，毛泽东起草《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
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20 余年后邓小平、薄一波对于此时毛泽东的
评价应是正确的——毛泽东此时确实是将党内官僚、宗派、主观问题当作社会波
动的主因，想依靠开放批评来进行党内整治。

不久党外人士的批评中开始出现很小部分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5 月 15 日，
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认为一些右派正在猖狂进攻。6 月 8 日，毛为中央
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直言中国如果不反右，
将可能面临匈牙利十月事件……到 1958 年 8 月为止，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本
是党外批评人士采用的“大鸣、大放”形式被借用过来，成为“大鸣、大放、大
争辩、大字报”，发动反右派斗争。据官方公布，这一运动中全国实际划归右派
分子 55 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人被错划。

薄一波认为，1956 年 9 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提出的“国内的**主
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
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
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被 1957 年 9 月到 10 月 9 日召开的第八届中央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
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错误取代。自社会主义改造完
成后，更应依靠法治解决社会矛盾，而非群众性阶级斗争。自 1958 年到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20 年，党和国家错误实行了群众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方针。^{[60]620-632}

11.2.4 浮夸风、命令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权风

在经历了一年半左右的对“反冒进”的批评和提出大跃进之后，1958 年 5
月 5 日至 23 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
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钢铁等重要工业品的产量上赶超英美成为一
个目标，笔者认为这标志着在中央政府层面上正式开展大跃进运动。虚报目标
并次次层层地加码，“浮夸风”盛行。薄一波认为农业上的“浮夸风”形成的盲

目乐观又导致了国家转向工业，形成了工业上的“浮夸风”，导致举国上下“以钢为纲”的大炼钢铁，农村砸锅进行土法小高炉炼钢，钢企不重安全和质量地快速出钢。

1958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国家计委重新拟定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1958—1962年的国家计划，这也是真正开始实施的计划)，提出了天方夜谭的高指标，冒进指数^①达到354.6%，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是“一五”时期的7.8倍，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是4.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是6.7倍。^[62]

由于“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1959年全国定产指标为5000亿斤原粮，而1959、1960、1961年的实产量分别只为3400亿斤、2870亿斤、2950亿斤。三年平均实产比1957年减少827.6亿斤，但平均年征粮食却比1957年增加了95.8亿斤，相当多的地方购了农民的“过头粮”。^②[60]278

浮夸风的盛行，使中央盲目乐观，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又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导致的现实具体因素方面，薄一波书中认为是大兴农田水利要求有**更为行之有效的基层组织结构管理**，对基层组织结构规模提出了较高要求。

1958年3月20日成都会议通过，4月8日政治局会议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佐证了这点。^{[60]728-730} 1958年8月17日到3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1日《红旗》杂志第七期中的嵯峨山卫星农业社模式推广至全国。生产生活资料公有，公社命令式调拨农民人力、物力、财力，吃饭不要钱^③，个别公社收缴了农户土地、房屋、资金、粮食……邓书杰写到

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此时改组成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加入公社的农户达1.2亿，占总农户数的99%以上。

农村人民公社兴起的同时，城市人民公社也开始兴起。据邓书杰：

- ① 原文注释：冒进指数是指本计划期的指标值相当于上一个计划期实际值的百分比，该比值越高，说明制定的计划越冒进，反之，越保守。
- ② 过头粮：中国在粮食争购工作中，对农业生产单位征购超过其实际负担能力的那部分粮食。1991年版胡绳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数据与薄相同。
- ③ 薄一波写道，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报告，参加公共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

到1960年7月底,在全国190个大中城市中,已经建立了1064个人民公社,基本上实现了城市人民公社化。

为实现“15年赶超英国”的强国梦,新中国实现了对农村前所未有的集权管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所问题的宏观根源究竟是什么?其实早在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已经由毛泽东本人提出答案,并在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得到深化。八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问题的根源。笔者认为时至今日这仍然接近标准答案,并且标志着中央正式开始“纠左”。

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 **不等于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

笔者在苏联一章阐述过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目的论和空想成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足以对他的共产主义作出批判,在此不再赘述。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冒进无视了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要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物质基础**;混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

人民公社的实质仍是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权力主体不是公社全民,而是集体组织。这一环境之下政社合一的集体组织是公社,以及可直接命令调拨公社财产的县级及以上国家机构,官僚具有的强大权力和自身欲望是人民公社问题一个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一些文章中已经作出一些判断,特别是在《哥达纲领批判》这一科学社会主义重要纲领文件中,沉重批判了拉萨尔为首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中》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仍是按劳分配和“带有经济、道德、精神方面的资本主义痕迹”,“仍带有资产阶级权利”,“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435}苏联列宁、斯大林均犯过冒进错误,很遗憾当时中国未能从苏联历史经验中吸取足够教训。

更为遗憾的是党中央未能发展和坚持《决议》的正确看法。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初期朱德、周

小舟、周慧等对公共食堂提出一些反对意见。7月14日，因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更为激进提出左倾错误。7月21日，张闻天在会议上讲话肯定和支持彭德怀观点。7月23日，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对左右两派“各打五十大板”。23日当晚，支持“纠左”的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等人于黄克诚住处发牢骚，张闻天说出“像斯大林晚年”等话。后被互相检举揭发，自此本次大会正式从“纠左”转向“反右”，且左倾错误继续扩大化。

另外笔者想提一点，据《重整河山 1950-1959》与《动荡年代 1960-1969》一书，

（农村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幸福院等公共事业。截至1958年末，全国农村共建立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托儿组织340多万个，幸福院15万所。

（城市人民公社）在这些基本实现了城市人民公社化的大中城市中，共计有850万闲散劳动力被安置就业，占这些城市闲散劳动力总人数的87%；共计兴办了7.6万个居民公共食堂，就餐人数达1700万；8.8万个托儿所，入托儿童为365万；还建立了8.9万个服务站。

虽然这些“大跃进”充满了主观期望与客观生产力不足的矛盾、大规模调用各方民众资源等问题，但也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1959-1961年^①，三年困难时期，岁大饥，人相食，饿死者以千万计。

11.2.5 大跃进中后期的安徽省

笔者之所以选择安徽大跃进问题单独论述，原因有四：一、机缘巧合，笔者最先接触这方面的史料。二、综合各方观点，安徽省总饿死人数不及四川省、位居全国各省第二，但是饿死人比例居各省最高，且行政主官主动推波助澜。三、安徽在大跃进前后出过两个上达天听的大人物，一个张恺帆，一个曾希圣，两人均具各方面代表性。四、安徽省官方较为尊重这段历史，地方志、论文等文献资料较为健全。

曾希圣于1952年1月-1962年2月任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10月，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②，也曾任济南军区

^① 一说是1958-1962年大饥荒。

^② 1961年1月曾希圣主动申请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普遍说法是曾希圣希望大搞“责任田”，无心兼任两省第一书记。另一说法是中央监察委员会针对安徽省饿死人进行的调查促使曾希圣辞职，这一说法可见尹曙生所作《曾希圣是如何掩盖严重灾荒的》http://www.yhcqw.com/33/10039_2.html

政治委员等职。大跃进时期曾希圣在土法炼钢、水利和粮食方面均大搞“浮夸风”。

1958年安徽产粮**167.9亿斤**，却被浮夸虚报成**450亿斤**（指标更高，是494亿斤），谎报了**2.68倍**。^[68]

在上下不讲真话的氛围中，1959年安徽粮食生产任务，于3月30日向全省宣布：“超额完成**720亿斤**”！这一严重浮夸的高指标，是1959年实际产量（**140.2亿斤**）的**5.14倍**！虽然当年征购粮是**70.94亿斤**还不到指标的9.9%，但却占实际产量的50.6%。为此，安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69]

张恺帆1959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之一，安徽省副省长，7月去兼任县委书记的巢县和老家无为县考察饿死人情况后，未经组织程序、自作主张、暂停无为县公共食堂，放赈救济粮。无为县问题也得到了时任安徽省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陆学斌的支持。此事被上报至庐山会议后，受到严厉批评。在随后8月、9月召开的两次安徽省委会议上两人被定性为“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

据张回忆录的记录整理者宋霖：

7月9日，张恺帆给省委和曾希圣写报告，报告无为情况和即将实行的“**三还原**”措施：1.吃饭还原，停办公共食堂；2.自留地还原；3.房屋还原，让农民回自己家居住。并于当晚严令县委立即付诸实施，他说：“救人要紧！”

7月10日至12日，库存的150万斤大米和300万斤稻谷，迅速发往农村；30万斤黄豆加工成豆腐、豆浆，供应浮肿病人和没有奶喝的婴儿；设法弄来的一批肉食品，供应给病人。此举拯救了数十万濒临死亡的人民的生命。

为此，两个多月后，张恺帆全家跌入苦难，六个亲人惨死……后来平反时统计：仅无为一县，因张恺帆事件受株连被批斗、被处理的县、社、队党员、干部和群众，共达28741人。^[69]

因笔者资料有限，不知酷爱仕途的曾希圣为何突然在1960年底开始转向，顶着重压积极实施“责任田”，笔者愿意相信曾希圣此时已无法再承受良心的拷问。

老农刘庆兰父子1956年起先后上山独立垦荒，4年“共向集体无偿缴纳上交粮食4716斤（平均每年1179斤）”。^[70]刘庆兰的事迹引发曾希圣极大兴趣，

后经毛泽东“同意试验”，在湖北进行“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用水和管水统一、抗灾统一”等“五个统一”之下的“责任田”推广。

它一问世就很受农民欢迎，全国不少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起来。比如，当时搞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安徽全省达 80%，甘肃临夏地区达 74%，浙江新昌县、四川江北县达到 70%，广西龙胜县达 42.3%，福建连城县达 42%，贵州全省达 40%，广东、湖南、河北和东北三省也都出现了这种形式。据估计，当时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约占 20%。^{[60]1078}

据张恺帆回忆：

我想，造成这种局面，高征购、浮夸风是主要原因，但办食堂，层层克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江苏早就把食堂停办了，与各省比较，安徽食堂持续的时间太久了，后果是惨痛的——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 40 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 400 万。实际上约有 500 万人。^{[71]344}

张恺帆的 500 万数据可由以下官方数据佐证，据《安徽省志·人口志》所载表 1-1-14，安徽省总人口在 1959—1961 年间负增长 406 万，仅 1960 年就比 1959 年负增长 11.21%，减少 3839979 人，^{[72]27}；表 2-1-18 记载 1960 年实际死亡人数为 2218280 人，死亡率为 68.58‰，书中还就此写到“此为年报统计数，人口实际损失更大”，1960 年的死亡比例远高于之前的建国后最高峰——1959 年的 16.72‰。从 1961 年至 1985 年，安徽省年死亡人数再也未超过 300000 人，死亡比例最高为 1964 年的 8.6‰。^{[72]95-96}

安徽省志 1958 年数据显示溺婴死亡 10159 人，1959-1961 年未提供溺婴数据……^{[72]108}根据周曼《三年困难时期安徽人口变动研究》，“关于安徽省的婴儿死亡率，也没有找到确切的数据。安徽与河南同属重灾区，再根据两省死亡率的比较，安徽省的婴儿死亡率可能会高于河南省（河南省 1960 年婴儿死亡率为 276.8‰），但确切数据无法估计。”

1960 年，人口死亡异常，死亡率在 10% 以上的有太和县（163.47‰）、无为县（158.29‰）、宣城县（147.26‰）、亳县（145.95‰）、宿县（130.32‰）、凤阳县（119.46‰）、阜阳市

(118.31‰)、肥东县(113.31‰)、五河县(108.71‰)等9个县,死亡率最低的是合肥市(11.27‰)。^[72]⁹⁸

(安徽省)各市县地方志关于人口死亡率的数据普遍(比《省人口志》)更高。以宣城县为例,安徽省《人口志》显示,1960年全县人口的出生率为4.57‰,死亡率为163.47‰,两相比较,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2.69‰。《宣城县志》没有显示当年全县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但提供了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为-205.88‰。^[73]

笔者认为同样要引起注意的是,据《安徽省志·人口志》,在“大跃进”拨乱反正3年后的1964年仍出现了1.81%的负增长。书中解释是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各地虚报人口获取利益的现象被纠正。如果将1964年纠正的负增长给到之前几年,死亡数据可能更加惨烈。

据姚宏志论文《1959-1961年安徽灾荒的差异性分析》,安徽省大饥荒时期烤烟、棉花等经济作物国家统购价格下降20%,改种粮食较多。文中引述的韩敏、王朔柏和陈意新等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宗族关系中官僚多的村庄受灾影响小;外派官僚取代原生宗族领袖的村庄受灾影响大;原生宗族领袖和宗族关系未变的村庄受灾影响小(采用偷稻种、瞒产、藏粮、对外守口如瓶等方式)……

曾希圣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受到批判,较多人——包括薄一波和陈者香等,说曾希圣是因这时的“单干风”而被调离安徽,笔者持不同意见。当时情景是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会续开“出气会”,分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陈云等领导人再次分赴几个省区大组,组织开展地委和县委干部对省委书记的“出气会”,且主要矛头均集中在“大跃进”错误。各省委书记捶胸顿足者有,嚎陶大哭者有,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被批判的主要错误是他的饿死人掩盖子问题。

此时并没有批判“单干风”一事,邓子恢、陈云等人在七千人大会同样主张搞“单干风”,毛泽东后派田家英进行责任田调查;“单干风”是在同年8月北戴河会议转向继续阶级斗争路线后才被定性的。笔者就此认为曾希圣被调离的主要原因绝不是“责任田”,就是“掩盖子”。

曾希圣力主推行“责任田”有功,但又何必将其粉饰为神呢?“出气会”初期依然死扛强硬“掩盖子”,他能算是个神吗?即使经过了历史几千年的教训,国民仍常常打破一个偶像后,又树立起一个新的偶像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学会客观求真、实事求是与就事论事呢?其实就算是张恺帆,笔者也觉要敬佩他停办食堂、开仓赈粮等英雄事迹和操守,但也莫要让其成神。我们要看的、要评价的应当是人所做之事,而非赋予人一个刻板标签……对于神圣者和

偶像的崇拜，无外乎是将本人无力之事寄托于他人，个人人格在此情境下无论如何也是残缺的。

这次始于1月30日的“出气会”，高层领导的参与除了为打破僵局、对省委书记展开批判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批判扩大至对一些省委书记更为严重的追责，如入狱、枪毙，隐含得更深层原因可能是将部分中央应付责任转移到省委一级。笔者一家之言，不可轻信，还要批判性吸收为好。

只是，曾希圣，你后来真的悔过了么？

最后，笔者也向曾希圣道一声歉意。本书前后虽批评很多人，但只细述了他一人的过失并不留情地抨击。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曾希圣也只是个浮萍。笔者细述他的深层目的不是将安徽省大饥荒归咎于他个人，而是他前后的故事均较有代表性，更希望官民皆以史为鉴，引以为戒。

11.2.6 对“大跃进”的补救措施及反思

1. 李若建论文《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将此时国人分为六个阶层：高级、中级、基层官员、利益相关民众和利益不相关民众，分别就权力和人性两方面展开论述。笔者认为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客观雄文，建议大家阅读。李若建另一篇《理性与良知：“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则说明了县官的生态环境、务虚正职与务实副职的差别和一些县长的英雄事迹，前文于无意中引用了李若建《困难时期的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我们还有一些负责任的官员、专家、学者和人民背负着国计民生的伟大理想和目标，向他们致敬。因笔者知识面狭窄，无法将他们姓名一一道出，还请读者自我发掘。

2.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和《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反五风，清理“一平二调”，反对五风，明确“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城乡精简，“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等。被庐山会议中断的“纠左”重新起步，笔者不再赘述。

经过“五风大跃进”，国家吸取了蔑视客观生产力的教训，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仍要“促生产”，各行业、特别是农业虽再发生过动荡，但再无这样强度的惨剧发生。

3. 城乡二元结构对立进一步加强，城市向农村逆向迁移。

1956 年秋天，由于过激的合作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导致不少省份粮食歉收、农民吃饭成问题，安徽、河南等省出现大量农民外流，进城寻求就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12 月《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出台，防止农村农民进城就业。

（出台一系列此类政策之后，）1958 年 1 月 9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以这个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严格限制农村农民迁往城镇，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因此而生成。

户籍制度变化第二阶段：（1958 年-1978 年），这一时期包括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文革”。**严格限制户口迁移**，特别是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迁移，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压缩城市人口**，包括精简职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农村等，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从城市迁往农村的反向运动**，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74]

上一段所述精简职工方面，

（大跃进时期的大招工）使得工人数从 1957 年的 3101 万增加到 1960 年的 5969 万，增长 92.5%。职工人数的增加，特别是从农村招收的职工，给城镇带来了大批的人口，1957-1960 年间，中国的城镇人口从 9949 万增加到 13073 万，其中由农村迁入城镇的大约 2218 万。

当粮食危机越来越严重时候，许多城市已经面临几乎没有库存的窘境，1960 年底全国 82 个大中城市的库存粮食只有正常水平的 1/3。1960 年 6 月北京、天津和辽宁的几个主要城市的库存粮食几乎没有，只能维持不到 10 天的供应，上海的大米库存已经没有了，天天告急。

有关的统计，在 1961-1963 年间，压缩下放 2500 万城镇人口，精减职工 1833 万人，被精减的职工中，大部分也被下放到农村，少数转为城镇集体企业工人，还有少数流浪到边疆地区，在当地谋生。^[75]

4.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俗称“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是一次纠左的、带有很多正面影响的会议，同时也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权力纠葛的复杂会议。

刘少奇代表中央政府引一老农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引用毛泽东说过几次的“指头论”对左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带头进行了自我批评，众高层官员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深化和发展了七千人大会的“民主集中制”之风。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奠定了此后半年的进步纠左基调。

邓子恢会后继续着力于推广“责任田”和“包产到户”。7月作出《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

1962年2月27日，王稼祥、刘宁一、伍修权联名给中央写信，分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趋于缓和，提倡对国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196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邓小平主持了这次会议，并推动平反工作展开，”到1962年8月，全国已有600万干部和党员得到了平反”。

1962年6月，彭德怀上书“八万言书”。

11.2.7 继续阶级斗争

虽然此后一直坚持阶级斗争，但再也不敢像“五风”盛行时那样破坏生产了。

1. 七千人大会的胜利成果只维持很短时间，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和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陈云、邓子恢和田家英经调查后支持“包产到户”“责任田”，因此被定为“单干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对经济困难形势的判断等被定为“黑暗风”；王稼祥等被定为“三和一少”；之前的右派分子甄别平凡工作、彭德怀此时的申诉信、《刘志丹》一书牵连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分别被定为“翻案风”。

2. 此后的历史，笔者认为已经乏善可陈。1963-1966年指向基层的“四清”，即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发动群众斗群众、官僚，发动官僚斗官僚……

11.2.8 笔者个人总结

1. 对唯物史观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可以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1965年2月11日，毛泽东在与苏联大使柯西金谈话时，主动提到“我对不以人民、党派和政府意志为转移，甚至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感兴趣。事件的过程都是被生存的客观法则所决定的。”毛泽东也知道。

但理论是抽象、枯燥、片面、书面的；而现实是综合、立体、具体、生动鲜活的；政治又是现实实践的，交织着种种人性私欲。正如扉页引用的黑格尔话语“人民和政府从来就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中国这一段历史犯有一些与苏联异曲同工的错误，可见前文 9.2 节“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缺陷，9.8 节“早中期苏联科社实践总结。”

2. 空怀理想无论如何也接不了地气，它也不能成为善的代名词，实事求是行动主义的必要前提、目标和标准。为了遥远伦理道德理想（空想社会主义）无视当前阶段的伦理道德——甚至肆无忌惮剥夺生命，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钱理群所说

至善至美的理想社会，只能存在于彼岸世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远方目标。它的存在，使人们永远也不会满足于现状，从而加强对现实的批判和改造力量。但这种改造、变革的努力，只能使此岸世界不断改善，不断趋向、接近理想，却永远也不会达到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任何将彼岸世界此岸化的努力，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天堂的现实化就是地狱。**

3. “民主集中制”是显明的“民主的集中制”，集中制为主。笔者认可中国必须实行集中制。诸侯纷争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朝代灭亡前的必然现象，乃至动因，不可不吸取这个教训。

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常提加强法制和民主（“法制”今日应当变更为“法治”），但是问题在于，集中制为主下，民主与法治的成份到底该有个怎样的度，怎样去确定度？历史唯物主义是极为宏观的理论，它缺乏对微观层面的考量，实质上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轻视上层建筑。

4. 官僚考核制度长远以来一直是各个国家的重大问题，它常常是唯上而不唯下、爱官而不爱民。我们该怎样发展官僚考核制度，是党和国家的重大课题。另外，这一阶段官员腐败和其他权力犯罪现象往往是被过于低估的。

5. 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段时期中，雪崩是主因、是制度，

雪花是次次因、是人性。这段动荡年代的种种人性体现足以给我们太多的警醒和教训，一些人是那样的残忍、残酷、蔑视生命、伦理、公理。人的本质就是会这样么？

再怎样的铁房子里，总有几线阳光照入，也总有并不算多的人如星般闪耀。联合国多年来一直倡导个人主观能动性，便是想要个人突破各种枷锁限制，最终使一个个进步的个人们彼此聚合为有力的、进步的和超越的群体。我们应当发展个人主观能动性，保持对人性恶的一面的警惕并敢于去对抗恶一些，有时甚至要为此抱有一种悲剧意识，只是这确实太理想化、太苛求了……

11.3 计划经济时期的成就

本节部分内容来自李慎明文章《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1. “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2. 排除种种干扰重返联合国。由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指导，我国与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的严酷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3. 1949年，中国人口5.4亿，人均预期寿命不足35岁。1976年，人口9.3亿，人均预期寿命64.6岁，人口数量增长近4亿，预期寿命增长近30岁。当然，这里也有之前战乱动荡，底子过于薄弱的加成。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将扫盲列为成人教育的首位，并在1952年，成立了“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积极推行“速成识字法”。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196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

解放初期文盲率80%，1964年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56.8%，1982年34.5%。^①

^① 参考黄晨熹《1964—2005年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动》

4. 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以严重城乡二元对立为代价，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

根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〇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

我们现在（80年代初）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在毛泽东时期，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跻身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

5.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2月，我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并于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在成熟的核潜艇的基础上，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战略核潜艇下水，使陆海空全都具备了第二次核反击能力。

邓小平1988年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6. 政治层面上前所未有的管控能力。计划经济时期通过“政社合一”人民公社体制实现了对农村前所未有、甚至可能后不见来者的资源管控能力。一切资源，包括“国有”和“集体”土地、企业、，事实上均被政府所垄断，为之后的市场经济时期提供了多方面可以运作的巨额红利空间。

因城市经济不可承受的压力，20世纪60年代初和三次知青下乡等以千万人为单位的城市向农民的劳动力逆向转移，没有这样管控能力和“信仰”加成

其实是办不到的，只是“信仰”在现实面前逐次衰减……

下一章我们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 1978-1992 年。

第十二章 市场经济过渡时期

1978–1992

12.1 时代背景

1976年，毛泽东逝世，党和国家粉碎了四人帮。

据世界银行数据^①，1978年的中国GDP总值仅为1490亿美元，人均GDP（现价美元）156美元，在世界银行所统计的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仅高于尼泊尔、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布隆迪三国。本时间段党和国家的改革都基于这一“国穷民弱”大背景。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领导人，都面对一个新时代，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试错是无法避免的；绝大部分人也都认为应当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增进民主、尊重价值规律、减轻中央财政负担、引入市场机制、加快经济建设。但调整幅度多大多小、多快多慢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歧所在。

12.2 整体意识形态转变

1.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到1981年，在全面复查的基础上，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和落实政策工作全部完成。全国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人，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8%”
<https://www.dswxyjy.org.cn/n/2013/0125/c244520-20323571.html>。

2.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拉开了全国范围内极左路线失势的序幕，华国锋“两个凡是”倒台。

^①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3.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原定议题讨论经济。陈云在东北组率先提出系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凡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到1982年底，约有300多万名干部得到平反。”）；邓小平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总结发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提到反官僚主义、加强责任制、“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同时对落后地区 and 人民给以有力支持等等。

4.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继承了几天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另外“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本次会议是纠正极左路线、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5.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党和政府系统梳理总结了这段历史，论述功过，极左势力下台。延续并发展了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论断，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6.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所提出的“一纲四目”，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提出“(3) 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4) 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1982年，邓小平就叶剑英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随后也成为香港、澳门回归中国的重要指导思想。邓小平在港澳回归问题上立场坚定，行动较为果决。

7. 1982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陈云约请国家计委负责人座谈，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保守派暂居自由派上风。

8.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开幕词，首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创了全面转向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新局面。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①

9. 1982年，黄克诚向陈云提出“要把经济搞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死，但搞活不能没有秩序。这就好比一只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它就死了，要让它飞。但要让它在笼子里飞，否则它就飞跑了。”陈云在之后两三个月里反复引用了黄克诚的谈话，并且加以补充：“搞活经济是对的，但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后被称为“鸟笼经济”^[76]，此鸟笼与我们当前的“腾笼换鸟”完全不同。陈云此时的“笼子”强调的是计划经济的约束，我们今天的笼子强调的是经济实体或空间生产。

10. 1983年10月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强调整党不能走过场，要清理“三种人”（指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198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9号通知，强调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②

11. 1984年10月20日，中共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重要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此外《决定》还涉及城市重点转移、价格改革、政企职责界定等。本文对于这些内容的探讨将分别放在下述相关章节。

^①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5/65448/4429495.html>

^② <http://l.zhuixue.net/jindai/89487.html>

张曙光评价

这样，“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12.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中指出：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①

13. 1987年10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提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整个历史阶段。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

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

据赵紫阳回忆，他作报告时，陈云中途退席。严立贤就此报告中的“**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写到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只是强调国家计划必须依据价值规律，而在

^①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5/65381/4429515.html>

这里，**国家计划必须通过市场来实现**，也即只能通过市场把企业引导到国家计划上来。这样，**指令性计划必然要退居次要位置**，整个经济体制因此向市场经济迈进了一大步。^①

在马克思所作的科学共产主义重要纲领性文献《哥达纲领批判》中，将共产主义分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初级阶段是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并不如报告中所说“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它不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而是相较社会主义阶段带有更多更多资产阶级法权的“前社会主义阶段”或“后资本主义阶段”。

事实上，不管苏联或者中国如何左或如何宣称，都始终都未曾脱离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范畴，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失败后对此具有较为清醒认识。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实践中，马恩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说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确实是无法跨越的卡夫丁峡谷。

赵紫阳本次大会报告上提出“**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列为两个基本点**。据赵紫阳《改革历程》记载，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等保守派在中共十三大之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意见较大，他们认为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纲，改革开放为目**”。此时自由派居保守派上风。

14.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和信贷。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②

试图使计划轨快速并向市场轨的价格改革失败，保守派势力相较之前有所增强，自由派势力受到暂时抑制。

15. 1992年1、2月，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提出当前在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认识上目前有三种提法——“**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个人的看

^① http://jds.cass.cn/ztyj/jjs/201605/t20160506_3324987.shtml

^②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0293/70319/4857100.html>

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改革步伐。本次大会如期撤消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12.3 领导制度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要求**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http://news.12371.cn/2017/03/09/ARTI1489054449475294.shtml>

本次会议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进行了严厉批判，将部分过往的政治内容划为封建专制主义，首次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的问题。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被党内外的主流研究者们奉为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①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讲话，贯彻和加强了领导制度改革。此后各级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精简、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等。1985年到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裁军百万。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连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彭真在本次大会所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中就此项规定说，“这就取消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会议上通过了1982年版的《中国共产党章程》^②，决定设立中央和地方各级顾问委员会。有相当资历和成绩的老党员、老

^① <http://www.yhcqw.com/33/9626.html>

^② http://guoqing.china.com.cn/2012-09/05/content_26433894.htm

人进入顾问委员会；中顾委接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但具有建议、协调、监督、宣传等权利。

笔者认为设立中顾委的本意明确，确实如邓小平在 9 月 13 日举行的中顾委第一次会议上所说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①

中顾委和地方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人选富有流动性，老顾问委员定期批量退休，部分较老的一线官员再退出一线增补进来，并且这种流动性与日俱增。1986 年 10 月，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全退”**，不再担任任何职务。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老“半退”**，仍担任一定职务。1989 年 9 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1992 年 10 月 18 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同意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就政治利益而言，在邓小平 1978 年事实上成为核心领导人之际，仍有一些与他相近资历却未必意见一致的老人。邓小平通过扶持对经济开放持激进态度的年轻领导班子，制衡拥有超然权力的幕后老人——尤其是希望放缓改革开放步伐的保守派老人。老人政治具有相当弊端，个人威权较大，给予民主的空间少，容易因循守旧、权欲过强，人治为上。拥有极大魄力的邓小平试图革除这一弊端，通过中顾委改革，政坛老人的影响力和权力逐步减弱，但是在现实实践上，邓小平最终仍成为实际上的“一个婆婆”，为其执政思想方针的贯彻实施打下坚实基础。

笔者简单认为，就“民主集中制”方面，一个好的中国“民主集中制”因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必然不能照搬西方口头宣传唬烂的那一套“三权分立”，诸侯蜂起时往往是最多战乱、人民最为痛苦无望时。就如何在保障集中制为主的基础上加强民主和法治成分，邓小平前行了几大步，大力推动党和领导制度改革，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功绩不能抹杀。虽未探索出最终的道路，但也不能过于苛求。

^① http://www.qstheory.cn/books/2016-08/31/c_1119485398_2.htm

12.4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分歧

这一阶段我党高层领导人均认为要纠极左并且发展经济，但就计划和市场两者占比多少存有分歧。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自由派倡导更积极全面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都属于自由派，笔者认为两位“年轻人”均是被拔苗助长的改开急先锋，用以应对“老人政治”中的保守派。

以陈云为代表的保守派倡导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支持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的步伐应该慢一些。前台人物可能是姚依林、李鹏？

197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今后8年，除抓紧把1973年批准的43亿美元进口方案（即“四三方案”）中的在建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总额为65亿美元。^[77]

中央较为乐观，会上就开始加码进口计划，并在之后掀起出国考察热，希望利用西方资本危机时机，大力引进进口设备。在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过程中，陈云曾提出“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派的意见，可能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但务虚会最终结论仍是膨胀到“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10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仅1978年，中国实际签约的引进项目总额为78亿美元。这比1950-1977年28年引进项目总额的65亿元多出13亿美元。这些项目引进所需资金，大多都依赖外债，且外债规模远远超出当时国家的还债能力。此外，由于对引进项目的要求过急，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可行性论证，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比如1978年12月最后10天就签订31亿美元的协议，因而在实际过程中，有些项目难于建成和正常运转，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浪费。^[77]

“洋跃进”造成了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电力交通和大型设备、投资和消费等比例失调。

1979年3、4月，针对比例失调，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这是全党的

中心任务。“国民经济调整第一次决策的关键人物是陈云，陈云的意见得到邓小平、李先念的支持。”^①

1979年底，基本建设的总规模不仅没有压下来，相反财政收支逆差170.7亿元，出现建国以来最大的赤字；外贸出口虽然比上年有所增加，但进口增加更多，逆差20亿美元。到1980年底，财政、外贸继续保持巨额赤字，迫使两年增发货币130亿元，造成物价大幅上涨。^[76]

1980年5、6月讨论制定六五计划时，陈云提出确保财政平衡、信贷平衡，为此可放缓经济增速，大大压缩基建规模、预防财政赤字、通货膨胀。

邓小平支持大力开放经济特区、吸引外资。陈云对沿海地区资本和外资投机保持警惕，认为资本的唯一目的是超额利润，担心不良后果；希望任用的沿海地区领导更为思想坚定而不是“头脑灵活”，但没有成功。赵紫阳认为陈云在1981、1982年打击沿海地区经济领域犯罪时有扩大化错误，有碍于改革开放进程。

1984年因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发放过猛、过多，基建规模过大，导致通货膨胀。陈云支持大缩基建和财政赤字；胡耀邦对产值和经济发展速度不是一般乐观，漠视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赵紫阳支持较为柔和的软着陆。

据赵紫阳，1987年10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大会报告时，陈云离席。看赵的前后文，可能是赵在报告中提到“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时。

1988年1月，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态势下，赵紫阳希望沿海发展更快些，进口国外原料，利用国内劳动力密集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在发达国家转向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生产的形势下发展出口；姚依林、李鹏担心会给全国经济过热带来影响和地缘经济发展不平衡；陈云等老人担心进口国外原料后向国外半成品、成品出口是否能够通畅流通。就今天看来，在邓小平支持下的赵紫阳这一举措是积极正面的，并为今日中国成为当今世界工厂奠定了基调，功不可没。

1988年5月18日，姚依林到陈云处，通报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意见。姚依林说：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笔账。陈云问：你看可以理顺

^① 蒋永清 《简述1977年至1982年国民经济调整的两次决策》

价格？姚依林答：我讲初步理顺，用五年时间。陈又问：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姚答：**价格总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资增加百分之百。**陈云表示怀疑，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姚依林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陈云进一步点出：问题是，物价连续上涨百分之十，影响的面很大。如果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赵紫阳**敢讲不敢讲**？姚依林：那非讲不可。陈云又谈到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并说：根本问题是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这个事很不容易。**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1984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头脑发热。我说，万元户没有那么多，无粮则乱。当时，有些人不相信。这次谈的是一个牵动整个国计民生大局的问题，因此谈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①

赵在《改革历程》中，也有提到“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提出今后经济体制的改革，用几年时间进行**价格改革，相应地增加职工工资**，认为这是解决走向市场经济，结束两种体制并存、价格双轨制的一个关键性战役。”他认为当时提议有些简单，应该辅以**加强企业管理**的措施……

赵对经济的认知水平，一言难尽……真要实施了，到时怕不是全民抢货囤货，商品价格暴涨，市场混乱程度绝不会亚于7月份之后的抢购风潮。

赵将1988年、1989年严重通货膨胀的问题归于邓小平为解决双轨制并轨，大幅放开市场价格的“价格闯关”：

1988年出现的物价上涨18.5%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既不出在信贷的失控，也不是出在基建规模过大，这两项都没有超过原“软着陆”方针下所规定的指标。主要问题是出在**储蓄存款大量下降**……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不采取上述的思路和做法，而是继续实行调放结合的方针，如果说感到过去步子太小了，可以把物价放开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同时借鉴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使银行利息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实行**保值储蓄**，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78]129}

鄢一龙和胡鞍钢引用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中的数据：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

(1986-1990“七五”计划期间)继续推行1984年开始的经济过热政策,信贷资金运用增加达到10686亿元,货币投放量达到1657亿元,均大幅度超过计划指标(分别为5745亿元、1000亿元)(笔者注:也明显高于经济增长。)[62]

笔者认为,赵的说法明显站不住脚,保值储蓄如何能够与通膨、基建、价改、贷款利率、中央财政负担等方面割裂开来单独实现呢?同期陈云、李鹏、姚依林的担心是正确的。

1988年因价格闯关彻底失败,保守派势力处于上升趋势,自由派势力有所减弱。

1989年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宣传部部长王忍之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议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全国开始兴起“**姓资还是姓社**”大讨论,这一年主要是保守派出击。

1991年1月1日,皇甫平^①在上海《解放日报》援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同志讲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发表文章《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3月至4月,皇甫平连发三篇文章,引发国家上下激辩。4月8日,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补选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但自由派仍未取得绝对优势。

邓小平1992年1、2月以全家度假为由再次南巡,争取到一些省委省政府和军队的支持,以类似于“地方包围中央”的方式,实现了他的政治抱负,确定了坚定不移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正式进入市场经济体制。

80年代过渡时期,胡耀邦和赵紫阳和两人对宏观经济的认识可谓浅薄,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基建规模过大、市场变化等问题实在是太过于乐观。

陈云对胡、赵二人的批评多数成立,认为要辩证看待市场经济的思想也成立。但陈云当时主要处于保守、被动一方,最终也是市场经济完全取代市场经济,这导致难以用现实发展去验证其理论和实践对错。

^① 作者原名周瑞金,笔者结合薄一波等人看法,认为笔名“皇甫平”应取黄埔江辅助邓小平之意。

陈云始终高度重视粮食战略，建国后的统购统销政策也是由他制定（可见上一章）。城市粮补、进口粮食、控制粮价其实也是延续“工农剪刀差”，其自述“**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这其实有现实的绝望和无奈。

中国最终还是走向了市场经济道路，且走得太快，或许这是历史和市民社会的必然吧……

邓小平与陈云虽有不同见解，但达成了不上纲上线扩大分歧的默契，斗而不破，能够互有吸收和让步。在邓小平 1992 年 1、2 月南巡后，陈云随即在 4 月份访问上海并表扬了上海改革开放的发展。笔者认为两人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民主，对党内整体的求同存异和团结民主起到了好的榜样作用，只是可惜同样并没有走得太远，没有推广至下级官员之间。

12.5 农业改革

12.5.1 包干到户、村社分设

1977 年 11 月 15 日，安徽省在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推动下下达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有“**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对收回的“自留地”，要按照政策规定如数退还给社员”等内容，安徽省再兴农业改革。1978 年安徽遭遇大旱，省委决定允许**借地给农民种“保命麦”**，9 月，肥西县山南公社黄花大队与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借此政策搞起实质“**包产到户**”，12 月凤阳县梨园公社严岗大队小岗生产队决定“**包干到户**”。

需要注意的是，虽有省委领导人万里推动，但党内和学界普遍认为“包干到户”是**农民先导和主导**，学者高王凌将农民主导的**软性反抗觉悟**称为“**反行为**”。笔者认为，“反行为”其实处处皆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也常常出现“反行为”，关于“反行为”的深入研究可能会在相当多层面上有利于国计民生，希望有相关人士深入研究此项工作。

前文已经说过，“**工农业剪刀差**”：相同价值工业产品、农业产品的价格不成比例，国家财政以**相对低价格收购农村农副产品**，甚至国家再补贴一部分后，以低粮价供应城镇，使城镇职工可以保有相对低的工资，工业得以较少支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是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借此发展工业。毛时代侧重重工业，邓时代减弱了对重工业的扶持力度。

根据薄一波所说，统购统销造成的财政缺口是巨大的：

（统购统销）第二年（即1954至1955年度），即赔了2.5506亿元。随着粮食经营费用的增加和购销价格“倒挂”现象的出现，亏损越来越大……1987年达276亿元，1988年突破300亿元，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包袱。^[60]²⁸¹

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取决于农产品价格：

1978年开始，在统购统销的大框架下政府对粮食价格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粮食市场出现松动，市场机制在小范围内开始发挥作用。国家调整了1966年以来长期未动的粮食价格，统购价格提高了20%，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价50%。粮食的提价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提升，长期以来粮食供需紧张状况得到了缓解，代表自由市场机制的农产品集贸市场开始出现。^[79]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舆论、政策上确立和巩固了“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原来三级所有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集体组织被取缔，建立乡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的村民委员会。^①

12.5.2 合同定购制、农业价格双轨制

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但同时也使国家在1984年这个“特大丰收年”已经无法完成“统购统销”了，“1983-1984年出现全国性‘卖粮难’问题。1984年，粮食露天存放量超过300亿公斤以上，形成‘收不起、存不下、调不走、销不掉’的困局。同时，超购加价政策以及粮食购销差价补贴，使国家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80]

卢迈说，为减轻此时财政负担，“将市场风险转移给农民”，同时兼顾城镇企业、职工利益分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由农村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逐步放开生猪、水产品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价格。农产品实行政府

^①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39/6619026.html>

定价和市场定价并存的“价格双轨制”，“逐步缩小合同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城市应继续办好各类农产品批发市场和贸易中心；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粮棉的合同定购制。

粮食合同定购价格按“倒三七”比例计价：针对合同订购部分的粮食，按照过去定购价格的135%收购全部合同定购粮食。^①198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较上一年下降6.92%，这一大幅下降还有“退耕还林”等政策影响。

由于“倒三七”比例加价小于超购加价对农户生产行为刺激，以及经济作物的相对价格较高，这一时期的粮食生产出现徘徊不前。^[81]

国家定价是稳定农民预期的重要手段。1985年和1993年我们尝试将计划价和市场价并轨，实际上是在粮食供大于求的形势下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农民，这是当年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之一。^[82]

然而合同订购执行不到一年便出现逆转，主要是因为粮食收购价格下降而导致的1985年粮食大幅减产。为控制粮源、保障供给以及稳定粮食市场价格，国家赋予合同订购为“国家任务”性质，并封锁粮食市场进行强制收购。合同订购性质的改变，标志着粮改折回到“统购统销”政策原点，也意味着粮价进入“虚位双轨制”时期（计划有效运行、市场无效运行），中国粮价市场化改革出现第一次反复。^[80]

农民不愿卖粮给国家，合同定购变为实质上的合同征购。为应对农民抵触情绪，刺激农民积极性，1986年10月14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合同定购制度的通知》。通知中对农民的优惠政策：超额部分实行议价——“从一九八七粮食年度开始，国家对农民完成合同定购任务外的粮食，实行随行就市，议价收购，让农民从多卖议价粮中增加收入”，粮棉三挂钩——“一九八七年中央专项安排一些化肥、柴油与粮食合同定购挂钩……国家对合同定购的粮食发给预购定金，由粮食部门按合同定购粮食价款的20%发放，在农民交粮时扣还，利息由中央财政负担。”；中央对地方和粮企的优惠政策：“中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定购任务仍按九折包干，即90%的部分按“倒三七”比例价结

① 按过去定购价格的30%和超购价格（过去的超购价格是，原定购价格的150%）的70%计算出综合平均单价，作为粮食“倒三七”比例价。其计算公式为：

$$\text{“倒三七”比例价} = \text{定购价} \times 30\% + \text{定购价} \times 150\% \times 70\% = \text{定购价} \times 135\%$$

算，其余 10% 按‘议转平’价结算。国家弥补平价粮食收支差额所需要的粮食，用‘议转平’的办法解决”。议转平进一步加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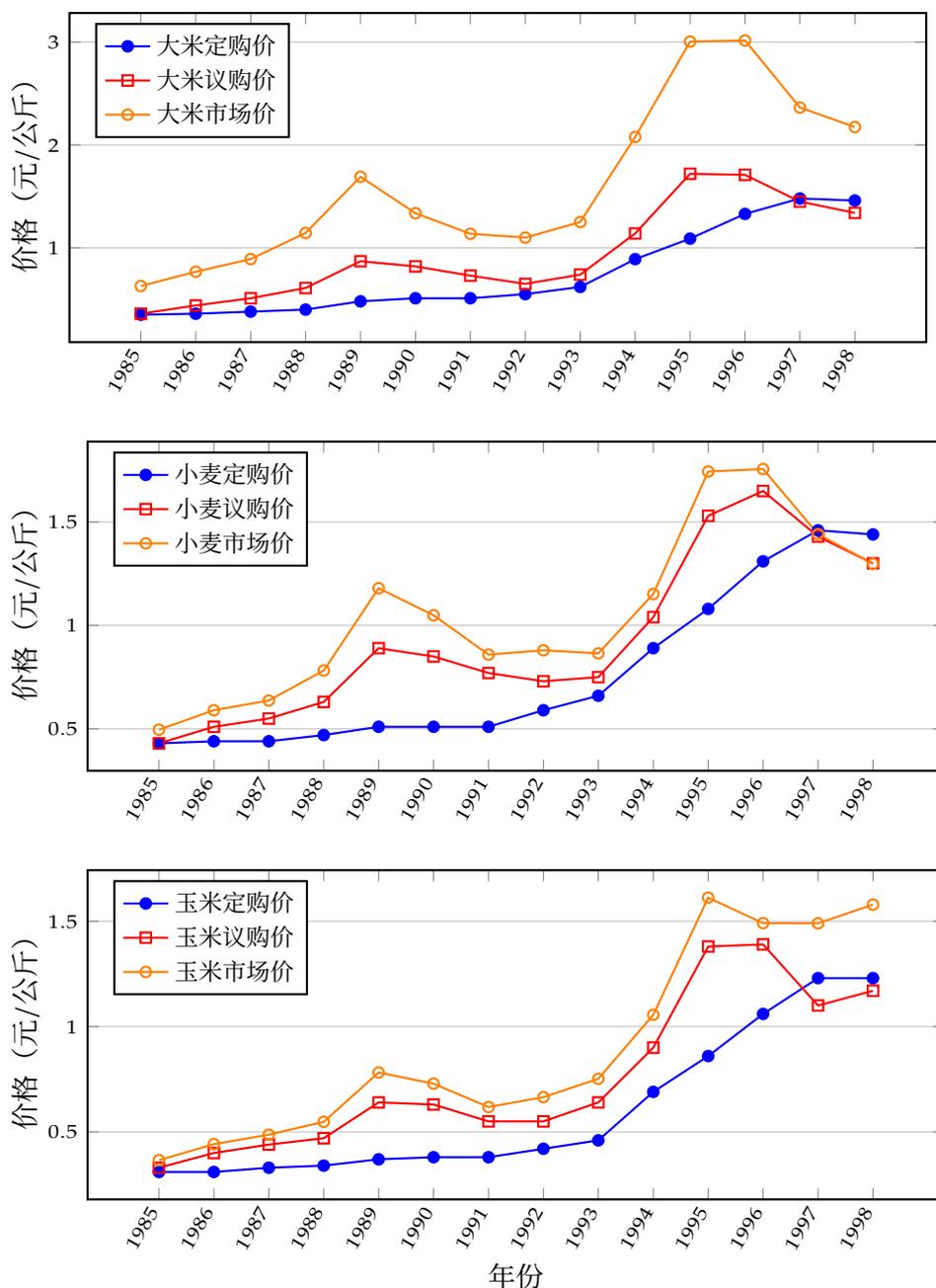


图 12.1: 1985–1998 年主粮定购价、议购价、市场价曲线图

资料来源：王小鲁，《中国粮食市场的波动》

1985–1998 主粮定购价、议购价和市场价可见图 12.1。1980–2017 粮食市场真实价格（1978 年不变价格）可见图 12.4。1985–1991 定购价变化不大。1987–1989 合同定购价、议购价与市场价差距逐年拉大。

1987–1988 年高于 18% 的强通货膨胀及“价格闯关”的失败，使市场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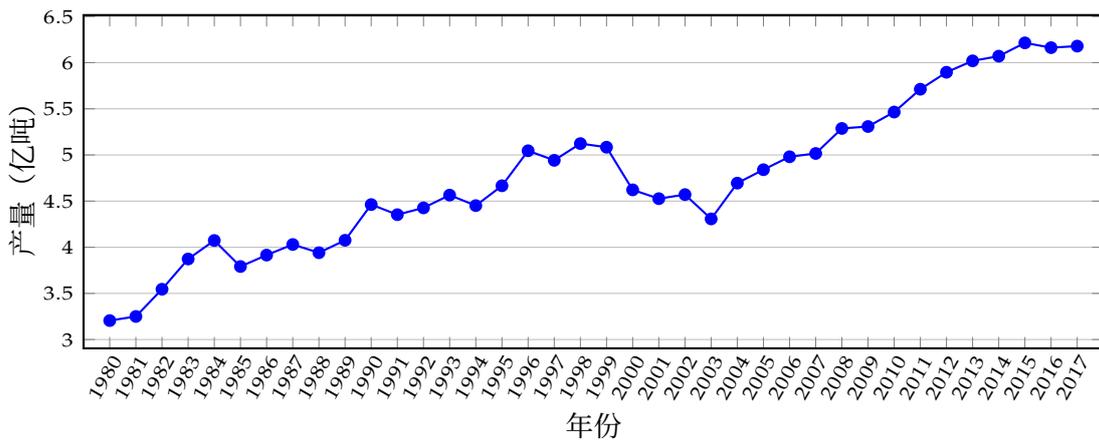


图 12.2: 1980-2017 年粮食产量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摘要-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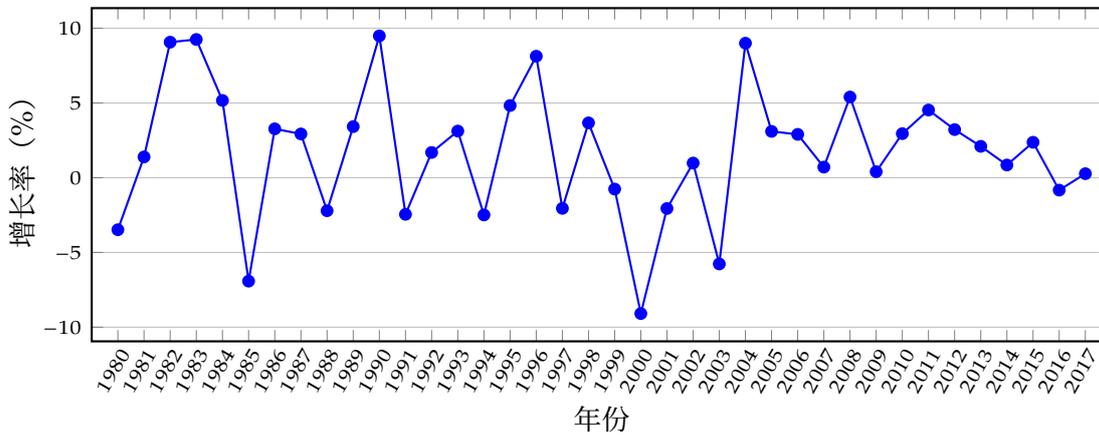


图 12.3: 1980-2017 年粮食产量增长率 (较上一年)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摘要-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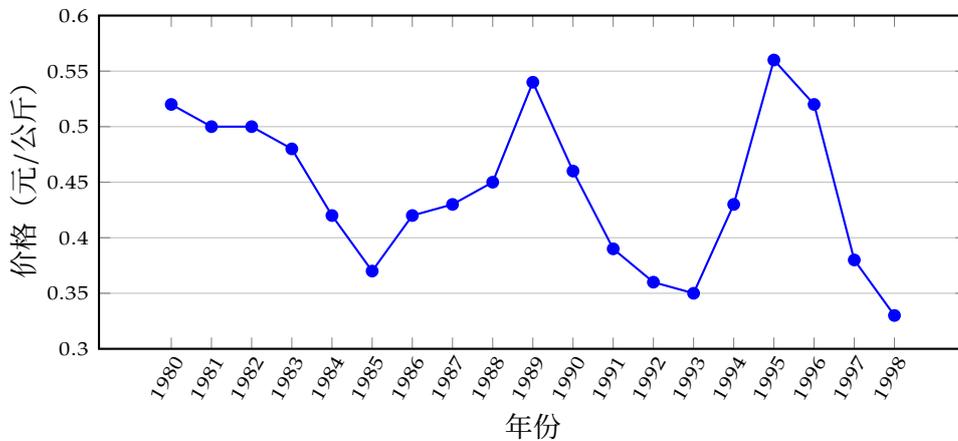


图 12.4: 1980-1998 年粮食市场真实价格 (1978 年不变价格)

资料来源: 卢锋, 《三次粮食过剩 (1984-1998)》

全国生产继续下降，我国在 1988 年下半年为稳定市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通货紧缩、减少财政支出、缩减基建规模、增加税收等。为扭转农业不利局面，国家也提升了一系列农产品价格。**1989 年较 1988 年，粮食议购价提升 40.3%，市场价提升 47.2%。**虽然议购价和市场价的差距仍较大，但已经强烈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90 年粮食产量年较 1989 年**粮食产量增长 9.5%**，达到 4.46 亿吨。据王小鲁统计，我国在 1989–1991 年，粮食净进口年年增加。1989 农民迎来了新的问题——**农产品全面“卖难”**，并持续至 1991 年。据卢锋，统计

名义粮价从 1989 年的 1.09 元/公斤下跌到 1992 年的 0.82 元/公斤；同期真实粮价从 0.54 元/公斤跌到 0.36 元/公斤，**跌幅达 33%**。**1989–1991 年三年间，国内购销余量为 5024 万吨，加上净进口 2162 万吨，理论累积剩余超过 7000 万吨。**结果出现比 80 年代中期更为严重的市场过剩形势。

此后，国家也颁布了一系列粮食补贴，防止谷贱伤农。1990 年 9 月 16 日，国务院发文《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的决定》。

为了解决主产区农民**卖粮难问题**，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当前必须**加强粮食收购**，把农民需要出售的余粮收购起来，以促进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搞好丰歉调剂，保证粮食市场供应和粮价的基本稳定。**

敞开收购议价粮，满足农民出售余粮的要求。

同年 11 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决定从 1990 年秋粮收购开始，**将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交售国家定购粮作为农民应尽义务，必须保证完成。**会议也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

1991 年 5 月，海南率先实行**粮食购销同价改革**。1991 年 5 月 7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通知》，**管控、优惠、平价农业生产所需生产资料。**

1989 年，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培育市场体系，发展生产资料批发市场，试办期货市场”。期货市场第一次写入官方文件中，并作为培养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提到实践日程。1991 年 3 月，中国第一个粮食批发市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签订了第一份小麦的远期合同，标志着中国期货交易的开始。^[79]

年份	城镇	农村	城乡差额	农占城	年份	城镇	农村	城乡差额	农占城
1978	343	134	209	39.07%	2001	6824	2407	4417	35.27%
1979	405	160	245	39.51%	2002	7652	2529	5123	33.05%
1980	478	191	287	39.96%	2003	8406	2690	5716	32.00%
1981	500	223	277	44.60%	2004	9335	3027	6308	32.43%
1982	535	270	265	50.47%	2005	10382	3370	7012	32.46%
1983	565	310	255	54.87%	2006	11620	3731	7889	32.11%
1984	652	355	297	54.45%	2007	13603	4327	9276	31.81%
1985	739	398	341	53.86%	2008	15549	4999	10550	32.15%
1986	901	424	477	47.06%	2009	16901	5435	11466	32.16%
1987	1002	463	539	46.21%	2010	18779	6272	12507	33.40%
1988	1180	545	635	46.19%	2011	21427	7394	14033	34.51%
1989	1374	602	772	43.81%	2012	24127	8389	15738	34.77%
1990	1510	686	824	45.43%	2013	26467	9430	17037	35.63%
1991	1701	709	992	41.68%	2014	28844	10489	18355	36.36%
1992	2027	784	1243	38.68%	2015	31195	11422	19773	36.61%
1993	2577	922	1655	35.78%	2016	33616	12363	21253	36.78%
1994	3496	1221	2275	34.93%	2017	36396	13432	22964	36.91%
1995	4283	1578	2705	36.84%	2018	39251	14617	24634	37.24%
1996	4839	1926	2913	39.80%	2019	42359	16021	26338	37.82%
1997	5160	2090	3070	40.50%	2020	43834	17131	26703	39.08%
1998	5418	2171	3247	40.07%	2021	47412	18931	28481	39.93%
1999	5839	2229	3610	38.17%	2022	49283	20133	29150	40.85%
2000	6256	2282	3974	36.48%	2023	51821	21691	30130	41.86%

表 12.1: 1978-2023 城乡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 (当年价格)

来源: 国家统计局

根据农业经济专家^①的研究, 1978 到 1985 年城乡收入的差距是缩小的, 从 1985 年起扩大。1989 年到 1991 年农民收入增长基本停滞, 城乡收入差距又恢复到 1978 年以前的情况。1993 年以后, 由于国家提高粮食价格、乡镇企业增长快、外出务工人口收入增长等原因, 农村收入增长较快, 但在城市劳动力大量剩余的情况下, 这一势头正在改变。^[83]

城乡收入差距可见表 12.1。

农业问题复杂深远, 其中一些政策弊端难以用简单的普世伦理衡量, 但确

① 汪晖此处所指专家为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市场研究室主任等职务的卢迈

实又具有**现实性要求和限制**。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立国之本，在国家战略层面占据重要位置。其实没有哪个现代大国傻到敢于放任农业自由市场化，直面各种严重矛盾。所谓“工农剪刀差”并非某个别国家的专用品，而是普遍存在于各国，只是形式、方法、实现上略微有些不同。有的补贴农民、有的补贴工人，有的补贴食品；有的直接补贴；有的间接补贴。

绝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后发达国家都没有美国早期建立在印第安人骸骨上的“美国式道路”的大农业工业化条件，这给后发达国家的发展带来太多的不利因素，真的太难，还请读者客观考量实际政策利弊。

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往往借助军事、外交、金融债权等大肆盘剥他国，从他国半强制抽取低价自然资源（包括农业）；又反过来对进口制成品、加工产品**征收高额税**；或者如日本对进口粮食设置高关税壁垒等（遭致美欧等国强烈反对）；美国对英国也进行过制裁；也常给予本国农业**巨额补贴**或对食品相关行业**减免税**以使本国**劳动力便宜、企业经营成本降低**，获得经济增长。具体论述可见联合国报告**第17点**。

为什么？因为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必然导致工人最低工资的提高。在政治经济学中，工人长期被限制在最低工资水平，这个水平是满足工人自己和繁衍下一代工人所需的最低生活需要（最低生活需要根据社会现实而变化）。最低工资水平可使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笔者猜想，这甚至可能隐含着资本主义的某种强烈矛盾——主粮不能够体现真实价值，不能等价交换，否则可能带来或者加速资本主义自身的崩溃。但这一做法恰恰又违背了资本本身的“合法性”，相当矛盾。

笔者无法提供农业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也不倾向于任何方案，这主要源于笔者对于农业问题的认知浅薄和绝望：诚然，改革进程中粮食问题的动荡多是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卖难”“买难”常交替出现，但笔者也绝不赞同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以及我们正在走的快速农业工业化道路。**无论是全面市场化粮食市场还是快速工业化，均未对农村群体中的下层贫弱群体出路，以及剩余劳动力过多进行足够考虑……**这不只是伦理层面，也涉及和谐社会层面。

其实笔者妄自认为，现代世界农业问题几乎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光明伦理的普世答案，农业问题必然带有对内或对外的**灰黑色**，这也使各国各界对农业问题的论述常常不能全尽、深刻。正如陈云在建国初所说“**炸弹中的选择**”和有生之年看不到问题的解决。

12.6 城市改革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提议发挥广东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邓小平就此提出“特区”概念。同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人大常委会此后正式批准此一建议。此后数年持续扩大和增强经济特区的权利和地位。

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的通知》。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1月巡视深圳、珠海，2月巡视厦门。同年5月4日，国务院发出《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确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扩大厦门经济特区范围到全岛，进一步开发海南等。随后国务院陆续批准在沿海开放城市及部分地区兴办经济开发区，引进外资、技术，以开发工业生产新技术和科研为主，减免税收，鼓励出口创汇。

1984年10月20日，中共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以后，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做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政府还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当地的条件，做好中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使承包责任制在城市生根、开花、结果。

1986年2月发布《国务院关于批转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意识形态上明确了“在经济上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为领导，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在具体举措上则是引进和利用外资，面向市场经济的国际市场，“**以首先搞好基础设施为重点展开基本建设**”，实行**减税或免税**等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的举措。1988年4月，人大会议决定设立海南省经济特区。

12.7 企业改革

12.7.1 雇工及企业性质

我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开始出现数量稀少的“红帽子”企业。进入 80 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步提高，“红帽子”企业越来越多。

所谓“红帽子”，即私营、个体企业以国有或集体企业身份注册（“戴红帽子”），或者挂靠国有、集体企业（“挂红帽子”），并向政府交纳行政管理费，向国有、集体企业交纳一定资金，以此享受国有、集体企业的利好。一些思想较活的地方行政事业单位与公司也建立了**专门提供挂靠服务的挂靠机构**。虽然“红帽子”使私营企业减少了**政府审批、贷款、出口**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但仍未完全放开。“红帽子”企业中国营、集体成份同私营成份**产权混杂**、较难辨别。随着私营经济的合法性得以确立，其社会地位也飞速提高，私营一方想要脱帽，国营、集体一方想要维持现状，因此在此后 20 余年“红帽子”脱帽的问题一直存在。

笔者认为需要注意“红帽子”起始于民间自发，并逐渐获得一些地方政府协助。如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反作用”一样。这仍然是一种从民间到地方再到国家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变迁。笔者之所以重点提及这一点，是希望读者注意**现代国家不是万能的，更不具备超越市民社会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才是国家的基础，而非相反；国家无法一厢情愿地超越阶级对立和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否则将承担严重不良后果。虽如此，也请国家多些合法性、理性。

1979 年，广东肇庆市人陈志雄开始承包鱼塘，越做越大，承包自己所属生产队及其它生产队鱼塘，越做越大，他人也入股部分鱼塘。一时间雇佣固定工 5 人，零工 1000 工作日。1981 年 5 月 29 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的调查报告，并以“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为总标题，开辟专栏，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激烈讨论。

1981 年 10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广开就业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通知》，文件中允许个体户雇工，但不能超过 7 人：“对个体工商户，应当允许经营者请两个以内的帮手；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五个以内的学徒。”俗称“七上八下”，7 人及以下为帮手，8 人及 8 人以上为雇工（资本主义性质）。为什么恰恰是 7 人？这一结论由经济学家林子力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小业主”概念作出，它是保守派和自由派政治博弈的结果，其意义是政治层面上更加放开了对私营资本的限制，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层面意义不大。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三不原则——“对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能手超过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应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七上八下”的雇工问题虽未完全解决，但已有较多松动。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对农村雇工问题进一步放开，有**合作经济因素**的部分企业被认为“实行了一些有别于私人企业的制度”，因此不能看作私人雇工经营。笔者认为需要注意这时期的“红帽子”问题。

1984年7月1日，安徽省芜湖市人年广久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清水工业公司联营成立“芜湖傻子瓜子公司”，年广久出任总经理。年广久也是想要借助“红帽子”降低或规避风险。年广久再次因雇佣问题引起党和政府内部争论，此时再次惊动中央。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放两年再看**”。

1987年1月22日，中央五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发布。文件中提及注意保护农民独立从事**家庭经营、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以及允许私营企业雇工**超过七人限制**。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案中明确提及“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1994年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份合作企业**开始逐渐转变为**产权清晰的有限责任公司**。

12.7.2 乡镇企业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同意报告提出的**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的建议，提出发展多种经营，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企业有利于**以工补农，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城市压力**等，乡镇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指出，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发展采矿和其他开发性事业；鼓励**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城市的各类科学技术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停薪留职，应聘到农村工作**。**放活农村金融政策**，提高资金的融通效益，农村信用社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

单位: 万

年份	企业单位数					从业人员			
	总量	增加率%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个体企业	总数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	152		152			2827	608	1970	248
1984	165	8.6	165			2848	284	3232	332
1985	1223	641.2	157	53	1012	6979	252	5151	1576
1988	1888	54.4	159	120	1609	9545	250	7188	2107
1992	2092	10.8	153	90	1849	10625	262	7889	2474
1993	2453	17.3	169	104	2181	12345	285	9086	2973
1997	2015	-17.9	129	233	1652	13050	277	9336	3438
1998	2004	-0.6	107	222	1675	12537	244	8968	3295
2002	2133	6.4	73	230	1830	13288	205	9128	3954

单位: 亿元

年份	产值			出口		
	增加值	GDP	增加值/GDP%	乡镇企业	全国	乡镇/全国%
1978	208.3	3678.7	5.7		167.6	
1984	633.2	7278.5	8.7		580.5	
1985	772.3	9098.9	8.5		808.9	
1988	1742.0	15180.4	11.5	269.0	1766.7	15.2
1992	4485.3	27208.2	16.5	1193.0	4676.3	25.5
1993	8006.8	35673.2	22.4	2193.0	5284.8	41.5
1997	20740.3	79715.0	26.0	6826.0	15160.7	45.0
1998	22186.5	85195.5	26.0	6854.0	15223.6	45.0
2002	32385.8	121717.4	26.6	11563.0	26947.9	42.9

表 12.2: 部分乡镇企业数据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1978-2002《中国乡镇资料》、《中国统计摘要-2018》

个体、家庭产业所面临的资金匮乏、信贷渠道不畅、生产力落后、政策限制等难题因此得到缓解, 联合成立“**股份合作**”企业的势头也迅速上升。私有产权、私有经营权在乡镇企业成分中发展迅速, 且成为一些地方经济支柱。但是它的合法性还存一些问题, 不同时期利润上交多少也有变动。

以戴慕珍为代表的学者更加侧重关注地方政府在地方工业化中的积极作用, 用“**地方国家公司主义**”的概念来解释乡镇企业和一些地方工业的兴起。戴慕珍认为, 在 80 年代中期确立的财政包干体制下, 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获得**超包干基数的财政收入**(乡镇企业能提供的预算内财政收入有产品税即后来的增值税, 利润税等), 另

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乡镇企业上交利润的形式获得预算外收入，所以有极大的动力去兴办乡镇企业。

80年代后期开始，除了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浙江之外，山东、河北、辽宁以及中部一些省份也开始大办乡镇企业，有些地区提出的口号是“村村冒烟、户户上班”。这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多由地方政府利用银行、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融资兴办，无论企业效益如何，都能够立竿见影地给地方政府带来GDP和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

1988年4月，“私营经济”写入《宪法修正案》，但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前文已述，因1987-1988年国内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基建规模盲目扩大，社会反响强烈，1988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

近30年主流看法是乡镇企业数量在1988年到1991年大减少的主因是保守派政策，笔者认为有一些影响，但不可背全锅，甚至保守派政策很可能不是主因。

据表12.2“部分乡镇企业数据”，只从数量来说，乡镇企业中个体企业数量变化不大（其数量只在1989年相较1988年有所减低，1000多万个体企业只缩减1万余家）；集体企业受到一些影响（1991年相较1988年数据减少10万余家）；私营企业受影响最大最明显（1988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为120万多，1991年不足85万，减少35余家）。

主流说法无视88年大通膨抢购潮（自由派导致）；无视相应的抢救措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本就是要减信贷、通膨、基建等；无视90年保守派才发力“姓资姓社”问题，91年年初自由派就开始大反击，92年初南巡结束争论的历史；也无视了一些地方，乃至官员个人，与乡镇企业形成的利益共同体。笔者只是抛砖引玉，若要明了究竟，非笔者力所能及。

1990年2月12日，农业部公布《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及附件《农民股份合作示范章程》，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发布，这两个法规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全国正式迈入市场经济体制，乡镇企业增长迅速。1994年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份合作企业开始逐渐转变为产权清晰的有限责任公司。

虽然乡镇企业数量在 1989–1991 年减少，但乡镇企业总产值、出口值、占比 GDP 却是年年提升，私营企业的“红帽子”保障，地方政府可从乡镇企业获得更多预算内收入及上缴利润，与乡镇企业达成发展经济的共识和默契也越来越多。从这点看，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市场体制不可阻挡。1992 年的历史似是必然。它未必是全民的，却是市民社会的抉择结果。

1985 年以前，没有私营和个体企业相关统计数据，以下只以国家统计局数字为准。仅 1985 年，新加入统计表的私营企业 53 万余家，个体企业 1012 万余家。从 1985 到 1993 年的 9 年时间里，乡镇企业就吸纳剩余劳动力 9497 万余人，平均一年过千万人；乡镇企业年增加产值占比 GDP 从 18.7% 增长至 22.44%。1985 年乡镇企业出口额占比全国出口总额 15.21%，于 1992 年增长至 25.51%。1993 年因进一步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对乡镇企业的政策支持放开，以及人民币大幅贬值下的实际汇率影响，使往日受压抑的乡镇企业瞬增诸多活力，1993 年其出口额占比全国出口总额 41.5%。

如同这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乡镇企业带有较强先锋、折衷、过渡性质。中国以乡镇企业为突破口，走向了市场经济。此后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有波折，但笔者认为已经可以将其划入一般企业改革中，因此不再将乡镇企业单独列出和赘述。笔者感觉这段历史有困惑之处，欢迎读者各种方式与我探讨。这时期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关系进展到什么程度？私占公发展到什么程度？

12.7.3 就业制度改革

1980 年 8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指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三结合方针，企业公开招工并可以增减人员。扭转过往片面强调“大”和“公”的错误以及“铁饭碗”的状况。

1983 年 2 月 22 日，劳动人事部发文《劳动人事部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积极实行劳动合同制，打破“大锅饭”、“铁饭碗”，**调动人民积极性，充分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全民所有制单位及集体所有制单位）经过若干步骤，**最终达到所有职工都实行劳动合同制。**”

1986 年 7 月 12 日，国务院一次性颁发四个法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

然而，这一改革措施只限于国营企业中**新招收的工人，并没有根本动摇原有的固定工制度**。到1991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合同制工人只有1449万人，占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总数的14%。^[84]

12.7.4 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和增强企业活力

1978年，四川省委、人民政府（赵紫阳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6个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开展扩大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在1979年1月扩大至100家工业企业和40家商业企业。

1979年7月后，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文件要求全国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1982年9月16日，国务院批转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1983年9月1日，国务院批转物价局等部门座谈会《关于进一步放开小商品价格的报告》。1984年10月6日，国家物价局下达《关于全部放开小商品价格的通知》。至此小商品价格改革基本完成。^[85]⁴⁴²⁻⁴⁴³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扩大了扩大企业和厂长（经理）的自主权，在招工、劳动工资和奖惩制度等方面作出较大放权。

1984年10月20日，中共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宏观理论层面上确定了城市企业学习农村，大力发展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增强企业活力，减弱政府对经济的各种管控，政企职责分开，确立企业主体地位；尊重价值规律及建立合理价格体系等。

1985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中提出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实现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的、自负盈亏；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配套地搞好计划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主要提出**企业所有权（全民所有制）与经营权分离**，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积极试行租赁、承包、拍卖、折股。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企业之间互相投资，或联合投资新建企业，一般宜采取股份制形式；**集体所有制企业一律改为自负盈亏**；对轻纺企业和其他进行重点技术改造的大中型企业减免税收；目前仍由上级部门集中掌握的30%的折旧

基金，要全部留给企业；限期清理、撤销行政性公司，停止行政性公司管理企业的职能，半年内限期转为经营型或服务型的经济实体，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鼓励发展企业集团。

1988年4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企业法》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为国有企业制度与经营方式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7.5 价格双轨制和价格闯关

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价格改革开始引入市场机制，确立了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改革方式。^[86]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67号文件（即扩权10条），其中规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出17号文件，干脆把20%的限制取消了：**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这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计划内的那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87]

笔者已在12.5.2节评价农业价格双轨制，这里不再赘述。

张曙光写到

双轨制改革的运行方式是：固定存量，放开增量，从边际上引入市场，然后再逐步用市场蚕食计划，最后实现单一市场。在双轨制中，**计划价格一轨旨在照顾原有利益格局，有利于保持大局稳定，减少改革阻力，而市场价格一轨则能提供新的激励，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从而保证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震荡，形成了改革与发展的双赢。

笔者认为张曙光的结论有待商榷。双轨制的发起者和拥护者往往认为即使双轨制的实行带有些明显副作用，仍是一种基于现实状况的选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必经之路；是理论创新。推崇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中青年学者和政治家至此走上中国政界、学界的主要位置。

笔者认为不管价格双轨制是否是国弱民穷下的必然政策^①，是否功远远大于过，仍需要对价格双轨制的副作用着重提出。经济政策中的“副作用”惯于被轻视或淡化；惯于被认为无可避免；惯于被认为功大于过；惯于以帕累托改进甚至帕累托最优等辞令作为遮羞布，掩蔽民众利益受损，最终成为既得利益者得利和辩护的工具。

在张维迎《当年对双轨制认识很粗浅 没想到腐败会如此严重》与张曙光《中国经济风云史》中同样使用了“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帕累托改进”、尊重既得利益团体等术语，且逻辑脉络、话语组织高度一致，如同一文。因张曙光的论述较详细一点，以下引用张曙光书中观点。

另一种批评是说，**双轨制为官员腐败创造了条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吴敬琏和荣敬本主编的《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这一批评有一定道理。因为，实行价格双轨制，必然出现价格落差，很多人利用计划内外价格差进行投机倒卖，谋取暴利，从而形成一批依次为业的倒爷和公司，特别是一些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官倒，权力寻租，倒卖批文和指标，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体制改革**。不过，应当指出，寻租的条件和寻租行为本身还是有区别的，寻租行为的大量发生，板子恐怕不能完全打在价格双轨制上。双轨制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是改革不得不付的成本和代价，否则，不可能实现制度改革。新制度之所以能够代替旧的制度，就在于它至少必须是一个“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就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转化为一个“帕累托改进”，改革就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和反抗，甚至可能根本无法进行，或者激起革命。因此，**改革和革命的不同就在于是否尊重既得利益。双轨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尊重在旧有体系下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得到牌价供应指标是一种既得利益）**。他一开始在一个特殊的起点出现而没有遭到任何强烈抵制，其原因就在这里。不错，双轨制的确为官员寻租创造了条件，但也同时减轻了拥有权力的官僚部门的抵制。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转而支持这种改革。此外，**双轨制在为寻租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孕育了中国企业家的诞生。**

① 双轨制前有波兰，双轨之后有苏东剧变，市场价格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的失败在实践上证明了直接转变为市场单轨是不可取的。

而国家模拟单一价格并逐步发展到彻底市场的模式除已知或未知的缺陷外，更需要国家投入，这与当时国弱民穷希望大规模减轻中央财政支出的中国大背景不兼容。

所以可能由此走向了双轨制。

因为，双轨制带来了整个经济系统的开放。这正是企业家生长的环境。^{[85]459}

笔者对类似论述的批判如下：

第一，以上言论在所倡导政策出现问题时较多甩锅给“寻租行为本身”，通俗易懂来说就是甩锅给体制，经是好的只是和尚念歪了；不是政策本身有问题，而是体制有问题，较为漠视经济政策的综合社会影响和现实状况。并且我们也可从二张的意见中看出，其目标甚至本就是尊重“既得利益”，也就是使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更加扩大化，并惯以改革本应如此的称号。

诚然，有权力的不平等便有寻租和腐败行为，复杂巨变的改革时期往往也是权力寻租行为的转型期、暴涨期。可是经济学家们在推行自己所倡导的经济政策时，他们说这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是带领社会利好的，经济权利是最重要的社会权利；在产生副作用时，他们又说经济无法代替社会负主要责任。一切为了维护和发展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需要国家支持时，国家是喂奶的娘；反之需要国家放开限制时，国家又从喂奶的娘变成了讨人嫌的看门狗。这样的双标是何等的轻松惬意。

第二，刻意滥用概念“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就历史事实和经验来说，笔者敢于断言双轨制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帕累托改进，它与强通货膨胀、劫富济贫“铸币税”的强相关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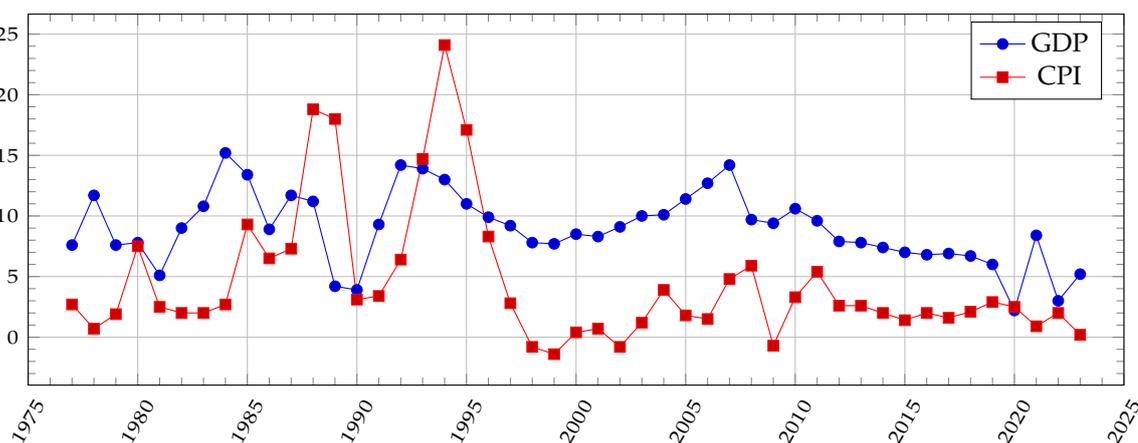


图 12.5: 1977-2023 CPI GDP 较上年增长率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截止到 1988 年价格闯关前，通货膨胀所收取的高额铸币暗税（见图 12.5）；1985-1987 一些社会事件；粮食合同订购农民积极性持续下滑，以至于发展到

1990 年国家要实行更具强制性的“国家订购”才能完成中央收购；尽快双轨并轨为市场一轨，实行激进“物价、价格闯关”的主因——“双轨制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也被这些经济学家们无视掉了；1988 年人民恐慌挤兑抢购的事实何在？只是因为“激进的”价格闯关来临，就没有之前“温和的”价格双轨制所造成的原因吗？张维迎、张曙光等对双轨制的辩护中，他们认为计划轨的失败本就属于双轨制改革的目的，那么主要在计划轨上生活的民众怎么办呢？他们居然说这是无损于弱势一方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第三，理论方面，帕累托改进局限在哪里？是否成立？现实中真的会有一方利益无损而另一方利益可以尽情增长的帕累托改进吗，它是真命题吗？笔者对以相当轻率和主观臆测的态度找到几篇论文，供读者阅读：价格双规制中帕累托改进的理论错误：张军《价格双轨制：是奇迹还是神话》^①；帕累托改进的各方局限性：姚洋《作为一种分配正义原则的帕累托改进》^[88]；帕累托改进理论的伪命题：朱富强《帕累托改进原则能否应用于社会改革？——实践的可行性和内在的保守性》^[89]，宋圭武《“帕累托最优”质疑》^[90]。

另外，阶段性的帕累托改进形成的发展不平衡、财富加剧分化往往会为下一次经济下行期带来更大矛盾和压力。此一阶段的成功，可能是下一阶段严重大萧条的根源所在。

更大胆来说，帕累托改进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人类社会是互相动态联系的整体，拔高一极，另一极不变，无可辩驳地会造成拔高一方对不变一方的权力压制。这本是中二生依据自己的现实经验就可以明白的道理，无需什么旁征博引，也无需扯什么“科学”的大旗。

第四，也是最后一条。双轨制的发明被认为是 1984 年莫干山会议的重大成果。这次会议参会者是通过征文入选，投稿人多是在读硕士研究生、讲师等青年人。参会者就“究竟谁最早提出双轨制”有争论；也有石油系统和其他公司认为自己早在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便已实际实施双轨制，他们才应是双轨制发起人，事实上，莫干山会议参加者正是学习了已实际实施了几年的双轨制。笔者妄断，其实谁提出双轨制并不重要，双轨制的路径是预设的，莫干山会议只是作为批判的武器——为双轨制增加经济学份量的一次会议。

杨继绳^[87]和张曙光就李鹏向邓小平反映价格问题的时间有出入，杨继绳说是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张曙光说是两会后，笔者认为并没有实质的差别，以下以张曙光记述为准。

^① <http://economics.efnchina.com/show-1554-58760-1.html>

1988年3月25日到4月13日，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北京召开，**物价和“官倒”**问题成为会议议论的焦点。代表们强烈抨击双轨制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痛斥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两会后，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会议情况。邓小平问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情，李鹏说是价格问题，**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再次提出要闯过价格改革这一关。并认为“**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事后，李鹏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了邓小平价格闯关的意见。^{[85]563}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价格闯关正式开始**，部分烟酒市场价较原来提高10倍，全国挤兑抢购现象相当严重。1989年2月，CPI通胀率同比（去1988年2月相比）增长28.4%，为改革开放以来同比最高比例。

1988年因价格闯关彻底失败，保守派势力处于上升趋势，自由派势力相当之前有所减弱。同年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①

由于连续两年的治理整顿，再加上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经济运行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经济过热变成增长过慢，从通货膨胀变成通货紧缩。1988年和1989年GDP分别增长4.1%和3.8%，1990年和1991年零售物价上涨率从1988年的18.5%和1989年的17.8%下降到1990年的2.1%和1991年的2.9%。市场秩序也发生了逆转，从紧张变成疲软，从旺销变成滞销，**持续了几十年的卖方市场第一次出现了买方市场**，这就导致了计划内外价差的缩小，**计划价格变成了市场价格**。于是，**双规价格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并轨**，到1991年底，80%的商品价格都已经放开，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这真是“踏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85]579}

笔者想，一些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极力推动，举国之力想要完成的事情都没有完成，却被历史和真正市场（并非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说的“自由”市场）以一种荒谬、戏谑众生和神奇的自我动态平衡实现了最终的并轨……

①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0293/70319/4857100.html>

12.8 金融改革

12.8.1 现代化银行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作出讲话，收录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中指出：“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过去我们的制度是采取拨款的形式，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这个制度必须改革。任何单位要取得物资，要从银行贷款，都要付利息。”我国开始了恢复、重构金融体系的工作。

1979年到1984年，中国恢复和建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专业银行；中央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同期也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地方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农村和城市信用合作社等。

1985年后，中央政府按照市场化运作的原则成立了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等。

1986年1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时再次指出“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

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公布以前，财政部可以向人民银行借款和透支，用于弥补中央财政赤字和解决专项支出。《中国人民银行法》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的规定出台后，中央财政不能再从人民银行借款。同时《预算法》规定政府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

12.8.2 汇率双轨制

杨帆将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汇率制度变革分为两个阶段。^[91]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因人民币汇率被严重高估，**全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较官方汇率过高，造成企业出口越多亏损越大**。笔者根据杨帆文中表格测算，1975-1979年的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均高于同期官方汇率50%以上，最高达至68%。

1978年8月为促进出口，平衡外汇收支，我国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所谓“外汇留成，即是对外贸单位和出口生产企业把收入的外汇卖给国家，国家按一定比例拨给他们相应的外汇留成。”

“外汇留成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现汇**（在企业 and 地方、国家间直接分配外汇数量），一种是**额度**；且以后者为主。所谓**外汇额度**，是指按照官方汇率获取外汇的一种权利。其目的是**政府直接控制外汇**，其办法是，外贸企业必须将**包括留成外汇在内的全部收汇**，按**官方价格售给政府指定的银行**，同时按照留成比例拿到一个凭证，即**外汇额度**。当该企业想使用外汇时，再持**外汇额度凭证**到银行按照政府规定的汇率用人民币购买外汇”。^{[85]769}

杨帆将 1981 年至 1984 年间划分为转轨时期第一阶段——“**人民币内部结算价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时期**”。此一时期，**贸易内部结算价**基本不变，“内部结算价按照 1978 年全国平均换汇成本 2.53 人民币/美元加上 10% 的出口利润计算出来，为 2.8 人民币/美元……我国贸易收支明显好转，外汇储备明显增加。1984 年外汇储备年末累计余额 170.42 亿元特别提款权，为历史上和 20 世纪 80 年代最高水平”。

有外汇额度的企业暂时不用，而没有外汇额度的企业却急需用汇，外汇额度交易（**合法和非法**）及其交易场所就应运而生。^{[85]769}

1980 年到 1983 年中国银行先后在北京、上海等 12 个城市开办了外汇调剂业务。张曙光指出，**调剂柜台外汇交易价格**为贸易内部结算价 2.8 人民币/美元基础上上浮 10%，3.08 人民币/美元），但这仍然低于**市场实际成交价格**。

随着外汇留成的增加和官方控制的放松，**私下的场外交易**发展起来……一美元可以兑付 4-5 元人民币。这样，外汇额度的价值已经由**市场**来评价了。一般的交易方式是，（笔者注：有外汇或外汇额度凭证的企业）先在银行按照官价提取外汇，出门后再按**黑市价格**补齐（笔者注：按黑市价格卖给需求外汇的企业或个人）。^{[85]769}

杨帆提及“（第一阶段）影响了**非贸易部门的积极性**……**外贸亏损增大**，在对外经济中陷入被动，造成了**外汇管理的混乱**，更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实行内部结算价注定成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应急措施**。”

杨帆将 1985-1993 年间划分为转轨时期的第二阶段：

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从 1985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取消**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应用于**贸易结算**和**非贸易外汇**兑付。

为**鼓励出口**，在**人民币汇率下调**的同时，1985 年国家又一次提高**外汇留成比例**，采取按出口商品收汇金额比例留成的办法。

这一阶段官价实行以美元为基准的有限弹性汇率制。综合来看汇率恰逢其时的步入了实质性和典型的价格“双轨制”时期。

1988年上海首创外汇调剂公开市场，实行公开竞价制度，其它城市也纷纷效仿。这样一来，外汇现汇交易和额度交易就合法化了。^[85]⁷⁶⁹⁻⁷⁷⁰

1988年后，国家放开了外汇调剂价格，调剂价格根据外汇供求自由浮动。同年，在北京设立了全国外汇调剂中心，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外汇调剂市场。^[86]

1988年我国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外贸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并对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行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91年外贸由补贴机制转向自负盈亏机制，取消财政补贴。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人民币汇率成为调节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手段。

1988年至1993年由于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进口需求猛增。1993年，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后一次年度贸易逆差。外汇求大于供，市场汇率不断下跌，由5.70人民币/美元贬值为1993年2月的8.20人民币/美元。为了限制汇率投机性上涨，一度实行限价，造成外汇流向场外交易。1993年5月取消限价，市场汇率骤升至11.20人民币/美元。1993年7月以后，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市场进行干预下，到1993年底市场汇率回落到8.72人民币/美元。^[91]人民币市场汇率贬值波动在43.86%—96.49%之间。

从1994年1月1日起，国家决定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现了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的并轨。特别要强调的是，1994年汇率并轨时，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中，这个“单一”不是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是相对于1994年并轨以前的双重汇率制度来说的。双重汇率制度时期，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的差价很大，并轨以后，所有的交易都使用了市场形成的汇率，因此，强调了“单一”。^[92]

根据邵宇、陈达飞^[93]，当时对于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并轨在决策层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央行是坚定的支持者，这被认为增加了一个调控经济的工具，而且简化了汇率政策。但就人民币升值或贬值有分歧：人民币升值，可抑制通货膨胀，利好民众；贬值，利好出口，但会通货膨胀。最后在时任副总理兼人行行长的朱镕基主导下，选择了贬值通膨的道路。

1月1日汇率强行并轨,从5.8贬至8.72,一次性贬值50%,中央配发大量基础货币,加之同期因经济过热、金融信贷短缺等也超发的货币,使我国1994年通货膨胀率24.1%,1995年17.1%。

并轨之初,市场普遍认为人民币汇率8.7守不住,甚至会跌到9甚至10以上,俗称“破九望十”。当时中央下达的任务是,一方面要稳定汇率,另一方面要增加外汇储备。

当时实行全面出口退税,对出口实行了零税率政策,整个退税比例相当于提高了11个百分点;不少企业受人民币信贷规模控制转而借外汇后兑换成人民币使用;一些外商也以各种形式进入国内进行套利活动,例如某些外商通过其在华企业用外汇兑换人民币后,再高息拆借给资金短缺的国内企业。

1994年的出口增长高达31.9%,贸易收支由1993年的逆差122.2亿美元转变成为顺差53.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有1993年的275.2亿美元上升至337.2亿美元,增幅达22.7%;实际利用外资额458亿美元。出乎绝大部分人预料,包括中国政府,外汇储备由年初的212亿美元猛增到516.2亿美元,增加304.2亿美元。

1994年汇改之后,与“破九望十”的市场预期相反,人民币反而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部分原因在于经常账户扭亏为盈和国际资本加速流入。至1998年10月,人民币与美元的双边汇率从8.72升至8.28,升幅5%。^[93]

双轨并轨使中国贸易顺差持续加大,促进了中国国内分工的深化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但与此同时,也令中国丧失了货币主权。顺差依赖成为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美联储利率的波动成为人民币信用震荡的主要外源。^[94]

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的汇率双轨思路是一贯的,国家抛弃财政包袱,减少对各方面的投入和支持,获取收益,解决原来企业出口亏损问题,通过汇率双轨、特别是持续增加市场一轨的权重刺激出口,做大市场。

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简明的,同农业、企业方面的双轨制一样,其中市场轨增大了权利寻租的操作空间,并过来压榨计划轨。双轨并轨似乎是势在必行的,权力寻租似乎也是无法避免的。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历史的趋势吧,不以个人或组织(包括政府)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趋势。

但笔者也认为(好像在本书中说过几次了),不管负面影响是不是大势所趋,在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能因为负面影响不可避免,就完全忽视负面,这已经成为一些当代学者和官僚的通病。

12.9 财政改革

12.9.1 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层逻辑

2008年3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见面会上说：“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回顾40年改革长路，是什么在推动中国财政改革？其深层逻辑又是什么？我们发现，从过去到现在，这一问题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公共风险的变化。财政改革往往不是在先见之明的制度设计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公共风险暴露与加剧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是财政改革的原动力。从历史上看，制度变迁无一不是公共风险与危机推动的结果，而制度变迁的突破口常常是在财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实质上都是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而推进的，其变化的脉络是从“家贫国穷”的风险到“机会不均”的风险，再到全球公共风险，这也是我国主要公共风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95]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提出解放思想。理论界批评投资饥渴症，提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强化对企业的预算约束，让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自负盈亏。对应的改革，一个是“利改税”，即把企业向国家财政纳税和上交利润两种形式，改为只向国家纳税一种形式。另一个是“拨改贷”，即把基本建设投资的财政拨款改为由企业向建设银行贷款，项目建成投产后，还本付息。^[96]

12.9.2 财政包干制

据《央地关系》^[64]：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承包制，所谓“一包就灵”，是适用于整个80年代的总体改革思路。承包制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展到企业以至于中央地方关系领域。

我国自1980年就开始试行**财政承包制**，经过几次尝试，到1988年在全国推行开来。财政承包，其基本思路是中央对各省级财政单位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地方增收的部分可以按一定比例留下自用，对收入下降导致的收不抵支则减少补助或者不予补助。这与农村包产到户与企业承包制的方法是基本一致的。

财政包干制则更加接近于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对地方的“分权”。包干制总的精神就是“包”，“包”的前提就是将中央和地方各自的收支权限划分清楚，中央“包”给地方的是**收支总数**，而**不对地方的增收、减支的权利多加干预**。这种“一揽子”包干实际上赋予了地方政府相对稳定的配置物资、管理企业的权限，地方政府开始逐步变成有明确的利益和主体意识的单位，而不再是被“条条”系统不断分割的、相对零散的“块块”。

1980年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对于15省确定包干基数，基数以外收入由中央和地方比例分成；扩大地方财政权限，中央各主管部门对于应对由地方安排的各项生产建设和文教事业，不再归口按“条条”安排支出，不再向地方分配财政支出指标”，“**原则上五年不变**”。俗称“**分灶吃饭**”，改变了过去“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

但是自1981年起，因为中央的财政收入下降，就开始着手改变这种“分级包干”的办法。到1982年6月底，在上述15个省份中，有10个又回到了之前“**总额分成**”的办法；到1983年，15个省份就全部恢复了“总额分成”的办法，分级包干的尝试可以说是名存实亡。

唯一留下的改变是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的“**大包干**”财政体制。所谓“大包干”，其关键在于由**比例上解和比例补助**变为**定额上解和定额补助**，其中广东实行的是定额上解，收小于支的福建实行的是定额补助。定额上解和定额补助的含义就是超基数部分100%归地方所有，中央不再分享超收部分。广东、福建实行的定额包干体制一直没有改变，可以算作中央推行**定额包干的试点省份**。

在这个阶段（**1985–1987年包干制的过渡阶段**），中央和地方实行的包干体制可以概括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在此期间，全国17个省级单位仍然与中央实行**总额分成**的体制，但是与

此前一年一变的总额分成体制相比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分成比例固定下来并且一定五年不变。一定五年不变，实际上为地方财政增收提供了动力。**其中，黑龙江与广东一样，实行定额上解的“大包干”办法，超收部分上解额度是0.65亿元。另外，吉林、江西、陕西、甘肃、湖北、四川也开始与福建一样，实行**定额补助**的办法。这样，定额包干的省份由第一阶段的2个增加到7个。其他少数民族和边疆省份则实行**民族地区预算管理体制**，实际上也是**定额补助体制**。^[64]

（1988—1993年**包干制的全面推行阶段**）是比较彻底的所谓“**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阶段。在这个阶段，包干形式多种多样，全国39个省级单位（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共实行了六种不同的包干形式。

包干制将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挂钩，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就要提高地方经济发展速度。随着实行大包干的省份越来越多，地方政府之间也就经济发展展开了**区域间的竞争**……这就是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放水养鱼**”的竞争模式。

在地方政府的各层级内，也普遍实行了中央与省级政府的包干制。

从理论而言，这个体制体现出的是一种与企业管理类似的激励模式。这正是戴慕珍提出的“**地方国家公司主义**”的微观运行机制的核心，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在地方的实践中，乡镇政府要实现自己可支配收入的最大化，并非一味地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因为在这种包干制下，在一个体制周期内收入的快速增长会提高下一周期内的收入基数和收入任务数，这会增加下一体制周期内完成任务的难度，并造成自身收入的减少。因此，**乡镇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应该与乡镇政府官员的任期制结合在一起理解的**。如果一个官员为了博取很快的晋升，他可能会尽全力增加其任期内的财政收入；如果一个官员预期到自己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留在本乡镇，则他可能会对收入增长的速度进行适度的“控制”。而对于县级政府来说，这种周期性的对基数和任务数的调整使得在增加乡镇增收激励的同时，又能保证县级财政的收入不会大幅度减少，并且会在下一周期内实现快速的增长。另外，通过调节超收分成的比

例，县级政府可以对增收较快和较慢的乡镇进行刺激，比如通过加大留成比例，就可以鼓励乡镇多超收；通过缩减这个比例，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乡镇的收入或者“劫富济贫”。

12.9.3 税制改革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1年12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国**涉外税制**初步建立。

为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政企分开、增强经济活力，“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和条条、块块分割的矛盾，企业对中央与地方只承担纳税的义务”^①，实现“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职工得小头”的目标，中国开始了利改税。

1983年4月24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规定“**以税代利，税利并存**”，国营企业上交利润转为上交税收，实现了（**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允许企业使用**税前利润归还银行贷款本息**，并且**小型国有企业自负盈亏**。9月18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在国营企业推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报告》，并颁布了《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规定10月1日起试行第二步利改税，进一步分解增设多种税种，由**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

根据田纪云1984年1月20日《关于完善利改税制度的几个问题》：

据初步计算，1983年全国实行利改税的国营企业新增加的收入，以税金和利润的形式上缴国家的约占**70%**左右，企业所得约占**30%**左右，其中用于职工奖励基金的部分约为**8%**左右。

1985年3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进一步改革包干式财政管理体制，“**一定五年不变**”。

国营大中型企业利改税综合税赋约为利润的70%，税赋较重。**税前还贷**使中央财政支出不降反增；经营状况好的企业被**鞭打快牛**，亏损的企业**包盈不包**

^① 田纪云《光辉的八十年代》

亏——亏损算国家的；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两本帐，消极预算内收入（税收），热衷于预算外收入（非税收入）。

利改税实行一年之后便让位给承包制。

针对两步利改税中暴露出来的价格、税收、信贷等宏观体制不配套的问题，1984年-1985年，国家开始酝酿以价格、税收、财政为中心的配套改革。但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严重的投资、信贷失衡，因此，这一改革方案虽由国务院讨论通过并得到中央批准，却最终未能推开。在价格、外汇等方面，采取了双轨制的过渡办法。而企业改革的重心则转向推广承包制。^①

税制改革从此成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场。依马骏所说，原“分灶吃饭”税制中，“20% 共享收入归地方的一刀切计算办法使富省多有结余，穷省多有赤字”，因此促成了这次改革。新税制改革的弊端是：

自 1978 年底以来，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快速地下降。

（地方政府）利用各种减免税来调节其实际税收……地方政府对有效税率及税基的控制还表现在其对财政收入渠道的控制……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比重的下降和预算外收入上升，中央政府控制全国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能力相应下降。

由于地方政府在事实上控制了有效税率和税基，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一些不规范的政策工具来控制地方向中央上缴的财政收入。^[97]

其实 1994 年分税制也是如此，这或许是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固有矛盾。

1988 年税制改革见下一节。

财政部官网转载刘邦驰、马韵《三十年税制改革的回顾与发展趋向》^②，将 1978 年-1993 年这一时期的税制改革称为“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涉外税制、利改税（“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 30 多年的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和调节税”）、个人所得税等税务改革。

① 吴晓灵《国企改革前奏（1978 年-1992 年）：扩权让利与承包制》

② https://www.mof.gov.cn/zhuantihuigu/czgg000_1/czggcz/200811/t20081106_88385.htm

这一时期全面改革了工商税制，建立了涉外税制，彻底摒弃了“非税论”和“税收无用论”的观点，恢复和开征了一些新税种，从而使我国税制逐步转化为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的复合税制，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日益加强。^①

12.9.4 拨改贷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一次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讲了话：是否可以设想，**将财政拨款制度改为银行贷款制度，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对投资少、见效快的企业，要采取不用财政拨款，而用银行贷款的办法。**^[96]

1985年，所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无偿拨款改为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贷款，并要还付本息，即“拨改贷”，信托投资公司也随之兴起。

实施“拨改贷”的初衷是：与无偿拨款不同，获得贷款的企业要还本付息，从而促使企业精打细算，先用自有资金建设，缩短工期，提高效率，把加速资金周转和提高经济效益提上企业的议事日程。

1984年国家出台拨款改贷款政策后，意味着1984年以后新成立的国企，一出生就是**100%的负债率**。^[98]

银行系统贷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很多都成了呆坏账，国有企业拖欠还贷的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出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政策性支持的需要，银行在政府的影响下，会继续向那些企业发放贷款。这样日积月累，便形成了银行系统今天巨额的不良资产。（林毅夫与李志贇就此总结有三个原因，一是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过程中，原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尤其受到外资、合资企业冲击，由此造成的**战略性政策负担**；二是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劳动力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责任，由此造成的**社会性政策负担**；三是无法划清**亏损企业经营者的责任**，经营者往往将责任归咎于前两者，并以此为理由拖欠银行贷款，政府在各方面压力下干预银行，要求银行继续贷款给亏损企业，由此造成**预算软约束**^②问题。)^[99]

① http://finance.ce.cn/sub/2013zt/zgszgg/hgyzw/201304/18/t20130418_199980.shtml

② 软预算约束就是指当一个经济组织遇到财务上的困境时，借助外部组织的帮助得以继续生存这样一种经济现象。

1988年，国家实施税收制度改革，明确了“**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政策，规定企业债务由税前还贷改为税后还贷，**原来由财政减税负担一部分还贷责任，改为全部要由企业的盈利偿还**。尽管当时限于国有资产的产权制度尚未建立，国家最终没有解脱对国有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但是这样一种政策规定，实际上是要**国有企业代替国家完全承担出资者的经济责任，国家成为既未出资，也不对投资经营后果承担责任的出资者**。^[96]

银行由财政部门的会计和出纳成为功能健全的现金融商业银行。但此时“利用存款发放贷款的指标，也要由国家计委分配，变成了按部门归口切块分配投资和贷款”。

12.10 土地财政

1978年，中国人均住房面积 6.7 平方米。

1978年1月至1979年2月的一年间，邓小平相继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这一系列出访，特别是对美国、日本、新加坡的访问，奠定和加强了邓小平自由开放的决心。

1978年9月，中央召开的城市住宅建设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一次重要谈话，大体精神是：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建筑业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位置**。

1978年11月的新加坡之行使邓小平对公共住房计划和工业园区感触颇深。

一、公共住房计划

邓小平听取了关于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并登上该局 22 层办公大厦的顶层，瞭望周围一幢幢新建成的公共组屋。小平询问了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筑的总面积和其他有关问题，在得悉新加坡总共有三万名技术人员和工人从事住房建筑的情况之后，他说，新加坡的**建筑机械化程度高**。

据中国新闻社报道，结束访问新加坡之后，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特别举了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月收入 1500 新币有权买房产，五房单位，70 平米，花半年工资。那里的房租是工资的 15%，而欧美日则是三分之一。

二、工业园区

邓小平也到裕廊工业区，听取了相关介绍，并登上五层楼高的瞭望塔，鸟瞰这个新加坡最大的工业区。新加坡以裕廊工业区为基地，提出面向出口的工业化战略，走跨国公司投资为主的发展道路。时至今日，裕廊工业区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其发展模式是中国各地的开发区借鉴的对象。

李光耀向邓小平介绍了外商投资对新加坡的好处。邓小平回忆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①

据赵燕菁^[94]：

1979年3月，骆锦星调职深圳担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②。征得时任省委书记任仲夷许可后，他选择了通过贸易补偿，获取地产开发资金——**港商刘天就出钱，特区政府出地，建房子到香港卖**，对于收入，深圳市政府和刘天就按85:15分成。为了吸引香港购房者，允许“一次性付款9.5折，提供购房入户，每家配备3个户口名额”，价格比香港的便宜一半。这一政策刺激了在内地有亲属的香港居民的购房欲望，结果楼盘很快售罄。**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出现了。这就是最早的“**土地财政**”的雏形。骆锦星后来回忆说：“东湖丽苑是土地商品化的体现，开了土地有偿使用的先河。”此后，很多香港房地产开发商来深圳要求合作，深圳意识到了土地的价值。

之后深圳规划建设罗湖小区，造价3亿，国家贷款给3000万，剩余缺口2.7亿由深圳自己想办法。1979年8月深圳房管局提出以“**土地使用费**”解决城市建设资金难题。小区由外商独资，以1:10的容积率建设，即1平方米土地建设10平方米的高楼。一平方米收**5000元土地使用费**，合同签订后要交50%，**卖楼花（房屋预售）**后交齐。项目出租5块地，占地1.1平方千米，收回5亿多元资金。

源于香港，始于深圳，自此拉开中国土地财政序幕。赵燕菁认为：

① 新加坡眼《45年前的今天，新加坡迎来了邓小平；他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世界格局》

② 据骆锦星回忆，彼时深圳基建落后，资金短缺，其走马上任后领导给的任务是“一年之内按照省科级干部住房标准，建好两万平米、三百多套干部宿舍，但市里批的经费是50万”。

开发和建设深圳的故事显示，并不是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会自发形成基础设施；而是要政府先提供基础设施，才能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自土地收入，其价值体现的是未来城市“外部性”带来的现金流的贴现。**没有“土地财政”，深圳的“第一动力”就不会产生。中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也正因如此，“**土地财政**”乃是一种金融活动。将土地收入视作“财政收入”，暴露出传统经济理论对真实世界的错误观察和认识。

只有政府提供了重资产（笔者注：企业不愿投入的、投资巨大、周期长、直接回报低等难见市场效益的公共服务），其他社会主体才可能以轻资产启动各类商业模式。**城市化就是资本不断聚集的过程。**

根据王永红《攀登新的高度——我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 30 年历程》：

1. 启用经济杠杆，土地由无偿、无期限、无流动向有偿、有期限、有流动转变

1979 年 7 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和颁布施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可以**出租批租**土地给外商使用。

同年 12 月 31 日，成立不久的广东省深圳市，签订了**第一个吸引外资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合同**，由深方提供土地，香港妙丽集团投入资金，合作兴建和经营住宅楼，规定税后纯利深方、港方按 85:15 分成。

（笔者附：1980 年 9 月北京城市开发总公司成立。同年 12 月 9 日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可以**组织开发公司，对土地进行综合开发**。1981 年 1 月，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由国务院批准组建，这是中国第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地产项目从此开始出现。）

由于合作经营很成功，妙丽集团进而申请独资开发经营。1981 年 2 月，双方签订合同，深圳市提供 6000 平方米“**地皮使用权**”，由妙丽集团“**独资兴建和经营商住大厦**”，土地使用年期 30 年，使用费每平方米 5000 港元。至 1981 年 12 月的两年间，深圳房地产公司单在罗湖小区就“**引进外商独资经营房地产项目 10 个**，订租（出租）土地 4.54 万平方米，土地使用费 21360 万港元；另有 8.1 万平方米土地作为 4 亿多港元的物化资本，在 10 个项目中与外商 6

亿多港元的投资合作建造商品楼宇”，“使昔日杂草丛生的罗湖小区，很快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商业、金融中心”。

《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自 198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规定了不同用途土地各自使用最长年期和不同用途不同地区每年每平方米土地使用费标准。还规定，土地使用费“可一次性付款……也可分年付款，按年息八厘加收利息。”《暂行规定》“适用于在特区兴办企业、事业的所有单位”。

（笔者附：1982 年宪法增加“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集体所有影响至今，在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新增建设用地和拆迁中发挥重要作用。）

辽宁省抚顺市自 1984 年 1 月起开征土地使用费，是非沿海城市中起步最早的。开征的缘起是，当时的抚顺市主管副市长刘文甲，于 1983 年听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易之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地租仍然存在、城市土地理应有偿使用的专题讲课后，开始琢磨并组织调研，提出开征方案。后经市政府讨论通过和财政部批准，全面开征城市土地使用费。尽管当时市里还没有“三资”企业，但开征当年就收取土地使用费 1300 多万元，不仅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短缺的情况有所缓解，而且有的企业主动退出超占及闲置的土地。至 1985 年底，全市共退还土地 15 万平方米。

1984 年初，上海市城市经济研究会成立了“上海城市土地有偿使用”课题组，对有偿用地的收费形式、方法和标准等六个方面作了专门研究，抽样调查了区位反映最敏感的 1161 家独立核算的商业企业（占全市商业总数的 20%）的土地收益情况。经测算，并参考历史上地价水平，将市区用地按地段繁华和开发程度分成 7 级，郊区、县分为 3 级，设计了 3 套土地使用费方案。

广东省广州市自 1984 年下半年起开征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建项目、“三资”项目的土地使用费。据介绍，广州城市建设资金每年约需 5 亿元，但实际只有一半左右，缺口很大，征收土地使用费对缓解资金短缺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1984 年下半年，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政府顺应农民盼望进城改善居住条件和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有偿提供土地，成为我国第一

座农民城。至1985年底，龙港镇政府收取土地使用费1000多万元。后来的12年间，龙港新城建设共投入资金12亿多元，其中90%是通过土地有偿使用筹措的。

收取城镇土地使用费，尽管标准较低，土地仍然由行政划拨，还不能名正言顺地进行市场流通，但这一创造性的实践，使原本不值钱、随意使用的土地一下子有了“身价”，为我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作好了准备。

2. 引入竞争机制，从深圳土地拍卖“第一槌”到全面推行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

1987年9月9日，深圳市政府首次以协议方式将一块5321平方米住宅用地的使用权，以106万元的价格出让给某公司，使用年限为50年。同年12月1日，深圳市首次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一宗面积为8588平方米的土地被一家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竞得使用权。这一改革举措面临的最大困境是“违宪”，因为《宪法》明文规定土地不能出租、转让。一槌定乾坤。次年4月，《宪法》增加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条文^①。随后，《土地管理法》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引入竞争机制之路并非坦途，土地拍卖槌声一度相当寥落。有的地方原来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土地拍卖制度，这时也改为协议出让。在协议出让的情况下，关系好的或者付了“寻租”成本的人，就能用很低的价格批到好地，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

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协议出让仍是土地使用权转让主流，持续滋生较大权力寻租空间。

1988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住房商品化，由此进入福利住房与市场化双轨推进时期。

12.11 权力寻租、官倒和腐败

改革开放初期，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明显增加。这些严重犯罪活动，往往是由

^① 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内的少数人员，同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相勾结进行的。

从1982年1月中央确定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作为打击经济犯罪斗争的办事机构开始，到1986年7月中央同意纪委不再作为该机构止，在中央纪委参与下，在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中，受党纪处分的党员67613人，其中被开除党籍的25598人。^①

1980年11月，中央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1981年1月7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走私贩私活动的指示》。

1982年4月10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

1983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必须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经济罪犯》。1983年12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1984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1985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

198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1989年2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清理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在公司（企业）兼职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价格双轨制时期的权力寻租和腐败论述请见12.7.5节。

改革开放之后，权力寻租和腐败问题普遍发生，贯穿这一时期始终，并未得到有效治理。有专家学者认为主因是这一时期价格双轨制、利改税、拨改贷等具体财经政策的巨大负面作用。个别专家认为正是体制本身产生了权力失控，从而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腐败。腐败犹如流行病毒般传播，批条倒卖迅速从少部分权力核心自上而下扩散到全民，当时有句顺虽有夸张却很形象的俗语——“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① 刘仓《陈云指导中央纪委打击经济犯罪》

第十三章 市场经济体制时期 1992—

之前一章已经说明，1992年邓小平南巡，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及十四大讲话中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八五”计划方针也响应十四大精神，调整为“双加快”——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中国正式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时期。

本章涉及这样庞大的课题，基本不可能由笔者自己完成。其实写作之初的设想是实现社会化编辑，吸收其他人参与和贡献，所以铺开了太大的摊子。但直至今日，基本上也只有能力浅薄的笔者自己亲自参与，独木苦支，只可论述二三事件，还请读者见谅。

13.1 农业改革

13.1.1 粮食并轨

1992年4月1日，继上年5月1日后，国务院再次决定**提高粮食统销价格**，实现**购销同价**。粮食统销价格提高后，粮食部门的经营费用仍由财政补贴；对城镇居民口粮继续实行凭证、凭票、定量供应政策；对农村平价粮销售也继续实行计划供应。在提高粮食统销价格的同时，国务院决定给城镇居民适当补贴。

1993年2月15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通知指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把握有利时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放开价格，放开经营，增强粮食企业活力，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向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方向推进。**”“1993年4月1日起，我国**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38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完成了谢幕演出，**票证时代彻底终结。**”多数省份在此之后**取消了“粮棉三挂钩”**。至此，**中国取消了长达40年的统销制度。**

“到 1993 年 5 月底，全国宣布放开粮价的县（市）超过总数的 95% 以上。”1993 年 11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决定“从明年起，国家定购的粮食全部实行‘保量放价’，即保留定购数量，收购价格随行就市……粮食价格和购销放开以后，国家对粮食实行保护价制度，并相应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和储备体系。”

据卢迈，1993 年的政策，如 1985 年一样，目的也是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农民。^[82]

1993 年 10 月底，南方沿海粮价迅速上涨并快速辐射蔓延全国，民间再次出现粮食抢购。

1993 年 10-11 月两个月粮食平均价格由 0.935 元/公斤上升到 1.080 元/公斤，涨幅约 16%。一些城市粮价出现一日一变甚至一日几价情况，为改革以来所仅见。1994 年初粮价相对平静，但三月份以后重新上涨，6 月份比 2 月上升了 25.7%。下半年上涨更猛，12 月粮价比 6 月上涨 31.8%。1995 年粮价仍在攀升，1995 年粮价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 2.155 元/公斤，全年上升 19.3%。^[100]

据卢锋，1993 年底，关于粮价上升过快的原因，决策层和学界起初认为“主要是由心理，投机因素等暂时因素推动”，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后来改变想法，认为主因是生产不足。

1993 年 11 月在京召开的“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会上，专家们普遍认为“这次粮价猛涨，是国营粮食企业带头抢购和哄抬粮价，而引起集市跟随涨价。南方，特别是沿海地区粮价先期上涨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迅速传播，助长了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普遍的涨价心理预期和惜售心理。”

（1994 年春，）决策层已开始转而认为生产不足是粮食上涨的主要原因，并试图通过加强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行政控制来应对粮价上涨。

以下绝大部分专家的论述只根据卢锋文章中的介绍作出，笔者没有查证原文，也不想查证。

卢锋论文中整理了 1994 与 1995 两年中几位专家学者对粮价上涨原因的论断：陈锡文、杨启先（1994）认为粮食总产量虽然上升，但南方稻谷减产导致粮价上涨；杨启先（1995）也继承了一个过往的传统观点，认为粮价上涨导

致通货膨胀；林毅夫、李周（1995）认为地方产量发展不均衡有所扩大之下的**封闭粮食市场**，与**不可阻挡的信息传播**之间的矛盾，从而产生农产品惜售行为，最终粮价上涨；戴根友（1995）将主因归于经济加速发展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导致农业生产和供给出现短缺，“不应把由改革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当成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笔者认为，王建（1994）的论述需要单独提一下。王建将通货膨胀分为两种，一种是**货币超发和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的通货膨胀**，一种是**我国转型期政策改革、产品结构调整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王健认为侧重于农产品的**改革型政策**是通货膨胀主因，而粮价提升在市场转轨过程中其实是种**市场化体现**，只需有**限制地调整**。笔者认为，王建漠视货币超发和投资规模过大是粮食通膨主因之一，这点是明显错误的；但他对农产品结构性调整的论述具有一定价值，可以引申为**农业在改革的结构型调整中倾向于真实市场价值**，于是原本被抑制的粮价在面对无形之手时涨幅较高。

另外笔者找到了温铁军（2001）一篇文章^[101]。温铁军认为粮价上涨的真实深层原因有两条。温铁军所述第一条深层原因和戴根友相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自1989年以来长期收入低下的农村劳动力在经济增长、基建投资增加的吸引下进城打工，**打工人数约6000—8000万。他们需要增加的粮食消费大约为600亿斤/年，而国家粮食系统是没有这个储备的**”。第二条原因是，人民币汇率贬值导致“外贸和南方各省突然从进口粮食转向在国内市场抢购以逐利……1993年秋季粮价已经开始上升，大量的粮食经营单位，特别是南方的粮商，已经有**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接着1994年汇率调整一步到位，**人民币贬值实际达到57%**，这就意味着刺激出口。本来1993年国内粮食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约20%，但在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7%的情况下，出口粮食就有可能得到**约30%的机会利润**。率先得到汇率调整信息的**南方粮商就从南到北抢购过来**。”

笔者认为温铁军并未能如他所说，找到“这次波动的真实原因”。现代社会大规模严重饥荒的主因往往只是人祸；而严重粮食问题的主因往往也是因政治或资本统治权力主导的宏观政策。近几百年来世界各国在自身粮食大问题上，常将囤积居奇的货商或自然条件等列为主要、本质原因，只不过是避重就轻而已。

笔者支持卢锋观点^①。卢锋（1999）否定了“稻谷减产导致粮价上涨”和

^① 需要注意前文所述学者除温铁军外的论断均是在1994、1995年作出，卢锋的论断或许有一系列滞后性优势

“粮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的说法。他认为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粮食价格周期性上升（90年代初过往粮价被显著抑制后的反弹）；国际市场米价急剧上涨和人民币汇率贬值，大米进口需求降低，对国产大米需求增加；投资需求（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激增和信贷膨胀（特别是通过民间非法集资和银行违规贷款实现的融资）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势头，从而农民倾向“惜售”和粮企调高合理库存量行为；政府认为粮价上涨主因是生产不足后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反过来使市场参与者预期粮价会进一步上涨，实际上走向预期的反面，推动了粮价上涨。

笔者妄论，除卢峰、王建等人，一些专家的水平或者立场有点让人失望啊。简单来说，无非是谷贱伤农则农民不愿种粮、卖粮，生产力不足。同时，严重超发货币导致严重通膨，通膨导致被严重贬抑、无法反映其真实价值的的粮价加剧触底反弹，粮价高涨。这必然是最主要的原因，在“最主要”这层面上没有之一。

1994年5月9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通知》。

粮食部门必须收购社会商品粮的70—80%，即900亿公斤左右（贸易粮）。……建立健全灵活的粮食吞吐调节机制，适时平抑粮价，稳定粮食市场，促进生产，保证供应，是粮食部门的重要任务……在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统一领导下，粮食经营实行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两条线运行机制，业务、机构、人员彻底分开。

同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印发〈粮食风险基金实施意见〉的通知》。同年11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挂牌成立，它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中国唯一的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这一次粮食双轨并轨、全面市场化、“保量放价”的尝试不到一年就失败了，我国重新回到**粮食双轨制**。

13.1.2 重回粮食双轨制

以下内容引自王德文、黄济焜《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一文。

1994年5月，《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购销改革的通知》进一步明确规定：实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领导负责制**，负责本地区粮食总量平衡，稳定粮食面积、产量与库存，灵活运用地方粮食储备进行调节，保证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这为1995年正式出台“**粮食省长负责制**”打下了基础。

同时，为了缩小市场价格和定购价隔间的较大差距，刺激粮食生产，1994年和1996年，中央两次提高了定购价格，两次粮食提价幅度均在40%以上。

政策干预和提价等因素刺激了粮食生产增长，1993-1997年粮食增产后，农民面临着“卖粮难”问题，国家一方面通过保护价政策来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粮食风险基金来填补政策运作中的各项成本。但是，由于1994年以来连续几年的粮食丰收、不适当的粮食进出口政策（常常是丰年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以及为遏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措施制约了国内需求扩张，粮食市场价格随之下跌。而按市场价销售收购的粮食将面临巨大亏损，粮食部门不仅没有将旧帐减少，反而又添巨额新帐，摆脱粮食收购中的财政补贴压力成为燃眉之急。

为什么在粮价涨幅较大的情况下，依然在1996年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呢？综合几份资料，笔者认为可以简单总结为：对市场信息反应迟滞，错判粮食生产不足。

卢锋提到两件事：一，“国家计委‘九五’规划预测2000年才达到9800-10000亿斤”；二，国家怀疑统计部门上报的1996年粮食总产量超过一万亿斤的数据可靠性，认为水分较大。王小鲁关于粮食波动的论述能较为清晰直白地佐证这点。

由于（1994年的大幅）提价大致是从6月份开始，已经错过了播种季节，因此对当年的粮食生产并未发生积极影响。1994年产量反而下降了2.5%。在产出未作出明显反应的情况下，1995、1996和1997年实际定购价格又连续提高了4.4%、8.1%，从而使总产量扩过了5亿吨。由于供给过剩，市场价格和议购价格在1997-1998年大幅下跌，而定购价则在1997年继续上涨，1998年也只有小幅下跌，这导致在1997-1998年定购价超过了市场价^①。^[102]

13.1.3 混沌双轨制

1996年10月份，国务院在大连召开部分地区粮食工作座谈会，会上提出“四分开，一并轨”的改革思路——政企分开、中央和地方责权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帐目分开，粮食定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并轨。

^① 根据王小鲁整理的价格数据（见图12.1），大豆、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中其实只有小麦的定购价在1997-1998年超过市场价。

1997 和 1998 年，国家又持续调低了粮食定购价和议购价，并且保护价下调至定购价之下。有资料显示，1997—1998 两年，国家对粮农其实是负保护水平。

1998 年 5 月 10 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四分开，一完善”，将原来的“**粮食定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并轨**”替换为“**完善粮食价格机制**”。

本次改革的原因和目标是：

现行粮食流通体制仍然没有摆脱“**大锅饭**”的模式，国有粮食企业管理落后，**政企不分，人员膨胀，成本上升**；同时又**严重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资金**，导致**经营亏损和财务挂帐剧增**，超出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这些都说明，现行粮食流通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到了**非改不可、不改不行、刻不容缓**的时候了。不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关系不清，**中央财政不堪重负**；不改革，**国有粮食企业就难以扭转亏损**，不能担当粮食流通主渠道的重任；不改革，**不利于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必将影响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

具体政策和解释如下：

1. **政企分开**。“实行政府粮食行政管理职能与粮食企业经营的分离”。国营粮企具体政策方面也包括“国有粮食企业要实施**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直接从事粮食收储业务的人员要逐步减少到现有人员的一半左右。”

2. **中央和地方的粮食责权分开**，全面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

3. **储备与经营分开**。分权责建立中央和省份的两级储备体系，**储备粮与企业经营周转粮实行分开管理**。

4. **新老财务账目分开**。“新老财务帐目分开的核心是要正确核定应由财政补贴的挂账额度，同时要认真制定和落实消化新老挂账的措施，并要求在新体制下不得再出现新的挂账。”^[103]

5. **完善粮食价格体制**。建立收购保护价和市场价的动态关系；销售限价；进出口和储备粮宏观调控。

6. “要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粮食的主渠道作用，农村粮食收购主要由国有粮食企业承担，**严禁私商和其他企业直接到农村收购粮食**。”

“四分开、一完善”政策鲜明地继承了 94 分税制思路，**政企分离、减轻中央财政负担、中央和省级责权分离**等。

1998 年 6 月 3 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购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朱镕基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下文接着引用王德文、黄济焜《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一文：

到 1998 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在学术界和地方很有争议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方案，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实行顺价销售、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加快粮食企业自身改革**，转化经营机制，提高市场竞争力。2 年来的实践证明，**预期的改革目标不仅难以实现，而且更加大了走出双轨制度的难度。**^[81]

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四分开、一完善”与“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使粮企止损盈利并迎接市场化、消化历史亏损挂账**。笔者根据各方文献，结合自己思考对此一时期政策的理解如下：

1. 关于“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的内在逻辑，朱镕基曾在 1998 年粮食工作会议上如是说：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为了**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对农民出售的余粮，只能由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不能侈谈什么‘放开’**。在这方面，过去的教训是深刻的。1992 年秋收后，一些地方盲目放开粮食收购和价格，结果大量私商进农村抢购粮食，粮食市场混乱，**粮价猛涨**。国家不得不采取**抛售专储粮**等措施，才把粮价稳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04]

笔者认为朱的谈话除防止粮价过低外其实还有三个含义，一、**虽然目前粮食供给过剩，仓储也过剩，但如果以市场来主导，则粮食产量可能会降低。我国目前仍要保证产量**。二、**如果粮食产量降低，供给不足，从而粮价暴涨，国家就要花费巨大代价“稳住粮价”**。三、**禁止私商粮贩收购，形成国家垄断性市场，便于宏观调控和实现国营粮企的顺价销售**^①。

笔者还有一个相当主观，缺乏科学论证，很可能错误的揣测，希望读者能够批评指正。根据卢锋所言

① 顺价销售：指国有粮站、粮库等粮食购销企业出售的原粮及其加工的成品粮，必须以粮食收购价格为基础，加上合理费用和最低利润形成的价格进行销售，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粮食加工、批发和零售企业亏本销售。

我国粮食生产继 1995 年丰收和 1996 年特大丰收之后，1997 和 1998 两年仍是较大丰收年，这是一个很异常的现象。因为过去专家和官员谈粮食，通常有“两年一歉”或“两丰两歉一平”一类的说法，不可能有三年连续丰收，认为这是我国粮食产量受气候制约的周期波动规律。然而 1995 年以来四年连续丰收，以往的经验 and 规律似乎突然失去了灵验。反常现象必有反常原因，这应当主要是价格保护政策的功劳。

那么，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国家 1998 年制定“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时其实是预期我国粮食减产？如果粮食如预期一样减产，那么这一政策对财政将不是利损，而是利好。这可能是错判 96 年粮价 2 年之后的又一次错判。

王德文、黄济焜评价此政策造成的弊端是：

保护价敞开收购导致的国家仓储设施、信贷资金和粮食风险基金负担沉重。（陆文强等调查资料显示）1998 年国家粮食储备率高达 60%，属超安全储备，成为严重的经济负担，国家仅支付保管和利息就高达 500 亿元，财政已不堪重负。”

虽然保护价落实折损后的价格并非那么如意，“敞开收购”也未能真正贯彻执行，但提高了粮农一定的安全感，粮农的生产积极性没有立即减弱，随着保护价的持续降低和取消保护政策，我国抗压农民生产积极性才真正降低。因农村和国家有大量库存，我国粮食过剩问题存在到 2000 年。

2. 顺价销售的内在逻辑是通过严禁私商和其他企业（非国有粮企）直接收购粮食形成的垄断性地位使国家掌控市场，节约成本和增加利润，最终使粮企止损盈利、消化历史亏损挂账，

但是此时的垄断性国营粮企也增加了各项成本。（1）高昂垄断行政成本：如王和黄所说政府主管部门、公安、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建立加工企业台账和粮食稽查队伍等的财政支出。（2）高昂经营性成本（收购资金利息、仓储成本、人力成本、损耗、政策失误等）。（3）国营粮企将一些经营性亏损转嫁至下游粮农、上游粮食需求单位如面粉厂等、提供财政补贴的国家（经营性亏损转嫁为政策性亏损），伴生吃拿卡要的权力寻租。

笔者认为，这一切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农民粮食经粮企收购折算后的实际收购价仍然较低。此时我国仍有 2 亿多农村生产单位，加之以上原因，无法有效管控逐利私商和非国企粮贩，从而“粮食部门与私商粮贩在价格竞争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最终“市场仍是竞争性市场状态”，国家耗巨资赔钱运行“三项

政策、一项改革”。

曹宝明的论述比较实在一些：

事实上广大农民已经习惯了将自己的粮食出售给服务**远远好于**国有粮食部门的私人粮商，在 1998–1999 年的粮食收购中**工商行政部门及国有粮食部门已经自认无能为力了**。^[103]

农民并未获得实惠，王和黄的文章可以提供论据：实际执行过程中**农民收入不升反降**。“1999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2430.0 元，其中来自种植业收入为 342.3 元，比上年下降 10.5%（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0）”。

竞争性市场状态下，农民实际卖粮价必然低于市场价，可通过图 12.4 获知此时期粮农真实收入上限。

3. “收购资金封闭”政策的内在逻辑是为**杜绝收购资金的挪用和超期占用，以控制财政贴息**。

笔者没有找到“资金封闭”政策的宏观深刻论述，仅列举几个例子吧。地方粮企指责地方财政**挤占挪用粮企补贴**，指责农发行只管收购所需**封闭资金**，限制了粮企生产运营的**动态要求**，如企业缺乏所需信贷、企业间资金流转受到限制等。农发行指责地方粮企**挤占挪用收购资金**，粮企**亏损挂账**等。

98 粮改政策当年就无法贯彻实施，此后保护价开始放开，但 98 粮改精神尚在。

1999 年 5 月 30 日，国务院发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中提出：

黑龙江、吉林、辽宁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的春小麦和南方早籼稻、江南小麦，从 2000 年新粮上市起**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1999 年暂不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但要较大幅度地调低收购保护价格水平**。具体办法由各有关省级政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研究决定。

2000 年 2 月 10 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写信，“**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几年间我国个别地区也发生个别粮农群体性事件。

2000 年春天，经国务院批准，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省份。

2000年2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关于部分粮食品种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指出“从2000年新粮上市起，**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玉米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

2001年我国继续缩小实行粮食保护价政策的范围和品种，将实行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的地区局限在粮食主产区，同时**赋予粮食主产区省级人民政府自主决策的权力，即自行确定实行保护价收购的品种、范围和办法。**

2001年7月31日，国务院发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中提出：

特别是东南沿海的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海南、江苏和北京、天津等地区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潜力较大，粮食市场发育较好，粮食购销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完全可以放开粮食收购，粮食价格由市场调节。**

从2000年到2004年5年，当年生产粮食其实无法满足当年消费所需，缺口是由库存来补充，借此我国每年消耗约400亿—700亿斤的库存^①。

邓大才所作《粮改30年：农民、市场与国家的博弈与利益重构》^[105]对粮改的分析非常深刻客观，并具有完整逻辑链条的，这在粮改论文中是**相当难得和罕见的**。为读者观看方便，笔者直接大篇幅引用邓大才的文章吧。

1999年开始国家每年都**下调收购价格及保护价格**，而且还允许部分收购价格低于保护价格。另外退出保护价格收购的粮食又缺少其他收购主体，**粮食价格大幅下滑，“卖粮难”再次出现**，而且有些地区种粮还出现了亏损，农民纷纷**以脚投票，弃田抛荒，粮食播种面积不断降低**，1999年至2001年分别下降0.55%、4.15%、2.2%，**粮食产量也逐年下降**，三年分别下降0.76%、9.09%、2.06%，特别是2000年粮食减产4621.1万吨，2001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5263.7万吨，达到了历史新低。**但是此时，中央对粮食供给仍然比较乐观，根据库存与粮食价格判断，粮食仍然供过于求，其实此时已经开始酝酿新一轮的粮食紧张。**

2002年虽然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但是粮食产量有稍许的增长，**减缓了改革的压力，更重要地是老一届的政府领导即将卸任，没有**

^① 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韩俊所作《当前我国粮食供求形势分析》一文中提出“自2000年以来我国粮食消费需求大致在9600—9800亿斤之间”，笔者结合我国粮食年产量计算出此一阶段粮食库存消耗数据。

大改的动机，但是粮食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粮农增收的环境没有解决，2002年粮食价格下滑到了谷底，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继续减少，粮食再次减产2636.3万吨。2003年底粮食供给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粮食价格开始上涨，累计的粮食问题开始爆发。老的粮食政策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经济社会的需要，新一轮粮改势在必行。

2004年，粮食市场化改革开始。

13.1.4 有限制的市场化改革

2004年5月26日《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正式对外颁布，赋予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全社会的粮食流通和对市场主体准入资格审查的职能，个体工商户和非国企具有了直接收购粮食的资格，具有了合法性。

2004年5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宣布，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

邓大才深入客观地介绍了2004年粮改起初几年的情况，笔者已无力再将农业问题继续写下去，推荐读者尽量阅读邓大才的完整文章。为方便读者，以下仅直接引用邓大才原文吧，

2004年中央以农民增收为主题发布了1号文件，要求“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2月全国人大会议为配合和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政府工作报告以粮食为主题——“调动农民积极性，增加粮食生产”，推出了一系列的粮食生产优惠政策：一是直接对农民实施粮食补贴，这是几千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对粮食生产者进行直接补贴；二是加大粮食主产区减免农业税的力度，11个粮食主产区省市降低3个百分点，其他地区降低1个百分点；三是扩大良种补贴试点范围和规模，鼓励农民进行粮食结构调整；四是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格制度，实施“地板价格”保证农民利益；五是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这些政策都是历史性的突破，表明国家从向农民索取剩余转向休养生息，从“以农补工”转向“以工补农”，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004 年粮食改革政策和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使粮价开始回升,连续两年粮食播种面积增长,粮食产量增长。但是由于多年粮食减产的供给压力,粮食价格回升比较快。

为了培育粮食生产能力,2005 年中央 1 号文件强调“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一是继续加大“两减免、三补贴”等政策实施力度,即减免农业税、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二是切实加强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三是建立稳定增长的支农资金渠道。

2006 年中央 1 号文件要求“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全国人大会议决定取消农业税,几千年以来加在粮食生产上面的税收被取消。2007 年中央 1 号文件同样也强调“继续促进粮食稳定生产”,加大农业生产的补贴范围和水平,2008 年中央 1 号文件要求“高度重视发展粮食生产”。由于粮食政策已经在“04 粮改”调整到位,2005 年至 2008 年基本没有出台有关粮食改革的专门文件,只是在四年的中央 1 号文件中强调粮食安全,确保粮食产量,减轻粮农的负担,增加粮食生产经营的支持和保护。^[105]

2007 年至 2008 年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检验着“04 粮改”政策框架的弹性。这两年国际粮食价格大涨,但是国内粮价却在国家抛售储备粮的调节下“非常稳定”,而且粮食生产资料更是随国际粮价水涨船高,国内国际粮价差异巨大、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侵蚀农民的粮食收益,粮食生产是否又在隐藏着下一轮的粮食危机和农民“以脚投票”呢?

13.2 分税制

13.2.1 分税制历史资料简单汇总

自 1985 年 3 月 21 日确定财政包干制以来,因利益关系,我国地方政府往往采用地方收款(预算外收入,地方独享)代替税收(预算内收入)、减免或隐瞒税收、以行政收费、集资、摊牌和赞助等代替税收等手段,实际控制了有效税率和税基。为应对中央财政收入困难,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借款,并在还款上采用了拖延、欺骗、耍赖、强霸等手段补贴中央财政,使地方政府不愿再借钱给中央。^[97]中央在 80 年代末的分税尝试均未有效实施。

1982—1992年，地方预算外收入年均增长30%，远超过预算内收入年均19%的增速。1992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达到了预算内收入的86%，相当于“第二财政”了。^[106]

（分税制之前）为了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操纵税收部门而方便地“藏富于企业”。除了在企业承包制之下税前还贷之外，地方政府还大量使用减免税和税收优惠政策。这导致减免税的范围不断扩大，许多地区擅自越权减免税收。根据国家审计署对十个省市工商税收减免的调查，1990年共减免流转税97亿元，占当年流转税入库数的20.7%；1991年19个省级财政越权违规减免税收额占违纪金额的22.7%。除了减免税之外，地方企业偷税漏税的现象也非常严重。根据某省的调查，国营企业的偷税、漏税面达70%，集体企业为72%，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达85.5%。^[64]

以下资料汇总主要来源为江大桥所作《我们地方没钱：分税制改革下中央与地方的博弈》^[107]与张曙光所作《中国经济学风云史》。

中央财政收入困难，90年代初期我国两任财政部长由“穷得只剩下背心和裤衩了”到“我连背心都没有，只剩下裤衩了”。加之经济过热、汇率改革等，造成的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通货膨胀：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逐步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6月5日，财政部开始在天津、辽宁、沈阳、大连、浙江、武汉、重庆、青岛和新疆九个试点试行分税制。

1993年，朱镕基正式接手分税制的改革，当时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9年的28.4%降到1993年的12.6%，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的比重从46.8%降到31.6%，也就是所谓“双降”的局面。

据张曙光，最具影响力并引起中央强烈重视、正式采取分税制改革的学术源头为当时留美归国博士（学位）王绍光、胡鞍钢所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85]⁷⁵⁶，该报告发表于1993年5月。报告中认为当时实行财政包干制的国情为“弱政府、弱中央、强地方、财政收支最为分散”。

1993年夏季，中国最高当局决定实行财税体制改革。7月23日，朱镕基副总理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取消中央

与地方财政大包干的制度。从 1994 年起在全国实施统一的财税体制。即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从此，税制改革进入了快车道。

为应对地方对即将施行的分税制的不满情绪，朱镕基亲自带队，从 1993 年 9 月 9 日-11 月 21 日，先后分 10 站走访了 17 个省、市、区。^{[85]758}

1993 年 12 月 25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从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中央固定收入包括：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消费税，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等集中交纳的收入（包括营业税、所得税、利润和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央企业上交利润等。外贸企业出口退税，除一九九三年地方已经负担的 20% 部分列入地方上交中央基数外，以后发生的**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

地方固定收入包括：**营业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不含上述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地方企业上交利润，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农牧业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的农业税，（简称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遗产和赠予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

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增值税中央分享 75%，地方分享 25%。资源税按不同的资源品种划分，大部分资源税作为地方收入，**海洋石油资源税**作为中央收入。证券交易税，中央与地方各分享 50%。

一九九四年以后，**税收返还额**在一九九三年基数（即 1993 年的**消费税 + 75% 的增值税 - 中央下划收入**）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平均增长率的 1:0.3 系数确定，即上述两税全国平均每增长 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 0.3%**。

此外，为实行分税制，**财税分家**，原财务系统下的税务系统独立为国税、地税两套机构；中央通过分税制集中起来的财力，不断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

此后又对税权划分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完善：

连续6次调整中央与地方证券交易税分享体制，到2003年达到**98%**；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率，从1997年11月起由**5%**提高到**8%**，增加的收入全部归**中央财政**。2001年起分三年恢复到**5%**；1999年恢复开征**利息所得税**，收入归**中央财政**；从2002年起，除部分中央企业和机构缴纳的所得税继续作为中央收入外，**其他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以2001年地方实际的所得税为基数，中央与地方**增量分成**，分成比例2002年为**5:5**，2003年为**6:4**，以后年度再根据实际收入情况商议；**新办企业的所得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新增税种的收入**都由国家税务局征收；来自**新批转为非农用地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上缴中央；2004年10月对**出口退税机制**进行重大改革，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从2004年起以2003年出口退税为基数，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由中央与地方按**75%**和**25%**的比例共同承担。^[108]

“**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成为分税制基本原则及政策合理性诉求。胡锦涛在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政府报告中改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财权”（与税基相关）变“**财力**”（政府拥有的可支配财产），这一变动是为削弱地方权力，减轻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便于向落后地区转移支付。

13.2.2 分税制的后果

2011年清华校庆，朱镕基回校参观，借着师生座谈会的机会说到分税制：

指责“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他用2010年的财政数据举例，92年、93年的中央财政比例是**28%**、**27%**，而2010年，扣除财政转移支付3万3000亿，**中央财政不过是1万5900亿只占20%左右，地方政府有的是钱。**

（朱镕基说）“当然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返还支付的方式……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

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

“(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笔者认为，朱镕基说得还算中肯，但也有遗漏之处，现结合资料总结如下：

一、集中力量办大事。

邓小平认为的我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得以建立。当然，“集中力量办大事”未必就使大事有个好结果，也可能造成更大恶果，但分税制确实赋予了中央政府更多的可能与力量，得以指导整个市民社会朝某方向发展。

胡鞍钢认为“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混合模式得以建立，且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中央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避免了省级政府权力过重、各自为政。弱中央、强诸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好结果。

笔者认为，就全球化环境下，繁荣地区、都市本身就获得了更多自主权，与世界各国、地区建立了更多联系，这些繁荣地区、都市在一些层面或部分上甚至可以影响或超越国家。近三十年世界各国基本都处在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这一具有内部强大张力的框架之下，一个强力中央的集权管控，能够使繁荣地区受控、不至于太过出格，同时为落后地区多输血，也使国内意识形态较为统一。如胡鞍钢所说，地区的**多样性**仍主服从于中央的**统一性**。

二、分税制没有完成，层层盘剥克扣下加总事权最重的县乡只有最少的财权，财政困难。

中国是中央、省、市、县、乡五级管理体系，分税制方案所预想的减少财政层级没有实现，成为省市县乡四级从上至下的层层盘剥克扣，导致**县乡事权最重，财权最小**。

胡鞍钢在2014年接受采访时说到，“中央现在只是对省级政府转移支付，确实没有解决省以下的转移支付问题。”其实在王绍光、胡鞍钢1993年所著《国家发展报告》中，确实已经提出建立四级政府运行结构，实行三级财政征收和四级财政使用。但是“当时中央来不及解决这一根本问题”^①。2006年后我国逐步提出“省管县”，最终目标建立财政实体三级架构：中央、省和市县。

^① 胡鞍钢：中央转移支付可直接到县

根据财政局科研所领导贾康、白景明研究：

自 1994 年以来，中央的资金集中度实际在下降（从 1994 年的 55.7% 下降到 2000 年的 52.2%），而省级政府的集中程度不断加大，**年均提高 2%**（从 1994 年的 16.8% 提高到 2000 年的 28.8%）。市一级政府同样在想方设法增加集中程度。2000 年地方财政净结余 134 亿元，**而县、乡财政赤字增加**。这些说明实际上财力在向省、市集中。^[109]

省以下政府层层向上集中资金，基本事权却有所下移，**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成为现在的突出矛盾。**

据腾霞光研究：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几乎没有触及省以下转移支付，各级包干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得以延续。……地方转移支付以省级为主，地市级规模很小，县级几乎微不足道。1994-1997 年全国 28 个地区均等化转移支付，中央占 37%、省级占 47%、地市级占 15%、县级只占 1%。

官僚考核制度与权力寻租变现明显是造成五级政府**层层盘剥克扣**的主要原因，并且因县、乡政府财权事权两极分化，事实上加重了当时的城乡二元对立，县乡困难。

三、分税制没有直接使中央掏空地方，没有直接导致地方走向土地金融，中央大量转移支付基本弥补了地方缺口。但分税制下国有土地转让收入全归地方的政策，加之 1998 年取消福利房、住房市场化货币化、发展住房金融促成了地方走向土地金融。

简明论述可见粤开证券研究所《1998-2023 土地出让收入排名变迁年》。顺带一提，笔者认为粤开证券研究所这份报告相当中肯客观，比一些专家论文专著要好得多。

分税制确实导致财政收入初次分配中地方占比低、支出占比高，**但是经过转移支付的二次分配后地方占比大幅上升，而中央通过掌控一定财政资源加强宏观调控实现区域均衡是必要的**（笔者注：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和转移支付规模可见表 13.1。）。

分税制改革改变了财政包干制下中央财政困难的局面,解决了“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下降”问题,提高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是持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但分税制改革初期,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划分合理性欠缺,地方政府支出责任较重,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亟需完善,甚至出现“跑部钱进”情况。

另外如朱镕基所说,中央所拥有的集中财力及转移支付权力,造成“跑部进京”现象。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机构均设立驻京办事处;部委官员权力巨大,其个人与地区的政治人文关联,同地区所得政策支持相关,也存在官僚权力寻租变现问题。

四、财政包干制下地方政府公司化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锦标赛,在分税制后反而被加强^[64]。

中央收权,以转移支付方式控制地方发展方向的分税制,使地方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下降,反使地方支出压力持续加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官僚考核机制促成地方开展竞争更为激烈的 GDP 锦标赛,寻求新的增长点,为此可以以牺牲其他非核心指标为代价。

年份	全国		中央财政收入		地方财政收入		中央转移支付(亿元)				转移后 中央占 比全国	
	财政收入	土地出让收入 (亿元)	总额 (亿元)	占比全国 财政收入	总额 (亿元)	占比全国 财政收入	财力转 移支付	专项转 移支付	税收 返还	合计		
1993	4349	557.80	958	22.02%	3391	16.45%						
1994	5218	639.00	2907	55.70%	2312	27.64%	99	361	1799	2259	12.41%	
1995	6242	387.70	3257	52.17%	2986	12.99%	133	375	1867	2375	14.12%	
1996	7408	349.10	3661	49.42%	3747	9.32%	161	489	1949	2599	14.34%	
1997	8651	462.10	4227	48.86%	4424	10.44%	199	518	2012	2729	17.31%	
1998	9876	507.70	4892	49.53%	4984	10.19%	210	878	2083	3171	17.43%	
1999	11444	514.33	5849	51.11%	5595	9.19%	364	1424	2124	3912	16.93%	
2000	13395	595.58	6989	52.18%	6406	9.30%	620	1613	2207	4440	19.03%	
2001	16386	1295.89	8583	52.38%	7803	16.61%	1176	2200	2309	5685	17.68%	
2002	18904	2416.79	10389	54.96%	8515	28.38%	1623	2401	3328	7352	16.06%	
2003	21715	5421.31	11865	54.64%	9850	55.04%	1914	2598	3749	8261	16.60%	
2004	26396	6412.18	14503	54.94%	11893	53.91%	2605	3423	4380	10408	15.51%	
2005	31649	5883.82	16549	52.29%	15101	38.96%	3812	3529	4143	11484	16.00%	

表 13.1: 1993-2005 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及转移支付规模

来源: 周飞舟、谭飞智《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一直到2008年，每年中央转移支付总额都高于地方预算收支缺口，一般要高10%—20%。2009年“4万亿”财政金融刺激之后，地方可以通过发债来融资（县级则是建立起融资平台），收支缺口才开始大于中央转移支付（2015年新版预算法之后，省级政府才可以发债。但在2009年至2014年间，财政部可以代理省级政府发债）。^[106]

笔者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地方融资平台蜂起后，债务规模持续扩大至不受控后，中央和地方矛盾持续扩大，最终实际导致中央集权的衰退趋势。

四，继续重生产建设，轻民生消费

因中国财政以对企业征收间接税为主，不仅九成的税收征收自企业，税收之外的其他政府收入基本也都征收自企业，比如土地转让费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社保费中个人缴纳的比例也低于企业缴纳的比例。所以在分税制改革后的头些年，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向招商引资倾斜（如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补贴等），而民生支出（教育、医疗、环保等）相对不足。2002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求更加重视民生支出。由于第一章中讨论过的规模经济、信息复杂性等原因，民生支出基本都由地方政府承担，所以地方支出占比从2002年开始快速增长，从70%一直增长到了85%。^[106]

如果只是单纯要求重视民生支出、重义务、轻利益，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自然不会有强动力，必然有“软行为反抗”，结合土地金融等做文章。

这一点放在分税制中其实有些不妥。因为重投资建设、轻民生消费是中国自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双轨制以来一直实际坚持的路线和问题，持续至今，根据笔者对当前一些主流“专家”观点的考察，这一问题很可能还会持续加重，相关论述可见第15章“中国未来怎么走？”。

13.3 土地金融

13.3.1 海南房地产泡沫危机

1988年8月23日，海南脱离广东省独立建省，并在海南设立经济特区，成为当时中国最新、最大且是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成为全国各地淘金客们的狂

欢地。1989年到1993年间，商品房平均价格从1400元/平方米到7500元/平方米；商品房年销售面积从1000万平方米到9000多万平方米；房地产投资总额从3.2亿元到93亿元；土地价格从几十万元/亩到600万元/亩，

据太平洋证券数据，高峰时期，当时总人数不过656万的海岛上有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平均每300个人一家房地产公司。与此同时，大量金融机构进入，海南短时间内成立了20家信托投资公司，35个城市信用社，此外还有一批股份制、会员制的金融性公司；证券行业从1989年初建立海南省证券公司，到后来已发展为26个证券机构34个证券交易点。^①

海南房地产此时玩的已是“击鼓传花”的金融游戏，下海官员、批条、虚拟概念（方案和图纸）、信贷、炒楼花、炒地皮、炒项目，上一人传给下一人，死的是最后一个接盘侠。

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16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银根全面紧缩，一路高歌猛进的海南房地产热顿时被釜底抽薪。这场调控的遗产，是给占全国0.6%总人口的海南省留下了占全国10%的积压商品房。全省“烂尾楼”高达600多栋、1600多万平方米，闲置土地18834公顷，积压资金800亿元，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

当时在海南炒房的“万通六君子”之一的潘石屹自述当时在泡沫破裂前成功抽身的原因：

我到海口规划局查了一下我们的项目，是有（证件）的。我这个人特别好学习，除了看完自己的，我还要看看别的项目。

我记得数字（海口规划局统计的海口人均住房面积）是四十九平方米。当时北京的人均住房面积是七点四平方米，而海南刚刚建省，在海口这样一个不富裕的地方，电都没有，一个红绿灯都没有的地方，建房子要接近五十平方米，北京才七平方米多。

^① 沈奇杨政《刺破的泡沫—海南房地产往事》

这就是房地产泡沫啊，跑的越早越好。于是我就赶紧跑到北京来，做了第一个项目，在阜成门这边，万通新世界广场，赚了不少钱。海口的企业家，多少企业家，基本上全军覆没，出来的很少。

有好多人说，我们几个人，能够从海口这边逃着出来，能够从海南岛的 92、93 年房地产泡沫里逃着出来，非常聪明，很有远见。其实呢就是算数，就是建筑面积除一个人口数。就是常识。

不要把这些商业的东西搞的多神秘，一会儿佛了，一会儿道了，一会儿鬼了，一会儿神了，没有这么神秘的东西，就是要尊重常识。

多么聪明，举一反三的潘石屹啊！呵呵，你信么？反正笔者不信。

同期不止海南，北海、惠州、上海等地也出现了房地产热。当时朱镕基也在视察北海时就提醒过北海市政府。1999 年 1 月 8 日朱镕基在省部级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对这时期的房地产热总结到：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许多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集中反映在金融领域。仅从房地产看，1992 年、1993 年的房地产热，就造成银行不良贷款几千亿元。目前，全国闲置的商品房多达 7000 多万平方米，价值在 4000 亿元左右；光是海南省就闲置 1600 万平方米，占压银行资金 460 亿元。原来占用的那些贷款，连本带息，现在要翻一番。同时，建起来的房子质量差、价格高，地理位置也不好，很难处理掉。这些绝大部分已成为银行的呆账、坏账。

沈奇、杨政：

海南烂尾房消化到 2007 年才接近结束。据泽平宏观数据，截至 2006 年 10 月，全省累计处置闲置建设用地 23353.87 公顷，占闲置总量的 98.17%，处置积压商品房 444.82 万平方米，占积压总量的 97.6%。而海南省的房价到 2010 年才再一次回到 1993 年时的水平，海南经济的萧条周期近 20 年。

13.3.2 住房双轨制

1990 年 5 月 19 日国务院发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采用

协议、招标和拍卖三种方式。“这标志着中国的土地市场走上了有法可依的轨道，从而使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在全国推开。”

1992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进一步深化土地所有制改革，继续深化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的发展在1992、1993年迎来了第一个高潮。1992、1993年商品房销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79.35%和102.47%；1993年固定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始终保持在60%左右。

1993年6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国16条”，即整顿金融秩序、加强宏观调控的16条政策措施。这是国家第一次宏观调控过热房地产。其中包含要严控涉房信贷，坚决制止炒房地产获取暴利的行为，房地产开发投资必须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等。海南等房地产击鼓传花游戏走到尽头，泡沫破灭。

经历初步探索之后，住房制度改革的市场化特征显现，逐渐形成以权力下放、培育市场主体为特征的改革。199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按照国家、企业和个人合理负担的原则进行住房体制改革，将公房实物分配改为货币工资分配，建立面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性住房和面对高收入家庭的商品房，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至此，开始全面市场化的改革。^[110]

1994年这份《决定》并没有有效刺激房地产市场，当时东北国企已开始出现实质性下岗，全国主流仍是福利分房，毕竟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工作人员可以福利分房的话有多少人会去市场买房呢？房地产市场尚不具备较大投资和金融价值。

据谢家谨《房地产这10年》回忆，

1996年7月11日，朱镕基在听取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汇报时指出：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很好，是1993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但问题是国有企业亏损增加，经济效益下降；原因是结构不合理，企业生产的产品不适销对路；解决的途径是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调整产品结构，减少库存积压。关键是打开市场，搞活流通，培植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当前最有可能形成消费热点的是房地产……一要推进住房商品化，二要有个好的规划。

1997年初中央决定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同年1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提到“前些年出现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造成大量不良信贷资产，其中大部分已成为呆账、坏账，无法收回”。

13.3.3 新的增长点——住房市场化和资本化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已开始影响我国,1998年累计下岗近3000万人导致消费低迷,初级产品出口出现负增长,形势严峻,财政货币紧缩尚未实施多少时日,便转为宽松,此后财政货币政策时常在一两年、甚至两三个月内经历从开始紧缩到重返放宽的过程。

1998年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说到:

我们必须确保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国内的需求……拿出较多的财力来刺激国内需求。这个需求就是加强铁路、公路、农田水利、市政、环保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建设,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当然还有住房建设,因为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第三是住房制度改革。住房的建设将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但是我们必须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整个房改方案已酝酿三年多。我们准备今年下半年出台新的政策,**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一律改为商品化**。

1998年5月,《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发布。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正式宣布**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停止福利分房),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

据1998年3月任职财政部部长的项怀城回忆,其上任时原定**5年内消化470亿元财政赤字的财政紧缩预想**被打乱。同年8月份,财政部执行1997年3月1日人大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发行期限为**30年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不计入赤字)**,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定向发行,所筹资金专项用于补充四大银行资本金,以达到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挽救了濒临技术性破产的国有四大行。此外财政部又增发**1000亿元10年期长期建设国债**(其中500亿元计入中央财政支出;另外500亿元算作中央替地方发债,转拨地方,**地方这500亿元不计入赤字**。),银行又据此再发**1000亿元**

贷款。根据项怀城主编的《中国财政通史》，“1998-2004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9100亿元**”。

原本1997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规定“农地转为非建设用地的土地收益，全部上缴中央”。经过一年多中央和地方博弈，被1998年8月29日修订通过，1999年1月1日起实施的《土地管理法》“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30%上缴中央财政，70%留给地方人民政府”所取代。中央希望通过土地收益方案的调整，来加强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工作，但在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下未能实现。^[111]

另外，《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农业用地如想转为建设用地，需经过征地环节，只有变成国有土地后才能上市转让，这也就确立了政府对于建设用地的垄断地位。

13.3.4 土地招拍挂

据王永红：

有媒体透露，1987年至1999年，深圳市利用拍卖和招标两种方式一共卖出了80多宗地，面积基本上都在1万平方米左右。而每年协议出让面积是100多万平方米。两者相差甚远。1995年、1996年还一度终止了土地拍卖。1997年连一次招标或拍卖都没有举行。1998年深圳市土地出让金达108亿元，但这一年仅有的两次招标和两次拍卖，一共只有3.3亿元。1999年之前，深圳90%的土地实行的是非市场价格的协议出让。

协议出让意味着存在很强的人为操纵的可能性。让行政权力从富有诱惑力的利益空间中退出，发挥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需要很大的勇气，但能带来**巨额的回报**。1999年，浙江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实行**经营性用地一律招标拍卖制度**。2000年，全国土地招标拍卖收益为350亿元，而浙江一个省就达195亿元。

基层的首创精神，在2001年国务院15号文件（即《关于加强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和2002年国土资源部11号令（即《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中受到了高度重视。国务院15号文件提出，从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严格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大力推行**招标拍卖**，加强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加强地价管理和规范土地审批行为。国土资源部11号令则**对经营性**

土地协议出让“叫停”，明确四类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必须采用招拍挂方式。这两个文件对土地市场建设的推进作用显而易见：2000年全国招标采购出让土地的收益为350亿元，2001年为492亿元，增长率为40%。2002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采购挂牌出让的宗数、面积、价款分别是上年的108.55%、273.8%和197%。

招拍挂可让土地的市场化、资本化价值大幅上升，但当时地方政府为招商工业项目；房地产商为成本和利润率仍倾向于低价的协议拿地；招拍挂需更加庞大资金；另外协议出让拥有的较大权力寻租空间，这一系列问题导致出让土地面积和收入，仍以协议出让为主。

国土资源部15号文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9日，要求7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就抢于6月28日发文《关于停止经营性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有关规定的通知》（京政办发[2002]33号），开了几个允许**协议转让**的口子，如“绿化隔离带项目、小城镇建设项目、危旧房改造项目以及其它重大建设项目中的经营性项目用地”“属于规划为高科技、工业用途的经营性项目用地确需协议出让的”，被称为“四个口子”。

2004年3月31日，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发出《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采购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土地出让的所有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在2004年8月31日前界定并处理完毕。8月31日后，**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采用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业内称之为“8·31大限”。国土资源部为此多次召开座谈会和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部署。也就是2004年9月1日以后，土地使用权招标采购挂牌制度（简称土地招拍挂制度）得以在全国建立。

既然中央强令、意志坚决，而招拍挂确实可让地方政府获得更多土地转让收入，那地方何乐而不为呢？

地方政府原来主要是低价或零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以吸引外来投资、刺激经济发展、扩大GDP考核指标；自招拍挂制度建立后向低价征地、高价出让住宅、商业用地发展，以赚取高额利差。“**从此开发商（消费者）之间为买地而展开竞争，政府（生产者）坐享生产者剩余。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资本来源**”^[94]。

招拍挂和协议出让历年比例变化请见表13.2。

王永红《攀登新的高度——我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30年历程》：

年份	出让土地面积比重				出让收入比重			
	协议	招标	拍卖	挂牌	协议	招标	拍卖	挂牌
2002	0.84	0.03	0.10	0.02	-	-	-	-
2003	0.72	0.03	0.05	0.19	0.43	0.12	0.16	0.29
2004	0.71	0.02	0.05	0.21	0.45	0.08	0.15	0.33
2005	0.65	0.03	0.06	0.26	0.29	0.08	0.16	0.48
2006	0.69	0.01	0.05	0.24	0.28	0.04	0.16	0.52
2007	0.50	0.01	0.06	0.43	0.18	0.04	0.21	0.58
2008	0.16	0.02	0.06	0.76	0.07	0.05	0.13	0.74

表 13.2: 不同土地出让方式出让土地面积、收入的构成

来源: 李郁、洪国志、黄亮雄《中国土地财政增长之谜》

一些地方为招商引资, 工业用地出让中长期存在着**低地价乃至“零地价”**行为, 严重干扰了土地市场秩序, 为一些地方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条件。其获取土地的方式必须加以改革。国务院 15 号文件已经提出: 除按现行规定必须实行招拍挂的土地外, 工业用地也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招拍挂出让。这个规定是**工业用地进入招拍挂**的一个信号。

2004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即国务院 28 号文件), 有针对性地指出: “必须严禁非法压低地价招商”, 同时要求要加快探索和实践, 加快工业用地进入市场化配置。2006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即国务院 31 号文件), 则完全把工业用地纳入了市场竞争的范围, 要求“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 其出让价格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价标准”。

2006 年 12 月 27 日, 国土资源部发布《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 并将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此举标志着, **我国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 其出让底价和成交价格均不得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的最低价标准。

工业和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出让, 由国家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2007 年 3 月 16 日颁布的《物权法》明确规定: “工业、商业、旅

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

全国就此实行了普遍招拍挂制度。

13.3.5 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采用累进税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土地级差地租和增值收益……国家征收土地增值税，主要目的是为调节房地产开发市场的秩序，抑制房地产开发、转让的暴利行为。因此，这一税种的征收，最主要受到影响的还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别是开发别墅、公寓、写字楼等高档项目的开发商，以及炒卖楼花的个人买卖行为。^[64]

土地增值税在 1994 年分税制后属于地方政府收入，但一直征收不利。国家税务总局自 2005 年至 2010 年，曾经 8 次发文，对土地增值税的预征和清算提出要求，各地进展甚微。包括房地产上市公司在内，地产商一般是以 1% 的预征率来进行土地增值税的计提，远远低于实际清算的税率。地产商出现拖欠、不清算、不缴纳土地增值税、甚至开发楼盘收回资金后注销公司等现象。地方政府碍于地产商提供的大额土地转让金及其他财政贡献，往往对占小头的土地增值税消极作为。而中国财政金融压力甚或危机有时也使严格清算土地增值税政策半途夭折。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荆宝洁曾获得一份未公开的政协提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国政协委员在这份提案中说，根据计算，2005 年到 2009 年土地增值税共流失 2.52 万亿元。

对土地增值税的严格预征和清算，不足以让地方政府放弃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原因仍然是土地收入太过巨大，其他收入无可替代。不过，中央政府愿意为地方政府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地方政府当然会笑纳。^[112]

13.3.6 地产商阶层对金融监管的胜利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2003 年 6 月 6 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03〕121 号）：

通知规定：

商业银行严禁以房地产开发流动资金贷款及其他形式贷款科目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并要求企业自有资金不低于开发项目总投资的30%；对土地储备机构发放抵押贷款，贷款额度不得超过所收购土地评估价值的70%，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年；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的项目，不得发放任何形式的贷款；商业银行发放的房地产贷款，严禁跨地区使用；商业银行不得发放用于缴交土地出让金的贷款。

商业银行只能对购买主体结构已封顶住房的个人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对借款人申请个人住房贷款购买第一套自住住房的，首付比例仍执行20%的规定；“对购买第二套以上（含第二套）住房的，应适当提高首付款比例”；“个人商业用房贷款的抵借比不得超过60%，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0年，并且所购商业用房为竣工验收的房屋”。

时任金融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的戴根有被认为是起草人行121号文件的关键人物。据他自述他在2001年就注意到房地产市场一些局部问题，2002年向人行领导汇报“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长明显高于销售的增长，第二是商品房空置面积明显增长，而且增长幅度非常高。因而给出了“部分地区房地产出现过热”的判断意见。”2002年4季度抽查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情况发现，房地产信贷违规金额接近1/4。^①

121号文件受到很多大房地产商的声讨和行动抵制^②。两个多月后《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出台，提到“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发展住房信贷”“建设部要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具体实施并负责对本通知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地产商冯仑就此说到“商人的声音首次大过了政府的声音”，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是“地产商阶层的胜利”。10月份，戴根有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

2005年8月15日，央行金融市场司房地产金融分析小组在发布的《2004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中提出，“很多市场风险和交易问题都源于商品房新房的

① 21世纪新闻报道，121文件内幕戴根有回应：谁说121与18矛盾？

② <https://news.sina.com.cn/c/2003-09-16/14051753586.shtml>

预售制度，目前经营良好的房地产商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力，可以考虑**取消现行的房屋预售制度，改期房销售为现房销售**”。

房地产商们多以现房销售将引起房价上涨为理由反对现房销售。笔者认为，真实原因显而易见，资本只有自我增殖这一本质目的，现房销售将引起房地产大幅降杠杆，利润率缩水严重，资金流也随之匮乏干涸，金融属性大幅削弱才是真正原因，房价上涨是这一真正原因的副作用而已。何况房市金融投资属性降低之下，房价未必会上涨。

袁一泓^[112]写到：

2005年8月24日，**建设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商品房预售制度**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确立的一项制度。从十多年的实践看，这一制度与我国国情是适应的，目前还不能取消。

地产商们又赢了。

这第二次，地产商阶层从开始作战到胜利只花了9日。

据21世纪新闻报道^①，

国家审计署2007年第86号《上海市社保基金运营及管理情况专项审计》报告所披露的社保基金整体状况远比此前所暴露的福禧个案更为触目惊心：“多年来，上海市社保局共计运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小城镇保险等8个险种的社保资金，金额共计达329.44亿，截至2006年7月17日，尚未收回的资金达255.41亿，占运营资金余额387.31亿元的66%。”

根据报告，这些违规运营的社保资金大量投向了和国家宏观政策导向不符的产业领域——比如房地产业。

“截至2006年7月17日，对**44家房地产企业贷款余额201.25亿**，**社保资金甚至给不法商人和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

养老金个人账户依照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应是实收账户——账钱相符、账人相符、账账相符，但历年来被一些地方政府挪用至养老金统筹账户，甚至搞金融投资、基建和房地产，具体数字不可考。其后二十年，国务院数次要求坐实养老金个人账户，但最终未见实效。2000年代末可能不少地区已直接转为名义账户——只记帐面数字，不做实，没有真实资金。

^① <https://news.cctv.com/financial/20080326/100431.shtml>

首先,名义账户制度下个人的养老金待遇完全由个人缴费水平决定,因此失去了在参保者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互助共济性与公平性。

其次,名义账户制度下由于缴费率确定不变,养老金水平下降之势几乎不可逆转。

再次,由于名义账户制下影响记账利率的因素是多元的,养老金增长率的波动性增大,结果必然削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稳定安全预期。^[113]

2006年在国内房价高启、地产行业景气上升的大背景下,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超过了A股市场的平均水平。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27.48亿元,净利润83.36亿元;同比增长接近30%和60%。^①

2007年全国共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额25280亿元,增长30%,增速上升7.4个百分点,高于其他行业的投资增速;占城镇总投资比重高达21.5%……吸引了大量信贷资金进入,房地产业利用国内贷款规模达到6961亿元,增长32.3%。07年虽是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力度最大的一年,但外资并未放缓进入中国的步伐,全年房地产开发利用外资高达650亿元,增长65%,增速加快8.24个百分点。预收款大幅增长31%。2007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分别为76193万平方米、29604亿元,分别增长25.7%、44.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分别为69104万平方米、25323亿元,分别增长27%、48.6%。一线城市房价涨幅尤为巨大,07年12月份,深圳住宅价格同比涨幅为51%,北京45%,广州达到了30%,津、渝、沪三地的同比涨幅也都超过了15%。**各地地王频出。一些大房地产商盲目乐观,大举借贷。**

美国次贷危机显现,加之国内房地产过热,销售不畅,信贷规模过大,央行数次加息后于2007年9月27日联合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银发〔2007〕359号),被称为“927房贷新政”,**严格房地产相关信贷管理。**房地产走向低谷,房地产商资金链紧张。

13.3.7 四万亿元投资刺激

2007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双防”,即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

^① 据水清木华研究中心《2006-2007中国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研究报告》

控的首要任务。与此对应，中国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而稳健的货币政策则转向较为严厉的**从紧的货币政策**。

据袁一泓回忆，就连大房地产商潘石屹都对房地产未来持悲观态度，当时应在坐等抄底收购：

2008年八九月，凭经验觉得买地时机到了，我（袁一泓）两次向潘石屹建议去买两块地，我知道他手里握着一大笔现金，但他不为所动。后来我才明白，老潘那时是在**等待收购可能面临清盘的地产商的优良项目，譬如绿城**。当然，潘石屹失望了。土地的底没抄成，目标地产商全都好好活下来了。^[112]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出口下滑、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在2008年下半年更改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8年10月2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37号），“一、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二、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三、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地方债的爆发始于2008—2009年。为应对从美国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我国当时迅速出台“**4万亿**”计划：中央政府投资**1.18万亿元**（包括汶川地震重建的财政拨款），地方政府投资**2.82万亿元**。为配合政策落地、帮助地方政府融资，中央也放宽了对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信贷的限制。2008年，全国共有融资平台公司3000余家，2009年激增至8000余家，其中**六成左右是县一级政府融资平台**。快速猛烈的经济刺激，对提振急速恶化的经济很有必要，但大水漫灌的结果必然是泥沙俱下。财政状况不佳的地方也能大量借钱，盈利前景堪忧的项目也能大量融资。短短三五年，地方政府就积累了天量债务。直到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债务依然没有完全化解，还存在不小的风险。^[106]

地方政府负债余额则从1万多亿元增加到6万亿元（也有人说是5万多亿元，还有人估计是11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地方政府的深度介入众所周知，各类融资平台公司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负债就是政府负债。^[64]

重点投向	资金测算
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	约 4000 亿元
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	约 3700 亿元
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	约 15000 亿元
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	约 1500 亿元
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	约 2100 亿元
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	约 3700 亿元
灾后恢复重建	约 10000 亿元

表 13.3: 2008 年四季度到 2010 年底, 4 万亿元投资的重点投向和资金测算

来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

起初 4 万亿的预计投向见表 13.3。

2008 年 12 月 20 日,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标志着房地产全面“救市”的开始。加大对廉租房、棚户区改造等投资支持力度, 加大对自住型和改善型住房消费的信贷支持力度等。

实际上, 4 万亿投资刺激没有向预期方向流动:

2010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全国“两会”期间说, 4 万亿中央投资, 没有一分钱进入房地产市场或是用于土地买卖, 但包括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 其中有 1/4 资金通过各种途径潜入了楼市。^[112]

(居民消费和内需) 没有办法拉动, 只好存银行, 银行贷款里面给了谁? 我们知道, 2009 年 4 万亿投资是主要给了国企, 而且主要是央企, 10 万亿贷款主要给了谁呢? 还是国企, 是央企, 以至于我们有些我们的央企, 感觉负担很重, 他拿到这么多钱怎么办呢? 结果纷纷成立房地产公司, 就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体制问题上, 在体制问题上, 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 他获取要素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要素最重要的就是资本要素。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资本市场很不正常, 不是一个建立在规则上的一个真正市场, 因此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根本的出路是改革。^①

据范剑勇^[114]:

① 吴敬琏《国企拿到 4 万亿不知怎么办都去投了房地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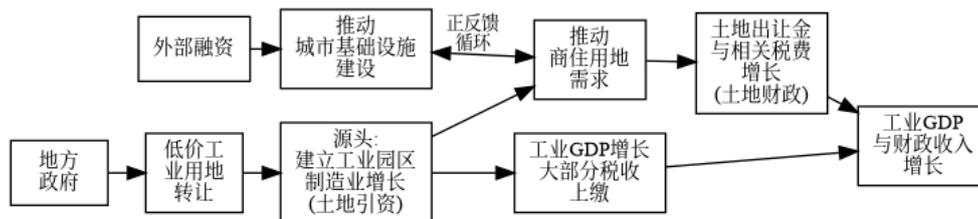


图 13.1: 2008 年以前工业增长、土地财政与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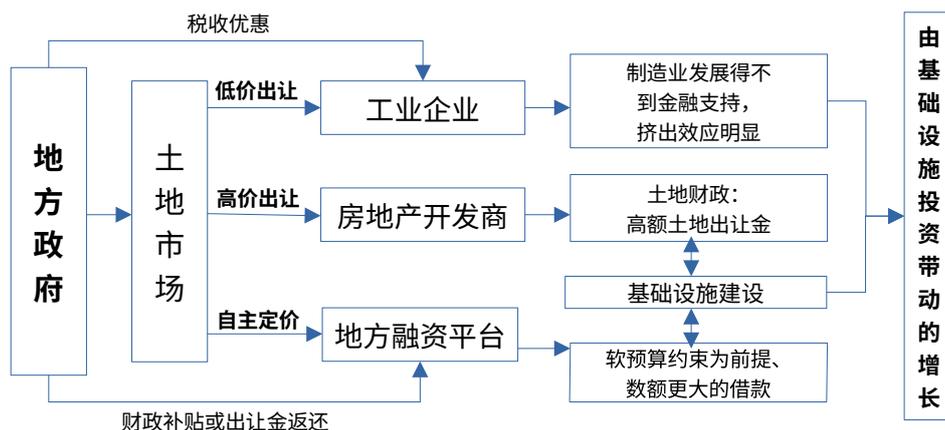


图 13.2: 2008 年后软预算约束与地区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范剑勇 《四万亿如何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

2008 年之前,中国是硬预算约束条件的土地财政模式(见图 13.1),而 2008 年之后,是软预算约束条件下的土地金融模式(见图 13.2)。2008 年之前,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制造业+房地产”两个轮子一起转,2008 年之后是偏向以基础设施为主的单轮驱动。

详细论述可见范原文,不再赘引。4 万亿之后的土地金融历史,就本书所占角度来说,似乎未发生明显本质转变,也不再赘述。

13.3.8 土地置换制度

本小节大量照摘周飞舟和谭飞智所著《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推进速度越来越快,大量耕地农用地被占用是土地财政^①发展的必然要求。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各地土地财政带来大拆大建,形成规模不小的失地农民群体,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自中央层面来看,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维持改革

① “土地财政”四字为笔者所加。

以来确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营组织方式的要求，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占补平衡为代表的系列政策应运而生，**18 亿亩耕地红线**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贯穿而下，实行一把手问责制。

耕地占补平衡

1997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11 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明确提出省（区市）必须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要求，同时确定了实行**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①挂钩的政策，首次明确提出“耕地占补平衡”的概念。

随后在 1998 年 8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再次修订，明确提出“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要求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耕地相平衡。

1999 年 2 月 4 日，《关于切实做好耕地占补平衡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1999〕39 号）要求确保建设占地“**占一补一**”，逐步实现耕地占用的**先补后占、占优补优、不补不占**。自此，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开始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实施。

2006 年以前，占补平衡考核采取的是“**算大帐**”的方法——**以区域为单位进行**，考核区域内的总占补平衡。这种方法存在的漏洞是，很多建设用地项目并没有实现法律所规定的占补平衡，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项目单位的补充耕地与土地开发整理脱钩。同时，由于区域内的占补平衡考核仅仅关注于数量，一些建设项目**占优补劣**的现象比较突出。

2006 年 6 月 8 日，国土资源部第 3 次部务会议通过了《耕地占补平衡考核办法》，于当年 8 月 1 日起施行。“耕地占补平衡考核，**以建设用地项目为单位进行**”“耕地占补平衡，实行占用耕地的**建设用地项目与补充耕地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挂钩制度**。”不再采取大锅饭式的算大账。这一管理思路，为后来的增减挂钩所延续，即采用“**封闭运行**”的项目制运作模式，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大势所趋，“**保耕地红线**”成为地方政府沉重的**政治负担和资金负担**。耕地占补平衡政策自出台以来，在各地具体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耕地的“**实占虚补**”；补充耕地的“**实优虚劣**”以及**农地非农化和非粮化**的风险。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实行以来，各地实际工作中建设占用耕地长期以“**先占后补**”和“**边占边补**”方式为主，加上对补充耕地的监督力度不够，导致建设占用耕地**占而不补、占多补少**的问题经常发生。国土资源部因此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工作的通知》，规定从 2009 年开始，除国家重大工程可以暂缓外，非农占用耕地全面实行“**先补后占**”。

① 土地复垦是指对生产建设活动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达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

从地方政府角度出发，其更多的是从如何提高土地生产效益的角度出发的，因此如果单纯地维持原有以粮食为主的种植结构难以达到提高效益的目的，转变生产结构成为必然的选择，农地非农化、非粮化在所难免。所谓粮食安全的担忧也并非地方所考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凸显。

由于耕地的开垦整理需要一定的工程周期，因而由“先占后补”到“先补后占”的转变，开启了**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化**的进程，各地纷纷建立**占补平衡指标储备库**。提前储备补充耕地，需新增建设用地时再从库中支取“指标”。

土地置换与指标折抵

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的五级规划与年度建设占用耕地计划指标等限制了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新增建设用地、发展土地金融的强烈渴求，与中央严格土地制度框架出现较尖锐矛盾，违法占地屡禁不止，中央政府为此开了以**农用地整理换取新增建设用地的“口子”**。

1999年10月，《国土资源部关于土地开发整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1999〕358号）提出土地置换和指标折抵。

土地置换 促进农村居民点向中心村和集镇集中、乡镇企业向工业小区集中，选定新址**建设需要占用其他耕地时**，可以与腾出来的旧址整理后增加的耕地进行置换，实行这种方式置换的其建设用地**不占用年度建设占用耕地计划指标**。

百分之六十指标折抵 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地区，可以用通过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指标**，向上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一定数量的**预留建设占用耕地指标**，用于本地区必需的非农建设。但必须按规划用地，并要严格检查，适当控制。

这两项政策“指标的使用并不占用当年的年度建设用地指标，因而受到各地方政府的欢迎……也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出台的前奏”。

但地方政府仍感受到发展建设用地限制较大：发达地区可供补充耕地量匮乏，不能满足新增建设用地需求；一般为10–15年的土地规划无法更好预见未来发展，不可占用基本农田^①使大块建设用地项目难以落地。于是一些省开始省内跨区域操作，实现了较为系统性变通的是浙江省，一些人称之为“浙江模式”。

^① 基本农田：为了切实保护耕地，国家把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以及对建设用地的预测而确定的长期或一定时期内不得占用的耕地称为基本农田。

简而言之就是浙江省将一些指标统筹在省或市以内，不下沉分解至县乡级；并且各市之间可以交易指标，落后地区大量土地整理用以补充耕地，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购买耕地指标专心发展建设用地。（详细了解可见汪晖、陶然《论土地发展权转移与交易的“浙江模式”——制度起源，操作模式及其重要含义》。）

对浙江在土地发展权转移和交易上的改革探索，不仅学界有论述质疑浙江的做法是**规避中央政府基本农田审批权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导致基本农田质量下降和建设用地总量失控**（谭峻等，2004年），中央政府也存在不少担心。

欠发达地区为了折抵指标从而过度投资土地整理，甚至在新增耕地比例上弄虚作假，或发达地区通过购买折抵指标无限制扩张城市和工业园区用地。

浙江省基本农田集中置换和易地代保政策^①在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采取措施落实严格保护耕地制度的通知》（国土资发〔2003〕388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04〕20号）公布后停止执行；折抵指标政策也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7〕71号）颁布后停止执行。^[115]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2004年10月2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

（4年陆续增加试点后，）2008年6月27日，国土资源部印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若干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以下简称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节约**

^① 即基本农田易地代保：简而言之，发达市县有偿购买落后市县的基本农田，以便消除本市县相应面积、质量的基本农田保护，新增大块连续建设用地。

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其实仔细比较增减挂钩政策与之前我们所分析的建设用地指标置换政策其在表述上和本质上相类似，而这也反映了中国改革中政策制定的延续性和探索性。

同时 138 号文批复下达了第二批试点项目（共 10246 公顷，合 15.368 万亩），项目区以项目区备选方式下达。2009 年 3 月 5 日，《国土资源部关于 2009 年第一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相挂钩周转指标的批复》（国土资函〔2009〕299 号），对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宁夏 13 省（区），批复下达周转指标 15.275 万亩（合 10183.3 公顷）。2013 年 10 月 23 日下午，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土地总督察姜大明主持召开第 15 次部长办公会，审议并原则通过 2013 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分解下达方案，共批准 29 个省份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全国共安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 90 万亩。^[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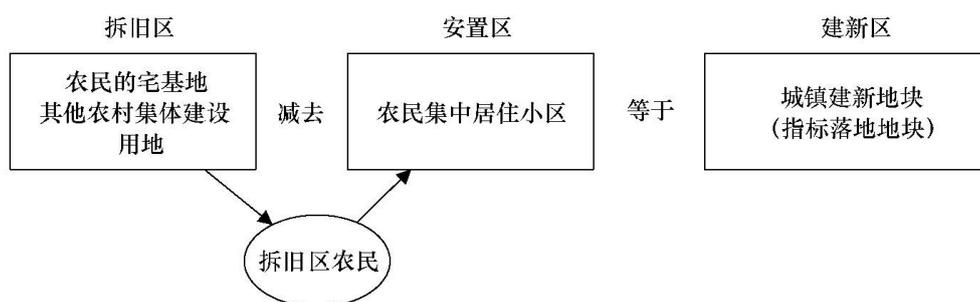


图 13.3: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示意图

周飞舟、谭飞智 《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指标计算公式：增减挂钩周转指标 = 拆旧区总面积 - 农民集中居住小区占地面积 = 项目区中建新地块可占地面积（见图 13.3）。所谓“周转指标”其在实质上是一种指标“预借”或“透支”制度。拆旧复垦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短期内难以完成，因此不需要拆旧区完成耕地复垦工作之后，建新区才能够进行城镇开发建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了指标“周转”的概念，一般要求，指标三年归还。

增减挂钩的根本意义在于：开辟了一个独立于每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严控体系以外的指标来源，为城镇发展提供“不占指标”的“计划外”土地资源，且规模逐年增加。^[64]

截至 2013 年底, 全国共有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被纳入了试点范围, 共下达周转指标约 90 万亩。

2017 年 4 月, 增减挂钩再出新政, 在《关于进一步运用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中, 明确允许**省级贫困县的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 进一步释放了政策红利。为了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2018 年 3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 规范了“三区三州”及其他深度贫困县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 助力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绿色发展的战略。至此, 增减挂钩先后两次完成政策升级, 从省域内流转到跨省调剂, 逐步拓展政策适用范围。这一阶段增减挂钩政策更加强调以人为本, 致力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116]

据《央地关系》, 不管是政策实质还是地方需求, 对新增耕地并无多少刺激, 只是满足“占补平衡”即可。如图 13.3, 为获得更多新增建设用地, 地方倾向于减少农民集中居住小区占地面积, 显而易见的方法是“农民上楼”——楼房可以在单位占地面积提供更大容积率、容纳更多被增减挂钩析出的农民; 并进一步采用合村并居等方法, 以便最大化减少成本、扩大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中央中央政府面临对地方监管失控的风险。一方面土地金融下, 地方为 GDP 考核机制不满足于中央给定的增减挂钩指标, 为获得更多新增建设用地或直接将用地指标出售给其他地方, 对大量村庄违规改造; 另一方面中央为维持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及活力, 又不得不逐年扩大试点范围和规模。

增减挂钩以项目制方式向下推进, 中央资金以项目形式向下转移, 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要有相应的配套资金和政策支持, **地方政府继续高额举债以及引入社会资本成为必然**。债务压力迫使地方忽视了反哺农业、农村、农民, 仍倾向于以建设养建设; 可同时进行的拆旧和建新在极端情况下也会停滞或缓慢发展, 造成各种不安定因素积累发酵; 地方也面临和社会资本的博弈; 合村也带来更多政治管理矛盾。

起初农村拆迁矛盾多因行政强制指令下补偿不足, 农地价征收城低价出售, 城乡二元对立有所加重, 有损村民利益。随着政府日益重视农民权益问题, 拆迁补偿已有较大实质性改观。但随着市场经济边沁利己的日益深入人心, 土地金融的日益发展, 使土地成为全民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虚假繁荣市场, 增减挂钩成本日益提高, 越发加重了风险。

土地金融造成地方各自为政, 热衷于地方产业结构高大全, 重复投资建设, 高负债率, 新增建设用地、合村并居, 耕地质量下降等问题。

第十四章 再论土地金融及个别经济概念

近 30 年来，土地金融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全国全民，并且下一步改革重点似乎还会是土地，土地已和国运紧密相联。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前文基础上，再做总结和展望。

14.1 王小鲁《土地财政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关于土地金融的总结，笔者尚未见到比王小鲁论述更为直接和深刻的文章，本节除特殊说明，完全引用王小鲁《土地财政的昨天、今天和明天》^[117]。相关历史事件可见本书 12.10 节、13.3 节。

全国土地财政格局迎来了一个大转折。2022 年上半年，全国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2.36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大幅度下降 31%。要判断其原因和未来趋势，需要对土地财政的来龙去脉做一个清晰的梳理。

一、昨天：土地财政从何而来？

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土地不是商品，需要的建设用地由政府从农民手里征用，并进行**无偿划拨**。

上世纪 80 年代，少数城市开始尝试**土地有偿出让**和**住房商品化改革**，1990 和 1992 年国务院分别发布了土地出让的暂行条例和暂行管理办法，1993—1994 年开始推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土地和住房才开始成为商品。

但土地交易从一开始并没有按市场原则来设计。地源仍来自政府征收农民的土地，只给很少的补偿（起初按被征土地农作物年产值的三到六倍计算补偿，后有增加，但多数情况下仍然**严重违背等价交换原则**）。

政府征收的土地进行初步开发后、通过**协议方式**（后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业用地改为“**招拍挂**”方式）有偿出让，**地方政府是唯一的建设用地垄断供应者**。扣除征地补偿和拆迁费用后的土地收入、全部归政府所有。

年份	GDP		土地出让收入				财政收入		
	当年价格	较上年 增长	收入	较上年 增长	占比 GDP	占比地方 财政收入	全国	中央	地方
1988	15180	15180	4.16	24.69%	0.03%	0.26%	2357	775	1582
1989	17180	13.17%	4.47	7.45%	0.03%	0.24%	2665	823	1842
1990	18873	9.86%	10.52	135.35%	0.06%	0.54%	2937	992	1945
1991	22006	16.60%	11.37	8.08%	0.05%	0.51%	3149	938	2211
1992	27195	23.58%	525	4517.41%	1.93%	20.97%	3483	980	2504
1993	35673	31.18%	558	6.25%	1.56%	16.45%	4349	958	3391
1994	48638	36.34%	639	14.56%	1.31%	27.64%	5218	2907	2312
1995	61340	26.12%	388	-39.33%	0.63%	12.99%	6242	3257	2986
1996	71814	17.07%	349	-9.96%	0.49%	9.32%	7408	3661	3747
1997	79715	11.00%	462	32.37%	0.58%	10.44%	8651	4227	4424
1998	85196	6.88%	508	9.87%	0.60%	10.19%	9876	4892	4984
1999	90564	6.30%	514	1.31%	0.57%	9.19%	11444	5849	5595
2000	100280	10.73%	596	15.80%	0.59%	9.30%	13395	6989	6406
2001	110863	10.55%	1296	117.58%	1.17%	16.61%	16386	8583	7803
2002	121717	9.79%	2417	86.50%	1.99%	28.38%	18904	10389	8515
2003	137422	12.90%	5421	124.32%	3.95%	55.04%	21715	11865	9850
2004	161840	17.77%	6412	18.28%	3.96%	53.91%	26396	14503	11893
2005	187319	15.74%	5884	-8.24%	3.14%	38.96%	31649	16549	15101
2006	219439	17.15%	8078	37.29%	3.68%	44.13%	38760	20457	18304
2007	270092	23.08%	12217	51.24%	4.52%	51.83%	51322	27749	23573
2008	319245	18.20%	10260	-16.02%	3.21%	35.81%	61330	32681	28650
2009	348518	9.17%	17180	67.45%	4.93%	52.69%	68518	35916	32603
2010	412119	18.25%	27464	59.87%	6.66%	67.62%	83102	42488	40613
2011	487940	18.40%	32126	16.97%	6.58%	61.14%	103874	51327	52547
2012	538580	10.38%	28042	-12.71%	5.21%	45.91%	117254	56175	61078
2013	592963	10.10%	43745	56.00%	7.38%	63.39%	129210	60198	69011
2014	643563	8.53%	34377	-21.41%	5.34%	45.31%	140370	64493	75877
2015	688858	7.04%	31221	-9.18%	4.53%	37.61%	152269	69267	83002
2016	746395	8.35%	36462	16.79%	4.89%	41.79%	159605	72366	87239
2017	832036	11.47%	51984	42.57%	6.25%	56.83%	172593	81123	91469
2018	919281	10.49%	65096	25.22%	7.08%	66.49%	183360	85456	97903
2019	986515	7.31%	72581	11.50%	7.36%	71.81%	190390	89309	101081
2020	1015986	2.99%	84142	15.93%	8.28%	84.02%	182914	82771	100143
2021	1143670	12.57%	87051	3.46%	7.61%	78.36%	202555	91470	111084

表 14.1: 1988–2021 财政及土地出让收入 (单位: 亿元)

财政收入中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

土地出让收入数据, 1988-1998 来源于张清勇, 1999-2017 来源于《国家土地统计年鉴》, 2018-2021 来源于财政部。其余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按照早期的设计，住房改革实行**双轨并行**的体制，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保障性住房**，为高收入居民提供**商品住房**。但在实行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利益导向使商品房比重越来越大，保障性住房受到挤压。2000年以后，**商品房用地**的收入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从此开始了土地财政时期。

土地财政体制的形成有某种必然性。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资源集中控制在政府手中，企业没有活力，居民收入被压低且增长缓慢。改革之初，为改变这种僵死局面，政府实行了**大规模的放权让利和其他市场化改革**。此后，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增长加速、而全口径政府收入（起初包括**财政预算收入和政府预算外资金收入**，后加入**土地出让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0.2%**直线下降到1995年的**15.9%**（据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数据计算）。在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政府财政困难。为缓解政府财政资金不足，**土地出让收入自然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一个补充来源**。

所罗门的魔瓶一旦打开，就很难让其回到瓶子里了。**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土地收入越来越大，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1998年，全国国有土地出让成交价款约500亿元，相当于当年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10%。此后土地出让收入以不可抑制的高速度膨胀——2001年1300亿元，接近地方财政收入的17%；2011年3.3万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63%；2021年8.7万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78%（均不包括在地方财政预算内）。（具体数据可见笔者整理的表14.1“1988–2021 财政及土地出让收入（单位：亿元）”）

多年来，它已成为地方政府不可缺少的巨大财源。

从2001到2021这20年，现价GDP年均增长12.4%，现价全国财政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3.4%，而土地出让收入年均增长23.4%，远超过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计算）。

计算平均地价，2001年每公顷土地出让收入143万元，2011年为978万元，2021年为2393万元。**20年间地价上涨15.7倍**。

同期消费价格指数（CPI）只上涨58%，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只上涨38%（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计算）。

过高的地价大幅度推高了房价，并改变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由于不包括地价和房价，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不足以反映真实的通货膨胀率。

而地价和房价飞速上涨，是几方面影响因素合成的结果。

从供给侧来说，一个正常因素是**城市规模经济的溢出效应带来的城市用地和城市周边待开发土地升值**。

从需求侧而言，**城市化快速发展造成的房地产需求上升，而土地资源相对有限，持续拉动了房价和地价上涨。**

第三个因素的作用可能更加突出，即长期以来**货币增长大幅度快于经济增长，货币超发造成的多余购买力大量流向房地产，造成越买越涨、越涨越买的趋势，成了长期不破的资产泡沫。**

第四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地方政府**的作用。对地方政府来说，**土地出让收入来得容易，用得方便，监管不严，透明度低**，一方面可以用来搞各种地方政府想搞但没有其他资金来源的投资项目，既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建设，也包括政府楼堂馆所等各种自我服务设施，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党政机关行政管理费用。**

更严重的是，在**政府垄断地源**的情况下，大量的**官商勾结腐败案件都与土地和房地产交易有关，给腐败官员带来了巨额收入，造就了一大批隐性富豪**——在种种利益驱动之下，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独占地位，通过控制土地投放量，借“招拍挂”尽量抬高地价，以获得最大收益。这也导致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所占份额不断扩大，挤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份额，形成与改革开放前面 20 年的放权让利截然相反的趋势。

二、今天：土地财政的 4 大负面影响

由于地价房价不断上涨，土地似乎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土地财政的基础条件是城市化带来的效率提高，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随着土地资源商品化、资本化，成为巨大的财富源泉，政府的土地收入也确实在过去的经济建设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推动了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条件快速发展完善，过去 20 年间对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不可忽视。**

但同时，土地财政体制的**负面作用已经越来越大。**

其一，随着地价不断上涨，推动房价迅速上升，**普通百姓购房、租房负担越来越重。**

2001 年，全国房地产企业的商品住宅平均售价 2017 元/平米，2021 年升至 10396 元/平米，已是原来的 5 倍以上。但这远远没有反映出大城市房价的涨幅。在一线城市，房价涨了几十倍。而此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涨幅不到 6 倍。

北京市四环路到五环路间的房价目前大约在 5-10 万元/平米，2020 年北京市私营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 9.06 万元，只够负担 1-2 平米的房价。

目前大城市有房居民和无房居民的生活冰火两重天，天价住房让外来年轻人望而却步或最终不得不离开。留不住年轻人的城市，未来可能是人口老化、人力资源枯竭的城市。

其二，**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宪法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因此农民在符合国家的土地规划用途的条件下，应当有处置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获得合法收入的权利。城市周边土地大幅度增值，是城市规模经济的溢出效应所致，不应全归农民集体或个人，政府有理由通过税收提取土地增值的一个合理部分用于公共目的。但在现行制度下，如政府以获利为目的，用征地的方式把土地收归国有，独占土地收入，实际是违反宪法的。目前，除一些大城市周边征地有高额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农民并未获得足够的补偿。这对农村发展和提高农民的财产收入有严重的不利影响。

其三，**地价房价的持续畸形上涨扭曲了国民财富分配格局**。

伴随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迅速提高，中等收入阶层不断扩大，90年代的住房改革又把原来的公有住房以低价卖给城镇职工，使他们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房产。这些本来创造了一个改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良好条件。

但过去20年，地价房价的过度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打断了这一进程，**实际上形成了对新一代中低收入群体的掠夺**。中年以下的中等收入人群或者背上了沉重的房债，或者成为永久的无房户。房贷和房租大大压缩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使他们很多人只在名义上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实际生活水平无法提高甚至下降。

过高的地价和房价还**推高了商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租金水平，把成本转嫁给各行各业和消费者**，而占人口少数、囤有多套住房的富裕阶层，则可以轻松凭借房价上涨使财富快速升值。因此**土地财政实际造成了财富的逆向再分配，是导致财富占有差距持续扩大和国民经济各行业间苦乐不均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全口径政府收入（包括财政预算收入、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全口径政府支出已分别上升到GDP的35%左右和40%左右，**政府配置资源的程度大体回到了改革前的水平**，其中土地出让收入扮演了重要角色。

市场配置资源的比重与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被大大压缩，出现了背离改革大方向的趋势。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政府收入占比高的情况差异很大，后者占比高是因为政府承担了大量公共服务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而我国这样高的占比中很大部分是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

其四，**地价房价持续上涨和相关的金融扩张导致了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

2020年，房地产业创造增加值7.3万亿元，占GDP的7%，但**房地产相关贷款已超过67万亿元，占银行贷款总额的39%，相当于GDP的66%。2020年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80.7%，居民的房贷规模也越来越大**^①

① 笔者注：2020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4.4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34%。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郭树清：“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2020年12月)。

地方政府的高负债也与土地有密切关联。这样高额的负债还不仅仅是因为**地价和房价**越来越高，也是因为**融资的放大效应**。因为地价不断上涨，变相鼓励了房地产企业用外部融资囤地囤房，地方政府还可以用升值后的土地做抵押，借更多的贷款进行新的土地开发和其他投资。**资产泡沫和金融泡沫促使经济继续脱实向虚，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挤压作用，并形成了巨大的风险。**

这些越滚越大的债务虽然有价格不断上涨的土地和房屋为抵押，表面上安全，但一旦地价房价由涨转跌，就可能引发坏债连锁反应，引爆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土地财政已经成为一个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和财富分配失衡的因素，土地相关制度亟待改革。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今年的土地收入大幅下跌说明，现有的土地财政格局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三、明天：调整政策，重振改革，化硬着陆为软着陆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90年到2021年，全国已累计销售新建商品住宅202亿平米。房地产企业目前正在施工的房屋面积还有97亿多平米，此外，在住房商品化之前和来自非商品房的城镇居民住宅存量估计90-100亿平米。待目前施工中的住宅完工后，全国城镇住宅城镇居民住宅存量总共将达到380-390亿平米。

按现有城镇人口计算，人均拥有住房面积41-43平米（按42平米计），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城镇住房建设已经接近饱和。

假设今后到2035年，城镇化率再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75%，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目前的42平米提高到50平米，城镇充其量还需要新建150亿平米住宅。未来14年，平均每年只需新建10.7亿平米住宅，城镇住房就将完全饱和。

而过去3年，平均每年新开工住宅面积高达15.9亿平米。这意味着今后房地产业哪怕只保持现有建设规模不再增长，未来也将出现**非常严重的住房过剩，每年都会有约1/3的新建住房（5亿平米）卖不出去。相应地，房地产业对土地的需求量也将至少下降1/3（实际下降幅度可能更大，因为房地产企业目前还囤有相当数量的待开发土地），使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大幅度缩水。**

据这些情况判断，今年上半年出现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度下降，并非短期波动，很可能代表了土地和房地产市场走势的根本拐点。只是由于今年经济形势不佳，土地需求颓势更加突出。

在住房和土地需求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未来经济会发生什么？

大致会有**硬着陆和软着陆**两种可能。这里先对硬着陆的情况做一些大胆推测。作者希望这只是杞人忧天，推测错误。

土地成交可能转向量价齐跌。地方政府收入大幅度减少，以前那种不计成本、不算回报、寅吃卯粮、大拆大建、为了一时的政绩大手笔投资的格局难以为继，政府消费靠土地收入挥霍、钱权交易靠土地收入大行其道的局面也无法维持。靠政府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再是一个现实选择。

地价下降到一定程度，大量以土地为抵押的政府贷款将会成为不良贷款。银行的坏账率会大幅上升。政府债券到期不能兑现的情况可能大量发生。出现较普遍的偿债危机。

土地收入下降的直接原因是房地产业已进入衰退。今年上半年，房地产业的土地购置面积和土地成交价款分别下降了48%和46%。同期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下降27%和32%，意味着房价和销量同步进入下降期。地价下降还有一定的滞后期，但估计坚持不下去。房屋销售和房价大幅下降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会有相当多的房地产公司倒闭，坏债大量发生。

房价降到一定程度，一些贷款买房的居民会发现与其继续还贷，还不如直接违约，因为市场上的现房可能变得更便宜。这与当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情况相仿，会使银行的处境雪上加霜，坏账进一步增加。政府可以禁止房地产公司降价售房，但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企业倒闭可能更多，对银行的打击可能更大。

大银行有政府支持，不会倒闭，但坏债会严重影响资金周转，把影响扩散到实体经济。中小银行将面临严重挑战，对实体经济影响可能更大，可能拖累整体经济进入较长时期的衰退。

有些人也许会主张重走大规模货币放水的老路来救经济、拉增长，但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最终需求在消费者一端，没有最终需求回升，大量增加流动性、只会加剧坏债螺旋形攀升。

上述情况只是一个沙盘推演，作者希望不会发生。现实情况永远比理论推演更复杂多变。

但一旦发生上述情况，需要有理性的宏观政策应对，同时痛下决心，推进改革。如果应对得当，有可能使硬着陆变成软着陆，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延长还贷，清理坏债，收缩房地产规模，整顿金融，稳定储户，防止挤兑。

如果发生全面的资金周转困难，货币当局可能需要释放一定量的货币维持资金周转，同时面对企业面临的困难，货币当局可以考虑降息作为一个选项来缓解企业的负担，但同时**必须坚持货币总量控制，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利率与货币量的变化之间未必是线性负相关关系，不同政策工具的效果可能有很大差异，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财政政策不宜把重点放在扩大政府投资。保护失业者、低收入者和稳住最终需求是当务之急。强化失业保障，对未被失业保险覆盖的失业者（包括符合

常住人口标准的失业外来农民工)进行普遍救济,促进消费需求尽快回升,引领经济回升。

政府收购适用的滞销房产,转为廉租房和公租房,并通过政府采购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一方面减轻房地产业和银行业受到的冲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把保障性住房覆盖面扩大到合理水平,分步使保障性住房能够满足城镇低收入和中下收入居民的居住需要,应覆盖未取得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但整个过程必须公开透明、建立规范,防止幕后交易、私相授受。

改革土地制度,政府征地仅限于公益性和必须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参照市场地价予以补偿。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商业性土地需求通过市场满足,不必通过政府征地。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允许农户闲置宅基地在不违反土地规划用途的条件下进行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取消对需求方身份的限制。

改革土地增值税制度,政府对土地交易中的大幅度增值部分征收适当比例的土地增值税,用于补充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

政府要过紧日子,压缩不必要和不急需的政府支出,转向量入为出的理财观念,把更多的资源留给市场配置,尽量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退出竞争性市场活动,转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中心任务。

多用普惠政策,少用特惠政策,对民营企业要一碗水端平,鼓励公平竞争,改善营商环境,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14.2 土地财政还是土地金融?

笔者认为相较于土地财政或者“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还是直称土地金融为好,这更能说明核心本质。

重引赵燕菁:

(80年代初)开发和建设深圳的故事显示,并不是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会自发形成基础设施;而是要政府先提供基础设施。中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也正因如此,**“土地财政”乃是一种金融活动。将土地收入视作“财政收入”,**暴露出传统经济理论对真实世界的错误观察和认识。

土地肯定“不具有天然的信用”,所有资产的价值都是未来收益的贴现。土地及附着其上的不动产也是如此。**土地的信用来自附着其上的公共服务给土地带来的现金流。**

只有政府提供了重资产（笔者注：企业不愿投入的、耗资巨大、长周期、低回报等难见市场效益的公共服务），其他社会主体才可能以轻资产启动各类商业模式。**城市化就是资本不断聚集的过程。**

自 70 年代末深圳开始实际实施国有土地有偿使用之初，地方就采用了土地入股、利润分成、卖楼花（房屋预售制）等方式（见 12.10 节）；而在 1992 年海南岛、北海等房地产泡沫时，金融资本成分更是加重，批条、图纸、信贷、炒楼花、炒地皮、炒项目，楼还未建，已可层层转手数次，击鼓传花；之后一直延续低价或零低价出让工业用地换取财政收入，再将之用于七通一平等基建；1998–2004 年不计入赤字的长期建设国债 9100 亿，房地产开始作为超发货币蓄水池，并成为中国面对经济危机的固有路径；2004 年招拍挂 8·31 大限抬高土地转让价格，“**从此开发商（消费者）之间为买地而展开竞争，政府（生产者）坐享生产者剩余。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资本来源**”；2008 年 4 万亿投资刺激形成的大量地方融资平台，以地方政府信用背书，以土地作为信用和货币支撑，以债养债，则进入了完全体的土地金融时代，地方政府债务也节节攀升，面临难以偿付、甚至事实上破产的系统性风险。（见 13.3 节，表 14.1）

赵燕菁对土地金融成就比较肯定：

中国之所以能“和平崛起”，原因恰恰离不开“土地财政”这种融资模式，这使得**中国不必借由外部征服，就可以获得原始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初始信用”**。高效率的资本生成，缓解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信用饥渴，确保了中国经济成为开放的和在全球化中获利的一方。因此，即使处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化初始阶段，中国也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希望维持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更有动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土地财政”的成功，确保了“和平崛起”成为中国模式的内置选项。

但赵其实也知道大多数城市的衰退是必然：

城市发展的衰退与企业经营的失败在原理上是相同的。能够获得资本，完成市政建设的城市很多；**但能创造足够的收益，持续运转下去的城市却很少**。当城市化转入运营阶段，问题的焦点不再是资本的多少，而是经常性收入是否足以覆盖一般性公共服务支出。如果无法获得足够的现金流性收入，之前所有的投资就会转变为无法偿还的债务。正如能盖起厂房的企业很多，但能赚钱的企业没几家。

城市的道理相同，能建设起来的城市很多，但能通过运营最终获利的却很少。

不同于美国的股市，中国找到了自己的信用货币之锚——土地金融，吸纳大量超发货币。而中国超发货币之路，至少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洋跃进”就已经开始，可能是学习了美国 70 年代初的做法。但地方土地金融债务所造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一触即发。

14.3 地方债务

	单位：万亿元						与 GDP 的百分比						官方政 府债务	IMF 增扩 政府 债务	私人部 门债务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中央政府	15	17	21	23	26	29	16	17	20	20	22	23			
地方政府	18	21	26	30	35	40	20	22	25	27	30	3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能)	35	40	45	50	57	66	38	40	44	44	48	53			
政府基金 ^①	6	7	9	12	14	16	6	7	9	10	12	13			
家庭	48	55	63	71	73	75	52	56	62	62	61	61			
企业(不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105	111	121	128	142	153	115	112	118	113	119	123			
备忘项															
合计	227	252	285	315	348	380	248	254	278	277	291	306			
广义政府债务	33	38	47	54	62	69	36	38	45	47	51	56			
IMF 增扩政府债务	74	85	101	115	132	151	80	86	98	101	110	122			
IMF 增扩政府债务(仅地方)	53	61	71	80	92	106	58	62	69	70	77	85			
名义 GDP	92	99	103	114	120	124									

^① 政府指导基金和专项建设基金(仅包括社会资本部分)。

表 14.2: 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

来源: CEIC 数据有限公司; Capital IQ; 中国财政部; 以及 IMF 工作人员的估计。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预算外政府激进债务)，在 2015 年占当年名义 GDP 58%，2023 年迅速提高至 85%。其他数据可见见表 14.2 “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表 14.3 “全球债务总额(占 GDP 百分比，加权平均数)”，表 14.4 “全球公共债务(占 GDP 百分比，加权平均数)”，表 14.5 “全球私人债务(占 GDP 百分比，加权平均数)”。

近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是推动全球债务的重要力量……中国的总债务与 GDP 之比从 1980 年代中期的 70% 左右(接近当时的新兴市场平均水平)增长到 2022 年的 272%，接近美国，增长了近四倍。不过，以美元计算，中国的总债务(47.5 万亿美元)仍明显低

	1950s	1960s	1968	1970s	1980s	1986	1990s	2000s	2004	2010s	2019	2020	2021	2022
世界	96.8	101.5	106.4	115	144.3	156.8	180.1	196.8	198.6	219.4	228.9	258	248.1	238.1
发达经济体	110	115.4	118.9	133.6	165.4	177.1	202	229.5	225.9	267.4	268.8	301.3	290.1	277.9
欧洲地区	53.5	68.1	70.7	118.5	144.1	147.3	176.5	214.4	208.6	255.1	246.7	273.6	266.8	254.4
日本	13.1	79.7	127.9	157.5	229.5	242.2	296.1	336.7	333.5	386.9	400.9	442.2	439.8	447.4
英国	134	120.5	129	116.7	118.7	125.7	153.1	205.2	197.3	248.5	240.8	279.1	269.3	252.1
美国	133.5	140.4	138.7	139.8	163.2	176.8	189.1	218.3	217.7	256	260.3	297.4	283.5	273.9
新兴市场经济体	28.2	33.1	37.8	39.5	65.5	72.6	87.2	101.6	102.7	148.5	176.8	201.2	195.3	191.2
中国					71.3	73.4	97.2	137.9	142.4	211.5	246.8	268.8	264.9	272.1
其他	28.2	33.1	37.8	39.5	65.7	72.5	85.4	91	91.6	110.6	123.1	141.1	131.8	124.2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20.2	43.6	51.5	73.7	61.9	65.3	61.9	77.3	85.3	87.4	87.8

表 14.3: 全球债务总额 (占 GDP 百分比, 加权平均数)

	1950s	1960s	1968	1970s	1980s	1986	1990s	2000s	2004	2010s	2019	2020	2021	2022
世界	56.2	39.8	36.3	33.1	47.6	54.3	62	66.5	69.8	81	84.9	100.4	96	92
发达经济体	64	44.3	39.5	36.1	50.7	57.5	66.4	75.3	76.8	104.6	105.4	124.4	118.7	113.5
欧洲地区	32.5	24.7	25	27.7	47	52.1	67	69.9	69.7	90.9	85.9	99.2	97.3	93.2
日本	13.1	10.1	11.8	23.4	64.3	74	89	166.6	169.5	227.5	236.4	258.7	255.4	261.3
英国	134	81.5	70.9	57.5	40.3	41	38.1	42.6	39.8	84.7	85.5	105.6	105.9	101.4
美国	69.7	54.4	48.7	43.6	51.6	57.7	66.3	64.1	66.1	104.1	108.7	133.5	126.4	121.4
新兴市场经济体	15.5	18.8	20.6	21.4	35.6	40.2	41.5	40.9	44.1	44.3	55.7	65.8	64.8	65.2
中国							21.2	26.9	26.4	44.3	60.4	70.1	71.8	77.1
其他	15.5	18.8	20.6	21.4	38.6	45.8	46.3	44.7	49	44	52	61.9	58.4	55.3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15.6	36.2	43.2	64.8	45.8	51.2	34.8	42.9	48.5	48.5	48.4

表 14.4: 全球公共债务 (占 GDP 百分比, 加权平均数)

	1950s	1960s	1968	1970s	1980s	1986	1990s	2000s	2004	2010s	2019	2020	2021	2022
世界	40.6	61.7	70	81.9	96.7	102.5	118.1	130.3	128.8	138.3	144	157.6	152.1	145.7
发达经济体	46	71.1	79.4	97.5	114.6	119.6	135.6	154.1	149.1	162.7	163.4	177	171.4	164.4
欧洲地区	21	43.3	45.7	90.7	97	95.2	109.5	144.5	138.9	164.2	160.7	174.4	169.4	161.1
日本		116.1	116.1	134.1	165.2	168.2	207.1	170.1	164	159.4	164.5	183.5	184.4	186.1
英国		55.6	58.1	59.1	78.3	84.6	115	162.5	157.5	163.8	155.3	173.5	163.4	150.8
美国	63.8	86	90	96.1	111.6	119.2	122.8	154.2	151.6	151.9	151.5	163.9	157	152.5
新兴市场经济体	12.6	14.3	17.2	18.1	29.9	32.4	45.7	60.7	58.6	104.2	121.2	135.4	130.5	126
中国					71.3	73.4	86.6	110.9	116.1	167.1	186.4	198.7	193	195
其他	12.6	14.3	17.2	18.1	27.1	26.7	39.1	46.4	42.6	66.6	71	79.2	73.4	68.9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4.1	4.6	4.7	7.4	8.3	8.8	16.1	14	27	34.5	36.9	38.9	39.3

表 14.5: 全球私人债务 (占 GDP 百分比, 加权平均数)

数据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债务监测报告, 2023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Conferences/2023/2023-09-2023-global-debt-monitor.ashx>

注意: 表头年份列加 's' 标志的是测算的十年平均值, 例如 1950s 表示 1950–1959 年的平均债务水平。

1/3 的中国私人债务数据为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和其他预算外政府基金债务。

于美国（接近 70 万亿美元）。中国债务占 GDP 之比的上升是其他大型经济体所无法比拟的。从 2009 年开始，增幅明显加快，尤其是非金融企业债务……2008-2022 年期间，全球债务与 GDP 之比增长的一半以上可归因于中国债务与 GDP 之比的快速上升。^①

世界各国都存在着同样的“债务型驱动”经济发展的问题，借新还旧，发展金融虚拟经济，工业经济也积极的发展金融化部门。美国股市、中国房地产，皆作为信用货币之“锚”。

“债务型驱动”一般是通过超发货币及其相关形式来实现，下文我们来了解下超发货币吧。

14.4 通货膨胀税

本节和下一节基本概念主要参考了张怀清几篇论文，在此表示感谢。

通货膨胀税是从宏观经济层次考虑的通货膨胀对货币持有者的影响，指持有中央银行纸币者由于一般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所受到的损失。

引起通货膨胀税的原因很多，并非都是中央银行增加基础货币引起的。例如，由于石油价格上升等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由于支付技术进步导致的微观经济单位减少对中央银行现金的需求而增加商业银行活期存款（或之前支付宝、微信钱包等金融存款方式）导致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而恶性通货膨胀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微观经济单位在恶性通货膨胀条件下一般减少对中央银行纸币的实际需求，例如发生货币替代，对本国货币需求减少……这样中央银行铸币税小于通货膨胀税。

14.5 铸币税

在现代经济理论中，**铸币税**多指货币发行者由于在货币发行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垄断权力（非完全竞争）**而从货币发行中获得的利润，是一种**隐形税收**。可以认为铸币税是通货膨胀税的一个子集。

简单举一闭环例子来说，假设市场总价值变化不大，流通货币 x 元。央行再发行货币 y 元，相应支出 y 元购买商品。长期市场流通循环后，市场价值不变，却已有 $x + y$ 元货币，通货膨胀率 y/x ，货币贬值 $y/(x+y)$ 。央行通过征税、

^① <https://www.imf.org/zh/Blogs/Articles/2023/09/13/global-debt-is-returning-to-its-rising-trend>

债券等方式回收货币，但货币整体已贬值，此时央行赚取的并不是超发货币之初的 y 元，而是回落到 $(1 - \text{货币贬值率})y$ 。

超发货币使货币贬值，原债务金额不变，但实际价值减少，实际购买力下降，相当于**债务缩水（比如政府公共债务）**，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这也是所谓“**债务型增长**”的源泉。

可以这样来简单形象理解：央行依仗垄断权利向全民强制发行**无息债券**，其中的**本应支付却未支付的债券利息**^①便是央行铸币暗税，**其实际收益与临期时长成正比，与周转次数成反比**。越早越先使用这张债券的部门，越受益，例如政府、投资家、企业家、金融和土地食利者等；不参与其中投资周转过程的部门，例如只是储蓄或拿死工资的普通人蒙受全部应付未付利息的损失。

央行《金融知识全民读本》：

通货膨胀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总是“劫贫济富”，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严重时还会引发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剧烈动荡。

劫贫济富，这其实是人类从原始社会至今的固有滥觞。这也本属权力的语义范畴——影响和掌控他人的力量。

以下为张怀清几篇论文的摘选：

不仅金属铸币、中央银行货币的发行产生铸币税，商业银行由于在存款市场具有垄断而获得的利润也可看作是铸币税。不仅如此，还有诸如政府债券铸币税（*bond seigniorage*）等形式的铸币税。

随着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完善和金融产品的丰富，微观经济单位对中央银行纸币的需求呈现相对减少趋势，不仅商业银行类金融机构正在发行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中央银行纸币的货币，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产品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中央银行纸币和商业银行负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于1998年分别考察了欧洲和北美等21个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等79个发展中国家，得出结论：1980-1995年期间，发展中国家铸币税收占GDP的比重平均在1.4%-3%之间，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平均在0.64%左右的水平。而中国在同一时期，铸币税占GDP的比重平均为6.52%（Massonet al, 1998），除了少数几个发生过超级通货膨胀的国家之外，已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

① 具体论述可见张怀清论文《人民银行铸币税的测算和运用：1986-2008》

不同的学者利用不同的方法得到的估计有所差异，谢平（1994）按照基础货币增量的算法，得出我国 1986–1993 年之间，政府每年得到的货币发行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 5.4%；易纲（1996）得出 1978–1992 年真实铸币收入平均占 GNP 的 3% 左右；周立（2003）认为 1984–1996 年期间的大部分年份的真实铸币收入占 GDP 的 5%–7%，1993 年和 1996 年达到 8.5%。但无论是哪一种算法得出的结果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0.64%，也在很大程度上超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1.4%–3%。

另外本国货币如能作为国际货币使用，自然也可向其他国家收取国际铸币税。人民币国际化还任重道远，较多采用货币互换方式，能收取的国际铸币税较少。根据人行《2023 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2023 年一季度末，人民币国际化综合指数为 3.26，同比上升 10.2%。同期，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国际化指数分别为 57.68、22.27、7.66 和 5.48。

2022 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为 4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1%。其中，实收 2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9%；实付 2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5%，收付比为 1:1。

14.6 超发货币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根据《黄金重要：超现实风险的真实解决方案》^[118]，美国自 1983 年起，以购房是投资而非消费为由，不再将购房价计入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取而代之的是增长速度远低于房价的**业主等价租金**（owners' equivalent rent, OER，简单理解就是如果房主将房子出租所能获得的租金），由此 CPI 被严重低估。以中国为例，中国重点 50 城租售比自 2019 年后始终在 1:600 以下，且租售偏离程度持续扩大，也就是说，租房至少 50 余年才可收回房价，而发达大城市需 60 余年才可收回。

《黄金重要》摘抄：

美联储多年来一直公开撒谎，淡化真正的通货膨胀……**CPI 表是一个公开的骗局**，这允许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因此也允许美联储，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报告”通货膨胀——至少目前是这样。

如果使用 20 世纪 80 年代美联储 CPI 通胀加权方法衡量今日，那么美国在 2021 年的 CPI 通胀率将接近 15%，而不是报告的 6% 多。

美联储简单调整了其衡量通货膨胀的 CPI 尺度，有效淡化了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成本上升，以衡量消费者价格通货膨胀……简言之，美联储不喜欢用旧的 CPI 尺度来衡量通货膨胀，所以他们简单地用 $2+2=2$ 的 CPI 来代替它。

同样，美联储为了保持其由欠条驱动（即债务驱动）的“复苏”假象，别无选择，只能发明一个可控的（即较低的）CPI 通货膨胀率，以便使美国国债在与通货膨胀相比较时，看起来对其他债务驱动买家更有适度的吸引力。

自从尼克松在 1971 年取消美元与黄金挂钩以来，各国货币情况都变得更糟了。债务和赤字呈指数级增长，而这种债务政策导致的人为（即债务驱动）市场扩张只能通过被误导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家人造货币和相关“解决方案”来实现。所有这些钱都是无中生有的。没有人需要为它工作一分钟，也没有人需要生产单一的商品或服务来反对它。

保持债券和债务市场活力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过度印刷”来摧毁国家的基础货币。简而言之，畸形膨胀的市场可能在利率抑制的刀锋下生存，但货币，嗯……他们死在同一把剑下（过度印刷）。

当然，这是在吃你的蛋糕，但不是吃它……

量化宽松只是制造并扩大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风险资产泡沫和贫富差距。

为了进一步欺骗人民，这个“魔术”背后的所谓专家想出了 MMT（即现代货币理论，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个舒缓的概念，以使这种腐败的东西看起来更符合逻辑，更正式，甚至更聪明。对政策魔术师来说，这种语义上的技巧并不新鲜。当他们需要欺骗人民时，他们会巧妙地从字母表中抽出令人平静的字母，发明一些听起来很有学术性、有效和健全的政策名称，比如 MMT 或 QE（量化宽松）。但是，这两个现在常见的政策名称都不过是指凭空伪造货币，这是一种公开的荒谬。

今天全球的特点是不顾一切地扩大广义货币供应，以解决不可持续且史无前例的债务水平。这种扭曲而一贯的政策错误，导致了

历史上最大的风险资产泡沫……正如历史所提醒的，所有的泡沫都会破灭。

当股票在投机性政策的支持下不合逻辑地上涨时，尽管其政策制定者有信誉的“逻辑”，但事实上没有逻辑，随之而来的极端纸面财富获得了永久甚至稳定的幻觉。但是，正如我们和赫斯曼当时所警告的那样，今天更是如此，投资者很快就会集体陷入一种错觉，认为他们今天投资组合中的数万亿美元代表着明天的持久购买力。换句话说，“合乎逻辑”的投资者总是忽略了一个历史上被证实的事实，即一旦上升的东西崩溃，大部分的财富最终会蒸发掉。简而言之，风险资产从未变得更有风险。例如，截至目前，全球金融资产的价值（股票、债券和房地产）是520万亿美元，是全球84万亿美元GDP的6.2倍。

考虑到持续增长和怪诞的债务水平，决策者实际上别无选择，只能膨胀他们的债务。作为聪明的小狐狸，公共政策制定者当然会尽一切努力，故意允许通货膨胀（以偿还债务），同时控制收益率曲线来人为抑制利率，从而抑制债务成本。同样，这种绝望的利率压制对于爬进2020年代的“破产”主权国家来说是必须的。再说一遍：他们别无选择……摆脱债务的唯一方法是让通胀率高于利率——差距越大，摆脱债务的速度就越快。

考虑到当前大于300万亿美元的全球债务水平，如果允许利率自然上升（即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中），政府债务的利息支出将在几秒钟内大幅超过GDP的50%，全球债务方和所谓的“经济复苏”将立即以戏剧性的方式结束。

如果CPI通胀率被准确报告，那么虚假的美国国债实际收益率将为负值，美联储通过给这种收益率涂上口红，可以继续依靠更多债务、更“有吸引力”的欠条和更多的欺骗为生。这种隐蔽的通胀欺诈行为让美国能够有效地延长和掩盖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债务狂潮，而美国信贷市场就像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怪人一样前进——它已经死了，但仍然在所谓“无通胀”但永久的货币创造的氧气下前进。但即便是弗兰肯斯坦最终也会死去。

就今日世界大国强国实践，尤其是美国而言，超发货币、寅吃卯粮已是长期传统，报表上的CPI指数意图掩盖的是真实通货膨胀、货币发行机构所收取的铸币税、持续破发的国债；超发货币实则是金融虚拟资本（包括房地产，房

地产真实属性是金融) 对其他赛道人民的盘剥。收入不平等加剧、财富极度分化就这样静悄悄地来到了现代社会。

其实现代国家往往都习以为常施用各种“真实数据烟雾弹”……数据完全可以是真实的，但却是在各种特殊统计方法下的真实数据。

14.7 GDP、GNI 和分配正义

据国家统计局,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全部最终成果, 等于所有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之和。可见, *GDP* 强调国内生产, 体现的是增加值的生产创造。

国民总收入 (*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结果, 等于所有常住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

GNI, 即在 *GDP* 的基础上, 扣除外国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收入, 加上本国从国外获得的资本和劳务收入。

不管 *GDP* 还是 *GNI*, 都是以**加总**方式来衡量国家经济。当代所有国家几乎都热衷于用这两种方式来描述国内经济状况。这两个指标都无法说明、甚至不想说明**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社会福利**这类问题。其实自资本主义发端之初, 古典 (自由主义) 经济学家们便惯于使用**国民经济**这一加总说法。历史并未改变多少, 除去多了很多晦涩难懂、混淆视听的概念。

如 240 余年前的亚当·斯密《国富论》:

劳动获得宽裕的报酬, 不仅是一国财富**不断增加**的必然结果, 同时也是一国财富**不断增加**的自然症候。另一方面, **贫穷的劳动阶级生活捉襟见肘**, 是一国财富**停滞**的自然症候。而**该阶级人民濒临饿死**, 是一国财富**迅速萎缩**的自然症候。

国民经济的发展 (*GDP* 或 *GNI* 等) \neq 大部分国民的经济发展 \neq 国民的幸福。

恩格斯和马克思分别写到:

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36]60}

我们且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36]156}

张文喜探讨了《所有制与所有权正义：马克思与“亚当·斯密问题”》^[119]：^①：

在对斯密等人的评述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存在私有财产和工人需要的悖论，认为市民式的自私自利能够保证与公共利益先天和谐，这是一种**幻象**。斯密的自然自由原理与利益和谐的自由市场学说注定满足不了任何一个阶级的要求：**工人和资本家同样苦恼，没有财产的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7页）；因而，“既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社会的最富裕状态会造成大多数人遭受这种痛苦，而且国民经济学（总之，私人利益的社会）是要导致这种最富裕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是社会的不幸**”。（同上，第230页）

生产资料私有制给特定的阶级带来的具体结果，在本质上绝不是像斯密所讲共同富裕，而是两极分化。

1993年，中国正式采用GDP作为经济表现的指标，从此开始了追求GDP增速的历史。回到亚当·斯密，中国持续发展可以“先富带动后富”，并且确实使国人生活水平普遍大幅提高。但中国如何应对“财富停滞”时“贫困的劳动阶级生活捉襟见肘”，又如何应对经济危机、财富迅速萎缩时的“濒临饿死”呢？现代经济周期不存在持续增长，只有上升和下降交替波动。

四十多年来，如美国一样，中国刺激经济持续增长多是以**大规模超发货币**为主要手段，用基建、房地产等固定资本投资作为货币蓄水池，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使固定资本投资本身成为货币。这一政策核心至少自上世纪70年代末的“洋

^① <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9/0617/c427160-31162202.html>

跃进”便已出现，只是那时候还没有房地产的加入。执着追求 GDP 高增长的是缓解债务压力、保持泡沫不破的不得已选择。

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是短期应用经济学，且要求针对经济萧条和上升期适时调整；它对于长期无力，长期应用必然持续集聚毒性。每一次的负债经济增长都必然使将来市场出清、结算埋单时期更加残酷惨痛。

为缓解今日危机，除非我们能将危机转嫁至他国，甚至参与战争。问题是，太多发达国家也是这样想的——一方面担忧已在世界资本市场长袖善舞的中国经济危机导致世界大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希望啃噬世界最大市场之中国的血肉，将自身危机转嫁至中国。这里面没有意识形态之争，只有现实利益。

另外我们的贫富分化已持续加大。

北京大学以全国 25 个省市 160 个区县的 14960 个家庭为基线样本所得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5》显示，**最富有的 1% 的家庭占有近 1/3 的全国财产，而底端 25% 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只占 1% 左右。**^[94]

2023 年贝恩公司与招商银行联合发布《2023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提到

2022 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规模达 278 万亿人民币，2020-2022 年年均复合增速为 7%；到 2024 年底，可投资资产总规模预计将突破 300 万亿关口。

2022 年，可投资资产在 1,000 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达 316 万人，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 3,183 万人民币，共持有可投资资产 101 万亿人民币，2020-2022 年年均复合增速为 10%；预计未来两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和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以约 11% 和 12% 的复合增速继续增长。

也就是说在中国，**0.22% 的人口（所谓高净值人群）占据了总可投资资产的 31.96%**。另外，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增速倍数于 GDP 增速，也意味着财富分化趋势更进一步加大。

相比贝恩和招行报告，瑞士信贷和瑞士银行发布的《2023 年世界财富报告》相对乐观些，但只是相对。中国的百万美元富翁数量已占世界 11%，仅次于美国的 38%。

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的财富不平等现象大幅上升。2000 年财富基尼系数为 59.5，稳步上升，2016 年达到 71.7。2000 年，前 1% 人群的财富份额为 20.7%，2021 年为 30.5%，2022 年上升至 31.4%。**

迄今为止美国**百万美元**富翁人数最多，为 2270 万，占世界总数的 38.2%。这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中国，中国占全球百万富翁总数的 10.5%。在本世纪初，日本的百万富翁数量与美国竞争，之后日本地位一直在稳步下降，于 2014 年被中国超越，2022 年仅占百万富翁的 4.6%，首次排在第四位，仅次于法国（4.8%），并受到德国（4.4%）和英国（4.3%）的挑战。

	基尼系数							1% 最富有的人财富占比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1	2022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1	2022
巴西	84.5	82.7	82.1	88.7	88.9	89.2	88.4	44.2	45	40.2	48.7	49.5	49.3	48.4
美国	80.6	81.1	84.1	84.9	85	85	83	32.9	32.8	33.4	34.8	35.3	35.1	34.2
印度	74.6	80.9	82.1	83.3	82.3	82.3	82.6	33.2	41.9	41.4	42.3	40.5	40.6	41
德国	81.2	82.7	77.4	79.2	77.9	78.8	76.9	29.1	30.4	25.7	32.1	29.2	31.7	30
加拿大	74.9	73.3	71.7	71.8	71.8	72.6	72.3	29.1	25.9	22.4	23.3	23.6	25	24.3
中国大陆	59.5	63.8	70	71.2	70.5	70.1	70.7	20.7	24.2	31.5	31.7	30.8	30.5	31.1
台湾	64.7	67.8	72.6	70.5	70.7	70.7	70.5	24.3	23.6	29.8	26.9	27.3	26.6	26.4
法国	69.7	67	69.8	69.9	70	70.2	70.3	25.5	21	21	22.3	21.9	22.3	21.2
英国	70.5	67.6	69.1	73	71.7	70.6	70.1	22.1	20.6	23.6	25	23.1	21.1	20.7
西班牙	65.5	62.2	61.4	69.5	69.1	69.1	68.3	24.1	18.7	18.5	24.1	22.7	23.1	22.4
韩国	69.7	70.1	74.7	72.4	67.7	68.2	67.9	21.3	21.8	26	26.9	23.4	24	23.1
意大利	60.4	59.4	63.1	66.9	66.4	67.2	67.8	22	18.2	17.4	22.6	21.9	23.3	23.1
澳大利亚	63.7	63.1	63	64.9	65.5	66.2	66.3	20.5	20	19.2	20.5	20.6	21.8	21.7
日本	64.5	63.1	62.5	63.6	64.4	64.7	64.8	20.4	18.8	16.7	18.2	18.1	18.7	18.8

表 14.6: 全球财富不平等趋势

来源：瑞士信贷和瑞士银行《2023 年世界财富报告》

其实走向这样道路，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自身，因为这是现代世界生产关系的可悲客观规律，不以人民、党派、国家意志为转移！各主要经济体都大差不离（见表 14.6，但我们的债务增长、超发货币确实走得太快了……

第十五章 中国未来怎么走？

笔者认为马克思足够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世界的破坏性，但在建设性上乏善可陈，宏观或曰大师叙事 40 余年来也欠缺实质性发展。笔者自然也更加无力去探讨中国未来发展路径应是怎样，但自认可发现个别“忧国忧民”“专家”政策提案所描绘未来美妙画卷背后隐藏的真实破坏性——一些可以让党和国家陷入大崩溃泥沼、让人民生活日益困苦的破坏性。笔者确信这个别“专家”要么是天真幼稚的蠢，要么是为背后利益集团服务的刻意为恶。

当代世界的批判武器虽然在宏观和建设性上缺失，但历经 200 多年积累，其数量已积累不少，可称是批判武器军火库了。边沁利己资本主义的侵蚀，人民批判意识日益增长，信息化传播越来越便捷，使我们的一些“专家”话术也随之更加高明，可以十句话九句真，隐蔽性极强。其中九句真话，主要立足批判现实存在的问题、弊端，也常常以人民的名义批判政府，悲天悯人真是我见犹怜，比如减少城乡二元对立——户籍改革，劳动力自由流动；加大民生支出、社会保障、居者有其屋。但剩下的那一句假话，才是其话术“精华”和真实意图所在，前面九句真话、正确的话只是说明自己的正义和“洞见”，为其谎话打造完全不存在的合法合理性。真正要做的是悄悄引导党和国家、人民成为其背后利益集团待宰的羔羊。

伪道学家、欺世盗名、祸国殃民、宵小鼠辈式的“专家”真不算少，道行更高者甚至可以十句话十句真，比如可以流涕于中国财富分化之严重，摇旗呐喊中国要建立健全对富人的累进直接税征收，呼吁国家招纳这类方向的专家进入智囊团，他自己其实却在国际金融寡头公司从事着“资本管理”类业务……真是让人叹为观止！高手啊！“高级知识分子”啊！

笔者曾经真的失望于中国脊梁式的专家为何如此罕见，后来在写作本书、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可能想错了。中国脊梁一样的专家不是凤毛麟角，只是他们大多乏名少利，影响力有限，很少能站在光鲜亮丽的舞台前，时代并不能给他们多少表达空间……不过当前世界已经应验了习总书记所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脊梁们还是能发声的多发一些，能做事的多做一些，晚一些隐退于浊世吧……

本节一是说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中的共性背景，二是以《大国大城》为例，对其批判，希望读者能够多些批判性思维，勇敢独立思考，谨防新自由主义实践对公民权利的损害。三是建议党和政府对政策提案要进行不可行性研究，并提供部分考量标准。四是谨防影子政府，与之战斗。

15.1 背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危机的共性

沃夫冈·斯特里克在《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120][121]}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面临着同质的危机，尤其是美国，摘抄如下：

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通胀**之后，发生了80年代**公共债务的上升**，而90年代**财政的巩固**伴随着这一时期**私人债务的迅速增加**，危机最终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爆发，这种紧张局势被一个**不可持续的“向未来借款”**的过程所取代……40年来，**失衡**几乎是各“发达”工业国和“发达”工业世界的常态。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已经不再把危机看成是纯粹的经济危机。这引发人们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从前的概念——**资本主义是一种从根本上依靠私有资本连续积累过程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

日益去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轨迹有三个长期趋势。**首先是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最近因2008年的事件而加剧了这一趋势；**二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整体负债程度普遍而持续的上升**，40年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家庭、金融以及非金融企业不断累积起大量债务；**三是几十年来，伴随着债务增加和经济增长下降，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均处在上升过程中**。

多年来，这三者似乎已经相辅相成：低增长加剧了分配冲突，加剧了不平等；不平等通过限制有效需求来抑制增长；高额的现有债务堵塞了信贷市场，增加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过度增长的金融部门既是经济不平等的结果，也是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等等。

现在很清楚，资本主义世界的民主国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两个主权国家：下层的人民和上层的国际“市场”**。全球化、金融化和欧洲一体化削弱了前者，加强了后者。现在，权力的平衡正迅速向上层转移。以前，领导人需要了解和**使用人民语言**；今天，他

们必须掌握国际“市场”这一金钱语言。“人民耳语者”由“资本耳语者”接替。资本期望领导人知晓可保障投资者们以复利收回资金的秘密戏法。

资本主义可以由于过于成功而破坏其自身。我所想像的资本主义终结，是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慢性衰败的过程。虽然我们无从准确知道资本主义什么时候消失、如何消失、以及替代资本主义的将是什么制度，但重要的是，目前没有力量能够扭转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金融稳定的持续恶化趋势并终结三者之间的相互强化。

当今经济和社会混乱背后存在着结构性紧张和矛盾，社会科学几乎无能为力帮助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它所能做的是揭示它们，并指出其历史连续性，以便充分理解当前危机。它可以，并且必须指出民主国家正在戏剧性沦为全球投资者寡头集团的债务催收机构……今天，经济权力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政治权力，（笔者注：新自由主义所要求的是经济自由优于政治自由。笔者妄论，可以认为新自由主义要求经济权力大于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沦为经济权力附庸。）而公民似乎已被完全剥夺了自身捍卫民主的力量，以及向政治经济施加影响的能力；公民的利益及其诉求与资本所有者的无法相提并论。

事实上，回顾 1970 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资本主义危机，仿佛真的有可能在发达资本主义中找到一种新的（即使是暂时的）社会冲突解决方案，这一次完全有利于现在牢固地扎根于其政治上无懈可击的据点——国际金融资产阶级。

15.2 大国大城 = 超级资本原始积累

15.2.1 大国大城概述

陆铭“教授”写了《大国大城》，概括来说，他希望“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政府发力发展节约空间和时间的大城市规模集约经济——户籍改革，劳动力自由流动；一线大城市不怕大、不怕扩建，敞开展发展并吸纳劳动力，实现人员高度集聚的规模经济。

他认为，“拥挤 Time、污染 Grime 和犯罪 Crime 问题这三种“城市病”

对于中国来说并不可怕，事实上可能并不严重。大城市在合适政府政策下也不会陷入贫民窟拉美化，反而更应去实现高密度基建。

过往土地金融导致地方以邻为壑、各自为政，重复建设、高大全项目体系可以休矣。当然，这点批判完全没问题，许多专家也痛陈这一弊端，本书也涉及，这已是一种定论。但关键是，要做什么！

15.2.2 具体批判

笔者无意于多么科学详实、引经据典地说明自己的批判观点，对于这样错漏百出、昭然若揭的书来说并无必要。

接下来笔者逐条引用《大国大城》陆铭观点，然后进行具体批判：

1. 无知之幕

美国的政治学家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当中提出，一个问题中所涉及的所有各方，都应该被放在同一个标杆之后，在那儿**没有角色之分，也没有社会差异**，这样的原则被称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更通俗地说，其实这就是国际版的“换位思考”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意味着在公共政策的讨论当中，**每一个公民所持的观点应该与自己的社会身份无关**。再换句话说，**公民所持的观点不应该跟自己是否在当前处于既得利益的位置有关**。

中国的地方政府最大化本地利益，缺乏彼此之间的协调，国家利益被忽视，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发展的道路和可持续性。**中国已经到了呼吁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人放弃本地思维，顾全公共利益的时候了**。

不管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还是通过**帮欠发达地区还债**的方式，**发达地区都需要负起相应的责任**。读者可能会问，发达地区为什么要负起这个责任？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这是**统一国家的必需**，而且，发达地区恰恰是因为处于一个统一国家和统一货币区的内部，享受了统一市场的好处，获得了来自欠发达地区不断流入的劳动力资源，并且恰恰因为自身是这个国家统一货币区的一部分而成了金融中心。只想要**统一的好处，不想承担统一的义务，这是任何国家的政治都不会允许的**。

“无知之幕”之正义本身没有错，但世界不正是笼罩在功利利己这一经济学倡导的“理性”之下么？陆教授知道“发达国家才不会以天下大同为己任呢！”

但似乎不知道自由经济学家们口中所说的利己“理性人”，不止包括人，也实际包括着各级各处人的组织。从何让各级各处组织和个人放弃自利，去实现这无知之幕呢？中央如何呼吁和管控？级级以邻为壑，事权层层下压，财权层层上收的过去，经陆教授振臂一呼就变成大同天下，统一大国了？真好！共产主义一夜间到来了！真是正确又毫无营养的梦话。

我们回到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看到了历史的轮回：

现代的国家不能够也不愿意消除住房灾难。国家无非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个别资本家^①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不愿意做。因此，如果说个别资本家对住房短缺虽然也感到遗憾，却未必会受触动而去从表面上掩饰由此产生的极其可怕的后果，那么，总资本家，即国家，也并不会做出更多的事情。国家顶多也只是会设法在各地均衡地推行已经成为通例的表面掩饰工作。我们看到的情形正是如此。

笔者知道，资本和性质等问题较为敏感。这里主要请读者理解。诚然，资本主义不完美，相当具有破坏性，但至今仍是革命性的和先进的，尚未有可以取代的生产关系。早中期苏俄所谓社会主义其主体其实仍是列宁所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许并不具备充要科学成分。最终中国不能不走向这条世界性的道路，不然早就崩溃，只是我们走的太快，也舍弃了太多太多……本章首节引用了沃夫冈·斯特里克的几段话，在他看来，马克思可能悲观了，资本主义如今日益严重的危机可能在尚未有新的革命性生产关系出来之前终结。笔者对此抱有相当大的怀疑。

至于国家，也请理解这番直言。笔者只是一介草民，于国于家无用，身无长物；没有加入什么结社团体；更无什么图谋不轨。只是世界各国如今都太危险了，中国作为各大国强国眼中的大肥肉，皆欲对我食肉寝皮，更是危险中的危险；而国外垄断金融寡头对我国的侵蚀程度并不乐观，国家肯定有相关了解，情况应当比大部分人想象的要更加可怕。笔者说出来，便想给出一个小压力，使国家不至于那么乐观，政策后果不至于那么坏，能减轻一些就好。

2. 用人均 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来考量区域平衡

应该从 GDP 总量增长的考核转变为**人均 GDP 的考核**。特别是对那些人口流出地来说，追求人均 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才是长久之计，

^① 恩格斯注：这里与问题有关的只是资本家，因为参加这种事业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资本家资格出现的

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在欧洲，收入不平等减少快乐，而在美国，这种效应却不强。这实际上就和美国社会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更强有关，其实，“**美国梦**”的道理就是说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致富的机会。

前文已述（见 14.7 节），GDP、总收入的加总方式，无法说明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社会福利这类问题。大区域（比如美国的州）人均的本质仍是加总，同样无法说明这类问题。陆铭进而通过美国各州人均 GDP 比较平衡，证明美国区域发展均衡。美国梦“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致富的机会”，哈哈哈哈哈……

美国财富不平等可见表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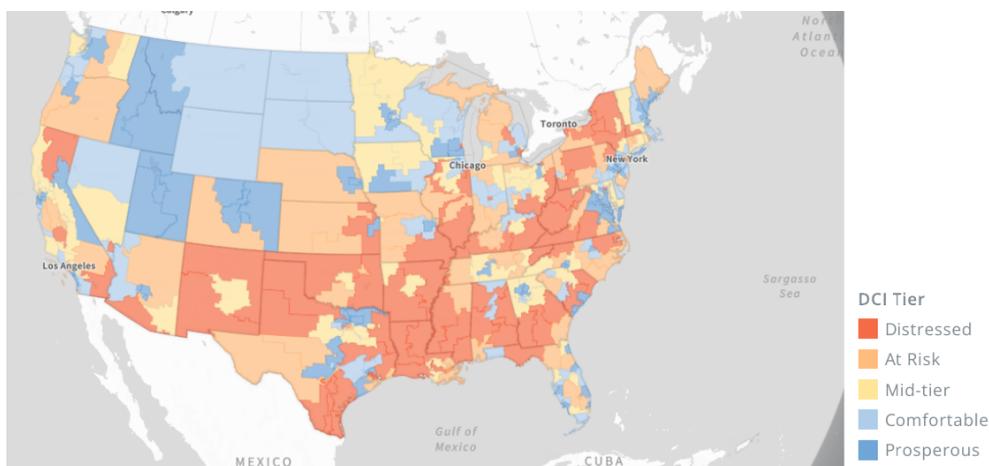


图 15.1: 美国困境社区指数（按 districts 划分）

来源：美国经济创新集团

也可以参考美国经济创新集团（The 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发布的困境社区指数（DCI, the Distressed Communities Index, 见图 15.1）。对困境社区指数 DCI 的中文介绍可见澎湃《美国社区评价：困境社区指数和繁荣城区体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以上 DCI 链接网址，进一步了解美国区域发展不平衡。

但是，城市化和地区之间的自由移民是一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只看特定时段的局部地区，就可能会觉得，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带来地区间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

陆铭倒是知道均衡需要长期（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均衡）。可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区域失衡中，中国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恐怕早已内爆了。

3. 不可能三角

第一，国家的统一。

第二，经济效率的提高。

第三，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

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而如果要破解这个“不可能三角”，就必须改变“平衡”的定义，将经济资源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转变为人均 **GDP**、人均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而这种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恰恰是可以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的，不需要大规模地采取行政控制的手段来对人口流动进行限制。

前面一条已述当前人均“平衡”的荒谬。那么按陆铭说法，我们还是要面对不可能三角。我们是要国家的统一，还是经济效率的提高，还是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呢？事实上会走到哪一步？

恐怕这三角三边全部失败，只留资本寡头的胜利，他们可以资本外逃或当买办。

4. 持续发展

未来中国的严峻挑战是城市部门是否能够**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服务业岗位**，从而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使得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直至75%，甚至80%以上的水平。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劳动力总量的枯竭，而是未来城市是否具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大家可能会怀疑，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能够实现75%以上的城市化率吗？问这个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在问中国能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最终成为发达国家**。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到底能够提高到什么程度，主要是看城市部门是不是能够**持续地提高生产率，并为农村进城的移民源源不断地创造就业**，如果能做到，农民就可以不断地减少，最终，通过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少量农民的收入**。

陆铭认为进城农民可从事餐饮、家政、网约车、快递、外卖等服务业。大城市那伟大规模的服务业，竟能容纳那么多人呵！

笔者认为，当前世界环境及生产关系之下，从无“可持续发展”。即使在主流经济学，也只有上升和下降交替的“经济周期”。持续发展是梦，或是谎言！我们必然要经历下行期，甚至可能就在五年内、后年、明年。中国自市场经济以来，尚未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我们用巨大规模超发货币逃课了，这

使我们太乐观了，真的太乐观了……

不可能持续发展的境况下，陆自己的论述就会将我们引到农民数量不可以不断减少，或者被迫挤进城市成为贫民。这点无需多说。

5. 政府支出和中央转移支付

我们的陆教授说了几句冠冕堂皇的话，既好听又正确！但能做的是什么呢？做不到的后果又是什么呢？

社会保障健全则储蓄的动机将减弱。

通过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可以为人口流出地的养老提供更多资源。更重要的是，全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将逐步走向一体化，这时，即使人口流出地面临更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也不需要担心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民在放弃土地的时候要满足自愿、有就业、有社会保障、土地（或建设用地指标）能够市场定价这几个基本的前提，让农民避免被剥夺。而以禁止市场交易的方式来保障农民，这是最为荒谬的逻辑，其结果恰恰是给不尊重土地产权的行政性剥夺找到了借口。

在“蛋糕做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就更有能力来进行区域间和城乡间的财政转移，但未来的财政转移应该更多地用于城乡和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比如说提高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和医护人员的待遇，相应地减少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政府的财政负担，以促进区域和城乡间在生活质量上的平衡，实现“动人”和“动钱”的良性互动。

如果一个城市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放大正外部性，会引导城市进一步向有效的更大规模城市发展；如果一个城市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政府的管理措施减少负外部性，也可以使这个城市更加有效地运转。

对于部分国家出现的贫民窟现象，要作有针对性的分析。城市经济是否可以持续增长，从而为农村移民创造就业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些拉美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制约了低收入阶层提高收入的机会。而在印度这样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城市经济高度偏向现代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产业，为低技能者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

中国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这在根本上可以允许中国城市政府作出更好的规划，以及向低收入居住区提供基本而必要的公共服务，来

防止大面积贫民窟的出现。

大国大城策略，要求在中国债务累累的背景下，国家继续进行巨额投资，发达城市要：巨资投入基础设施扩张。土地金融造就的大量衰退城市又被人为加大其人力流出，负债更加无力解决。中央要从自身和发达城市抽水，为衰退城市财政转移支付，用以发展落后地区的教育、培训、民生、公共服务等。你猜中央有多少钱？发达城市愿不愿意，会不会软性反抗，又能抽出多少水来？继续超发货币吗？

普遍劳动力过剩、土地金融导致多数城市衰退的现状下，让农民挤入城市谋生，小城市市民挤入大城市，大量中小企业家破产甚至负债累累，这一系列人造集约规模经济（资本史上也是一直如此人造，而非什么自由市场自由经济。）之下劳动力只会更加溢出，失业后备军必然更大。政府需要在目前负债累累、养老保障覆盖面不足、养老金缺口巨大且持续扩大的今天，负担起更全面的社会保障。说得很好，点赞！资金从何而来？如何保障就业？危机之下农民又如何自愿放弃土地前往城市？农民、城市职工的社会保障肯定要政府支出，我们当前现实的社会保障什么水平，要达到这个目标又需要什么水平呢？不知从何而来的巨额支出！

建设用地指标交易中，出卖土地指标方一般会土地资源较大、发展落后的地区。农业工业化所需人力极少，即使这些地区获取了收入，在劳动力大规模流失的情况下也难免面临大工业发展限制。人力将会进一步流失，利得者是农业工业化的所有者。

正是大规模快速城市化造就大量贫民窟，城市化在消除过往贫民窟的时候，也将在未来生产出更为恶劣的贫民窟。中国过去充满活力的“希望的贫民窟”——城中村因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发展工业和房地产中大部分消亡，但将在步步改造中产出生活条件恶劣、犯罪事件频发、公共服务无法保障、没有明天的“绝望的贫民窟”（见 2.8 节），届时将处处有“深圳三和”，里面到处有不怀希望的“挂逼”。

20 年来，各行各业均有不少人担心中国出现“拉美化”，陆认为中国实现大国大城就不会“拉美化”，要求政府“作出更好规划……基本而必要的公共服务”等等。其真实目的是将可能出现——其实是必然出现的——将“拉美化”贫民窟的责任转嫁给政府！不是我的政策提议不好，而是因为政府技术和管理水平差，超出预期！不知道读者们是否还记得本书提及的个别专家学者对 80 年代中后期双轨制的论述。政府管理水平又如何提高至可以应对其中种种问题？政府实际能力的限度是多少？我想政府和专家都应该明白。

当前地方以邻为壑、各自为政，陆对此也批判。但陆所要求的是 1980 年代以来一个从未有过的空前集权的中央政府！一个具备超凡入圣管理水平的政府！一次**超级大跃进**呵！完全无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复杂化，更重要的是无视现实境况。

全国土地的市场定价，呵呵，恐怕是软硬暴力下才会有这样一个“市场”吧。这条放在本节总结时再论述总结。

6. 地方比较优势

一些“专家”提出了常人都不理解的“比较优势救国论”，倡议中国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农村、农家乐、山海旅游景点或港口均是如此，大多数人第一反映是这究竟能对这么大中国的经济帮助多少？类似观点有时并非是“专家”高瞻远瞩，**更可能是别有用心**。将特殊提升至一般，建立自己提案的伪合法性和伪有效性，隐藏其真实动机。

个别、特殊、一般（普遍）这三个基本的哲学概念及其矛盾和张力常常被忽视。国家和人民要小心对待任何“比较优势”说法！比较优势基于区域**特殊性**，一定要考察相应提案能覆盖和折射中国多少区域；有相近比较优势的区域过多也会使其同质化，走向**一般性**，丧失**特殊性**，届时哪有什么比较优势，只有比较破败。

15.2.3 总结——美国式道路的超级原始积累

本节以陆铭《大国大城》为例展开批判，并非因为陆铭是段位很高的“高级知识分子”或很专的“专家”。相比于他那些可以十句话里九句真、只有一谎为利益的同路“专家”，他的话术并不高明，往往以片面论述全面，以个别论证一般，以小作文抒情代替论证，但其“大国大城”政策提案却真是太可怕了。

大国大城其实并无多少新意，其实只是我国政府 2012 年正式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新四化的扩大版，我们也一直在走这条道路。要说有新意，那就是倡议立刻将区域限制由省市县直接扩展到国家一级。

土地的自由留转、自由市场定价没有在过去 200 年出现过，也不会在未来几年实现，只能在农业农村税、政府和资本协作的羊吃人、农业工业化挤出小农生存空间等软硬暴力中实现。希望是不学无术的笔者错了。

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基本了解的人，便可以看出这是赤裸裸的超级“**资本原始积累**”，并且是超级“**美国式道路**”。

我们回看历史，美国式道路是建立在殖民者造成的印第安人累累白骨之上。19世纪中后期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正是害怕血淋淋原始积累才积极学习马克思，向马克思求助，探索社会主义道路。1900年代之初政治强人如列宁认为俄国要生存和发展最好是经过“美国式道路”——农业工业化资本家，但他也只敢借希望由沙皇俄国来推动，沙俄没有推动，列宁掌权后也不敢推动。强人斯大林掌权后搞了古拉格和大迁徙，仅饿死人就600万人以上，造成巨大灾难（见9.8.1节），效果未有多好。强人毛泽东尝试大兴农田水利基建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社会实验失败后，也只是城乡二元对立固化、工农剪刀差，先保障城市经济，同样没有搞“美国式道路”。对于中国现状来说，这仍将是极为可怕的、血淋淋的！

大量失地农民，过剩的产业后备军（失业和半失业者），破产中小企业，无限压低的工资……中国人已经不是饿不死就不乱的中国人了，届时党和国家将面临极大危机，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危机！陆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谁最得利？最后的胜利者只有国内外的金融和土地食利者——金融垄断资本家（土地已彻底归于金融）。

这便是新自由主义，步步吸取国家政府和人民血液，至死不休，定要寝骨食皮。矛盾最后可能直接被转嫁给党和国家。“啊，政策是好的，让和尚念歪了”！党和政府不可不防啊！

事实上，笔者还见到有其他“专家”设此同样路径——他们一方面大给糖衣炮弹、赞美党和国家能力；另一方面将必然会失败的内容，同时也是私人资本不愿承担的内容，推给国家负责。例如倡议政府和国有企业负责必然会被债务压垮的巨型重固定资产投资，同时要求国家负责消除届时兴起的条件愈来愈差的贫民窟等。

我国在1992年后没有经历完整经济周期，1998、2008年左右依靠原垄断在国家的土地红利超发货币渡过难关，但不会一直这样下去。除非我们能战胜美国资本，危机转嫁美国；或者战争侵夺他国财产、灭失自己人口等等……这都是太过邪恶的道路，并且有着艰难未知后果。

党和国家需要更悲观反思危机，需要更谨慎小心政策提案，甚至可能需要坦诚面对和释放一些危机。超发货币不持续，其实谁都知道……

15.3 建立健全政策提案的不可行性报告

笔者建议党和国家建立健全全国性政策提案的不可行性报告，慎重对待任何人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提案。可包括如下内容：

1. 建立各种不同倾向专家、官僚组成的评审机制，建议倾向于有才，但少名少利或暂受抑制的人员。

2. 由情报机关牵头对提案人及其关联人员、组织做背景调查，简明描述其政策倾向。

3. 提案人需说明提案倾向于投资还是消费，二者内容如何划分，篇幅不必长，但必须涉及具体举措。

如提倡“居者有其屋”的赵燕菁应说明政府需投资多少，政府债券是否会造美国式次贷危机，城市报障房规模到底能多大、到底能容纳多少人，如何健全报障房租户审核，退出机制如何，报障房又如何不影响商业房等，与19世纪英国一些所谓住宅报障计划有何本质区别，而不是只以杜甫式“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共欢颜”的话术模糊其真实目的。

对可能出现的破坏性后果必须详细说明，话不必多，但要涉及要点难点。《大国大城》就是未对破坏后果详细说明的反面例子，前文已批判。

4. 警惕一切需要政府大力兜底的政策。我们的一些提案者们已经习惯于边拍政府马屁，边让政府“负责”某些必然或极可能失败的内容。届时出了问题，“非我之罪，罪在政府，政府大罪！”。

5. 提案不可行性报告是领导接见提案人的前提，莫要被“赞许”冲昏头脑。

15.4 谨防影子政府

美国有 Shadow Government (影子政府)，或曰 Deep state (深层国家)，现在基本上是易得认识。笔者甚至怀疑 New World Order (新世界秩序，多国顶层资本精英和政府权力贵族组成的幕后世界政府) 到底是阴谋论还是现实……

世界各主要经济国普遍持续超发货币，制造货币炸弹摧毁之前的货币；寅吃卯粮的丧失理性，进行着“击鼓传花”和“只要我跑得比你快”的庞氏骗局金融游戏；为了躲避1929年美国大萧条危机而持续吹大泡沫、给未来炸弹持续装填炸药；为“大到不能倒”甚至“大到不能判刑”的金融资本集团造血；人民在超发货币中不停缴纳铸币暗税……

这其中负债累累的政府其实并不是胜利者，暂时的胜利者只有财富分化日益严重下越来越富的顶级富人阶层。当然，他们现在也面对当前世界天威难测的大变局。(见^[118]、^[121]、8.2节“希拉里邮件门事件”)

结合新自由主义批判说法（见第7章），影子政府应是金融精英和权力贵族的合体，以政府透支于公共债务减轻投资压力、加快资本流转，并做私人贷款的催债机构，来使自己的资本增殖。

读者们应该比较熟悉日本和韩国“财阀”一词，其实财阀即**康采恩垄断集团**。康采恩以其金融垄断机构为核心，直接或间接控制多行业领域中的企业，往往涉及各行业全链条或主要部分，实现横向纵向全面垄断，为金融中心服务，获取超额利润。

中国也有自己的康采恩，如一些IT集团（这很可能也只是显露出的冰山一角）。2020年7月15日，蚂蚁金融服务集团运营主体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变更企业名称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0月24日，马云在上海第三届外滩峰会上发表一番惊世骇俗的演讲，笔者认为其深层目的在于除了欲让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一“科技公司”取代央行货币的四大职能——价值尺度、流通、贮藏、支付手段；还要超高杠杆、无节制发展金融信用；消泯国家金融监管职能乃至世界金融监管体系！

传统的金融公司都受到巴塞尔协议的限制，可是蚂蚁科技通过将自己“包装”成科技公司绕过了监管，并且依托其行业垄断地位和大数据红利等获得了传统金融公司无法得到的超额利润。一旦蚂蚁科技集团出现金融风险而国家不得不出手救助，就意味着让全体国民被动帮它分担和承受巨大风险损失。

2021年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处以行政处罚，并处以182.28亿元人民币。2021年7月7日，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对蚂蚁集团及旗下机构处以71.23亿元罚款，并关停其旗下的“相互宝”业务。两次巨额罚款之后，阿里股票大涨，资本市场认为蚂蚁“利空出尽”，投资信心回升……在其演讲和事后处罚的表现上，我们都可以直观感受到金融垄断资本的强势地位和野蛮狂妄。

中国体量太大，营养太丰富，国外反动势力意图阴谋颠覆中国之心未曾停歇。在当今残酷的世界政治竞技场中，一个伤痛的中国将被诸多国家、甚至本国买办——金融精英和腐败权力贵族群拥而上，饕餮而食，渣骨不剩，万劫不复。不了解当前世界政治这一残酷性，要么是幼稚无知，要么是包藏祸心，望大家明鉴，莫要让亲者痛、仇者快。我们砥砺前行吧。

党和政府一定要深刻理解并运用好习总书记所说“人民监督”“自我革命”两种武器，一定谨防影子政府的产生，或者与已经产生的影子政府开展艰苦卓绝斗争。影子政府总的意图是相通的——侵蚀中国国力和民生，借此满足自己对资本增殖的无限贪欲。

主人说，“你这又可恶又懒惰的奴仆！你既然知道我在没有播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收获，就应该把钱存入钱庄，等我回来可以连本带利还给我。”

“所以收回他的一千银币，给那个有一万银币的奴仆。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更多，让他丰富有余；凡没有的，连他仅有的，也要夺去。把这没用的奴仆扔进外面的黑暗里，他必在那里哀哭切齿。”

—— 《圣经·马太福音》

插图索引

1.1 丁家庄村碑	4
1.2 熙熙攘攘的三八大集	5
1.3 北侧一处出租楼房外景	5
1.4 一条街道	6
1.5 城中村最为破败的一间自搭棚户	7
1.6 笔者田野调查中租住的单间	7
1.7 夫妻二人和他们一岁孩子所租住的储藏室	8
1.8 城中村中等水平的简易卫生间	9
1.9 阳光	10
1.10 二楼房顶私搭简易板房	10
1.11 丁家庄村民常用的木柴铁皮桶炉	11
1.12 幼儿园外墙与线缆	12
1.13 玩耍的孩子们	12
1.14 改造楼梯、层层加盖的一座楼房	13
1.15 街景	14
1.16 丁家庄综合市场中的一处菜摊	14
1.17 城中村内一处简易搭建的菜摊	15
1.18 简易菜摊消失了	15
1.19 墙上张贴的治安告示	16
1.20 一位走丢的小孩暂在三轮车摊主的怀抱中睡着	16
1.21 一处住户外侧的绿植与杂物	17
1.22 一处阳台——花与衣	17
1.23 丁家庄工业南路南区一户未拆住房的外墙	18
12.1 1985–1998 年主粮定购价、议购价、市场价曲线图	143
12.2 1980–2017 年粮食产量	144

12.3 1980–2017 年粮食产量增长率（较上一年）	144
12.4 1980–1998 年粮食市场真实价格（1978 年不变价格）	144
12.5 1977–2023 CPI GDP 较上年增长率 %	157
13.1 2008 年以前工业增长、土地财政与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 ...	209
13.2 2008 年后软预算约束与地区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209
13.3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示意图	213
15.1 美国困境社区指数（按 districts 划分）	240

表格索引

2.1	1990-2014 年中国城市贫民窟人口比例及数量	19
4.1	20 世纪死于战争、屠杀和压迫的人数统计表	43
12.1	1978-2023 城乡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当年价格）	146
12.2	部分乡镇企业数据	151
13.1	1993-2005 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及转移支付规模	194
13.2	不同土地出让方式出让土地面积、收入的构成	202
13.3	2008 年四季度到 2010 年底，4 万亿元投资的重点投向和资金 测算	208
14.1	1988-2021 财政及土地出让收入（单位：亿元）	216
14.2	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	224
14.3	全球债务总额（占 GDP 百分比，加权平均数）	225
14.4	全球公共债务（占 GDP 百分比，加权平均数）	225
14.5	全球私人债务（占 GDP 百分比，加权平均数）	225
14.6	全球财富不平等趋势	234

参考文献

- [1] 孟繁瑜, 刘红海. 城市化过程中的贫民窟问题[J/OL]. 中国城市报, 2015(07) (2015-07-06). http://paper.people.com.cn/zgcsb/html/2015-07/06/content_1584683.htm (引用页: 19).
- [2] **UN-HABITAT**. *World Cities Report 2016: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 Emerging Futures*[M]. **United Nations, 2016** (引用页: 19).
- [3] 马克思 卡, 恩格斯 弗.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引用页: 27, 82, 102, 117).
- [4] 臧峰宇.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研究读本[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引用页: 28, 65).
- [5] 张笑夷. 列斐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研究[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引用页: 29, 101).
- [6] **HARVEY D.**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M]. **Verso books, 2012** (引用页: 32).
- [7] 人权[EB/O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9D%83> (引用页: 39).
- [8] 如何看待北京医生辞职去阿富汗参加无国界医生? [EB/OL].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835987> (引用页: 39).
- [9] 丽水市教育局. 《朗读者》首期特邀嘉宾蒋励[EB/OL]. http://www.sohu.com/a/127492681_387142 (引用页: 39).
- [10] 邱仁宗. 一本医学家、遗传学家、决策者和立法者必读的书: 读《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J]. 医学与哲学, 2002, 23(5): 61-63 (引用页: 40).
- [11] **WHITE M.** *Necrometrics: Death Tolls across history*[EB/OL]. <http://necrometrics.com/all120c.htm> (引用页: 42).
- [12] 易江波. “人相食”: 中国史中的一个固有表述及其法理[J]. 人大法律评论, 2015, 2 (引用页: 43).
- [13] 郑麒来. 中国古代的食人: 人吃人行为透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引用页: 43).

- [14] 丁赛尔. 国际劳工实践标准将对我国企业构成潜在威胁[N]. 2011-11-18(003) (引用页: 45).
- [15] ”新生代”ilabour 课题组. 富士康最新工资、工时与生产管理调研[J]. 政治经济学报, 2015, 4: 97-132 (引用页: 45).
- [16] 中国网. 华为买断工龄终辟谣专家指其行为“双输” [EB/OL]. (2007-11-08). http://www.china.com.cn/tech/txt/2007-11/08/content_9196708.htm (引用页: 46).
- [17] 瞭望东方周刊. 华为: “自愿”的奋斗者协议[EB/OL]. (2010-09-21). <http://focus.news.163.com/10/0921/15/6H4600P00011SM9.html> (引用页: 46).
- [18] 钛媒体. 58 同城要实行“996 工作制”了, 姚劲波微博正被员工攻陷[EB/OL]. 钛媒体. (2016-09-02). <http://www.tmtpost.com/2453930.html> (引用页: 46).
- [19] 滴滴北京. 滴滴大数据 | 2016 年最“狠”公司大揭秘[EB/OL]. 滴滴北京. 2016.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NjAyODM0NQ==&mid=2650506049&idx=2&sn=38698a2abe64348969f064704c62ae02 (引用页: 47).
- [20] 陈日华. 19 世纪英国对工厂制度的规制: 实践与立法[J]. 贵州社会科学, 2014 (引用页: 47).
- [21] 马克思 卡. 资本论: 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引用页: 47, 48, 50).
- [22] 马克思 卡. 资本论: 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引用页: 49).
- [23] Foxconn[EB/OL]. Wikipide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oxconn> (引用页: 50).
- [24] 刘绪贻. 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J]. 美国研究, 1991(1): 70-92 (引用页: 55).
- [25] 王小鲁. 美国大萧条与新政再思考[J]. 比较, 2020(2) (引用页: 55, 56).
- [26] 张世明. 经济法学的经济学基础探讨[J]. 经济法学评论, 2001, 1: 349-389 (引用页: 55).
- [27] 列宁. 列宁全集: 第 29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人民出版社, 2017 (引用页: 57).
- [28] JAHAN S, MAHMUD A S, PAPAGEORGIU C. *What is Keynesian economics*[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4, 51(3): 53-54 (引用页: 58).
- [29] 李小科. 澄清被混用的“新自由主义”: 兼谈对 *New Liberalism* 和 *Neo-Liberalism* 的翻译[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01): 56-62 (引用页: 59, 63).
- [30] 林光彬, 张蔚. 新自由主义研究综述与研究新思路[J]. 教学与研究, 2005(05): 55-62 (引用页: 61).

- [31] 哈维 大. 新自由主义简史[M]. 王钦,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引用页: 62-64).
- [32] 哈曼 克. 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研究的反思(上)[J]. 国外理论动态, 2008(09):6-12 (引用页: 64).
- [33] 哈曼 克. 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研究的反思(下)[J]. 国外理论动态, 2008(10):27-32 (引用页: 64).
- [34] 马克思 卡, 恩格斯 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上册[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引用页: 82).
- [35]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 张企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引用页: 82).
- [36] 马克思 卡, 恩格斯 弗.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引用页: 83, 232).
- [37] 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M]. 罗达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引用页: 84).
- [38] 刘建国, 马龙闪. 马克思的预言与俄国村社的历史命运: 对马克思与民粹派通信的解读[J]. 2011(05):26-29 (引用页: 84, 86).
- [39] 李静.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经济周期理论及其影响[D]. 云南: 云南大学, 2011 (引用页: 85).
- [40] HOWARD M C, KING J E.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1883-1929*[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引用页: 85, 86, 88, 98).
- [41] 沈志华.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引用页: 86, 87, 90, 95).
- [42] 王游.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关于护国主义问题的论战[EB/OL]. 中国俄欧亚研究网. (2014-07-15). http://euroasia.cssn.cn/cbw/cbw_wzsf/201407/t20140715_1781855.shtml (引用页: 87).
- [43] 列宁. 列宁全集: 第 42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人民出版社, 1985 (引用页: 90).
- [44] 列宁.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人民出版社, 2009 (引用页: 90).
- [45] 闫永飞. 苏联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新经济政策[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引用页: 91, 92).
- [46] 闻一. “路标转换派”回俄后的命运[EB/OL]. (2016-08-26). <http://cul.qq.com/a/20160826/005126.htm> (引用页: 91).
- [4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 第二分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引用页: 92).

- [48] 布哈林. 布哈林文选: 上册[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引用页: 93).
- [49] 布哈林. 布哈林文选: 中册[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引用页: 93).
- [50] 布哈林. 斯大林全集: 第 11 卷[M].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5 (引用页: 94).
- [51] 徐隆彬. 对苏联全盘集体化时期富农迁移问题的历史考察[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4(06): 67-78 (引用页: 95).
- [52] 李燕. 乌克兰“大饥荒”: 不仅是个历史真相问题: 兼析历史问题的政治化[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2(01): 69-77 (引用页: 95).
- [53] 霍华德 M C, KING J E.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 1929-1990[M]. 顾海良, 张新,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引用页: 95).
- [5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 第四分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引用页: 96).
- [55] 黄立菲.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引用页: 96).
- [56] 吴恩远. 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J]. 历史研究, 2006(06): 167-179 (引用页: 96).
- [57] 陈新田. 列宁“美国式道路”思想述论[J]. 社会科学论坛, 2005(06): 4-6 (引用页: 98).
- [58] 亨利·列斐伏尔. 资本主义的幸存[M]. 米兰,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4 (引用页: 101).
- [59] 王晓玲. 中国医疗市场政府管制的历史演进及制度反思[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2(03): 113-119 (引用页: 108).
- [60]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引用页: 110, 111, 115, 116, 120, 141).
- [61]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引用页: 111).
- [62] 鄢一龙, 胡鞍钢. 中国十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情况回顾[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27(4): 35-45+158 (引用页: 111, 116, 139).
- [63] 胡安全.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与经济体制改进[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7, 24: 41-49+126 (引用页: 112).
- [64] 周飞舟, 谭飞智. 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引用页: 112, 164, 166, 189, 194, 203, 207, 213).

- [65] 周雪光.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一个组织学研究[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引用页: 112).
- [66] 刘晓泉, 吴焱军. 新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探析(1949—1959年)[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2, 29: 105-119+158-159 (引用页: 113).
- [67] 温铁军. 八次危机: 中国的真实经验 1949—2009[J]. 2013 (引用页: 114).
- [68] 宋霖. 张恺帆“反党联盟”案考辨[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0(05): 12-20 (引用页: 119).
- [69] 宋霖. 张恺帆在 1959 年[J]. 炎黄春秋, 2012(08): 65-71 (引用页: 119).
- [70] 陈者香. 安徽六十年代的“责任田与七十年代的“大包干”[J]. 百年潮, 2010(12): 55-59 (引用页: 119).
- [71] 张恺帆. 张恺帆回忆录[M]. 宋霖主编. With a comment. by 宋霖, 刘思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4 (引用页: 120).
- [72]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志·人口志[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引用页: 120, 121).
- [73] 姚宏志. 1959~1961年安徽灾荒的差异性分析[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3(02): 37-41 (引用页: 121).
- [74] 邓敬雷. 取消户籍制度, 推动全面改革[EB/OL]. 中国改革论坛. (2015-05-10). http://www.chinareform.org.cn/society/huji/Report/201303/t20130325_163484.htm (引用页: 123).
- [75] 李若建. 困难时期的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J]. 社会学研究, 2001(06): 31-42 (引用页: 123).
- [76] 朱佳木. 谈谈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J]. 党的文献, 2000: 8-20 (引用页: 131, 137).
- [77] 王传东. “洋跃进”问题探析[D]. 中共中央党校, 2009 (引用页: 136).
- [78] 赵紫阳. 改革历程: 完整录音还原历史[M]. 香港: 新世纪出版社, 2009 (引用页: 138).
- [79] 陶昌盛. 中国粮食定价机制研究[D]. 复旦大学, 2004 (引用页: 141, 145).
- [80] 胡小平, 范传棋, 高洪洋.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粮食价格调控的回顾与展望[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45: 23-29 (引用页: 141, 142).
- [81] 王德文, 黄季焜. 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双轨过渡与双轨终结[J]. 改革, 2001: 99-106 (引用页: 142, 183).
- [82] 卢迈. 实行“保量保价”的双轨制: 我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J]. 改革, 1997: 54-57 (引用页: 142, 178).

- [83] 汪晖.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 文艺争鸣, 1998(06):6-21 (引用页: 146).
- [84] 袁方. 中国就业问题和劳动制度改革[J]. 社会学研究, 1992:1-5 (引用页: 154).
- [85] 张曙光. 中国经济学风云史: 经济研究所 60 年(上卷(II)) [M]. 新加坡: 八方文化创作室, 2017 (引用页: 154, 157, 159, 161, 162, 189, 190).
- [86] 汪强. 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D].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引用页: 155, 162).
- [87] 杨继绳. 价格改革: 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J]. 炎黄春秋, 2009:18-23 (引用页: 155, 158).
- [88] 姚洋. 作为一种分配正义原则的帕累托改进[J]. 学术月刊, 2016:44-54 (引用页: 158).
- [89] 朱富强. 帕累托改进原则能否应用于社会改革?: 实践的可行性和内在的保守性[J]. 学术月刊, 2011:82-90 (引用页: 158).
- [90] 宋圭武. “帕累托最优”质疑[J]. 甘肃理论学刊, 2008:67-69 (引用页: 158).
- [91] 杨帆. 人民币汇率制度历史研究[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5:59-64 (引用页: 160, 162).
- [92] 管涛. 四次人民币汇改的经验与启示[J]. 金融论坛, 2017:3-8+18 (引用页: 162).
- [93] 邵宇, 陈达飞. 流动性经济学 | 人民币汇率 70 年: 汇率并轨的始末与纠结[EB/OL]. 澎湃新闻·澎湃商学院. 2019.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033359 (引用页: 162, 163).
- [94] 赵燕菁. 大崛起: 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 (引用页: 163, 171, 201, 233).
- [95] 刘尚希. 财政改革四十年的深层逻辑[N/OL]. 经济日报, 2018-09-20(14). http://views.ce.cn/view/ent/201809/20/t20180920_30347369.shtml (引用页: 164).
- [96] 中国工业信息网. 改革开放三十年纪事: 试行“拨改贷”[EB/OL]. 中国改革信息库. (2008-09-16). <http://www.reformdata.org/2008/0916/23089.shtml> (引用页: 164, 169, 170).
- [97] 马骏.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J]. 当代中国研究, 1995 (引用页: 168, 188).
- [98] 董志凯. 由“拨改贷”到“债转股”: 经济转型中企业投融资方式的变迁(1978—2015) [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6(03):5-15 (引用页: 169).
- [99] 林毅夫, 李志赞.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J]. 经济学, 2005:913-936 (引用页: 169).
- [100] 卢锋. 三次粮食过剩(1984-1998): 我国粮食流通政策演变的备择解释[R]. 讨论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999 (引用页: 178).

- [101] 温铁军. 中国 50 年来 6 次粮食供求波动分析[J].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7-9 (引用页: 179).
- [102] 王小鲁. 中国粮食市场的波动与政府干预[J]. 经济学 (季刊), 2001, 1(1): 171-192 (引用页: 181).
- [103] 曹宝明. 中国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进程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01: 23-30 (引用页: 182, 185).
- [104] 魏赤娅, 孙杰. 坚定不移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N]. 科技与经济画报, 1998 (引用页: 183).
- [105] 邓大才. 粮改 30 年: 农民、市场与国家的博弈与利益重构[EB/OL]. 中国改革论坛. (2015-03-19). 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Agriculture/Practice/201503/t20150320_220991.htm (引用页: 186, 188).
- [106] 兰小欢. 置身事内: 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引用页: 189, 195, 207).
- [107] 江大桥. 我们地方没钱: 分税制改革下中央与地方的博弈[EB/OL]. 格隆汇. <https://www.gelonghui.com/p/173177> (引用页: 189).
- [108] 曾晟.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二元财政结构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引用页: 191).
- [109] 贾康, 白景明. 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 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J]. 经济研究, 2002: 3-9 (引用页: 193).
- [110] 王振霞. 中国住房制度改革 40 年: 回顾与反思[J/OL]. 财经智库, 2018, 3: 128-136+144. DOI: 10.20032/j.cnki.cn10-1359/f.2018.02.012 (引用页: 198).
- [111] 张清勇. 纵向财政竞争、讨价还价与中央——地方的土地收入分成——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土地收入的考察[J].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08: 107-127 (引用页: 200).
- [112] 袁一泓. 从沸腾到癫狂: 泡沫背后的中国房地产真相[M].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1 (引用页: 203, 205, 207, 208).
- [113] 杨俊. 全面认识养老保险改革中的名义账户制度[N]. 人民日报, 2015-03-02 (引用页: 206).
- [114] 范剑勇. 四万亿如何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EB/OL].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2018-11-16). <https://econ.fudan.edu.cn/info/1024/3148.htm> (引用页: 208).
- [115] 汪晖, 陶然. 论土地发展权转移与交易的“浙江模式”——制度起源, 操作模式及其重要含义[J]. 管理世界, 2009(8): 39-52 (引用页: 212).
- [116] 黄瑾, 陈红霞.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评价——基于文献综述[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21 (引用页: 214).

- [117] 王小鲁. 土地财政的昨天、今天和明天[EB/OL]. 爱思想. 2022. <https://www.aixiang.com/data/138457.html> (引用页: 215).
- [118] **PIEPENBURG M, von GREYERZ E.** *Gold Matters: Real Solutions to Surreal Risks*[M/OL]. Egon von Greyerz & Matthew Piepenburg, 2022. <https://books.google.co.jp/books?id=GuwozwEACAAJ> (引用页: 228, 246).
- [119] 张文喜. 所有制与所有权正义: 马克思与“亚当·斯密问题”[J]. 哲学研究, 2014(4): 11-18 (引用页: 232).
- [120] 沃夫冈·斯特里克. 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J]. 经济导刊, 2015: 84-92 (引用页: 236).
- [121] **STREECK W.**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M]. Verso Books, 2017 (引用页: 236, 246).